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美较量大写真 (上)

 **eBOOK**
网络资料 非精英

代 序

《中美较量大写真》一书出版了，我表示祝贺。在中美关系又处于微妙的时刻，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逼使中国与其进行较量的内情和史实向广大读者展示，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美国以超级大国自居，到处插手，对别国颐指气使，狂妄地用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去规范别国，搅得世界不得安宁。新中国成立前，它出钱出枪，帮助国民党打内战。新中国成立后，它又处心积虑对新中国加以扼杀，除了没有投放原子弹，其他凡是能想得出的手段都用上了。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又搞得中美之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双边关系得不到正常发展。它看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感到由它代表的西方所主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受到了挑战，于是为了限制中国的影响，保持国际现存旧秩序的稳定，就苦心孤诣向中国挑战，挖空心思制造麻烦。这样“中国威胁论”就首先彼炮制出来了。美国想以此离间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关系，怂恿它们发展军备，制造紧张空气，毒化”中国的周边环境。在此同时，它又明里暗里祭起了冷战时期似乎有效、实际早已破产的“遏制”政策，企图在各个领域对中国施加影响，从而达到最终阻止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尽管美国政府竭力否认，声称美国执行一种对华“全面接触”政策，但是，从美国资深政界人士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的谈话中，从美国国会山上某些议员先生不断发出的反华喧嚣中，在现实的中美两国各个领域的交往中，特别是某些美国媒体的明目张胆的鼓吹中，这种倾向却表现得相当露骨。比如，我国在我东海地区进行立常军事演习，美国竟然置自己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庄严承诺于不顾，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的行动横加指责，并把航空母舰开进台湾附近的海域进行炫耀，为“台独”分子撑腰打气，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然而，我相信，这种“遏制”政策，到头来肯定会失败。如果说，冷战时期，中国的经济力量还相对较弱，美国的“遏制”政策都破产了，那么经过改革开放后这么多年的发展，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的今天，这种“遏制”政策也一定会失败，美国又将是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曾任中国驻美大使多年，深知中美两个国家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都是对世界有着重要影响、负有重要责任的国家。两国和平相处，多些谅解，多些尊重，对双方都有好处，反之，则共同受害。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是一种警示。对美国，能起一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不能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就反对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对别国指手划脚；更不能搞不得人心、强加于人的那一套。对我们中国，则是能让国人牢记，落后挨打，落后受人欺侮。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发展经济，埋头苦干，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只要我们自己的事办好了，强大了，那对什么事情都可以应付裕如。

1996年3月15日

再版说明

本书出版之后，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许多读者表现出了很高热情，纷纷来信来电表示祝贺，其中既有干部，也有知识分子、工人，这使我们倍受鼓舞。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者面前誓不低头、永远抗争的斗志令人精神振奋，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这对我们了解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大有益处。

特别需要告诉读者朋友的是，本书在海外也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通讯社和报纸以“中国掀起爱国主义浪潮”为主题对本书的出版进行了报道，有的还详加评论。他们是：

法新社，埃菲社，香港《南华早报》、《大公报》、《明报》、《天天日报》，台湾《中国日报》，马来西亚《南洋商报》，菲律宾《世界日报》，泰国《星暹日报》……等等。

美国《华尔街日报》等传媒也对此予以强烈关注。

老子天下第一，老子说了算。

美国的自恋和霸道天下有名。

过去，美国人把战火烧到鸭绿江，今天，它又把2艘巨型航空母舰调到台湾海峡附近。战云密布。

1996年3月19日，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恫吓中国：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厉害的海军，谁也不要忘了这一点。”

同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宣称美国应该帮助台湾，“使之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入侵、导弹袭击或者封锁”。

这情景，犹如一个陌生人闯进你家里，叫嚣要保护你的孩子。

这只是中美近50年全方位较量中小小的一幕……

本书作者均是国际问题专家，他们以深厚的专业基础和广博的学识，从中国、美国、英国、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广泛收集资料，精心撰就此书，以纪实手法全面展示了半个世纪来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诸领域的较量和对抗，堪称国内第一部全面反映中美关系的权威纪实作品。

中美较量

第一章 失之交臂，刀戟言语相较量

新中国刚刚诞生，美国即出兵朝鲜，同时派遣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对我形成两面夹击之态势，企图扼杀我于摇篮之中。毛泽东英明果断，毅然下令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保家卫国，美军虽气焰嚣张，终难抵我正义之师。板门店谈判、日内瓦会议，使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漫长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两国虽针锋相对，但也以特殊方式互通了信息。

第一节 交兵朝鲜

红色中国的诞生，引起西方极大恐慌。为了打垮社会主义阵营，阻挠中国的统一，美军悍然出兵朝鲜，并与蒋介石密谋，目标直指大陆……

“红色恐慌”与“亚洲警察”

历经冰冷的漫漫长夜，忍受数不清的血雨腥风，新中国终于像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横空出世，照亮整个世界。

人们不会忘记，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以其雄浑的声音，庄严地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洪亮的声音犹如晴空中的一声霹雳，震动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也引起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恐慌。

新中国虽刚刚从疮痍满目、硝烟弥漫的炮火中诞生，但在毛泽东领导下，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正豪情满怀、自力更生地塑造一个崭新的国度。新中国的解放和蒋家王朝的垮台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来说不亚于一声晴天霹雳，特别是中国的“丢失”在整个美国政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共产党的中国与苏联结盟这一现实使美国人茫然不知所措。美国人已习惯于看到中国人仰慕美国的文化和宗教，依美国人的鼻息和眼色而战战兢兢地生存，而新中国却敢于拒绝美国的干涉，敢于挑战美国人在中国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1937年以前，美国政府在中国所起的作用相当小，美国卷入中国事务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传教士、商人和慈善团体来实现的。但1937年以后，罗斯福总统改变了这一政策，通过对国民党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持，使中国成了其战后的伙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政策的演变，到了40年代后期，维护美国人在华的利益同维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继续执政便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体。在一般美国人的眼里，是他们创造了蒋介石及其政权，是他们创造了“真正的中国”，而现在它却被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共产党所控制了。这样，他们自然认为一个不受蒋介石统治的中国，就不是他们心目中的“真正的中国”了。因此，美国拒绝与共产党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继续不顾事实地把台湾岛上的蒋介石残余力量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强大，美国处心积虑想限制所谓“红色中国”的蔓延。此时，美国的一群蛊惑人心的政客，以其顽固的反共立场而登台，获得了权力，并大搞政治迫害。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是最有名的代表。麦卡锡和他的同伙们对外交部门实行了恐怖统治，进行人员大清洗，把原美国政府中最有经验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外交官无情地赶出办公室，并在中美关系上罩上了一层烟幕。于是，美国的外交官们都变得“聪明”起来，尽量避免在中国问题上标新立异，以免招灾惹祸，引火烧身；而新的国际问题专家则一边倒地认为美国应成为“亚洲的警察”。

在新中国成立后仅两个多月的1949年12月30日，杜鲁门总统就批准了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48—2号报告），该报告使美国坚定地建立了“防止共产党在亚洲进一步扩张”的政策。

1950年1月，杜鲁门总统再次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检查美国的防卫政策，并于同年6月完成了一项“国家安全委员会—68”的研究项目。该研究预示，“自由世界”（以美国为首）和共产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之间

将维持一种长期的对抗。这份绝密报告（直到 70 年代才解密）暗示需要增加美国的国防开支 300—400%，这不仅是为了对抗来自苏联的直接挑战，而且也是为了对付各国风起云涌的向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发动进攻的民族运动。

“国家安全委员会—68 计划”实际上是一个“武装动员令”，它号召美国及其盟国大规模地增加他们的军备，准备抵抗已出现的苏联的威胁。以保罗·尼采为首的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专门研究小组写出了大量文件，把世界描绘成为共产党在任何地方的胜利就意味着美国的损失。“国家安全委员会—68 计划”不允许有任何灰色的地区存在。美国政策的制定者把所有的威胁都看作是苏联扩张的先兆，为了在世界各地保持现有的秩序，美国将实施人为的干涉，甚至不惜孤注一掷。

对于如何防止“中国共产党的扩张”，尽管美国当时还没有制订出具体的措施，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经济制裁和封锁之外，应该尽快建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包围圈。

“三八线”的隆隆炮火

1950 年 6 月 25 日凌晨，毛泽东书房的灯光依旧亮着，值勤的警卫换过一班又一班，可毛泽东却仍然是彻夜不眠。书桌上的两个烟灰缸早已堆满了小山似的烟蒂，桌上主席阅过的文件也是探得高高的，上面密布圈圈点点的批注。偶尔主席也站起身，伸展一下坐得麻木的腰，自己捶几下后背，聆听窗外的雨声，踱步思忖治国大计，雨越下越大，间或夹杂着隐隐的雷声。风卷着雨，重重地敲打着玻璃窗，把屋外的一片小竹林吹得哗啦作响，摇摆不止。天将破晓时，雨已经是倾盆而下了。

主席也终于阅读完所有的文件和书籍，抽过一块毛毯，盖在身上，和衣躺在沙发上，伴着雨声进入了梦乡。倾盆大雨依旧不停地下着，似乎在向世人警告，这个多灾多难的新生国家又将遭受到血与火的洗礼。

天还未破晓，也就在主席刚阖上眼时，位于北纬 38 度线的南北朝鲜分界处突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从而拉开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南朝鲜李承晚傀儡集团军队激战的序幕，也向世界宣布朝鲜战争爆发。这是一场历时三年的持久战，卷入的国家之多次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正是这场战争导致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急剧恶化，双方刀戟相见干战场之上。

二次大战后，朝鲜被一条临时停火线一分为二。随着冷战气氛的增加，终于导致了在南、北朝鲜建立两个敌对政权的局面，并且各自又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被保护国。美国对朝鲜半岛觊觎已久。这一点从日本投降后美国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推行的政策就可看出。1945 年美国进驻汉城后，很长时间不解除日军武装，并且保留原日本“总督府”的体制和行政机构及其法令。与此同时，杜鲁门把李承晚扶植成“大韩民国”的总统，李承晚一上台就多次提出：“要解决南北分裂，就必须用战争来解决。并且提出“北进统一”的口号。现在美国又公然入侵朝鲜，武力干涉该国内故。

我们该怎么办？

朝鲜战争的爆发虽早已在毛泽东意料之中，但他没有想到这一切会发生得这么快。早在 1950 年 4 月，金日成就曾秘密访问北京，告诉毛泽东南、北

朝鲜有军事摩擦，苏联支持北朝鲜，并希望必要时中国能出兵帮助北朝鲜，后来，斯大林也给毛泽东来了电报，征求中国方面的意见，希望中国能调几个师的兵力到东北，布防于丹东——沈阳一线。对此，毛泽东表示，兵力我们是有的，但由于我们刚刚打完了解放战争，军火消耗殆尽。若苏方可以提供装备几个师的武器的话，我们可以在兵力方面给予帮助。斯大林很快就复电，说装备问题可以帮助解决一些，但要求我们最好早一点把部队摆到东北的东南地区。还就在中苏双方往返于电报协商之际，朝鲜战争却突然爆发了。

这天，毛泽东仅仅睡了三个小时。一整天，毛泽东都处于高度亢奋状态。他关注着战事的进展，分析预测着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会对中国带来何种影响。已是子夜，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灯光依旧通明，写字台前的烟灰缸里又已塞满了烟头。说实话，毛泽东真希望这场战争能稍后些再发生。新中国成立才半年多，八年抗战以及解放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急待恢复，台湾和西藏问题还未解决，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近邻——朝鲜就发生了战争，而且美国的反应又是那么迅速。

毛泽东拉开窗帘，让窗外的清新空气迎面吹来。风吹在发热的面颊上，很是清爽。风也把主席写字台上堆放着的一大摞文件吹得沙沙作响，他连忙伸手按住，此刻，眼光不禁又停留在最上面的一份文件上，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几个黑体大字，“美国已决定出兵朝鲜”。

毛泽东皱着眉头，拿起这份文件再次咀嚼，“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6日美国就倡议召开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由于常任理事国苏联代表马立克缺席，而中国的席位仍被蒋介石的代表窃据着，此次会议完全被美国一手操纵了。利用苏联无法行使‘否决权’的机会，会议非法做出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侵略者’的决议，27日又再次非法作出决议，要求‘必须用紧急的军事措施来恢复国家和平与安全’，并成立了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比利时、泰国等23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使美国对朝鲜的干涉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这件使中国、苏联和朝鲜三国在外交上处于被动的巨大失误，据葛罗米柯的回忆录《回首往事》一书透露，原来是斯大林“没有很好考虑，并且不听劝告、专断独行造成的”。

毛泽东长叹了一口气，眉宇间的“川”字显得更深了。他用红笔在这份文件上疾书了几行字，然后眼光又跳在第二份文件上。

另一份文件的标题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上面写道：美国总统杜鲁门6月27日已在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将全力干预朝鲜战争。杜鲁门已签署几项命令，下令美军全力以赴支援南朝鲜：一是任命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赴朝鲜战争参战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并命其动用可以动用的全部武器装备供应李承晚部队，而美国在远东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将给予李承晚部队以必要的掩护和支援；二是杜鲁门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迅即开进台湾海峡，以准备“阻止并击退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三是命令立即撤退美军顾问团的家属。同时，杜鲁门和他的将军以及大大小小的智囊们还做出了一项具有“长远意义和军事战略意义”的“英明”计划，决定准备大幅度增加对法属印度支那军队的援助。在这份标号为“1950—00143R—K”并由杜鲁门总统亲笔签发的政府绝密文件的第一页第一段中开宗明义地明确写道，美国必须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行动来支持中国邻国中与中国不友好的各个政权。在谈到该战略的理论根据时，该报告分析说，由于越南的抗法领袖胡志明不过是“共产党阴谋的傀儡”，所以只能利用和依靠中国周围的、亲西方的反

共政权（如法国殖民者所控制的印度支那），通过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对其提供保护来实现遏制中国、截断社会主义阵营联为一体的趋势。看到这份情报，毛泽东顿时陷入了沉思之中，手指间的香烟点燃后都忘记吸了，长长的烟灰像根刚被伐倒的“望天树”，轻飘飘的斜落在他的手背上。静悄悄的走廊里，此时忽然传来了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将主席从深思中唤醒。

“请进。”不用看，准是周恩来。毛泽东站起身，迎向急步走进来的人。果然，是周恩来。

“对不起，主席，打搅您了？”周恩来轻声地问道。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正要打电话叫你来看一下。”说着，毛泽东指了指桌上的文件。

“是不是关于美国声明将干预朝鲜战争的事？我已看过了，看后实在是躺不下。”

“是呀，恩来。”毛泽东气愤地说，本想坐下却又站了起来。“我看美国也实在是欺人太甚了。看来美国已有所图谋，才敢这么冒天下之大不韪行事的。”

“是呀，”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我也是这样想的。美国之所以急于派兵在朝鲜参战，又把他的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还在印度支那插上一脚，显然是把矛头对着我们的，想从前、后双向来牵制、围堵和夹击我们中国。”

“哼，这些美国佬，打的可净是如意算盘。”毛泽东把余下的烟蒂狠狠地摁灭在烟灰缸里，背着手在房间里大步踱了几步，然后面向周恩来继续说道：“他们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以朝鲜战争为契机，想从上、中、下三面结合来夹击我们。这样一来，美军和蒋介石的部队上可从鸭绿江直逼中国东北，中可用第七舰队从日本和台湾海峡向我沿海地区发起进攻，下可让蒋介石在美军的海、空力量的支援下以及西南的蒋军残部的配合下从南部反攻大陆。多么宏伟的一幅蓝图。”

“主席分析得很对，我完全同意。那么我们怎么办？”

“对这件事我们不能听之任之，任其胡来。应给美国佬一点颜色看看。”毛泽东果断地挥了挥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古人讲究先礼后兵，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外交方面向美国提出抗议，表明我们的态度，然后再教训他们？”

“嗯，当然可以。我们要立即发表声明，但同时，我们在军事上也必须马上做好准备，防备可能出现的局势恶化。”

接下来，两人集中地讨论了各种措施以应付朝鲜战局可能出现的危机。等到各种方案均已胸有成竹了，特别是决定立刻成立东北边防军，并从中南军区调第13兵团开赴东北的细节商讨后，东方的天际已不知不觉显露出鱼肚白了。

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庄严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同一天，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严正声明，指出“杜鲁门27号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

然而，一意孤行、狂妄自大的美国根本没理会中国政府的抗议，在杜鲁门眼里，中国是没有资格、也毫无能力与美国抗衡的，只能是嘴上抗议、虚张声势而已。于是，在五角大楼的沙盘桌上，一群受过最高等的教育、有着丰富战争经验、满腹经纶、威风凛凛的星级将军们导演了一盘甲方必胜、

乙方必败的“棋”。7月1日，美军最著名的精锐部队之一、第24师的先头部队气势汹汹地杀入朝鲜；7月7日，杜鲁门总统在全国范围下达了“全国征兵令”；7月8日，杜鲁门宣布了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命令。此后，美国的陆、海、空各军兵种像铺天盖地的蝗虫一样，不断涌入朝鲜。一时间，朝鲜半岛烽烟四起，血雨腥风，战争局势急剧恶化。

到了7月底，就在双方在战场上挤死厮杀的关键时刻，朝鲜战场“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率领他的高级官员和将领，突然应蒋介石的邀请访问台湾。这次访问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向世界宣布了这样一个信息：无论发生何种情况，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决意防卫台湾。

在这次访问中，蒋介石向麦克阿瑟提出一项建议，要求派遣一支精锐部队赴朝鲜参战。事情很明显，美国和台湾欲联手行动，妄图对我国形成一种南北对应的态势，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麦克阿瑟和蒋介石的动态和心态，使毛泽东和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朝鲜战争事态的扩大，似乎为蒋介石提供了某种契机，可以借助美国的帮助反攻大陆了，以圆蒋介石的幻梦。

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个又一个清晨，每当周恩来总理从短暂的睡眠中清醒之后，他的心情就一次又一次变得沉重而愤怒。摆在书桌上的军情通报，无数次地报告着美军飞机不断侵入中国领空侦察、轰炸和扫射的消息。8月27日和30日，周恩来总理曾两次致电联合国，抗议美军的暴行。美军在仁川登陆后，美军飞机侵入中国领空的事件更是有增无减。9月24日和27日，周恩来又两次致电联合国，抗议美国飞机再次侵入中国领空及美国海军破坏中国航行权力的罪行。为了警告美国不要逼人太甚，周恩来给美国传递了许多公开的私人口信，表明如果美国越过“三八线”试图摧毁北朝鲜、逼近鸭绿江的话，中国不会、也不能“袖手旁观”，眼看我们的友好邻邦生灵涂炭。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之前，周恩来多次打算通过适当方式警告美国，中国将采取军事手段捍卫国土。当时拟将这个极为重要的外交、军事部署，通过印度大使转告给联合国，以期引起美国政府的正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商议此事时，特别要求传话时要表明这样一个信息：如果美国再如此猖狂下去，中国可就要“管”了。但这个“管”字在英文上不容易翻译准确，什么时候管？怎么管？为此，两人冥思苦想了好一阵。为了准确地、有分量地译出这个“管”字，周恩来特地打电话叫翻译浦寿昌连夜到总理办公室去。

“总理，你找我吗？”

“是的。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你看，这个‘管’字怎么翻才能把我们的意思表达得清晰明了？好让美国人知道其后果？”

“‘管’？”浦寿昌想了一会，试了几种译法，但总理都不太满意。“看来，这个‘管’字还真得琢磨琢磨。”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于是，总理又把翻译的要求重新讲述了几遍，并让浦寿昌把翻译的句子重新讲给总理听，直至总理满意为止。尽管此时已是深夜时分了，但周恩来还是迫不及待地请印度大使潘尼迦请来谈话，请他给美国方面传个话。

在谈话中，浦寿昌把这个“管”字译得非常恰当和准确。这就是：如果美国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到底”。同时，周恩来还重申，“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

尽管印度方面迅即向美国方面转达了中方的意思，但是美国始终不予理睬。对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愤怒和抗议，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的和

平建议，杜鲁门政府也始终是冷若冰霜，毫不理会。

1950年9月30日，大批装备精良的美军地面部队在其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指挥下，不顾中国政府和世界各国的反对，悍然越过“三八线”，迅速把战火烧向鸭绿江边，对中国的和平建设和亚洲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严重威胁。

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总理心中的怒火，顿时烧遍全身每一根血管和每一根神经。他狠狠地在沙发扶手上砸了一拳，厚厚的一摞文件震得洒满了一地。“这群侵略者，简直是大嚣张了！”他迅速草拟了一份文件，报经主席过目后，于1950年9月30日当天马上向全世界发表。这是一份义正辞严的重要演说。周恩来总理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来也永远不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邦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企图把中国近五万万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煞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电波在数秒之内就把周恩来总理的演说词传遍了白宫和朝鲜战场，但杜鲁门政府认为中国的警告是“虚声恫吓”，是“对外宣传”。利令智昏的麦克阿瑟也被最初的胜利冲晕了头脑，对中国的强烈反应根本不屑一顾。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胆略与力量。10月1日，趾高气昂的麦克阿瑟竟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命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必须立刻无条件投降，否则就彻底摧毁北朝鲜，并且命令美军继续逼近鸭绿江，将战火日益推向中国的工业重地——东北。

唇亡齿寒

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9月上旬，朝鲜人民军曾在前线取得了重大胜利。除已解放了朝鲜南部90%以上的地区和占人口92%以上的人民之外，还将美军压缩到了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的釜山地区。

9月中旬，乘朝鲜人民军主力全部集中在洛东江战线，后方空虚之际，麦克阿瑟调动7.5万人的美军地面部队、260多艘舰艇和500多架作战飞机，于9月15日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发起了一场精心策划的登陆战，将朝鲜人民军拦腰切断，然后迅速向北发动进攻。

被朝鲜人民军主力围困在釜山的美军第8集团军约10个师的兵力，也于9月16日凌晨，集中所有的炮火开始向北突围反攻。9月23日，一支美骑兵师也从洛东江沿江北进，从侧翼掩护向东南突击的美第7师，然后在水原附近汇合。9月28日，汉城失陷。而在9月25日，大批美军已越过“三八线”，长驱直入。此时，朝鲜人民军已无招架之力，在各地受到围剿，人员损失巨大，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困境。

毛泽东主席每天都在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场的局势，为北朝鲜的命运焦急不安。作为一名出色的军事家和战略家，毛泽东经常在思忖对手的策略，咀嚼对方每一个微小的举动。他常常站在美国的角度，设计如何进行明天的战斗。并明确说，“如果我是麦克阿瑟，我会让美军在仁川登陆。”

1950年10月1日，就在毛泽东刚刚参加完国庆大典，从天安门回到中南海时，周恩来急忙送来一封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的加急电报：

毛泽东同志：

……自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我方遭受到极大损失。局势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影晌。敌人利用约千架各种作战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使我们的兵力和物资受到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目前，敌人的主要登陆部队已与其南线部队连接为一体，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和物资供应。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抵挡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在敌人进攻“三八线”

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能直接出动，赴朝参战，援助我军作战……

急盼您的答复。

金日成、朴宪永（签名）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看了两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额头两道浓眉拧成了疙瘩。他略加沉思，把头转向周恩来说：

“恩来，事态果然发展到这一步，连我都没有料想到来得这么快。看形势，朝鲜已面临亡国之难了。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呀。”

“主席，我建议立刻召开军委扩大会和政治局扩大会议，马上讨论我们的对策建议。”

“无论怎样，我们是不能见死不救的。”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接着，他转身走向西墙上悬挂着的巨幅军事地图，一边端详着一边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向周恩来说道：“金日成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向我们发出紧急救援的呼吁的，我们怎么能坐视不管呢？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哪！”

“何况，我们两国都是共产党国家，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周恩来也说了自己的看法。

“苏联方面昨天有电报吗？”毛泽东忽然回身问道。

“有的。是斯大林打来的。电报通知我们说，随着联合国军向北推进，金日成将军将不得不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流亡政府，让我们早做准备。”

“国际上有什么新的反应？”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上提出一个和平提案，要求立即停止朝鲜境内的敌对行为，同时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

“对这个方案，各国都表态了吗？”

“很多国家和我们一道是支持这个方案的。但美国和另一些国家明确表示反对。”

“这不难理解。我料到美国的杜鲁门是不肯接受的。朝鲜人民军已打到了洛东江，如果这个时候停火，外国军队又全部撤出朝鲜，那不是把朝鲜全交给金日成了嘛？丢了夫人又折兵，他杜鲁门怎么会善罢甘休呢？”说到这里，毛泽东的脸上总算掠过一道明显的笑意，这才顾得上回到沙发上坐了下来，同时手不自觉地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来。

“目前的局势对朝鲜人民军极为不利，我看他们速战速决的时机已经失去了。”毛泽东沉重地说。“不过，美国侵略者的命也不会走运的。他远隔重洋来干涉别人国家的内战，想把社会主义阵营打垮，想得倒容易。当今的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和人民要革命，那么多民族要解放，这是一个历史潮流，谁也挡不住。它美国怎么挡得住？手伸得太长只能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杜鲁门总统恐怕不这么认为。”周恩来笑着说。“尽管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但同时他要维持美国在西方世界的威信，要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要保全面子，一定会在朝鲜战场上孤注一掷的……”

“我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不过，我担心的是，朝鲜半岛的战争会扩大化，持续升级。因为我们参战后，一旦战局恶化，苏联也将参战，那么，会不会……”

“你是说引发又一次世界大战？”毛泽东皱着眉头道，“嗯……当然有这种可能，我们要尽量避免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过，即使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也并不害怕。他杜鲁门有什么了不起？有几架飞机？有一、两颗原子弹？可飞机和原子弹又不是只有他美国一家有，苏联也有了嘛！对待侵略者，我们的策略一是不怕，二是敢打……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苏联，第二次大战打出中国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假如第三次大战非打不可，那结局很难说，决不会是那些帝国主义分子所乐意看到的……”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迈着稳健的步伐在室内来回踱步，待把烟蒂在烟灰缸上揪灭后，又用手掸了掸身上、袖子上的烟灰，像是把某种看不见的妖怪小鬼一扫而清似的，语气、动作轻松而潇洒。主席的乐观情绪也深深地感染了周恩来，两人不禁会意地笑了起来。在余下的时间里，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对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要讨论的细节，反复做了认真的研究，一致同意：一，尽可能不给美国以国与国宣战的口实；二，争取把朝鲜问题地方化，避免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三，做好出兵援助朝鲜的一切准备，包括立即组建我国的空军部队；四，急令彭德怀彭大将军从西安进京，作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特邀代表；五，马上和斯大林联系协商，请示苏联方面出动空军，配合我军地面作战。周恩来还建议，我军入朝作战部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赴朝参战为好。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第二天，也就是10月2日，毛泽东向斯大林发了电报，阐述了中国方面的立场和主要考虑。斯大林很快回了电报。之后，双方继续通过电报又在主要问题上进行了协商，苏联方面对中国方面的观点和要求做了积极肯定的答复。10月4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实际上是一次最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对出兵参战的细节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上，大家各抒己见，气氛热烈。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作了总结讲话：“同志们，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哟！别说是此举关系到三军数十万战士的性命……打得好那没什么说的，打不好，有可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断送国家的前途江山，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子交待喽！会上，大家的担忧都是有道理的。不过，朝鲜亡国了，我们会怎么样？我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再说，中朝是邻邦，唇齿相依，一衣带水。我们要是不管，那社会主义阵营还不是一句空话？……”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环视了一下会场，寻找有何反应。但会场静得能听得到邻座的心跳。此时，每一个人心里都知道，毛泽东的决心下定了。

“苏联方面会出兵配合我们吗？”有人轻声问到。

“这个问题我已跟斯大林谈过了。苏联方面答应空中由他们负责，地面由我们负责，而我们的陆军是没有问题的。”毛泽东的话，使会场的气氛顿时开始活跃起来。

毛泽东站起身，继续他的讲话：“这场战争，尽管我们有不少柔弱之处，

但我们可以以柔克刚，以己之长击对方之短。第一，美国的战线太长，从北冰洋、黑海：波罗的海、地中海、印度洋、太平洋一直搞到东方来，战线从西欧拉到东亚，比当年希特勒和日本的战线都长。美国在全世界搞军事基地，好比十个指头按跳蚤，动弹不得。第二，美国距其后方太远——必须横渡大西洋与太平洋。第三，美国进行的是一场不义之战，多行不义必自毙。侵略别国，失道寡助。第四，美国的士兵是骄娇二气缠身，因为美国在朝鲜的部队大都是驻日本的占领军，过惯了舒服日子，据称都是些‘榻榻米，部队。离开温暖的被窝，士气必然不高，而且美国的同盟国都不强，可派的兵也寥寥无几。第五，有的同志担心美国的原子弹，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要知道，原子弹也并非美国他一国独有，苏联也掌握了原子弹，这就打破了核讹诈；再说，国土愈广，人口愈不集中，原子弹的作用也愈小……以上所谈的几点，都是敌人的弱点，但都是我们的优势。因此，说到底，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说到这里，毛泽东自信地将手臂扬了扬。这时，不知是谁竟鼓起掌来。

经过两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全党全军高层领导经过充分讨论，统一了认识。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全国发布了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节外生枝

这几天，是彭德怀将军思想和生命发生巨大转折的日子。他发现自己面临着新的历史使命的抉择。

仅仅是四天前，彭德怀，这位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主任，还在西安忙于制订开发和建设大西北的宏伟蓝图。当他收到主席的电报让他紧急入京时，还以为主席是让他汇报西北建设的规划蓝图。他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和正在外国发生的一场战争结下不解之缘。他更没有料到，毛泽东在考虑赴朝参战的时候，心里第一个想到的人选，就是彭德怀。对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对这场战争怎么打，彭德怀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完全进入了角色，开始了他极为繁忙的各项备战工作。就在任命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命令下达的当天，彭德怀便飞到沈阳，召开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在他的布置下，四个军的全体干部战士准备于10月中旬跨过鸭绿江。11日凌晨，彭德怀已坐上了开往安东的火车。在他的军事地图上，已标注好了详尽的进军路线：由梁兴初将军率领的第38军从辑安渡江，向礼仓里、五老里地区运动；由吴信泉将军率领的第39军从长甸河过江，向龟城、泰川地区推进；由温玉成将军率领的第40军从安东过江，向宁边、球场、宁远地区运动；由吴瑞林将军率领的第42军协同第38军一道行动。……一天24小时，连晚上睡觉也在内，他都在计划着渡江和交战。但他没有想到，就在他到达安东的第三天晚上，当志愿军过江的一切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随时将发布渡江命令的紧要关头，彭德怀突然收到了毛泽东拍来的一份加急电报，使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电文如下：

彭高：（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执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

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这回京一谈。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

箭已上弦，为何又不发？大政方针已定，却为何又中途易辙变卦？彭德怀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交代好下属，便和高岗一同匆匆返回北京去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

原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中国全力以赴准备赴朝参战的节骨眼上，斯大林却突然电告中共中央，通知毛泽东说，苏联的空军还没准备好，必须暂缓出动。10月12日凌晨，当周恩来的机要秘书把总理从睡梦中唤醒，交给周恩来这封电报时，周恩来着实大吃一惊，残存的一点睡意顿时全消。他手里握着这份电报，像是托着一座泰山，一轮火球：“一切不是商定好了吗？怎么在中国军队已下令出动的情况下，苏联却单方面改变主意了？难道斯大林是想让我们单独对美军作战，以避苏方的风险吗？”他顾不上多想，立刻披上大衣冲出门外，向主席汇报去了。

当周恩来赶到丰泽园，叫醒主席并将这一情况告知毛泽东时，毛泽东顿时脸就变了颜色。他狠狠地抽着烟，焦急地在屋年来回走动，足足有十几分钟没有说出话来。

“恩来，你看，斯大林这一变卦着实让我们为难。我实在想不通，他们有什么理由改变主意？他们怎么会这样？”

“也许是时间太仓促，苏联空军确实没有准备好，暂缓出动？还是……看来不像。”

“他们没准备好？那我们也没准备好呵。许多部队服装都没发下去，武器装备也没来得及更换……看起来，暂缓出兵不过是斯大林的推托之词罢了。”毛泽东摇头道。

“那我们是不是要重新考虑一下暂缓出兵的事……”

“难呵！我看苏联方面是有意想让我们这样的。否则，为什么他们早不说、晚不说，偏偏等我们宣布参战了，他才给我们这么一张通知，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依我看，斯大林是想让我们出头，而他们不想出头。也许另有原因，比如说，真正的原因是斯大林怀疑我们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他看到我们真的决定出兵了，而且美国准备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他就犹豫了……可是，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我们是不是有把握……”话没有说完，周恩来就打住了。

主席深深地点了点头：“是呀，如果苏联不出动空军，那等于我们就丧失了制空权。没有空军，让彭德怀白天作战，他的困难和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还有一点，主席，斯大林说的没有准备好，显然并不是真正的原因。”周恩来进一步分析到：“斯大林对我们的军队到底能不能打败美军，心里没有底。如果他们出动空军掩护我军，一旦我们没有打好这一仗，那就把他们给卷进来了，苏联就会”有与美军直接对抗的危险，甚至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也是这么想。恩来，我看这件事值得重新考虑，慎之又慎“我们也要为彭德怀和我们的队伍考虑……”毛泽东狠狠吸了一口烟，“请马上发电报给彭德怀和高岗，让他们暂缓出兵过江，同时立刻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下。”毛泽东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我没有意见，主席。你看什么时候开会？”

“越快越好。另外，恩来，还得麻烦你跑一趟莫斯科。”

“好，主席，我马上就出发。”

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后，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在第一次的会见中，斯大林平静地告诉周恩来：“目前苏联空军尚不能出动，主要是担心苏联如果和美国全面冲突起来，战争可能会无限升级。仗打大了，不仅会影响我国的建设，也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建设，特别是你们还处在战后恢复阶段……”

周恩来对斯大林的答复是：“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作战，我们暂不出兵。”

正如主席预料的那样，周恩来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的第一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自从10月12日周恩来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后，毛泽东的大脑一直没有停止思考这件事。尽管他明知在这件事上，苏联方面不会照顾和满足中国方面的要求，他还是在耐着性子等着、盼望着能有什么奇迹发生；但是奇迹并未发生。我们怎么都好说，可是金日成会怎么说呢？他的日子不好过呀。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对邻邦，我们怎么能见死不救呢？社会主义国家都看着中国，朝鲜人民正等着中国的支援，中国如暂缓出兵，影响巨大呀。毛泽东向刘少奇和朱德谈了他的想法。

“其实主席的看法也正和我们的吻合，”刘少奇和朱德这样对主席说。

送走少奇和朱德后，毛泽东在院子里又一个人徘徊了很久。他对各种情况以及后果均再次做了一次全面的判断和分析，终于做出了决定。回房之前，他第一次注意到今夜的星空是如此湛蓝，月光是如此洁白，如银泻地，如水柔软，仰望明月、星辰，谛听竹叶摇曳，直面深秋的晚风，他顿时感到头脑异常清醒和轻松。他主意已定，一个宏伟的画卷已在胸中绘成。

10月13日，当周恩来心情沉重地从斯大林那里回到住处时，接到了大使馆同志送来的电报。他迫不及待打开电报：

恩来同志：

……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兵援助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地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若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

1950年10月13日

周恩来久久凝视着这份不同寻常的电文，情绪不禁为之一振。除了惊异之外，更多的是感到一种激动之情油然而生，传遍整个身体。他深深地钦佩毛泽东的胆魄。周恩来马上通知苏联外交部，请尽快安排和斯大林再次见面。

当天下午，当周恩来健步出现在斯大林面前时，斯大林不无诧异地问道：“这次紧急见面，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还是继续我们刚刚结束的会谈？”

周恩来朗朗他说：“无需再谈了。中共中央让我立即通报给苏共中央一

件事：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刚刚拍来电报，我们已经再次做出决定，立即出兵朝鲜！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中国都要参战。”周恩来的声音，洪亮而清晰，久久回荡在斯大林宽敞的办公室。

当苏方翻译把周恩来的话译给斯大林后，斯大林半晌沉默不语。他不知说什么才好。此刻他的心情难以言表。他深知中共中央在做出这个决定时要具有多么大的毅力！它意味着中国人民将克服怎样的困难和付出什么样的牺牲！如果换了是苏联，让他站在毛泽东的位置上，他能有如此大的勇气和魄力做这样的决定吗？

“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斯大林喃喃着，像是对周恩来说，又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10月19日夜晚，冷雨靠罪，寒风扑面。残秋的寒风，裹着枯枝败叶从鸭绿江的波涛上刮过。忽然，在迷蒙的充满寒意的秋雨中，传来阵阵雄壮的激动人心的军号声以及轰隆震耳的军车、坦克的马达声，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入朝的四个军分三路齐头并进，雄纠纠、气昂昂地渡过了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汇成了一支气势磅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进军曲，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朝鲜局势发生了转折

远在东京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这几天一直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沉浸在踌躇满志的幻想中。仁川的胜利，联合国军的神速进展，美国总统亲自飞到威克岛与他的会晤，都使他出尽了风头。但麦克阿瑟心里并没有满足，他有着更高、更大的渴望。随着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向中国和朝鲜北部边境的迅速推进，历史舞台即将上演最后热烈的一幕——胜利大结局。不消很长时间，朝鲜半岛将统一在大韩民国的旗帜下，他麦克阿瑟将再一次出席盛大的交接仪式——把整个朝鲜半岛交给李承晚，而不仅仅是南部……

10月19日，闻听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的消息，骄横的麦克阿瑟不由冷笑了一声，把电报扔在了一旁。“中国人想把我已捕入笼子的猎物救走，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他扬头一口干掉了一大杯威士忌，又为自己满满斟上了一杯。在他眼里，中国兵都是些玉米地里长出来的“红脖子”乡巴佬，使用的都是些老掉牙的土枪土炮，别说是来两三个军，就是再加倍，也打不过由二十多个国家所组成的联合国军呀。不过，作为一个军事家，他也明白中国军队入朝对美国 and 朝鲜意味着什么。但不管怎么说，他是决不能让到手的猎物轻易飞走的。为了及早断绝中国人的念头，麦克阿瑟急令美军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在当天占领平壤。紧接着，在第二天，麦克阿瑟又派大批美军空降部队在肃川和顺川空降，以确保把自平壤北撤的金日成朝鲜人民军的退路切断。此时，入朝作战的美军和联合国军以及李承晚的兵力总数已达42万人，拥有飞机1100架，各种军舰300多艘。

正当麦克阿瑟草拟他在庆典会上的讲演稿时，前线告急的情报就象一桶刺骨的冰水浇在他头上。据第8集团军沃克电报，由于受到中共军队的猛烈攻击，联合国军已被迫从鸭绿江边退至清川江以南。他怎么也没料到战局的发展竟会是这样，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更没有料到，从此朝鲜战场就成了他不断惨败、不断屈辱的竞技场。

尽管10月19日第8集团军攻克平壤后，有关中国军队越过鸭绿江的消

息一再地传到东京他的联军司令部。但一直到 11 月初，麦克阿瑟都不肯相信中国敢于冒和美国全面战争的危险，以贫弱的国力介入朝鲜战争。然而，第 8 集团军的沃克和第 10 军的阿尔蒙德的报告不断表明，部队在向朝鲜北部挺进时，遇到了有组织的中共正规部队的顽强抵抗，一线部队开始遭受惨重伤亡，等等。现实无情地告诉了麦克阿瑟，他此前在威克岛上向杜鲁门总统得意洋洋宣扬的所谓中共不敢参战的理论和预言是完全错误的，他拟定的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已宣告彻底破产。

10 月 25 日，在一名名叫彭德怀的“中国乡巴佬”将军的领导下，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不管麦克阿瑟相信还是不相信，这场历时十三个昼夜的艰苦作战，结果是中国人赢得了战役的伟大胜利。这次战役共使麦克阿瑟的联军一下子损失了 1.5 万余人，不仅使联军北上的进军势头受到了严重的遏制，而且迫使联军不得不退缩到清川江以南。朝鲜局势开始发生了转折。

1950 年 11 月 5 日，《纽约先驱论坛报》载文，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首战获胜，引起全世界瞩目。”“这是美军陆军史上最大的失败。”

麦克阿瑟的情绪从几天前的最高点一下子跌到最低点。他沮丧、懊恼、愤怒的心态难以自制。他不得不重新制定作战计划，开始重视情报的作用。

“联合国军”总部以及美国的华盛顿和白宫都陷入一片混乱，所有的机构都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所有的人都明白，是到了该正视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问题的时候了。

联军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认为，志愿军参战的总企图不外以下三种：一是为保护其边防安全和鸭绿江电力设施；二是为从战略上牵制和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消耗战；三是企图把“联合国军”完全赶出朝鲜半岛。因此，可以断定，从中国目前情况看，它是不敢和美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此次出兵只是为了保护边防。

前线指挥官麦克阿瑟的观点是：志愿军参战人员虽入朝不多，但大队人马和物资正从中国东北运过鸭绿江，有使联合国军全部被歼的危险，应立即执行“轰炸满洲”的战略计划，将战争扩大到中国领土。

英国将军提出异议：中苏订有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轰炸中国东北有挑起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应先在中朝边境划定缓冲地带，力争通过政治方式解决。

杜鲁门认为，既不能在没做好大战准备的情况下冒扩大战争的危险，但也不能放弃已经“胜利在望”、占领全朝鲜的大好时机，美国应继续坚持军队进攻，迅速占领全朝鲜的既定计划，与此同时，在国内各个方面应做好进行大战的准备。

麦克阿瑟花了很长时间，再次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拟订了一份新的作战计划，称其为“总攻势”计划。其要点是继续坚持军事进攻、再次大举北侵，在鸭绿江冰封前抢占全朝鲜，力争在圣诞节前全面结束朝鲜战争。

为实施“总攻势”计划，麦克阿瑟在前线集结了 5 个军 13 个师 3 个旅和 1 个空降团，计 22 万余人，比第一次战役增加了 9 万余人，且主要增加的是美军，共有飞机 1200 余架，坦克 1000 余辆，火炮 1 万余门。

在麦克阿瑟部署完毕、准备大举进攻的同时，美国政府一面通过英国、瑞典向中国试探，图谋以所谓“保护中共利益”为诱饵，换取中国坐视其侵

占整个朝鲜；一面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要志愿军立即“撤回”中国，否则“目前的冲突可能不限于朝鲜区域”，以此来要挟志愿军撤兵。

麦克阿瑟钻进了口袋

在志愿军取得入朝后第一次战役的初步胜利后，彭德怀司令员向毛泽东作了前线战情分析，没有任何表功的词句，主要是分析我军的劣势，指出目前的形势对我很不利，战争形势尚未根本好转。

接到彭德怀的前线战情分析汇报后，毛泽东高瞻远瞩，明察秋毫，致电彭德怀要看到朝鲜战场总的形势正朝着对中朝方面有利的方向发展。为了给“联合国军”以更大的打击，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敌明我暗的朝鲜战局，在现阶段应充分利用敌人恃强骄傲的心态和对志愿军人朝实力及意图判断上的错误，采取诱敌步步深入、避免正面冲突、寻机各个歼敌的方针，争取在11月至12月初的一个月内，抓住战机在东西两线再给敌人一至两个大的打击，歼敌七、八个团，尽量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

为了保证这一战略部署的胜利实施和从根本上改变朝鲜战局，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立即做出了下列决定：一、迅速增调第9兵团入朝，援助长津地区，改变东线战局；二、用一切可能方法，令东北军区保证东西两线粮弹之供给、尤其是要保障入朝战士御寒的被服；三、要求前线立即抢修几条交通通道，可通达德川、宁远、孟山地区；四、在国内大力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加强海上边防和剿匪肃特工作，以随时应付敌人扩大战争的准备；五、为配合以上军事行动，政府同时在外交方面也展开对美国的攻势，派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大会，揭露与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与朝鲜的罪行。

11月7日，志愿军开始采取毛泽东制定的“诱敌深入、寻机歼敌”的方针，在“联合国军”试探性进攻的炮火下，先后放弃黄草岭、尽虎、德川等地。在东线，人民军部队负责在沿海地区节节阻击敌人，且战且退，逐渐把敌人诱向预定战场。

面对志愿军和人民军开始“全面溃退”的大好局面，麦克阿瑟没有感到些许兴奋。一切都不是像他预计得那样进行。溃退不应该是中国人的作风和人朝初战取胜后的正常表现。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名堂。“难道中国在什么地方埋伏好了一支强大的部队吗？那么会是哪儿呢？”麦克阿瑟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猎手，在仔细分辨着、嗅听着。“要吸取第一次战役分兵冒进而失利的教训”，他反复告诫属下。

面对“联合国军”疑虑重重、前进迟缓、不肯上钩的大难题，中央军委指示彭德怀，要采取一切办法让麦克阿瑟相信志愿军是真正溃退，促使他下决心敢于分兵冒进。志愿军上上下下为此纷纷献计献策，如：节节抗击，逐渐减少抗击天数；逐渐减少诱敌部队的数量；在路上丢弃一些破旧武器和物资，等等。16日，彭德怀司令员给一线各部队首长下达这样的一道命令：“由靠近前线之阵地继续北撤，不要进攻向前行进的敌人，让他们大胆进入我预定地区”。志愿军政治部并就地释放100名美军和南朝鲜战俘，以通过他们宣传志愿军可能退回中国的消息。

果不其然，“诱敌深入”的策略起了作用。我军北撤的“狼狈”相迷惑

了敌人的情报部队，使“联合国军”错误地认为中国军队确实是“怯战退走”，并断定“联合国军”发动的空中战役“已切断了志愿军前后方的联系和供应系统”，并“成功地使中国国内的部队不能进入战场”。美全天候侦察机以及运用各种手段搜索到的情报表明，志愿军目前在朝鲜的兵力最多不过6万至7万人，而不是像原先所估计得那么庞大。“这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麦克阿瑟终于舒了一口气，遂令“联合国军”加快北进速度和做好发动总攻势的准备。在麦克阿瑟的督促下，西线“联合国军”于21日抵达预定发起总攻势的“攻击开始线”，东线进至长津地区靠近鸭绿江边的惠山镇，同时空军和火箭炮部队尽全力严密封锁鸭绿江，切断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队可能出入的每条通道。麦克阿瑟这时坚信，离他雪耻、大功告成的日子已越来越近了。“中国人就像是被我捉住并关进火柴盒里的甲壳虫，”他在日记本上这样写道。

然而，就在麦克阿瑟自我陶醉、得意洋洋地打电话告诉家人说他不久就准备卷起地图、打点行装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志愿军第9兵团却在“联合国军”分割包围、齐头冒进的同时，基本上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秘密地进入了东线长津和厚昌江口地区，接替第42军执行东线作战任务。随后第42军又隐蔽地转入西线，加强了西线兵力。而原来西线的23万将士，已分别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定州西北、龟城、泰川、云山、德川以北、宁远东北地区隐蔽待命。由第42军两个营和人民军一个联队组成的游击队，也已插入敌人的心腹，与留在敌后的人民军取得了联系。毛泽东和彭德怀，就像一个巧夺天工、超世绝俗的棋手大师，为“联合国军”布置了一盘设计精美、无懈可击的棋局。

到这时，麦克阿瑟才发现，“联合国军”已陷入自己被团团围困、自身难保的窘境。11月28日夜，被战局震惊得如同闻听晴天霹雳一般的麦克阿瑟，紧急召集了朝鲜西、东两线的指挥官及美国远东空军、海军司令等高级军事将领，在东京研究如何摆脱朝鲜战场的困境。在众议无法挽回败局的情况下，麦克阿瑟指示沃克，“为避免被从东面迂回包围”，可于“必要时自行撤退”，扼守平壤一线。第10军也火速撤往咸兴、兴南一线，以保全有生力量。于是，麦克阿瑟的“大攻势”又变成了“美丽的梦想”。形势的发展已表明，朝鲜战场开始发生戏剧性、转折性的变化。

让原子弹作为杀手锏

朝鲜战局的意外发展也震惊了华盛顿美国最高决策当局。28日，华盛顿收到麦克阿瑟的紧急报告后，杜鲁门立即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和召开内阁会议，研究扭转败局的办法，但均苦于毫无良策可施。

同样也是在这一天，全世界的广播、电视、新闻媒介都播发了当日联合国安理会的情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约代表伍修权的发言：

“……美国代表奥斯汀说什么，‘美国未曾侵略中国的领土’。好得很！那么，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舰队现在是在哪里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们就在台湾。任何诡辩、撒谎的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美国的真实企图，正如麦克阿瑟所透露的，是要把台湾变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一个用以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海港的基地，一艘美国的永不沉没的航

空母舰……”

伍修权慷慨激昂的演说句句像是一把把利刃，刺进杜鲁门的耳朵里、心脏里。

11月29日，惊恐中的杜鲁门又收到麦克阿瑟的一份急电，建议立刻调遣台湾蒋介石军队入朝，参加“平壤保卫战”。据说，蒋军在台湾已作好了出动准备。但此建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阁紧急会议的复议，最终被杜鲁门驳回，主要是担心因此把战争“扩大”到台湾和其他地区，弄得最后无法收场。

随着朝鲜战局危机日趋严重，杜鲁门则日益焦虑不安。不知多少次，他脑海掠过同一个可怕的念头。这个念头像磁石一样紧紧地吸着他，尤其是他感到极为烦躁、懊恼的时刻。开始，他还能扪心自问，理智地考虑多种后果，但不久，他的决策已下，一个以此扭转战局的计划便问世了。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记者突然问到：“总统先生，麦克阿瑟将军曾强烈要求华盛顿授权他进攻满洲，这种行动是取决于您的意志，还是取决于联合国的行动？”

“当然取决于联合国，”杜鲁门答道，“谁都知道，麦克阿瑟指挥的是一支联合国的部队。”

“若联合国通过决议授权麦克阿瑟将军继续推进的话……”

“那我们就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应付目前的军事局势。”杜鲁门坚定地说。

“请问总统，”《纽约每日新闻》的一位记者敏感地接着问道，“您所讲的‘一切必要的措施，’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

“当然包括，亦即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武器。”

几分钟以后，合众社就播出下列新闻：“杜鲁门总统今天说，美国已在考虑同朝鲜战争相联系的原子弹问题。”

美联社也播发了新闻：“杜鲁门总统于11月30日表示，美国政府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采取这一措施的话。”

这条爆炸性的新闻当然也立即传到了北京，传到了莫斯科，传到了全世界。但毛泽东和他的中国领导人们，对此并没有流露出任何忧烦，在他们看来，这条新闻似乎只是迟早的问题，对中国丝毫不起什么影响。事实上，引起恐慌的却是西欧各国。尤其是伦敦，整个都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当时，当关于原子弹的消息传到下院时，工党的左翼立即散发了一份百人签名的请愿书，声称如果艾德礼对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意图给予支持的话，他们就要退党并决计使政府倒台。惊慌失措的艾德礼不得不立即飞往华盛顿，试图让杜鲁门保证，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时应事先得到英国的同意。

杜鲁门其实应该明白，在苏联同样也掌握了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的核讹诈政策只能是恐吓西方世界自己。原子弹的使用，只能意味着交战双方的共同毁灭，意味着世界大战，意味着世界的毁灭。

于是，杜鲁门碰了一鼻子灰，自讨没趣。他所提出的“有限战争”的概念遭到了失败的厄运，他一心指盼的“核讹诈政策”刚一出台就宣告不灵。这战争还怎么打？美国陷于了自己设下的陷阱泥坑。正如美国士兵自己所说“这是一场不能不打，但又永远打不赢的战争。”

朝鲜战争引发了美国对中国长达若干年的敌视。美国仇恨共产主义的浪潮经久不衰。凡是与共产党、社会主义、中国、苏维埃相关的，全都被形容

成红色。大学教授如果不高声臭骂“共产主义奴役”的邪恶，就会被校方解雇，反共的狂热分子的演讲能得到最高的报酬费，辛辛那提棒球红队因沾了“红”字而被迫改换名称，反共虐待狂的小说成为发行上千万册的畅销书，而连环漫画则画的是赤色分子被绳子吊死，用手枪砸死，活埋，喂鱼或是吊在美国人的汽车保险杆上……：甚至连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

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举国上下正在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志愿军，人们纷纷募捐，为志愿军购买飞机、武器，为志愿军赶制炒面，连周恩来都亲自挥起了炒面的锅铲。而全国的孩子们都学会了同一首儿歌：

“一二三四五，
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
专吃杜鲁门。”

美军大撤退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西、东两线给予“联合国军”的沉重打击，使麦克阿瑟从骄狂不可一世的顶点，跌落为惊弓之鸟。这时，他才感到遇到了真正的对手，而且这个对手咄咄逼人，使他几乎没有招架的工夫。他坚信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兵力已“增加到了50余万人”，并已逼近至平壤至元山铁路线区域，严重威胁其侧翼安全，深感处境“愈来愈危急”，如不急速后撤，全军面临着“人力、物力不断消耗，以致最后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12月3日他下达了实施“总退却”的命令，命前线部队立即撤出平壤，东面部队也立即撤到咸兴。

12月4日，毛泽东主席号召志愿军准备攻打平壤，“如平壤敌已退，则向‘三八线’挺进”。西线志愿军部队克服粮食、弹药已基本耗尽等困难，积极组织部分部队正面追击。6日，志愿军第39、第40军各一部和新近开到前线的朝鲜人民军一道，收复了被美军占领了47天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平壤。同时，由游击队配合敌后人民军各部队，截歼、追击退却中的“联合国军”，并收复了元山、沙里院等重要城镇，进而向南追击。到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志愿军除了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三八线”以北的全部领土（除襄阳）以外，还一并收复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至延安半岛，整个战役歼敌36000多人，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为朝鲜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这次战役的胜利震惊了全世界，给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集团以沉重打击，它有力地论证了毛泽东所阐述的“美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揭穿了美国的虚弱本质，极大地鼓舞了中朝军民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胜利信心。毛泽东在转发这次战役第38军作战经验时指出：“志愿军的作战经验证明，我军对于具有高度优良装备及制空权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

这次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乘胜追击，继续在不同的战场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和重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发动的“总攻势”不但没有实现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美梦，反而变成

了圣诞节向“三八线”以南的“总崩溃”、“总退却”，连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本人也在撤退中作了亡命鬼。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十分沮丧地断定：“联合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随着麦克阿瑟战略计划的破产，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及其侵略阵营内部矛盾日益加深，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间互相攻击和推诿战败责任。英、法等国对朝鲜战局更加忧虑，生怕把自己陷在朝鲜而削弱其在欧洲的势力，有的参战国甚至提出要求撤兵。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称：这次战役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失败”。

赔了夫人又折兵

“联合国军”向“三八线”以南“总崩溃”、“总退却”，美国政府在这种极为难堪的情况下，连忙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内阁会议，以及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并立即派遣要员同前线统帅磋商，以寻求摆脱危机、挽回败局的出路。在经过一系列的会议和磋商之后，华盛顿同意麦克阿瑟关于朝鲜战争现在已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的一次完全新的战争”的观点，承认朝鲜形势的发展使美国“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我们可能要节节败退，就像我们前次所遭受到的失败一样”，但美国政府仍然决意坚持其侵朝政策，声称“联合国的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

为了摆脱危机、挽回败局，华盛顿接受了麦克阿瑟的许多建议，采纳了其制订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例如，在军事上，加紧扩军备战，一年之内把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分别提高5倍和4倍以上；设立国防动员局，扩大征兵计划，努力把美国军队由250万人增加到350万人；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美国人民为战争做出“任何必要的牺牲”；由原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马修·李奇微接替在败退中刚刚身亡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的职务等。与此同时，在政治上，通过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表面上号召“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喘息的时间，准备再战。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敌变我变，随机应变。就像棋高一着的大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企图和阴谋早已洞察秋毫，了若指掌。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早在“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开始向平壤和“三八线”溃退的时候，就对战争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应当采取的策略进行了充分的考虑。中央军委、毛泽东认为，虽然取得了两次战役的重大胜利，扭转了朝鲜战局，但尚未大量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要赢得这场战争还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

针对“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退守“三八线”、美国当局玩弄“先停火、后谈判”的缓兵之策，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目前美、英等国正要求志愿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企图整军再战，因此，要求志愿军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人民军打过“三八线”。如果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我们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德怀关于部队过于疲劳，应稍做休整，速胜有害的建议固然正确，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很有必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下决心发起第三次战役。在他的精心部署下，各路人马从1951年1月3日起经过连续七昼夜的艰苦奋斗，以每小时前进1

公里的进攻速度前进了 80 到 110 公里，毙敌、俘敌 1.9 万余人，占领了汉城，粉碎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据守“三八线”，整顿军队，准备再犯的企图。这次战役成为朝鲜战争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

1951 年 1 月 25 日至 4 月 21 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又在“三八线”南北地区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了坚决勇敢的坚守防御战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等多样式的作战，歼灭 78000 多人，取得了全胜，粉碎了麦克阿瑟的反攻计划。

“联合国军”经中朝人民军队连续三次战役的打击后，溃退到“三八线”以南，后又丢失了汉城，内部矛盾加剧，失败情绪严重。美国统治集团对朝鲜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争论也更加激烈。到底是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还是守住朝鲜一个地区？还是撤离朝鲜？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杜鲁门的态度是：既不愿冒扩大战争的危险，也不愿撤离朝鲜。他这种中庸或者叫“骑墙”的态度招致了很多人的不满。为此，他亲自写信给麦克阿瑟，说明这场伟大战争的真正目的在于提高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威望”，保障日本的“安全地位”，推动西方国家扩充军备。他要求麦克阿瑟为了这些目的而战，也尽力在朝鲜据守一个重要地区，如不可能，则坚守朝鲜沿海岛屿，特别是济州岛。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在军事上被迫撤出朝鲜，也“不承认撤离的后果”，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麦克阿瑟尽力而为了。然而没过多久，麦克阿瑟就被解除了职务。

美国的慌乱与徘徊

1951 年 6 月底的北京，天气已开始热了，槐花正在盛开，满城飘逸着沁人肺腑的馨香。树梢上的知了欢叫着，此起彼伏，争先恐后，他们似乎也在为志愿军战士在朝鲜的胜利高兴。

朝鲜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了，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先后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李承晚的敌伪军部队进行了五次大的交锋，共歼灭敌人 22 万余人，其中美军占 11.5 万人。和第三次战役相比，虽然敌军在第四、第五次战役后又往北推进了一些，但总的来说，我军已将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附近。

美国陷进战场的泥坑中不能自拔。杜鲁门之流怎么也闹不明白，为什么装备那么差的中共军队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败世界强国美国？在美国历史上，这还是它第一遭受如此巨大的耻辱。从此美国不再有不败的记录了。

朝鲜战争不仅使华盛顿遭受到了沉重打击，而且还是个“无底洞”。在这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兵员和物资的消耗，比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头一年的消耗多一倍。其物资消耗平均每月为 85 万吨，几乎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的数量。

其实停战的问题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即美军越过“三八线”时，苏联等国就曾向第五届联合国大会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周恩来也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这项提案。

但是美国那时正是骄狂至昏、气壮如牛的时候，“停战”这个字眼是美国领导人脑海中根本就不会存在、也从不曾考虑过的词，因而下令操纵联合国否决了这项提案。

然而，落花流水，时过境迁。当志愿军连续进行了三次反攻战役，美军

被迫退到“三八线”、放弃汉城后，杜鲁门及其助手意识到他们在朝鲜问题上可能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于是开始玩弄停火谈判的阴谋。一方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做出决定，美国最根本的利益和最大的危险仍在欧洲，因而美国必须在欧洲部署大量军事力量，并鼓励北约盟国也采取同样做法。美国的根本利益决定了它绝不能陷入亚洲一场持久战，消耗掉原应部署在欧洲的军事力量。而这可能正是克里姆林宫所希望的。于是美国在1951年1月11日，向我提出了停战谈判的建议，并操纵联合国通过了“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提出的解决朝鲜及其远东问题的五项原则意见，要求在朝鲜立即安排停火，以各种措施实现“联合国”在朝鲜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代表讨论解决远东问题。而另外一方面，也由于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后，一度曾使朝鲜战局有所好转，于是美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决定继续在战场上碰碰运气，为谈判捞点救命稻草。

战争，从来不是单独孤立的军事行动，总是同外交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当美军首次发出“和谈”的信号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认为，尽管这时谈判对我方有利，但还不到火候。一是考虑到美军和谈并非有诚意，只是一种缓兵之计；二是想争取我军取得更大的战果，以使我军在谈判中能更占据更加主动的地位。因此，中央决定继续给美军以更大的打击。在毛泽东的部署下，第3、第19、第20兵团，第47军、第16军等被新调到朝鲜，向“联合国军”发动了更大的反击，最后把战线稳定在了“三八线”附近。

到了5月份，当美军在战场上不断失利、再次陷入困境、面临军事和政治上极为不利的局面的时候，华盛顿终于明白单纯靠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已不可能。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遂作出“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5月31日，美国国务卿顾问凯南私下拜会了苏联驻联合国负责人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者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并表示愿意“恢复战前状态”，愿意“讨论逐步撤退外国军队”。6月初，美国又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多次透露愿意通过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意图。与此相联系，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在军事上也暂时放弃了全面进攻的战略，改为在“三八线”附近构筑阵地，转入战略防御。

停火谈判看来已迫在眉睫，若美国正式提出谈判，我们应采取什么策略呢？

这天，毛泽东走出书房，慢慢踱步在花园叶影斑驳、杨柳婆娑的林荫小道上，正当沉思着这件事时，忽见周恩来兴冲冲地走了过来，脸上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喜悦。

“主席，杜鲁门已被我们打得终于同意坐下来谈判了。他已授权李奇微向我们发出声明，愿意与我们举行正式谈判。”说着，周恩来递给主席一封电报。

“好啊！好啊！”毛泽东大喜过望，连连叫好。他急忙接过文件，仔细地阅读起来。

“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事项：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

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

我在贵方对本文的答复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会议的日期，以便

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议可以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李奇微

1951年6月30日”

“我说怎么今天知了叫得这么带劲？原来是有好事到呀。”毛泽东笑了起来。“这两天我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今天他就向我们提出来了。我们得好好研究一下怎么给他回话。”

毛泽东和周恩来走回到菊香书房，各自坐定，话题便又回到研究如何答复李奇微的问题上。

“恩来，你看这个谈判声明，是美国佬真的回心转意想与我们真心实意的谈，还是炒的‘老三样’、虚情假意地蒙骗我们？”

“主席，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是在欧洲，可这次却在朝鲜战争中动员了他们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二分之一，还动用了英、法等20多个国家的军队，总人数由入朝时的42万增至69万。即使这样，他也仍然没有取胜的可能。目前，美国不愿也无力再向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并且担心再打下去，会被撵出朝鲜半岛。因此，为了避免他们的彻底覆灭，美国才急于与我们停火谈判的。另一方面，明年是美国大选年。杜鲁门为了民主党的竞选，不想当年在朝鲜停战，以免被共和党指责为承认失败。

因此，我看这场谈判有可能拖上一段时间。不过，既然美方已提出妥协，我们就是明知道他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也应照顾一下他的面子，给他一个表演的机会嘛。”周恩来思维敏捷，侃侃而谈，主席赞许地点着头。

“看来，国际形势要求美国必须把战争限制在朝鲜，限制在现有的陆海空军力量上，不会再派任何增援部队了。对他们来说，只要能尽可能稳住‘三八线’附近的战线就算保全了体面。”

“是的，主席，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依我看，现在是到了与美国佬谈判的时候了。”

“这次看来美国是真的要与我们谈判了。好，我看可以谈。谈判时机已到，能早解决就早解决，这样我们都可以睡个好觉，休养生息，搞我们的国内建设。说实在的，经过五次战役，我们虽扭转了朝鲜战局，但是与美军相比，我方技术装备仍处于非常悬殊的劣势，制空权、制海权也完全掌握在美国佬手里。虽然彭高步兵数量多、战斗力强，炮兵、坦克兵和后勤保障力量也得到了加强，但他们没有白天行动的自由，部队机动和物资供应均受到很大限制，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利的。既然速胜是不可能的，那么当客观上出现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时，我们应抓住这个时机。”毛泽东着有所思的停了停又继续说，“不过，从以往与他们打交道的经验看，我们还需多做两手准备，才能步步掌握主动。一方面要与敌人举行停战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另一方面还要准备打持久战。”

周恩来问道：“金日成发来电报，希望彭德怀代表志愿军出席谈判会议。”

“这不太好吧？彭德怀是中方统帅，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都不宜直接出面谈判，还是让副司令邓华和参谋长解方去谈判吧。”

“主席，我看还可以派李克农和乔冠华去朝鲜，充实谈判代表团的力量，他们俩精通外交、擅长谈判。”

“好，就这么定吧。”毛泽东肯定地说。“对了，你再给金日成和彭德怀发个电报，让他们尽快答复李奇微。”

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首相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彭德怀以声明的形式答覆了李奇微：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

你在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已收到了。我们授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从此，朝鲜战争结束了大规模运动战的时期，而代之以边打边谈，谈谈打打的僵持阶段。这个阶段前后延续了两年之久，双方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其间历经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防御战和反击战，包括最著名的上甘岭防御战和1953年夏季的金城反击战……。美国的侵朝战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道义、经济方面都有不少难以克服的困难，战争拖得越长，对美国越不利，但它又不甘心失败。因此，美国对谈判表现得既狂妄又虚弱，出尔反尔，能拖就拖，周恩来称之为“美国的慌乱与徘徊”。美国在谈判期间所表现的基本特点是“打时想谈，谈时想打”。他们一心想把持谈判，想让我们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达成停战协议，以取得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所以，他们在谈判过程中总是百般刁难，致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结果。

“用大炮和机枪来辩论”的结果

1951年7月10日上午10点，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西北郊的来凤庄正式开始。我方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先提出了三条原则建议：

第一，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

第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应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并且在一定时限内完成，双方撤离的地区为非军事地带，这里的民政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商谈。

第三，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便为停止朝鲜战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提供基本的保证。

停战谈判第一天的会议结束后，世界各大通讯社都报道了我方代表团的三项建议。

然而，作为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很是傲慢。从谈判的第一天开始，它就横生枝节，不断挑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诚意。美方代表还借口要讨论谈判的议程，避而不谈有关军事分界线和撤军问题，而仅仅说讨论会议议程，就一直拖到半个多月之后的7月26日，才勉强与我达成了以下五项协定：

一、通过议程。

二、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内建立非军事地区。

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

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

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翘首以待，希望这些难得的议程变为现实。但是，杜鲁门政府却蓄意破坏这次谈判。例如，在讨论军事分界线时，美国借口其

与中方相比，较有“海空军优势”，必须在陆上取得“补偿”，提出将分界线划在志愿军阵地以北约 38 到 68 公里的开城、伊川、通川一线，企图不战而获取一万二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一政治讹诈理所当然地被中、朝方面严辞拒绝。于是，在谈判会场，美国不断地制造事端。首先是美军借口我警卫部队误入会场单方面中断谈判。在我方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情后，美方仍无理拒绝恢复谈判。这一事件刚刚解决，8 月 19 日，在谈判会场的中立区内，对方 30 余名武装人员袭击了我方军事警察，打死打伤我方人员各一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枪杀我军事警察姚庆祥的事件。紧接着，8 月 22 日晚，美军飞机又袭击了位于中立区之内的我谈判代表团驻地，制造了一次更为严重的破坏停战谈判的事件。事件发生后，美军的态度蛮横无理，不仅不承认他们的破坏行径，反而不顾铁的事实，颠倒黑白地说这一事件是我方制造的。面对这种情况，我方代表团不得不从 8 月 23 日起宣告停会，等待美方对以上事件做出处理。

与此同时，美国又企图以军事压力逼迫中、朝方面接受其在谈判中提出的不合理的要求。当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严辞拒绝后，美方公然挑衅说，既然你们不肯就范，那么“就让大炮和机枪去辩论吧！”李奇微也狂妄地声称：“用我们联合国的威力，可以达到‘联合国军’代表团所要求的分界线。”

李奇微所声称的“联合国的威力”，是从美国本上新增运入朝的十多万兵员、炮兵及坦克部队。为了证明“大炮和机枪辩论”的威力，李奇微充分施展了他的能量和淫威。他除了调动美空军第 116、136 师两个战斗机轰炸队进驻日本外，又增调美第 40、45 师由日本进入朝鲜以增加其陆、空军作战力量，还将英第 28、29 旅和加拿大第 25 旅、新西兰炮兵第 16 团组编为“英联邦第一师”，并扩大了大丘机场，新开辟原州、水原等十几个海空军运输补给基地，修建东豆、川里、永平、麟蹄等十几处前沿机场。此外，李奇微还下令抓紧修筑道路，运输作战物资，出动大批飞机轰炸志愿军交通运输线和后方基地。8 月 18 日，敌人趁我遭受特大洪水灾害和“绞杀战”危害的极端困难之时，集中美军三个师的兵力，在伞兵和装甲兵支援下，向北汉江以东至东海岸约 80 公里的人民军防御阵地正面突然发动攻击，发起所谓的“夏季攻势”。

中、朝人民军队以高昂的斗志，投入了这场由敌人挑起的“大炮与机关枪的辩论”。“辩论”的结果如何呢？敌人攻了一个多月，除去付出死亡 78000 余人的代价，留下“伤心岭”的痛苦记忆外，别的一无所获。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美国的逻辑。大炮与机关枪的“辩论”的第一个回合，虽以美军的惨败而告终，但李奇微不甘心，9 月底转而向志愿军防御阵地发动了“秋季攻势”，把“辩论”推向了新的高潮。这次李奇微部署发起的“秋季战役”又进行了将近一个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可歌可泣的英勇斗志，打退了各路进攻之敌，东、西两线共歼敌 79000 余人。美军在付出高昂的代价之后，所取得的“辉煌战果”是在西线仅向前推进了约三至四公里，东线仅前进约六至九公里。

敌人连续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一再遭到巨大伤亡。美方从中得到了教训是，他们深深感到，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也难以得到，因此，不得不回到谈判桌旁。9 月 10 日，美国飞机袭击了开城附近满月里。借这次事件，美军承认了错误，并且保证不再发生这类事件，经过双方协议，中断了 63 天的谈判于 10 月 25

日在新会址板门店恢复谈判。

无法进行的停战谈判

新一轮新的谈判开始了。像第一回合的谈判一样，重新开始的谈判仍然是艰苦的。

早在谈判中断之前，我方在6月26日曾经就第二项议程提出了一个原则性建议，即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停战。但美方却在会上提出一个反建议，要把军事分界线划在我军大后方，即要使整个中朝部队在临津江以东从现有阵地后撤38到58公里；在临津江以西从现有阵地后撤68公里。也就是说，根据这一方案，美方可以从我方控制区获得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谈判重新开始后，我方代表驳斥了美方的无理要求，并且于11月7日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即以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退两公里为非军事区。然而，美方代表强词夺理，再次提出无理要求，它放弃了获取1.2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要求，却又提出将开城地区划入美占领区或划在非军事区内，实际上要我方退出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要求遭到我方代表的严词批驳。经过激烈的斗争，美方不得不接受以现有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

这以后，谈判进入了第三项议程，即对“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讨论。我方提出停战协定签字后，双方军队立即停战并且从非军事区撤出，由双方成立停战委员会进行监督等条款；美方坚持停战后到对方的后方去进行广泛的空中和地面的“自由侦察”。对这一干涉内政的要求，我方当然不能同意，提出了由中立国在双方后方进行监督的建议。对此建议，杜鲁门政府不愿接受，却又因为它的合理性而不能拒绝，因此，在拖了九天之后勉强同意。

而后，美方一方面坚持要大量轮换部队和补充武装弹药，另一方面、强烈要求不得在朝鲜境内恢复、扩充和修建新的飞机场。经过讨论，我方同意轮换部队的建议，为了早日实现和平，甚至接受了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弹药这一对我不利的建议。然而，对于美方提出的不得恢复、扩充和修建飞机场这一干涉内政的建议，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由于杜鲁门政府坚持干涉别国主权，使得第三项议程迟迟不能签定协议。

与此同时，1951年12月11日，开始讨论的有关战俘安排问题的第四项议程小组会也僵持住了。1952年1月31日，美方建议同时召开讨论第五项议程的小组会议，我方代表立即表示同意，并且建议召开代表大会讨论，争取在僵持中能够有所进展，2月6日，停战谈判举行代表大会，我方提出了第五项议程的修正原则草案，并且就此达成了协议。

然而第三、四项议程仍处于僵持状态，美方出席第三项议程的哈里逊少将从1952年4月11日起采取到会就宣布休会的办法，使得谈判有时只能进行两分钟，最短的一次只有25秒。第四项议程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的讨论，原本应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战争终结时交战双方交换战俘，既是历来国际战争的惯例，又有公认的国际公约的约束。释放战俘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1951年12月11日，我方提出停战以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而美方却设置层层障碍，在战俘问题上大作文章。他们先是提出名单问题，拖延实质问题的讨论。接着又在交换战俘的人数上提出无理要求，最后借口“自愿遣返”竟提出进行“一对一”的交换，妄图掩盖他们扣留战俘、干涉

战俘政治信仰的目的。面对美方在战俘问题上违反国际惯例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行径，中国代表团在谈判中，一方面对他们进行揭露和谴责，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一些让步。早在李克农、乔冠华等一行即将离国赴朝鲜谈判时，周恩来曾召集代表团团员开会，向他们谈了谈判的策略。他指出：“当美国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追求和的时候，我们就应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新中国的建设。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谈判时，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坚持原则，力争停战条件公平合理，符合国际公法，以利朝鲜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但从全局出发，在不损害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问题上可以做一些妥协或者让步，以避免谈判破裂，推动达成协议，实现停战。应掌握这样的原则：可让的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用对不能让步，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

外交大师和美国总统的较量

在朝鲜停战谈判的全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就像中方代表团的灵魂，随时指导着谈判的方向。尼克松在他所著的《领导者》一书中这样评价周恩来：“周恩来是有献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谋远虑的现实主义者，是政治斗争的能手和杰出的调解人。”朝鲜停战谈判的前前后后充分显示了这位外交大师的这种特色。

在谈判的战略战术方面，周恩来提出了谈判中要利用矛盾、掌握主动的思想。他认为在朝鲜战争和朝鲜停战谈判期间，存在着几种矛盾。第一，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区别对待。在朝鲜战场，和美国在一起的虽有十五个国家，追随美帝的国家毕竟是少数。美国与其主要盟国英国就有不少矛盾。英国虽也出兵朝鲜，赞同美国在联合国导演的一些提案，但是它反对美国扩大战争、把兵力陷在亚洲，反对美国企图使用蒋介石的武装，反对李承晚扣留大批中方被俘人员而危及停战谈判，认为美国封锁中国是一种错误。美国领导人几次叫嚷在朝鲜掷原子弹，英国很紧张，极力劝阻。它担心美国同中国冲突的升级会损害大英帝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利益。因此，英国、法国都应作为“维持现状派”的代表，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情况，使英、法对美国起一定的牵制作用。

第二，李承晚集团同美国之间也有矛盾。李承晚对停战谈判从中作梗，以此向美国讨价还价，要挟美国增加对他的支持和援助，志愿军总部在这一点要把美国政府同李承晚区别开来。一方面痛打李承晚的军队，一方面在美方对执行停战协定作出保证后才同意签字。

周恩来高超的外交艺术不仅表现在分析认识对立面那些客观存在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周恩来正确掌握并善于利用美国本身的种种矛盾。谈判开始前，美军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因在战略思想上与华盛顿有矛盾，而被杜鲁门撤职。谈判期间，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远东司令部以及谈判代表在战俘遣返等问题上不时出现分歧。这些都没有逃过周恩来的眼睛。

杜鲁门发动侵朝战争两年半后的1953年1月，在世界人民和美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责骂声中，杜鲁门下台了，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继任了总统。艾森豪威尔竞选时曾许诺当选总统后将结束朝鲜战争，但在当选并到过朝鲜后，他却在承认“要胜利很困难”的同时作出一些强硬的姿态。面对这种看

来矛盾的复杂形势，周恩来却清醒地看到，美军陷于东方，顾不了西方，盟国又吵，加上世界人民要求朝鲜和平，所以艾森豪威尔总的政策是要从朝鲜脱身。果然，艾森豪威尔新政府上台后不久，从总的战略出发，同时也是军事上一无进展，政治和外交上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改变那种破坏和拖延谈判的政策，开始实行转弯。在谈判体会四个月零两个星期以后再次发出回到谈判桌上的信号。1953年2月22日美方提出在战争期间先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

具有非凡政治头脑和外交眼光的周恩来，敏锐地抓住了美方的新动向，于1953年3月30日，周恩来提出了“分两步走”的建议，同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恢复谈判。

4月11日，遣返病伤战俘的协议签订了。

此前，中朝两国政府一直都在为和平进行着艰苦的努力，但杜鲁门政府却一再阻挠谈判。我方代表一方面与美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又千方百计地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不放过任何可以导致和平的机会。比如在战俘问题上，为了解除美方“释放战俘等于增加军事力量”的狡辩，我方曾经提出了一个修正案，提出战俘被遣返后不再参加战争的保证。为打破美方利用“扣留平民”的名义扣留战俘的企图，我方提出停战后协助流离失所的平民返回家园的全面措施。对这个方案，国际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谈话表示支持，不少新闻记者发表评论说：“这是一个不能久拖而又能打破僵局的好方案。”然而美方却仍坚持它的所谓“自愿遣返”，以此掩盖他们迫害战俘、阻碍谈判的真实目的。他们名义上高喊“自愿遣返”，背地里挥舞血腥的大棒。美军为达到破坏和平的目的，在战俘营里安插了大量的南朝鲜和蒋介石的人员，对战俘进行残酷的镇压和迫害。他们对每一个战俘进行强迫“甄别”，强令战俘“拒绝遣返”，在战俘的身上刺上反共的字样，残酷殴打希望返回祖国的战俘，使战俘营里发生了一场场惨不忍睹的流血事件。其中包括1953年2月18日发生的“巨济岛”惨案。那次被打死打伤的我方战俘就达373人。美军残害战俘的罪行，受到世界人民的谴责。

杜鲁门在谈判桌上达不到目的，就希冀用军事手段迫我就范。在李奇微的部署下，美国开始向我志愿军发动“绞杀战”，出动大量空军和海军尽其所能封锁我军的后勤供应。志愿军和人民军并肩作战，在反“绞杀战”的斗争中，建成了以兵站为中心、铁路和公路相结合、前后贯通、纵横交错的兵站运输网，形成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基本上解决了作战物资的补给问题，取得了战略上的一个重大胜利。1952年5月31日，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送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1952年10月8日，美国单方面宣布长期休会，以为美国军队发动新的军事攻击提供机会。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从10月14日起，“联合国军”集中兵力、火力，对我发动了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的“金化攻势”。在这次战斗中，“联合国军”为了占领志愿军两个连扼守的上甘岭阵地，动用了难以计数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它所倾泻的炮弹，平均每天2.4万多发，最多时一昼夜30多万发，每天出动飞机平均80多架次，多时达250多架次。上甘岭的山头被削低了2米，山上的石头被轰击成1米多厚的粉末。美国新闻界称这次战役“实际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

从10月14日到11月11日我军粉碎了美军三个阶段的进攻，美军伤亡25000多人，却没有前进一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其《从多瑙河到鸭绿江》的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金化攻势’发展成了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这次作战是失败的”。当时美国的新闻界也评论道：“美军的伤亡达到一年来的最高点”，“‘金化攻势’已成了一个无底洞，它所吞食的联合国军的军事资源要比任何一次中国军队的总攻势所吞食的都多”。

杜鲁门在战场上得不到任何他想得到的东西，在他所寄予厚望的第7届联合国大会上，同样什么也没有得到。他所指望的通过假谈真打、用军事手段压我就范的战略，最终证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使杜鲁门在世人面前丢尽了脸。

1953年，不寻常的春天和夏天

1953年4月，朝鲜战争迎来了爆发后的第3个春天。严冬为3000里江山披上的冰雪铠甲已为明媚的春光所消融，大地又一次显露出勃勃生机。美丽的金达莱花在广阔的原野上竞相开放，鸟儿在蓝天白云间恣意飞翔，纵情欢唱。举目眺望，到处是一片郁郁葱葱，满眼是簇簇柳绿桃红。这就是朝鲜的春天，清新、明丽。大自然具有无比的生命力，即使是残酷的战争也无法阻挡住春天来临的脚步。

伴随春天的来临，朝鲜问题的解决也开始出现了一线转机。4月26日，中断了六个多月的停战谈判终于在板门店重新恢复了。在这大的会议上，朝中方面为了解决阻碍停战协定达成协议的战俘遣返问题，提出了六点方案，坚持将遣返的战俘在停战后两个月内全部遣返完毕。然后在一个月内将其余的战俘从原拘留方军事控制下释放出来，送交中立国加以看管，并由战俘所属国家派人向战俘进行六个月的解释。在解释后，要求遣返的一切战俘应即予以遣返。如在六个月后尚有在中立国看管下的战俘，其处理办法应交停战协定所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5月7日，朝中方面又对方案作了修正，成了八条建议的新方案，主张由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及印度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不直接遣返的战俘，并由战俘所属国家向战俘进行四个月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这一方案的提出使双方的立场更加接近，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肯定。

然而，美国方面却不肯轻易接受这个公平合理的方案。为了给自己捞取更多的好处，并解决同李承晚集团之间的纠葛，美方代表于5月13日节外生枝地提出了一个朝中方面无法接受的方案。他们主张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在停战生效时“就地释放”，并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和战俘所属国家的解释工作加以种种限制。对中方提出的把暂时不遣返的战俘交往中立国的建议，美方又以存在实际困难为由加以反对。为了大局起见，周恩来指示中方代表团作出让步，同意将他们交由设在朝鲜非军事区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一定时期，以便他们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行使被遣返的权利。但即使这样，美方仍迟迟不予同意，继续设置干扰，因此遣返战俘的问题一直拖到了夏季。

显然，不给美军一点颜色看看，不再进行一次军事较量，美方就不会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坐下来谈判，战俘问题就达不成协议。为了打击敌人的

气焰，显示中方力量，有力地配合停战谈判，1953年5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决定采取“稳扎狠打”、“由小到大”的方针进行一场反击战来配合停战谈判。5月13日，即在美方提出所谓“就地释放”战俘、为谈判制造障碍的同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了夏季大反攻。整个战役持续了一个多月，至6月15日结束。这次反击战，我军突破敌人阵地正面达12公里，纵深达6公里，先后对敌团以下兵力防守的51个防御阵地，发动了61次进攻，并击退了敌人从一个排到两个营规模的反扑共733次，共歼敌41000余人，给李承晚的第5师、第8师以歼灭性的打击。通过这次战役，我方彻底查清了敌方布署的基本阵地和预备队阵地构筑的情况，这为以后如果敌人再不接受停战、我们将进行的更大规模的反击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志愿军组织的夏季大反攻的胜利终于打破了停战谈判道路上的坚冰。6月8日，双方终于达成最后协议并签署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文件。至此，一年多来唯一阻碍达成停战协议的战俘遣返问题就获得了解决。

6月8日达成战俘协议的新闻成了全世界绝大多数新闻媒介的头条新闻，它牵动着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心，人们盼望着板门店谈判的新进展，盼望着尽快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6月10日后，代表会议休会，双方参谋人员举行行政会议，分两组重新划定军事分界线和拟定签订停战协定的细节。全世界人民盼望已久的朝鲜和平就要实现了。

6月15日，中方停战谈判代表团通过电话，通知志愿军总部：“军事分界线基本上已达成协议，以6月16日24时为难，在24时前敌我双方攻占之阵地均为有效，在此以后（零时起），即作为17日计算，敌我攻占之阵地均属无效。”

6月16日，在板门店的帐篷里，双方参谋人员按照实际接触线重新划定了军事分界线。

在开城到板门店沿线，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战士们正在赶修公路和桥梁。紧接着，准备参加签字仪式的各国新闻记者来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人员来了，为代表团增加的各种工作人员也陆续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将军，也预定在6月19日离京前往开城，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盛夏酷暑，人们紧张而又有秩序地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以迎接停战协定的签字。

然而，就在停战协定即将签字的时候，李承晚集团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破坏双方达成的协议，叫嚣“反对任何妥协”，声言要“单独打下去”，并于6月18日午夜以“就地释放”的名义，胁迫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000多人离开战俘营，押解到李承晚军队的训练中心。据李承晚“国防部”发言人说，这些被扣留的战俘“将被编入”南朝鲜的武装部队中去。这是美军当局纵容下的一次严重破坏停战的行动。

李承晚集团的这一破坏停战的行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谴责。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发言人19日说，这是一件“很遗憾而极其令人反对的事”。英国首相邱吉尔于22日在下院也遭到严厉的质问，他不得不宣读英国致李承晚当局的抗议照会，称“女工政府强烈谴责这种背叛行为”。美国的其他盟国的政府也纷纷向华盛顿抗议和质询。

为了狠狠打击李承晚集团阻挠破坏停战的行为，促进停战谈判的顺利实

现，并拉直金城以南战线，以取得停战后的有利态势，彭德怀在6月20日抵达平壤的当晚，亲自拟电给毛泽东主席，建议推迟停战签字时间，再歼灭李承晚军15000人，给敌人以毁灭性的重创。毛泽东在6月21日回电中指出：“停战协定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作出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立即着手组织夏季战役的第3次进攻，即“金城战役”。

“金城战役”的组织，我在“天”、“地”、“人”三方面均占有绝对的优势。此时，经过志愿军连续两次夏季攻势，敌军在原北汉江两侧的防御体系已被破坏，其位于金城以南，西起金化、东至北汉江的李承晚的4个师的防御阵地更加突出，态势对我极为有利。同时，志愿军在金城地区已集中了4个军的兵力和近400门火炮，并已查明了该地域敌之纵深阵地工事情况，掌握了敌人防御的特点，因而斗志旺盛，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为了保证金城战役的胜利，志愿军领导机关参战部队事先补充了兵员，并加强了炮兵、装甲兵和工兵等部队，使敌我力量对比为1:3，人力对比为1:1.7。第20兵团和第9兵团的第24军及全军主要炮兵部队，向敌战略要点金城以南之上至金城川北与北汉江汇合处约25公里正面运动，以歼灭该地区李承晚军4个师而拉直金城战线为目标，实施主要突击。其他第一线各军在各自正面阵地积极出击，牵制敌人，以配合主攻方向的作战行动。

7月13日晚9时，夜色苍茫，万籁寂静。这是一个无星无月的夏夜，天气阴沉沉的，湿气袭人，大有暴雨到来之势。突然，三发信号弹呼啸升空，照亮了夜空。随着彭德怀一声令下，“金城战役”全面开始了。志愿军第20兵团及第9兵团共5个军组成的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军，出敌不意，在1000余门火炮的支援下，分路向敌展开了猛烈突击。经过短暂的激战，仅用了不到一小时，全线就突破了敌人前沿阵地，随后在24小时内将伪首都师、伪第6、第8、第3师4个师全部歼灭。

为了保障战斗的胜利，当我西集团军在突破敌人前沿阵地后，军指挥部派了一个加强营迅速向敌纵深发展。其中，由排长杨育才带领的先头班化装成伪军，以极其隐蔽而迅猛的动作，于14日凌晨2时插到了二青洞附近。他们根据反击前从敌俘虏中了解的情况，骗取了敌人的口令，巧妙地突破了一道道防线，直闯入伪首都师第一团（即“白虎团”）团部。面对这些简直是神兵天降的志愿军，“白虎团”团部的敌指挥官不禁目瞪口呆，全无招架之功，只好束手就擒。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就是取材于这一精彩战例。

7月14日，雷鸣电闪，暴雨倾盆。我军利用雨天敌航空兵活动不便的“天时”，迅速扩大战果。至14日17时40分，梨实洞、间榛岬一线以北地区已被我西集团军全部占领，伪首都师副师长林溢淳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犹如瓮中之鳖，被我生擒活捉。

“金城战役”的实施给予“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为了稳定军心，部署反扑，“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美第8集团军司令泰勒于7月16日匆忙赶赴前线，为属下撑腰打气，十天里先后发动上千次疯狂的反扑，企图夺回失去的阵地。尤其是7月19日和20日两天，敌军每日展开三个团的兵力，在400余架次飞机、30余辆坦克的支援下，连续猛攻，面对敌人的反扑，志愿军进攻部队随即转入了坚决的阻击。我前沿阵地将士在步、炮兵密切协同下，英勇奋战，打退敌人的猖狂进攻，牢牢地守住了阵地。至7月26日，志愿军部队先后打退了敌人大大小小反扑达1371次之多，巩固了所得阵地，大

量歼灭了敌人。

“金城战役”的实施具有极为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军事上，“金城战役”是朝鲜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和决定性的战役，共击毙、伤、俘敌 78000 余人，给李承晚军队以致命的打击，胜利完成了金城以南地区的作战任务，收复土地 240 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的战线。在政治上，“金城战役”的实施使美军不得不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在我沉重打击下，7 月 19 日，美国发表了保证停战实施的声明。鉴于美方向我方作出了完全的担保，我方也发表声明指出，为了全世界的和平事业，我方同意尽快签定停战协议。

1953 年 7 月 27 日，是一个世人瞩目、永载史册的日子：朝鲜停战协定终于签字了。这一天的板门店，天空晴朗，夏风宜人，发生在这里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在牵动着世界“神经”。

上午 10 点整，签字大厅一片安静。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从大厅南门进入大厅，分别在会议桌前就座。两位代表在本方助签人员协助下，在自己一方准备的九本停战协定上签字。之后，由助签人员同时交换九本，再在对方交来的九本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这些文本将由助签人员送往双方司令官签字。到场的来自世界各地的 200 余名新闻记者，均有幸目睹和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并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一头号新闻分发到世界各地。

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于汶山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

同日，金日成元帅于平壤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

次日，彭德怀司令员于开城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

同日，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向朝中部队发布命令：“自 1953 年 7 月 27 日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 12 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至此，历时 2 年零 9 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敌方联军总司令克拉克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场从“三八线”上爆发的战争，在历经 3 年多后，终于在“三八线”附近宣告结束。历史在前进中完成了一个螺旋形的圆。朝鲜停战谈判签定的喜讯传来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毛泽东特地打开了一瓶陈年老酒，请所有在场的同志们品尝。周恩来告诉大家，这是毛泽东早就预备好的酒，就等着有那么一天用它来庆贺胜利的。酒瓶既开，芬芳四溢，宽敞的房间顿时充满了舒心的、沁人肺腑的酒的馨香，每人心里的喜悦难以用语言所描绘。这一天，毛泽东睡得极为香甜。在欢迎志愿军将领载誉胜利回国的宴会上，毛泽东指出：“朝鲜停战谈判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停战谈判。它既不是帝国主义强迫别国接受投降条件的停战谈判，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间为瓜分殖民地、分得一杯羹汤而暂时妥协的停战谈判，而是帝国主义不得不举手投降、承认失败、倍受羞辱的停战谈判。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就是一个妄图独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耻下场。”

“在我们庆祝胜利的日子里，我们还必须提醒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帝国主义虽在战场上和谈判中遭到失败，不得不低头服输，勉强接受停战，但帝国主义者及其反动派们对于这样的结局是决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的，也是不会对一个社会主义的、年轻的、新兴的人民民主国家俯首称臣的，他会无时不刻地力图翻案。很显然，朝鲜停战谈判后，我们还不能就此罢手，高枕无忧，更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要准备迎接一场更加尖锐的、复杂的

军事与外交交织着的斗争。”毛泽东那洪钟般响亮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宴会厅里，也久久地回荡在人们的心上。

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朝鲜停战谈判后，在随后围绕着朝鲜问题所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我国与美国又再次交锋，展开了一轮新的看不见硝烟的斗争。

第二节 折冲樽俎日内瓦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低劣的装备，浴血奋战打败了号称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美国，在国际上充分显示了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的风采更令世界各国和人民对中国刮目相看……

“战前动员”

1954年4月，春天已悄悄来到了北京。柳枝吐着嫩绿的苞芽，春风吹拂着这座古老的城市，这正是孩子们追逐着争放风筝、人们相邀踏青出游的好季节，也是人们除去厚厚的冬装、一扫长冬的压抑、身心放松的季节。然而，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却与春天的气氛无缘，他们没有意识到春天的来临，更无暇带上家人外出轻松一下，享受春日的温暖和春风的轻抚，而是天天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这天下午，他们聚集在外交部礼堂，正在紧张地出席着一个奇特的“记者招待会”。到场的，有来自合众社的、法新社的、路透社的……而坐在主席台上回答记者质问的，是两个年轻人。

“请问，中国代表团此次参加日内瓦会议有什么目的？”

“在解决朝鲜问题上中国有何底牌？中国的底线是什么？”

“中国如何看印度支那问题的？”……

一个接一个问题，许多是带有明显挑衅性的、侮辱诽谤性的、威胁恐吓性的或质问性的问题，如雨点一样向坐在主席台上的黄华和龚澎袭来。面对黑鸦鸦的人群，面对一个比一个刁钻古怪、尖锐无理的提问，刚开始，黄华显得很紧张，面部表情严肃，但很快便适应了，从容、镇定的气质和机敏的应变能力得到充分显示。无论什么问题，他都能有理、有利、有节地一一予以回答、解释或是驳斥。他的回答时常引来在座的人阵阵喝彩和赞叹声。

原来，这是一次模拟的“记者招待会”，是外交部为了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而进行的战前演习，而那些来自各个外国通讯社的记者都是新华社记者扮装的。这是我国第一次派团参加如此大型的国际会议，而在重大的国际会议中，新闻发言人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为了实地锻炼中国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外交部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进行了多次彩排，有意识地让黄华等同志熟悉那些“敌对势力”的轮番进攻。几经“较量”，他不但锻炼出从容、镇定、大度的气质和机敏的应变能力，而且更加熟悉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及我们的政策、方针和策略。正是有了这种充分的准备，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每当黄华和龚澎在会议之后去新闻中心发布消息时，总是能够对答如流地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各种质疑。尽管遇到许多歪曲事实的挑衅和刁难，他们都能非常出色地予以反驳，他们的出色表现，引起外国记者们的普遍赞叹，就连西方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出色的、年轻优秀的”红色发言人。“记者招待会”快要结束时，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站起身来，向在座的全体工作人员做了“战前动员”。他说，“同志们，自从3月3日中央决定接受柏林会议的邀请，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后，同志们就开始了各方面紧张的准备。从今天的实战演习来看，同志们是可以胜任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

听了总理肯定的评价，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不过周恩来马上转换了语气，对大家说：“同志们，中央对日内瓦会议

十分重视，明确指出在这次国际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要通过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达到打破美国对我国封锁禁运的目的，并且要尽一切努力达成某些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同志们，这次会议主要是要解决朝鲜和平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尽管在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提议下，美国最终放弃了他原来坚持的反对态度，同意我国作为五大国之一出席日内瓦会议，但美国代表坚持要在公报上写明，中国参加会议并不意味着西方大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的承认。因此，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与美国的交锋是少不了的。我们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打开新中国的外交局面，使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我们新中国，并争取同他们建立广泛的外交关系。”说完，周恩来习惯性地向上扬了扬右手。周恩来的动员博得了全体人员的热烈掌声，在场的同志们都已摩拳擦掌，做好了迎战的一切准备。

为了更好地完成中央布置给代表团的政治任务 and 重要使命，中央任命了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作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为代表团秘书长，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如、雷英夫为顾问。

“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

日内瓦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空气清新，气候宜人，许多重大的国际会议都在此举行。

1954年4月24日，晴空万里，春意盎然，是一个令人心情愉快的天气。我国代表团乘坐的专机顺利抵达日内瓦机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派出大型代表团，它的到来格外引人注目。为了便于同与会各国广泛交往、深入接触，为了让更多的同志增长参加国际斗争的实践经验，同时也为了显示新中国强大的外交力量，我国组成了近200名工作人员的庞大代表团。他们之中可谓人才济济，精英荟萃，无论是在军事、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文化方面，各类专家能人一应俱全。

机场上虽没有举行什么盛大的欢迎仪式，但前往机场围观的各国新闻记者却有好几百。飞机停稳后，当周恩来矫健的身影出现在机舱门口时，各国记者顿时如潮水般纷纷拥上前去为他拍照，镁光灯的闪烁和照相机快门的咔嚓声，此起彼伏，把此时的周恩来衬托得更是端庄、潇洒，神采奕奕。

周恩来总理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他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是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的。我们相信，与会者的共同努力和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使亚洲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

当日，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刊登了来自日内瓦的电讯报道：“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着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

中国代表团抵达后不久，苏联代表团也抵达日内瓦机场。周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专程前去迎接。

其实，当周恩来率领我国代表团一行乘专机从北京出发飞往日内瓦的途中，曾在莫斯科稍事停留，期间按照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已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交换了意见。

当时周恩来曾向莫洛托夫表明了我国对这次会议的看法。他对苏联朋友介绍说，“中国、朝鲜和越南这次能够一同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是我们的一个伟大胜利。希望能够很好地利用这次机会，阐明我们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并争取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总理也一再向苏联方面诚恳地表示，“由于这是中国第一次出席这样重大的大型国际会议，经验不足，希望苏联同志能与我们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交换意见，协同行动。”

莫洛托夫一下飞机，就同前来等候迎接的周总理紧紧握手、热烈拥抱。记者摄下了这一意义深远的图象，见报对，配图的说明是：“苏中两个大国在这次国际会议期间将携手合作。”

莫洛托夫在机场也对记者发表了讲话。他说：“不能不指出这一重要事实，即：所有的大国——法国、英国、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代表最近几年来首次共同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苏联代表团在会上将尽力促成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以符合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同时，我们认为，尽速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保障印度支那人民的自由和民族权利是日内瓦会议最重要的任务。”

讲话完毕，莫洛托夫与周总理并肩同行，二人边走边谈，十分亲热。他们还有意放慢脚步，让外国记者尽情地为他们留影。

杜勒斯“雷管”未响

日内瓦会议期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杜勒斯。他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是美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正是他创立和发表了“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的理论。

杜勒斯中等个子，戴一副近视眼镜，脸色总是苍白疲倦，表情严峻冷酷，会议期间从未露出过一丝笑容。据悉，这次他来日内瓦之前，刚刚做过一次癌症手术，医生在他胃里专门放置了一支“镭管”，用作放射性治疗以控制病灶的扩散。因此，在他与会期间，人们都叫他“雷管”，“镭管”与“雷管”谐音，这绰号不仅仅反映出他是个危险人物，威胁着别人，而且也喻示他自己已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了。“雷管”这绰号使杜勒斯的赫赫大名蒙上了一层阴森森的色彩。他手术后先是拖着虚弱的身体到朝鲜“三八线”上去视察，然后又风尘仆仆地赶到日内瓦。当时朝鲜战争刚结束不久，美国和美国人操纵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中伤亡惨重，根据联合国在纽约公报上公布的数字，“联合国军”方面的伤亡数为147万多人，其中美军为14万多人，日平均伤亡数远远超过二次大战。最终美国不得不乖乖地坐在谈判桌前，破天荒地、屈辱地在自建国以来的第一个战败协议书上签了字。这次战争使得美国因二次大战的胜利而被激起的高昂士气和自信心跌得一落千丈，也正因此，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达到了极点。于是，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报复中国，以日本为其在东方的主要军事战略基地，通过武装台湾，插足越南，加紧控制亚洲其他国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中国形成军事包围圈，同

时极力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并对中国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为新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制造一系列的困难。

4月26日，在世界各国的期盼和瞩目中，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联的所在地）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很多是当时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赫赫有名的外交家，如：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外还有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南朝鲜以及参加“联合国军”的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希腊、泰国、卢森堡、新西兰、菲律宾、土耳其等国的代表。

根据日内瓦会议拟定的日程，会议首先讨论的是朝鲜问题。为了促进朝鲜和平统一，为了使所有在朝的一切外国军队撤退并帮助朝鲜举行自由选举，朝、中、苏三方代表携手并肩，在会上同以美国代表为首的西方反共势力进行了顽强而艰巨的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和解方案。

在4月27日的会议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相南日，根据预先商定的方案，提出了一项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面建议，包括三项内容：六个月撤退外国军队，全国举行自由选举，恢复朝鲜的和平统一。

第二天，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杜勒斯发言，强辞夺理地指责朝、中、苏三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共同立场。他提出了实现所谓“联合国统一朝鲜”的决议，其实质是想使美国无限期地占领南朝鲜。

听了杜勒斯目中无人、出言不逊的发言，周恩来总理即席在原来的讲话稿中增加了一大段话，义正辞严地批驳杜勒斯的发言。

周总理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实现国家统一的三项建议，谴责美国对朝鲜的侵略行为。我们呼吁亚洲国家彼此之间进行协商，共同努力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呼吁所有欧洲国家在集体努力的基础上保证欧洲的安全；呼吁停止扩军、普遍裁军并禁止使用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周恩来还对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未能出席日内瓦大会表示了遗憾。

周恩来的讲话，铿锵有力，有理有节，充分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鲜明的立场以及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诚恳态度，获得了很多国家代表的称赞和好评。

但是美国、南朝鲜根本就没有达成协议的诚意，步步设置障碍，阻挠会议的进展。尤其是美国根本不顾朝鲜人民的利益，拒不从朝鲜撤军。

美国人自以为是“金元帝国”，在会场上蛮横无理，横行霸道，无论对他们扶持庇护的国家或是盟国都要挥舞指挥棒，发号施令。开会时竟不顾起码的外交礼节，将两只脚高高地跷在会议桌上，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嘴脸。”有一次，李承晚的代表卞荣泰发言时因多少想解决一些问题，讲了一句不符合美国口味的话，美国代表马上暴跳如雷，站起来当着所有代表的面呵斥他，如同主子对待奴才一样。弄得卞荣泰尴尬万分，下不来台。

还有一次，加拿大代表在会下休息时，悄悄对中方人员说，他听了周恩来先生的发言，认为很合乎情理。中方人员便将此情况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周总理听后也很高兴，以为他会在会上讲几句公道话。谁知这位老兄在休息后的发言中，却将杜勒斯的提案大加发挥，并重复美国对我国的攻击和污蔑，诬陷中国“挑起了朝鲜战争”，是“侵略者”等等，这使中国代表很感意外。但散会后，他又主动与我方人员联系，又是握手，又是请求原谅，

说他会上的发言是言不由衷，因必须服从美国的指令，照美国的意思办，不敢越雷池一步。

在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东、西方形成了非常鲜明敌对。双方在看不见硝烟炮火的特殊战场上进行着殊死的搏杀。苏、中、朝、越作为一方，表现出高度的团结，会上紧密配合，在很多重大的关键性问题上，齐心协力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会下则频繁接触，四国代表团领导经常聚会在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住处，讨论研究会议上出现的问题，互通情报，交换意见，商量对策。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偶尔也来到我国代表团下榻的别墅找周总理谈话，但由于考虑到代表团住的别墅是临时租的，担心被安装了窃听器，所以，每当谈到重要问题时，都需要开大收音机音量。

在中、朝、苏三国团结联合的斗争下，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屡遭失败。5月3日，杜勒斯提前灰溜溜地离开日内瓦回国了。

提起日内瓦会议，人们不由会联想到一件引人争论的事，即会议期间杜勒斯究竟有没有拒绝与周恩来握手。

当时正值中美关系处于冰封雪冻时期。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杜勒斯确实曾亲自下令：禁止美国代表团的任何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握手。长期以来，国际上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即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断然拒绝了。当时任代表团秘书长的王炳南在他后来所著的回忆录《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对此事做了澄清。他写道：“有人说，在日内瓦期间，周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绝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他说，作为代表团的秘书长，在整个会议期间，他都是与周总理在一起的。每次开会时都是由他引路，陪着总理进入会场的。会场的座位是按每个国家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排列的。中国是 CHI-NA，排在前面，而美国是 USA，排在后面，两者相距甚远。每次开会和散会时，美国代表团与中国代表团从来都是从不同的门进出会场，因此两人会场上并不曾相遇。其次，杜勒斯是个坚决反共的人，他坚定的信念是决不容许共产主义在世界上存在。在当时中美仇视的情况下，他更不会想与共产党人打什么交道。第三，杜勒斯本来就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善与人交往的人。平时，他往往是一下汽车便低着头径直进入会场，一散会则立即退场，低着头钻进汽车，从不理睬记者，也不向任何人打招呼或寒暄。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没有机会、也根本不会主动伸出手去和杜勒斯握手的。另外，由于杜勒斯提前回国，他在日内瓦仅呆了一个星期，所以事实上并没有发生“拒绝与总理握手”的故事。此外，周总理也是不会主动去握杜勒斯的手的，因为我国代表团当时早有规定：我国外交人员在公共场合不主动和美国人握手，当然如果他们主动来握手时，要礼尚往来，不要拒绝。

关于朝鲜问题的又一次“朝鲜战争”

杜勒斯离开日内瓦回国后，由美国代表团副团长、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主持会务和出席会议，但杜勒斯始终还是美国代表团决策的幕后操纵者。当有关朝鲜问题的会谈接近尾声时，美国代表团就接到了国内的指示：一定要使会谈破裂，不许达成任何协议。

到了会议的最后两天，莫洛托夫通报周恩来，有迹象表明美国要突然停会。周恩来认为，会议开了近两个月，至少要解决一点问题，不应该就这样

提前闭会。

6月15日，等到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轮流当主席的那一天，果然提出要提前闭会。由于事先已有准备，于是中、朝、苏联合斗争，使会议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

首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相南日真诚地提出关于保证朝鲜和平状态的6点新建议，以谋求在成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接着，周恩来发言表示支持。他说：“我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不少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我们应将这些意见肯定下来，然后对分歧之处继续讨论，以便对各项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停顿了一下，周恩来继续说：“照目前会议的情形来看，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达成协议，但我们至少应该努力对巩固朝鲜和平的问题达成协议。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了巩固远东及世界的和平，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引起与会者的注意，周恩来提高了嗓音，“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不可能在南日外相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的协议。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方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周恩来讲完后，莫洛托夫发言。他说，“我支持南日外相所提出的六项建议，并提议与会的十九国发表关于不威胁朝鲜和平的共同宣言”。他当即宣读了宣言草案：“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业已同意：在等待朝鲜问题最后解决的期间，任何国家不得采取任何可能对维持朝鲜和平构成威胁的行动。与会者表示相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为了和平的利益将依照本宣言而行动。”朝、中、苏三国这三个建议的提出，一下子打乱了英、美事先商量好的提前停止会议的阴谋，各国代表开始交头接耳，会场秩序出现了混乱，艾登只好宣布临时休会。随后，美国等参加侵朝战争的十五国及南朝鲜在一起进行了紧急磋商。直至40分钟后，艾登才宣布复会。复会后，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首先发言。他说：“我拒绝莫洛托夫外长所提出的关于共同宣言的建议，因为朝鲜停战协定早有成文，没有必要再搞。”接着泰国代表宣读了参加联合国军的十六国因迫于美国的压力而共同拟就的《十六国共同宣言》，企图强行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眼看会议濒临破裂，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总理举手要求再次发言。他语调平缓，充满真诚。他说：“我对于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这样一个表示共同愿望的提议深表遗憾。但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周恩来用他那敏锐的目光扫视了一遍会场，然后放慢声音说：“我提议通过一个只有两句话的协议。”两句话的协议？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各国代表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周恩来。只见周恩来一字一板地说道：“第一句：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他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第二句：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停顿了一下，周总理接着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为不良的影响。”

这时，几乎所有与会者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周恩来的身上，那目光中有惊讶、赞赏与敬佩，也有惶恐、不安和窘迫。

比利时外长、者外交家斯帕克被周总理的诚意所感动，他激动地说：“周恩来外长的意见很好，有很多合理成份可以研究。”他继续说：“周恩来外

长的建议和十六国宣言精神并不矛盾，希望以后恢复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这时，周总理抓住时机作了第三次发言：“如果十六国宣言和中国代表团的最后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十九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示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一会议却连这点和解精神都没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能不表示很大的遗憾。”

斯帕克接着说：“我本人赞成大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这个建议。”

史密斯听了斯帕克的讲话后，气得鼻子都歪了，差一点就骂出声来。但比利时毕竟不是南朝鲜，史密斯不好发作，急忙写了一个纸条传给后边的人交给斯帕克。

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代表也纷纷表示赞同周恩来的建议。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担任会议主席的英国外相艾登对周恩来据理力争的发言也频频点头赞同，最后居然宣布说：“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应当受到最认真的考虑，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

活跃的会场一下子出现令人难耐的寂静，没有人对此表示反对。美国代表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若表示同意，将违反美国政府下达的使会谈破裂的指示；若表示反对，则将使美国陷入完全孤立的可悲境地。迫不得已，美国代表团代团长史密斯只好硬着头皮说：“在请示我的政府以前，我不准备发表任何意见，也不准备参加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周总理以缓慢和沉着的语气第四次发言。他说：“我对比利时外长所表现出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赞扬。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即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是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的。”会场鸦雀无声，寂静得能听得见每人的心跳。停顿了一下，总理将目光转向会议主席，接着说：“主席先生，我要求把我刚才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这马上得到了会议主席的同意。

由于美国力量的强大，其它国家对它敢怒不敢言，因此，历时五十一天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终因美国代表团的多方破坏，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而结束。但周恩来总理那入情入理、机智而又尖锐的发言，将美国政府顽固好战的立场揭露无遗。在国际政治会议上，美国还从未陷入过如此孤立狼狈的境地。正是在这一场唇枪舌战之中，周恩来的智慧、品德、风度和超人的外交艺术才华得到充分表现，也正是通过这次国际会议，使全世界第一次真正认识了这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6月15日的日内瓦会议，使中国和周恩来的声誉得到极大的提高。周总理的魅力征服了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所有外交官们，尤其是英国外相艾登对此更是赞叹不已。6月16日，即会议的第二天，艾登就宴请了周恩来总理，次日，英国政府即和中国政府达成了两国互相派遣外交代办的协议。艾登曾对记者说：“跟中国的周恩来打交道，我当然乐意。要知道，他是个不平凡的人。”在艾登写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联合国不能指望在没有得到中国周恩来和两个朝鲜代表同意的情况下来解决朝鲜问题。”

围绕印支协议的斗争

日内瓦会议期间，会上是各国代表针锋相对斗争的时间和“战场”，会下则是相互沟通情况，促进了解的好机会。我国代表团的同志在会下广交朋友，表现得非常活跃。

会议期间，周恩来经常在我国代表团的住地宴请各国代表团。出国前，周总理特意嘱咐王炳南挑选了两位手艺高超的大师傅，他们在日内瓦精湛的厨艺震惊了四座。除莫洛托夫外，周恩来还宴请了英国外相艾登。当时艾登还请周恩来在那天的菜单上签名，留作珍贵的纪念。80年代初，当艾登的遗孀访华时，还特地带来了那份菜单。此外，作为周恩来宴请客人的，还有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加拿大代表朗宁，以及定居瑞士的世界著名滑稽影星卓别林夫妇等。利用这种友好和谐的气氛，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为印支问题的解决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印支问题比朝鲜问题复杂得多，因当事国不仅有越南，还有老挝和柬埔寨，不仅有在印支进行殖民入侵的法国，还有阻挠达成任何协议的美

国。印度支那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原是法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后沦入日本人之手。1945年日本投降后，为了在印支恢复殖民统治，法国再次发动了殖民入侵，先后占领了这三个国家。1945年9月2日，胡志明领导越南人民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但法国拒不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也不承认寮国和高棉抗法民主力量成立的抗战政府，而把他们当作交战的敌方。于是，印度支那三国组成了印支联军对法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直到日内瓦会议召开时，老挝和柬埔寨仍未从印支联军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武装抵抗力量。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已进行了八年的抗法战争，但仍胜负未定。持续多年的印支战争不仅直接涉及到东南亚各国的利益和局势，而且法国也由于战争拖得太久造成经济、政治上的一系列困难，故正准备从印支脱身，而一心想围堵封锁中国的美国却想趁机介入，因此，印支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在中国和苏联的努力下，范文同于会议开始后的5月4日才得以率领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到达日内瓦出席会议。后经越南代表团提议，在中、苏、越三国的共同努力下，寮国和高棉的代表也先后抵达日内瓦进行会外活动。

正当人们在为印支问题的解决而发愁的时候，5月7日，越南战场传来奠边府大捷的消息，直接负责援越工作的彭德怀将军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帮助越南人民军将重炮和火箭炮运上前线，投入奠边府的战斗，使越南人民军终于打败了法国重兵守卫、碉堡林立，号称是一艘不可摧毁的“山林中的航空母舰”的集团阵地——奠边府。

消息传来，日内瓦会场内外都被震动了，会场的形势也陡然改变。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代表奔走相告，士气大振，信心倍增。法国政府却如丧考妣，国内还下了半旗，法国外长皮杜尔也因此急忙离开日内瓦返回巴黎。

尽管会议初期的主要议题是朝鲜问题，但从5月8日开始，会议已就印支问题开始了磋商。对于在日内瓦会议上如何具体解决印支问题，周恩来煞费了不少苦心，他又要统一印支国家间的意见，又要让苏联与印支国家取得一致。他反复做工作，终于取得成效。

5月27日，周总理提出了他拟就的折衷方案：“关于双方军队集结地区，也就是双方地区调整问题，印度支那的三个国家情况不完全相同，因此，在双方地区调整原则确定之后，还要根据三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因而解决办法也会有所不同。”

这一提案得到了与会各方代表的同意，因此会议决定由越、法双方军事代表谈判越南问题，外长会议继续讨论老挝和柬埔寨问题。

但后来由于美国的阻挠和法国拉尼埃政府对停战缺乏诚意，会议进展缓慢。这引起了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加之法国国内经济状况不佳，6月12日，法国主战派的拉尼埃政府倒台。消息传来，又一次震动了日内瓦会议。

法国新任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是主和派的代表，他希望能早日解决印支问题，尽快恢复国内经济，因此不想再完全听命于美国的指挥棒。6月17日，孟戴斯·弗朗斯亲自率团到日内瓦谈判。由于法国态度的转变，以及前不久因美国阻挠朝鲜问题的解决使之在会议上处于孤立的处境，会议有了明显的转机，使得印支问题的解决有了可能。

出席讨论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会议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的三个国家——南越、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九个国家。尽管美国依然阻挠会议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但周总理却运用了统战工作的经验和方法，同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法国代表团团长孟戴斯等人直接会谈，对促进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随着会议的进展，本来就存在的美法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美国陷入了日益孤立的状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6月23日周恩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同法国总理孟戴斯的会晤。

周恩来从法国切身利益出发，耐心细致地向孟戴斯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印度支那半岛的形势和法国国内的形势，诚恳地说：“印度支那战争已经打了八年，不但印度支那人民饱尝战争之苦，整个东南亚的和平和稳定都无法实现。贵国人民也受到很大损失，并且使贵国政府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接着，周恩来又进一步指出：“相信孟戴斯先生是明智的人，不会让美国人牵着鼻子走。美国阻挠达成协议，受损害的不只是印度支那三国，还有法国政府和人民。”

弗朗斯深受感动，对周恩来的话频频点头赞同。

周恩来又进一步向他指明了解决印支问题的方案。他说，“印度支那三国的的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适用同样原则时，应照顾到三国的特殊情况。如要求外国军队从印支撤走，是指一切外国军队应同样地从三国撤出，这就是说不但法国军队要撤出，进入老挝和柬埔寨这两个国家的越南志愿人员也要撤出。再如，停战以后停止从境外进入新军事人员和武器弹药的原则既要适用于老挝和柬埔寨，又要同时考虑到这两国自卫的需求。这样的方案才是公正合理的。”

此时，弗朗斯对周恩来已是心悦诚服，他激动而又断然地做了个手势，向总理表明：“你讲的非常合情合理，我决心以一个月为期实现停火。尊敬的周恩来先生，如果在7月20日不能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和平协议，我将提出辞职。”

休会期间的6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通过周恩来耐心细致的工作，争取了他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赞同我们的立场，击败了美国想压英国在东南亚问题上让步，从而破坏印度支那和平的阴谋。正是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总理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共同宣布了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印支问题谈判的主要问题是停火、划区、监督和国​​际保证。中心点是越、法临时军事线的划分问题。越南有些人当时希望能一下子统一越南，但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来看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会下经过讨论，苏、中、越三方一致认为，还是南北划线，争取 16 度以北的一块完整的根据地，巩固北方，以利将来的统一。为此，周恩来在日内瓦体会期间于 7 月 3 日至 5 日专赴柳州，和当时在那里休假的胡志明主席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讨论，达成了“7 月 5 日协议”，在越南争取 17（16）度以北的地区划线停火，在老挝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抗战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只能政治解决。

7 月 20 日，越南最后在会议上接受了以北纬 17 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并取得了在协议中明文规定的“两年内通过普选统一越南”的条款。与会国还达成一项协议，规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办法，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法国尊重印度支那三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印度支那三国停战后将不参加任何同盟，也不容许任何外国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美国没有在日内瓦协议和宣言上签字，但它声明将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妨碍上述协议。但后来正是由于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日内瓦协议未得到认真执行，致使 60 年代终于重新爆发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战争。

并非铁板一块

会议期间，中、苏两国配合得非常默契。当杜勒斯回美、副国务卿史密斯代理美国代表团团长后，莫洛托夫专程拜见了周恩来，向周恩来转告了有关史密斯的情况。他说，“史密斯是第二次大战中美国在欧洲作战的将军，在美国国内很有地位。在杜勒斯未抵日内瓦之前，我曾请美国代表团吃了一次饭。在私下谈话时，史密斯曾对我流露了对美国目前实行的敌视中国的政策的不满。史密斯认为美国敌视中国是不明智的，缺乏长远眼光。”

周总理听了这个情况后高兴地说：“看来，帝国主义阵营也不是铁板一块，杜勒斯自己率领的代表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哟。我们不应该放弃做工​​作的机会。”

6 月 16 日，当局恩来总理发表了全面解决印度支那的 6 点方案后，史密斯作了一个即席发言，他说：“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

第二天开会仍讨论此问题时，史密斯却借故离开了，说是到伯尔尼拜会联邦政府去了，留下了他的副手罗伯逊。这位罗伯逊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会议一开始，他就批驳了周总理的建议，并且毫不客气地说：“你们中国代表团的意见不值得考虑和讨论。”

周恩来一下子火了，很严厉地质问罗伯逊：“你们美国代表团说话算不算话？你们的团长史密斯昨天还表示我们的意见可以考虑，今天怎么又变卦了？”总理指着罗伯逊继续说：“罗伯逊先生，你在北平呆过，我们在中国是认识的，我了解你。如果美国敢于挑战，我们是能够应战的。”周恩来的话使罗伯逊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尴尬万分。

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团对中美关系特别关注，尤其注意观察这两个代表团是如何相处的。

有个美国记者曾当面问过史密斯：“你和杜勒斯同周恩来有没有什么接

触？”

史密斯的回答很风趣：“如果有接触的话，就是我们在卫生间共用过一条滚筒擦手巾。”

有一天，中国代表团正聚在酒吧喝饮料，史密斯端着一杯自兰地酒主动走过来，同当时担任周总理的英文翻译浦寿昌同志攀谈，“你的英语讲得很好，是地道的美国音，是在哪学的？……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我非常喜爱中国古老的文化这是两个敌对的代表之间从未有过的事，浦寿昌回去后立即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

周总理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找他谈谈。”

第二天会议休息期间，王炳南就密切注意史密斯的行踪。当他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吧台喝咖啡时，忙把总理引过去。总理微笑着走向史密斯，这是史密斯始料未及的。周恩来的举动立刻引起了各国外交官的注意。众目睽睽之下，史密斯急中生智，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避免了与总理握手。他竭力放松面部表情，笑容可掬地同总理打了个招呼：“周恩来先生，来杯咖啡吧？”

周恩来微笑着摆摆手说：“史密斯先生，不想尝尝中国的龙井茶吗？”

“谢谢。”史密斯喝了一口咖啡，借题发挥起来，从茶叶谈到长城，从龙门石窟谈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客气地赞扬了中国的古老文明和美丽的大好河山，并说，“我非常喜欢中国的瓷器，在我家的客厅里就陈设着许多中国的瓷器。”

“非常感谢史密斯先生对中国怀有的美好感情。”周恩来继续意味深长地说：“史密斯先生作为美国的一名将军，在二次大战中曾在欧洲战场创立了赫赫战功。为了维护今天和将来的世界和平，我真诚地希望史密斯先生能够继续做出努力。”

尽管史密斯内心里希望能如此，但他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因当国家利益与私人感情发生冲突时，外交官只能服从国家利益。

日内瓦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史密斯主动来找周恩来攀谈。他微笑着对周总理说：“会议即将结束，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恢复和平。”说罢，他抓住总理的胳膊使劲摇了摇，然后笑眯眯地走开了。

史密斯虽遵守了杜勒斯的纪律，没有与周恩来握手，但聪明地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了与握手同样的愿望。史密斯曾私下对中国工作人员说，他回国后就辞去这倒霉的职务，因为，他既无法按自己的心愿办事，也无法按事实的真相来解决问题。

后来，在时间流逝了 18 年之后的 1972 年 2 月，尼克松总统率团来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总理还特意对尼克松谈起史密斯拉他胳膊的往事。

第三节 马拉松式的外交战

由于朝鲜战争的惨败使美国在世人面前丢尽了脸面，更由于美国决心扼杀共产主义运动以防止全球赤化，它加紧了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与中国为敌。但中国犹如一轮冉冉升起的朝阳，任何势力也无法阻止这个东方巨人、这个刚刚苏醒的雄狮屹立于世界之林……

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日内瓦会议期间的5月19日，周恩来正在自己的房间里阅读会议文件和有关资料，这时代表团成员宦乡急匆匆地推门走了进来。

“总理，向您汇报一个重要情况。”

“噢，是宦乡呀，什么事这么着急？”周恩来抬起头来问道。

“总理，是这样的。今天，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对我说，他愿以私人身份就在华美侨问题和在美华侨问题作一个中、美之间的中介人。”

“哦，这倒是一个新情况。”周恩来听宦乡讲完，立即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其中包括钱学森等著名的科学家。他们对于新中国来说是多么地宝贵呀。

“美国方面是想要回我们在朝鲜战场上俘虏的美军和一批在中国犯了罪的平民。”宦乡的话打断了周恩来的思考。

周恩来说：“我们也有一大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我们应利用这个机会让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他一边思考一边对宦乡说：“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的被押人员获释的意愿，开辟新的接触渠道。……这个问题你需留心一下，看美国方面下一步怎么走。如果美方再试探，可以同意经英方中介进行直接接触。另外，可根据美方的态度，确定在什么地方举行谈判。但谈判中首先要联系中国留美学生和科学家被扣问题。”

为了掌握主动，5月27日，我国代表团发言人向新闻界发表了关于美国无理扣押我国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同时表示，中国愿意就被扣押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

宦乡根据总理指示，继续与杜威廉联系。经过6月1日和4日两次接触，最后达成协议：美国代表团指定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约翰逊为代表、国务院远东司副司长马丁为助手与中方接触；中方由王炳南为代表、柯柏年为助手与美方接触。根据美方的建议，中方同意接触地点在“国联大厦”。由于英国外相艾登指示杜威廉作为中介，参加中美之间的接触，因此，总理也让宦乡参加了首次接触。

6月5日上午10点，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国联大厦”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这次会谈的地点是美方选择的。由于当时美国还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约翰逊为避免形成两国政府正式谈判的气氛，有意选择了“国联大厦”里一间没有桌子，只有几套沙发的会客室，给人以会客的感觉，可谓是用心良苦。

第一次的会谈只进行了约半个小时。由于是初次接触，双方不免都有些拘谨。约翰逊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对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反应也颇敏捷。他提出会谈时双方不作记录，以使会谈的气氛比较轻松，少一些拘束。

会谈开始后，约翰逊提出，在华被扣的美国人共有83人，分为四类：在

华被监禁的美侨，在华被软禁的美侨，要求离华而得不到出境证的美侨，和在华被扣留或被监禁的美国军人包括原空军人员和“联合国军”中的美军人员，以及1953年1月在汕头附近被扣留的美国海军人员。希望中方能让这些美国人早日离华返美。

中方代表王炳南表示，美国方面提出来要商谈的问题，中方一直认为可由双方直接接触。美方今天提出的问题，希望美方提交一份具体名单。关于在美国被扣留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问题，中方将在以后的商谈中提出。

6月10日，双方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的地点由我方选择。为了与美国代表团针锋相对，中方在“国联大厦”选了一个房间，有意在房间里摆了一张大长桌子。我方坐一边，美方坐一边，形成两国政府正式谈判的气氛。

会谈一开始，约翰逊提交了一份所谓被中国政府扣留的美国侨民与军人的名单，并要求中方给予这些人早日回国的机会。

对此，王炳南作了原则性的答复。他说，“只要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只要他们是遵守中国的法律的，他们是会得到保护的。他们可以在中国境内居留，从事合法的职业。如果他们为了某种原因要离开中国回美国去，只要他们没有未了的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他们随时都可以走。实际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有1485名美国侨民离开了中国。至于在中国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的极少数美国人，他们被扣押是罪有应得的。你方交来的名单，我们将进行研究并在下次会谈中予以答复。关于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问题，我们准备在下次会谈中提出。”

会谈结束时，约翰逊提出杜威廉先生应继续参加以后的中美接触。

王炳南回答道：“我们感谢杜威廉在中美接触中所起的中介作用，但中美双方所谈问题应由中美双方自行直接解决。”

杜威廉于是表示，“如中美双方对此意见不一，我无意再参加你们的接触。”

从此，杜威廉未再参加以后的中美接触，宦乡也未再参加。

在6月15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王炳南首先答复了美方6月10日提出的被拘禁在美国的美国人与家属通讯等问题。

王炳南心平气和地说：“中国方面同意因犯罪而被扣押的美国侨民和军事人员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与他们的家属通信，他们的家属也可以邮寄小包裹到中国。中国政府是按他们所犯的罪来量刑的。判刑后，如果表现好，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减刑或提前释放，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政策。至于约翰逊先生6月10日交来的名单，中国有关部门正在核查，一经中国代表团收到这些人员的材料，将立即与美方约期会谈。”

但当谈到美国政府无理扣留我国留学生问题时，王炳南的语气严肃起来。他郑重指出：“中国现有5000多名留学生在美国，有不少留学生要求回国，但遭到美国政府的百般刁难，禁止他们申请离境，甚至威胁说，谁要是违反这一命令，将被判处50000美元以下罚款或者5年以下徒刑，或者同时予以两种处罚。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扣留中国留学生，并恢复他们随时离开美国返回中国的权利。至于居留在美国的中国侨民也同样应享有随时回国的权利。”

约翰逊一时语塞，但他辩解说，“扣留中国的学者完全是按美国的法律

行事的。”他是指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发布过的一道命令，规定凡是高级物理学家，其中包括受过像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都不准离开美国。

对此，王炳南反驳道：“这是无理的规定，应该予以废除。”

6月21日，中美双方举行了第四次会谈。

王炳南首先提出建议：“我建议双方起草一个联合公报，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守法侨民和留学生将具有返回祖国的完全自由，并建议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由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和留学生的利益。”

但美方只想在会谈中得到它想得到的，只想做于它有利的事。因此，约翰逊拒绝了王炳南的建议。他说，“美国政府将单独发表声明，肯定中国侨民依照美国的法律和规章，有完全的自由到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约翰逊又一次强调“美国的法律和规章”，实际上，他们只想片面要求中方无条件释放被扣留在美国的美国人员，而不肯让中国侨民和中国留学生回国。

7月16日和21日，双方派联络员又接触了两次。中方由外交部科长浦山为代表，美方由美国国务院中国司政治事务官艾尔弗雷德·詹金斯为代表。这两次接触，双方审核了各自提交的名单。浦山向美国提出六名已经获准出境的在华美侨的名单，同时要求美方提供在美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情况，并再次询问美方是否同意中国方面在上几次会谈中提出的请第三国使节代管双方侨民利益的建议。詹金斯用外交辞令对中国批准6名美侨出境表示感谢，但他没有进一步提供有关在美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新情况，并再次拒绝了我方关于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利益的建议。

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谈结束。从1954年9月2日起到1955年7月15日，有关各自侨民回国事，中美双方改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然而，在前后共举行的十七次领事级会谈中，美方仍然设置重重障碍，阻挠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同时，美方也拒绝接受中方愿意为那些想到中国探视美犯的家属给予签证的善意，决定不发护照给任何去中国访问的美国公民。领事级会谈也未取得任何成果。

日内瓦会议上的中美会谈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它却是此后十五年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这个前奏一经开始，就连美国的杜勒斯也不愿再关上大门了。中国也愿意留一条门缝，以便于更好地观察美国，与之斗争，并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一条表达意见的通道。

钱学森回国始末

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的国际形势，总的来说是由紧张趋向缓和。由于朝鲜停战和印支和平的恢复，远东的局势也开始缓和。但是美国不甘心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失败。作为报复，美国政府在日内瓦会议后，开始积极筹划与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搞了一个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的目的一是美国企图使其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二是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军事对抗和准备新的战争。这样一来，台湾海峡的军事对峙就变得格外突出和醒目。

中共中央研究了这一时期的形势，认为打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中央意识到，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这项工作，

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于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朱德总司令也在建军节上发表讲话，再次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周恩来从日内瓦会议回国后，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三十三次会议所作的报告中，也突出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号召“全国人民要为完成解放台湾、保卫世界和平的光荣任务而奋斗到底！”9月，在第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报告中重申“一定要解放台湾”，并指出，任何要使台湾“中立化”和制造“台湾独立”的主张，都是企图分裂中国领土，使美国侵占台湾合法化的企图，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的”。12月2日，美蒋正式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8日，周恩来又一次发表声明，深刻揭露这个条约的本质，指出这个条约是非法的，中国绝不承认。

1955年1月，为了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为了打击美蒋的“防御条约”，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8日发动攻势，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2月13日又解放了大陈岛。艾森豪威尔对记者发表讲话，要求联合国尽速“斡旋”，并提出在“必要时”将派美军赴台以“保障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同时美国极力反对中苏联合倡议的召开讨论台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十国会议。周恩来在各种外交场合一再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这一时期，中国政府以坚定和强硬的立场反对美国支持蒋帮，在美国的军事讹诈面前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精神。1954年底，中国政府又扣押了十三名在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的美国间谍。

面对形势的发展，美国意识到拒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是失误和失败的，它必须面对新中国已经站稳脚跟、屹立在世界政坛这样一个铁的事实。1955年1月，美国授意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通过印度的中介以他个人的名义访华，实际上是想来试探我将如何判处十三名美国间谍案以及其他情况。我国政府同意了他的来访。在会谈中，周恩来向他指出，联合国在我代表权问题和朝鲜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是不公正的。同时重申，是美国跑到远东来制造紧张局势，美国应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军队。

1955年4月18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这是一个没有西方大国参加，而由已独立的绝大多数亚非国家自己召开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周恩来根据中央批准的“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的总方针，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有气魄、有远见、诚恳坦率的讲话，整个世界为之震动。周恩来崇高的人品，细致入微的风格，虚怀若谷的谦逊作风以及一个伟大政治家所具有的广阔胸怀，博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钦佩和赞扬。

在中美关系的问题上，为了扫除一些亚非国家对我国的疑虑，为了真诚地表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美好愿望，也为了争取一个对我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以利于人类进步事业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4月23日，周恩来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

“中国人民不想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

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周恩来的声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许多中立国，特别是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都向美

国施加压力，希望美国能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同中国政府直接谈判。

随着新中国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了解、承认和支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陷于日益孤立和被动的地位，甚至美国国内舆论也在美被押人员和间谍案问题上对美国国务院进行指责，称美国政府不能对周恩来的这项声明置若罔闻。为了安抚国内舆论，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美国想找机会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7月13日，美国政府通过英国向中国建议，中美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经过磋商，中美双方确定将原在日内瓦进行了将近一年的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

外交部为了这次大使级会谈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负责研究会谈中的对策。组长为章汉夫，副组长为乔冠华，秘书长是董越千。由于王炳南在30年代就和美国人打过交道，后又参加了日内瓦会谈期间的中美代表谈判，比较了解如何与美国人打交道，因此被任命为首席代表。另外小组成员还有龚澎、浦山、王保流等，是一个人材济济的“智囊团”。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瑞士的日内瓦“国联大厦”内开始。我方代表是我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恰好是王炳南在日内瓦会议中文锋过的对手，美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尤·阿·约翰逊。

为表示中方对这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诚意和所持的积极态度，7月31日，即在会谈开始的前一天，中国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判决提前释放阿诺德等十一名美国间谍。这个消息使国际新闻界因为中美会谈而激动起来的情绪更加高涨了。有个美国记者闻听此讯后不禁脱口而出：“啊！中国又抢去了主动。”

由于中方宣布释放美国间谍，因此第一次的会谈气氛较为轻松愉快。双方达成了会谈议程的协议：一是讨论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讨论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8月2日，举行第二次会谈。约翰逊称有三十六名美国平民仍被扣留，此事影响美国人民及政府对中国的态度。随即他将三十六人的名单交给王炳南。

接着王炳南发言说：“在美国的中国侨民，绝大多数的家属都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和在实际上所造成的困难，他们不能自由返回祖国，无法回到各自的家庭。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们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所一向非常关心的问题。”

王大使最后说：

“为了使居住在双方的两国侨民，首先是关于他们回国的问题，能够获得应有的照顾和协助，使有关问题的实际情况得到改善，我们建议：

1、双方相互通报居留在本方的对方侨民情况。正像中方向美方提交了所有在华的美国人的情况一样，我们也希望美方向我们提交在美华侨（包括留学生）的总数和名单。2、美国政府应取消限制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的一切禁令和规定，包括所谓“限期出境”，因为这实际上增加了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困难。

3、美方应向中方补交1954年4月8日已获批准回国的76名中国留学生名单。

4、中美两国分别委托它所选择的第三国代理各自的侨民在对方卧家中的

事务，首先是这些侨民回国的事务。中国将提出委托印度共和国代理我国在美国的侨民的事务。”

王炳南发言以后，约翰逊对美国阻挠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一事做了辩解，声称美国政府绝对没有阻碍中国学生离开美国。

针对约翰逊信誓旦旦的保证和声明，王炳南在8月4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突出地提出了钱学森被阻挠回国的事例。

钱学森博士是1934年从中国到美国留学的。他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求学，后来先后在这两个学院任教。早在1950年春，他和他的家属就决定返回祖国。当时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曾经几次警告他们不许回国，并派人监视他们的行踪。但是，美国政府的威胁和干涉没有吓倒和阻止钱学森一家返回祖国的决心。1950年8月23日，当钱学森一家已经办好行李托运，订好机票即将启程回国时，美国当局突然通知钱学森不得离美，诬说他的行李里有同美国国防有关的“绝密”文件。8月25日，美联社报道了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密里根的声明，说钱学森在该院的工作是纯理论性的，与秘密研究无关。后来《纽约时报》又报道了联邦调查局对钱学森行李的搜索结果，证实并无所谓“秘密文件”。为了达到继续禁止钱学森回国的目的，美国当局又于1950年9月7日突然逮捕了钱学森，说他是共产党，并将他囚禁在圣佩得罗移民站。9月22日，美国当局在命令钱学森交出1.5万美元的保释金后才将他放出来。据合众社报道，联邦当局在9月23日表示，经查，他们没有发现任何钱学森同共产主义有关的线索或证据。钱学森获释后，仍旧不能回国，他的行动被限制在一个县的范围之内，一步也不许出洛杉矶，而且随时准备听候传讯。

从1950年起，美国政府以各种借口和种种手段将钱学森博士扣留长达五年之久。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和他的夫人蒋英借外出用餐的机会，按事先拟定好的计划，由钱学森缠住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人员，蒋英则借口上洗手间趁机给她在欧洲的妹妹寄了一封信，请她妹妹转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信写在一张便条上，信上说：“被美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信上还说，“除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表达了钱学森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情。陈叔通接到信后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指示外交部和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向美国进行严正交涉。

这样，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三次会议上，王炳南针对约翰逊所说的“美国绝对没有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的谎言，郑重指出：“据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1954年5月29日声明，截至1954年4月30日，持有中国学生护照的留美学生共计5242人。因为从1951年6月到1955年4月1日美国政府禁止中国留学生自由回国，违者课以5000美元罚金和五年监禁，许多想回国的留学生都不敢申请。今年6月15日，钱学森仍然来信给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先生，要求我政府帮助他回国。”他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恢复钱学森返回祖国的权利。

在确凿的事实面前，约翰逊再也无法辩解，美国也不能再阻挠钱学森等人回国。8月5日，钱学森接到了准许他和家人可以离开美国的通知。他们立即动身乘船返回他们日思夜念的祖国。与他们夫妇一同归国的还有二十二位科学家和六个孩子，其中有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女儿钱永真。10月1日，这些漂流在外的中国学子在船上兴高采烈地欢度了新中国的国庆节。10

月8日，船抵香港，同日即入境回到国内。

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就钱学森回国事所进行的斗争告一段落后，双方又就遣返侨民问题反复进行了多次会谈。约翰逊坚守当时美国政府的一条指令，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凡涉及有关我国主权的问题，约翰逊就故意兜圈子。例如，他始终拒绝同意中方提出的授权印度驻美大使馆照管中国侨民的要求，因他认为，这等于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居住在美的侨民负有合法的领事权利，就是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单就这样一个问题，双方就经过了无数个回合的斗争。

为了使中美会谈更快地进入关于台湾地区局势的实质性会谈，国内对在押的美国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复查和处理。于9月10日，王炳南向约翰逊宣布，中国有关当局对在华的十二名美国人的复查已经结束，他们可以获准出境，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我方也作了一些适当的让步。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达成了这样一个两国大使声明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享有返回本国的权利，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本国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分别委托印度和英国政府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平民返回本国。”

这是一份在互不承认的情况下、处心积虑搞出来的一份奇怪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既要体现互不承认，又要体现双方的一种共同意见，还要体现双方的联系，于是只好搞了这么一份“协议声明”。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达成的唯一一份正式协议。

50年代末，周恩来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有价值的。”

“一着很妙的棋”

中美侨民问题达成协议之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便进入了第二阶段。中央认为，中美大使级会谈应该进入讨论台湾问题、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杜勒斯举行会谈等其他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只有通过外长级会谈才能解决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缓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等严重的问题，并讨论两国建立贸易关系、文化交流等问题。但美国在第二阶段的会谈中，采取了极为敷衍的态度，不断在第一个阶段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上继续纠缠不休，以致会谈拖泥带水，几乎是寸步难行。

1955年9月20日，中美会谈再次开始。约翰逊绕开实质性的问题，首先提出要讨论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美国士兵的问题。

王炳南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关于在朝鲜军事人员问题，应该让板门店停战委员会去谈，我们没有必要谈这个问题。”

于是，约翰逊又提出第二个问题，“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双方应保证不诉诸武力。”

王炳南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严正地回答约翰逊：“美国侵占台湾已经构成了国际争端，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已影响到远东和东南亚的和平、稳

定与安全。造成这种局势的，首先是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它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应该放弃对我国使用武力，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接着，他又继续说，“台湾在历史上、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人民愿意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更无权要求我们不使用武力。”

于是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我方斟酌再三，认为在现阶段我们必须采取主动。于是在10月5日的第19次会议上，我方提出中美会谈的第二项议程可以自由交换意见，不必确定详细议题和排列议题次序。

于是在10月8日举行的第二十次会谈上，约翰逊果然先“自由”起来。他长篇累牍地宣读了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发言稿，大谈特谈中国必须宣布不对台湾使用武力，否则美国不同意举行中美外长级会谈。

王炳南站起身来，当场痛斥了约翰逊的讲话，并尖锐地指出，“美国要求中国宣布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阴谋搞‘两个中国’。”

为了争取主动，10月27日，我方就美国提出的“双方保证不诉诸武力”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协议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同意，它们应该用和平方法解决它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为了实现它们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定举行外长会议，协商解决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约翰逊拒绝签署这个协议草案。这样，美方实际上处于了极为被动的地位。这使约翰逊显得沮丧极了。他低着头不停地抽烟，一轮会谈下来，他面前的烟缸里塞满了烟蒂。

11月10日，经过近半个月后，美国才提出了自己起草的协议草案，称“……一般来说，美利坚合众国放弃使用武力。……一般来说，并特别对于台湾地区来说，除了单独和集体的防御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使用武力。”

我方立即拒绝了美国的这一协议草案并无情地批驳了这种荒谬无理的“协议”，指出美国要求在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的防御”权利，目的是要中国政府承认美国霸占台湾的合法地位，让我们放弃解放台湾的权利。

尽管如此，我方仍以极大的耐心，继续又作一次努力。12月1日，王炳南提出了一个新的草案。为照顾到美国不愿明确提联合国宪章条款和两国外长会谈的问题，这个草案只提“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它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威胁或武力”。

但美方却毫无诚意，约翰逊只是一味地拖延时间。在这之后的三次会议上，他都拒绝对我方的新草案作任何具体的评论，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直到1956年1月12日，他才提出一个对应方案，继续提出要求中国方面承认美国在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的自卫的固有权利”。

在1956年4月到5月间，美方和中方均提出了一项新协议草案或对案，但均未通过。会谈仍无丝毫进展。

在此期间，美国还违反了第一个议题中所达成的协议，迟迟不提供在美国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名单及情况，并继续刁难他们回归祖国，使印度作为第三国很难开展工作。

1956年，台湾海峡局势继续紧张。一方面，中美大使级会谈漫无期限地在进行，却毫无进展；另一面，杜勒斯狂妄声称美国在台湾地区将不惜进行

原子战争，以此恫吓中国人民放弃对台湾的主权。

会谈虽然仍在继续，但王炳南和约翰逊经常是互相读一通发言稿，中方提出一些美方侵犯中国领海、领空的抗议，双方交锋几句，然后双方决定下次会谈的日期就散会。

面对这样的僵局，毛泽东、周恩来运筹帷幄，积极思考如何对美进行新的斗争。1956年8月，犹如夏天的第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十五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

美国新闻界轰动了，国务院被震撼了。要知道，当时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不准许任何人对新中国进行符合事实的报导。因此，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新中国是很不了解的，他们渴望知道真情。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无疑是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而美国新闻界却因此兴奋起来。那些接到中国政府邀请的美国记者更是激动万分，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访华申请。

谁知狡猾的杜勒斯却按兵不动，他决不愿轻易废除国务院关于不让美国人，不论是一般平民还是记者，到中国旅行的禁令。于是一时间美国几乎所有的报刊都一致攻击国务院的这种愚昧和顽固的立场。他们愤怒地说，美国作为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民主国家，竟对本国人民的旅行自由横加限制，这在宪法上和道义上都是不能容忍的。

差不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新闻界一直在向美国国务院施加压力。有几名美国记者不顾禁令，勇敢地冲破封锁，成功地访问了我国。在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美国青年代表团也不理睬国务院的禁令，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后，勇敢地集体来到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接待。他们宁愿回到美国受罚，也要到中国来看一看。70年代末，这些年已半百的人还自发地组织起来旧地重游，再访中国，反映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向往和情谊。

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形势面前，权衡利弊，美国国务院终于沉不住气了。1957年8月，杜勒斯被迫悄悄地同美国一些新闻界代表举行了协商，并作出了一些妥协，准许美国二十四个

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访问，以免引起美国舆论反对它全面孤立中国的政策。

在这个事件中，许多美国记者都赞扬说，周恩来这一着棋下得很妙，他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

周恩来走的这着棋，是希望沟通美国人民与新中国的交往，也让美国记者看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希望他们能把新中国的真实面貌介绍给美国人民。同时，周恩来的这步棋也是为了推进中美会谈。

在杜勒斯准许美国记者到中国访问后，在9月的会谈中，王炳南提出了两国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准许记者互相采访的协议草案，但遭到美方的拒绝。杜勒斯坚决不同意中国派相等人数的记者去美国访问，他说“中国记者只有按照美国现行的移民法取得合法资格才能进入美国”。

周恩来对美国记者的主动邀请和杜勒斯对中国记者互访协议草案的生硬拒绝，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周恩来坦荡博大的胸怀，明智的策略，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赞赏，特别是美国人民的高度评价。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就中美会谈和台湾问题做了讲话。周恩来说：“中国方面并不反对同美国发表一个在中美关系中互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声明。事实上，早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就已经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但是，必须指出，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由于美国使用武力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而造成的。因此，任何关于中美之间互不使用武力的声明，都必须能够导致这种紧张局势的缓和和消除，而不应该使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得到承认。同时，中国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不容外人过问，因此，中美两国的声明不能以任何方式干涉这个问题。……”

周总理继续说，“美国虽然表示，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应该具体地应用到台湾地区，但是却反对确定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来实现这一原则，甚至也不同意在一定的限期之内，寻求和确定和平解决中美两国争端的途径。不仅如此，美国还坚持它在中国的领土台湾有所谓‘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这一切表明，美国的企图是要取得一个对它片面有利的声明：一方面保持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另一方面继续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在不能取得这样一个声明的情况下，美国就企图无限期地拖延中美大使级会谈，以便同样达到冻结台湾地区现状的目的。”

周总理最后说，“美国的这种企图正是中美会谈至今不能达成协议的症结所在。中国不能同意发表一个仅仅对一方有利的声明，也不容许中美会谈被一方利用为达到片面目的的工具。中国认为，任何共同声明都必须是对双方有利的；同时，中美会谈的继续，也只有在对双方都有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周总理的讲话获得了人大代表们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

时间在一轮又一轮往复进行的会谈中流逝着。由于美国对中美会谈采取“拖而不断”的方针，到1957年12月，各种会谈已进行了七十三次，各种文本已堆积成山，但会谈仍未取得任何结果。

12月12日，约翰逊突然对王炳南宣布，他已被调任美国驻泰国大使，其副手埃德·马丁参赞将接替他的工作。

不难看出，这是杜勒斯耍的又一个花招，他把参加谈判的大使换成了参赞，目的在于想使会谈降级。对此，王炳南当场表示，“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个参赞，不能代表大使。”王炳南进一步指出，“约翰逊大使，你这样的做法是不严肃的。”

当王炳南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情况后，周恩来果断地说：“既然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谈判破裂，但我们不怕谈判破裂。美国如果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第四节 鸵鸟政策导致

两度失之交臂新中国成立之前，美国把注意力只集中在蒋介石身上。如果美国能早一点回到现实中来，真正认识中共的强大，能真诚地与中共发展关系，中美关系史也许会是另一种状态，而不会有惨烈的朝鲜战争和马拉松式的大使级会谈以及台湾海峡剑拔弩张的危急情势出现，但美国却宁愿执行鸵鸟政策……

毛泽东未能与罗斯福会面

1944年11月6日，开往延安的美国信使班机如同往日一样按时抵达延安郊外的机场，美国派往延安的使团团长沙瑞德上校像平时一样来到了机场，同时他还邀请了周恩来与他同行。

飞机停稳后，首先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是一位佩戴着闪闪发光勋章的少将，周恩来不禁问道：“那是谁？”

“噢，那是帕特里克·约瑟夫·赫尔利少将，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包瑞德用蹩脚的汉语回答。

“总统的特使？”周恩来对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感到有些吃惊，“这样吧，你先陪他在这里呆一会儿，我去找毛主席。”

十几分钟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乘坐着一辆旧卡车急匆匆地赶来，后面还跟着一营临时召集起来的队伍。在机场，毛泽东和周恩来为这位突然从天而降的特使举行了简单的阅兵式。

然后，毛泽东、周恩来、赫尔利和包瑞德一同坐上了回城的卡车。卡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车后扬起阵阵黄尘。毛泽东和周恩来沉默不语，他们的大脑在飞快地思索着如何对待这位突降的总统特使。只有赫尔利因初次来到北方这黄土高原，初次进入共产党控制区而感到异常兴奋，一路上只有他在兴致勃勃地与包瑞德交谈。

赫尔利到达延安后的第二天，即11月7日，就是罗斯福第三次连任美国总统的日子。赫尔利是美国国会中主张与中共发展关系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蒋介石的政府官僚机构腐朽，军队士气不振，很难与中国北部充满生气的现代人民政府相匹敌，即使蒋介石政府得到外国小心翼翼的支持，只能把中国推入内战的深渊，而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共产党。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赫尔利才决定了此次事先没有通知延安任何人的行动，他希望自己能在总统的对外政策中扮演一个真正的无畏将军的角色。

到达延安的次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与赫尔利在窑洞里举行了会谈。会谈中赫尔利一直在侃侃而谈，最后还主动提出了五点建议：

一、国共两党“为实现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联合、早日打败日本和重建中国而共同努力”；

二、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和一个联合的全国军事委员会；

三、中国将成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建立司法制度，实行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

四、将由这个新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把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组织起来，把外国提供的援助平均分配给他们；

五、这个中华全国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以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性。

这五点建议远远超出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所预料的，因此，他们爽快地同意了。11月10日，当赫尔利的飞机正在做起飞准备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和赫尔利都庄严地在这五点方案上签了名，赫尔利以为蒋介石很快也会在这上面签字。

但陪同赫尔利返回重庆的周恩来却并不乐观，在飞机降落前，周恩来曾提醒赫尔利：“将军，请你一定先把这个方案直接拿给蒋介石本人看，千万不要让宋子文先看，否则，他会制造麻烦的。”

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赫尔利一到重庆，就把这个文件给宋子文看了。在宋子文的支持下，蒋介石马上提出了一个三点方案来取代赫尔利的五点方案，这个三点方案的宗旨就是要达到让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目的，而不是与它平等相处。

当周恩来与包瑞德回到延安后，毛泽东一看到这个三点方案就火了，“赫尔利将军要我们放弃自己的主张，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全世界的承认，但一旦我们被蒋介石控制住，那我们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又有什么意义？”

尽管赫尔利没能使中共与蒋介石达成协议，但他仍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任命，他被任命为驻华大使。12月中旬，赫尔利又派包瑞德上校和战略情报局的伯德中校一起去了一趟延安，他们提出：如果美国在东北空降几千人的部队，中共希望美国提供什么样的支援。

包瑞德和伯德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讨论了这个计划，之后，包瑞德他们回到重庆又商讨了一个扩大的建议，这个建议涉及到25000多名美国伞兵。这一突如其来的扩大建议使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感到吃惊。毛泽东对包瑞德和伯德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他和周恩来应当到美国去和罗斯福总统面谈。但他们一直没有得到邀请。

1945年的3月，毛泽东邀请谢伟思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向谢伟思表示，虽然美国政府一贯举棋不定、出尔反尔，但他仍然希望能面对面地同罗斯福讨论美国是否愿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为了加速日本的战败，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同美国建立在抗日方面的合作，希望美国能支持中国的统一和民主事业。当然，美国是否同中共合作，只能由美国决定。

但不幸的是，仅一个月后，即4月12日，罗斯福就逝世了。毛泽东永远也不能与罗斯福见面了，美国与中共的联系亦中断了。

未能成行的司徒雷登北平之旅

1949年4月，经过平津和淮海两大战役，国民党主力被歼，解放军横渡长江，并于23日解放了南京城。当时除苏联驻华大使带使馆部分馆员随同国民党政府去了广州外，多数国家使节仍留在南京。

为了接管蒋介石的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周恩来决定派黄华到南京外事处工作。临行前，周恩来特地把黄华叫到办公室，对他谈了有关与美国建立联系的事情，周恩来告诉他，司徒雷登曾通过其他渠道，向我党表示只要中共保护美侨利益，建立通商关系，尊重国际条约，美国即与中国建立实际上的外交关系。因此，周恩来嘱咐他可以同美国驻南京政府的大使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司徒雷登 1876 年生于中国杭州，其父是在华传教士。他从 29 岁起就开始在中国传教，曾任燕京大学校长。1946 年 7 月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他曾忠实地执行杜鲁门政府“美国人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人打仗杀中国人，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但随着 1948 年辽沈战役的开始，国民党大势已去，司徒雷登不得不另谋对华对策。

1949 年 1 月，恰逢美国国内主张“与新中国建立政治经济关系，对中国施加影响，促使中国与苏联分手”的艾奇逊接替了因病辞职的原国务卿马歇尔继任国务卿。司徒雷登便利用这一机会凭借他本人既是美国官方代表，又是中国“友好人士”的身份，想通过与一些民主人士的朋友关系和燕京大学的师生关系，影响新中国的政策，维护美国在华利益。

艾奇逊上任后仅两个月，司徒雷登就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滞留南京，同中共接触，“建立新的关系。”4 月 6 日文奇逊即复电授权司徒雷登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会谈，但要求他不要把话说绝，注意保密，以免走漏风声，引起国会反对派的反对。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黄华来到了南京，于是，司徒雷登马上派其私人秘书傅泾波求见黄华。5 月 7 日，黄华接见了傅泾波，傅泾波先是替司徒雷登任驻华大使期间的所作所为申辩，希望中共方面不要过分责备司徒雷登，接着又为司徒雷登表功说，国民党撤退以前，何应钦曾希望司徒雷登去广州，但他照会蒋介石政权，美国大使馆决定不随蒋介石政府南迁广州，各地美领馆及美新闻处皆作留驻准备。英法等国看美国未走，也都没走。而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就是希望与中共方面接触，并已获艾奇逊同意。他甚盼与黄华会见，因现在正是美对华政策的改变时期，他本人希望能在其中起一定的积极作用。还表示“中美商约”（指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 1946 年 11 月 4 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可以修改。

黄华告诉他，会见的事考虑后再说。但美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创痛极深，空言无补，目前需要的是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

5 月 8 日，黄华将与傅泾波谈话的情况报告了中央，10 日，毛泽东即为中央起草了致中共南京市委复电，即《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5 月 13 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处。司徒雷登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即将成立的新政府。并说，美国已经停止援蒋，不愿参与中国内战。建议待上海解放后即将上海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粮食、棉花等援蒋物资移交我方，以支持上海恢复生产。

黄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司徒雷登提出，美国既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美国驻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雷登答应转告有关方面。

很快，美国舰队就于 5 月 21 日撤离青岛，驻中国其他地区的美舰也准备撤走。

经请示中央，黄华决定第二次与司徒雷登接触。这次黄华约了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到外事处会晤。

会面一开始，黄华就点明，“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是：外国武装撤出中国；不能援助国民党政府；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司徒雷登却辩解道：“各国使节留驻南京，这已表明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如国民党政府今后再由广州迁往他处，美国代表也不准备随往。在目前中国尚无一个新政府的情况下，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

黄华说：“据我个人看，我军打下广州后，就可能召开政协会议，联合政府将由政协会议决定产生。因此，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停止援蒋，以表明美国放弃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但现在在美国仍支持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因此，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无从谈起。”

司徒雷登回答说：“断绝与国民党关系是消极的作法，积极的作法应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援助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我个人希望今后尽量多吸收一些开明的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府。”

黄华当即表示：“各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中国人民选择的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因为它更适合中国人民的需要。政府要员问题纯属内政问题，外人不得干涉。”

傅泾波插话道：“中国今后究竟是先实现工业化还是先共产化？”

黄华告诉他：“你这种提法不对，中国人民目前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不存在是先工业化还是先共产化的问题。而且，这也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外人不得干涉。”对黄华的话，司徒雷登无法进行有力的反驳，只好转而谈起了“共产主义威胁”问题。他说：“中美关系问题不单是对华政策问题，而是关系世界和平的问题。现在世界局势动荡，美苏之间误会很多，美国害怕世界革命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中美关系得到完善解决，对美苏关系及世界和平都是一大贡献。如果中美关系能有第三者出来协助更好。”黄华马上反驳道：“我个人认为无需第三者参加。”此次会面后仅隔了两天，傅泾波再次来见黄华。向黄华转告，司徒雷登已接国务院来电希望他近期返美，目前司徒雷登希望能在返美之前赴北平与周恩来见一面，知道了中共更高层方面的意见，回去后讲话才能更有力量。美国现在对新中国的关系还很难作正式表示，但司徒雷登表示回美后在中美关系上他还会作进一步的努力。

黄华马上将这一重要情况汇报给了中央，中央考虑到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于是由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给司徒雷登写了一封邀请信，邀请司徒雷登到燕京大学访问，并暗示司徒雷登北平之行有可能见到中共高层领导人。

由于当时司徒雷登和傅泾波正好去上海，等他们返回南京时，已是6月底。司徒雷登对于北平同意他去燕京大学，并有可能与高层领导会晤一事感到非常高兴，但考虑到国会将于7月底休会，而且当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还是决定请示艾奇逊。

7月2日，司徒雷登接到艾奇逊的来电，艾奇逊要求他7月25日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并告诉他现在还是不去北平为好，以免引起各方议论。

于是，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只好夭折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接触又一次失之交臂。

司徒雷登的离去、艾奇逊于7月31日致杜鲁门的信以及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使毛泽东大光其火。从8月14日至9月16日仅一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就相继发表了《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剖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此后的中美关系便进入了一个相互仇视、针锋相对的时期。

第五节 台湾海峡乱云飞渡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杜鲁门下令美国第七舰队驶进台湾海峡，同时派遣大批美军事人员进驻台湾，对中国领土台湾省实行赤裸裸的侵略。中国政府则针锋相对，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中国将军走进了联合国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马上就要到达纽约机场了……”广播里传来了航空小姐轻柔甜美的声音，提醒每一位旅客飞机将很快结束长途旅行抵达目的地了。

自11月14日离开北京，途经莫斯科，在布拉格办理了赴美的入境手续，再从伦敦飞纽约，现在已有十天了，终于要到达目的地了，但伍修权的心里丝毫不觉得放松，反而更感到了肩上的重担。

自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围绕着台湾问题展开了异常尖锐激烈的斗争。以朝鲜战争为借口，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第七舰队驶进台湾海峡，同时派遣美国第13航空队和“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先后进驻台湾，并宣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

面对美国肆意侵占台湾、不断向台湾增派军队和运送武器的行径，8月24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揭露美国的侵略政策。8月31日，安理会同意将中国控拆美国侵略案列入议程，但是把议题改为笼统的“控拆武装侵略福摩萨案”。

9月10日，周恩来总理又向联合国提出，在安理会讨论这一议程时，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经过辩论和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规定，安理会在9月29日通过了决议，同意由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

正是在周总理的努力下，中国政府派出了一个一行九人的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以伍修权将军为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

飞机在著名的纽约摩天大楼、自由女神像以及霓虹灯闪烁的这个繁华的大都市上空盘旋，等待着肯尼迪机场准许降落的信号。透过舷窗外面掠过的朵朵乳白色的云蔼，能清晰地看见下面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所有代表团的成员们都和伍修权一样深感责任的重大。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有机会到联合国参加会议，他们代表的是整个中国。

飞机终于停稳了，伍修权整了整衣服，调整了一下情绪，稳健而自信地率领着代表团成员们走出了机舱。苏联代表马立克马上上前迎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和联合国礼宾科长等也在机场欢迎。

伍修权代表中国代表团向在场的各国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宣布了中国代表团的使命，并且通过报界向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致意。

1950年11月28日下午，联合国开始讨论我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代表团团长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要求首先发言，但安理会主席却让美国代表奥斯汀首先发言。

到伍修权发言时，他首先对安理会主席不要他先发言表示了严正的抗议。接着又全面地揭露和批驳了美国的侵略行径，列举了大量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政府的武装力量侵

占了台湾，这就构成了美国政府对我国公开直接的武装侵略行为。

伍修权着重批驳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特别是“台湾地位的确定须待对日和约签订”的谬论。他说：实际上早在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内部就发布了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台湾的最后地位须待对日和约来决定；称呼“台湾”应为“福摩萨”。“美国政府侵占台湾，本是没有丝毫理由的。然而为了要侵略，这需要找出‘理由’来，说是‘因台湾地位还没有确定，所以美国武装侵略台湾不能算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这样说实在是荒谬之极。首先是1950年1月5日的杜鲁门反对1950年6月27日的杜鲁门。1950年1月5日杜鲁门说，美国确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条款。申明‘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器、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当时杜鲁门先生并没有以为对日和约已经签订了。其次，罗斯福总统反对杜鲁门。1943年12月1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庄严地宣布了‘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应归还中国’的《开罗宣言》，当时罗斯福总统或其他任何人也不以为在‘对日和约’签订以前开罗宣言是无效的，不以为满洲、台湾、澎湖在那时以前仍然应当归日本所有。”

“台湾的地位早就决定了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台湾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政府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问题。”

伍修权进一步指出：“美国政府武装侵略我国台湾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是美国政府加紧侵略、控制与奴役朝鲜、越南、菲律宾、日本等亚洲国家与人民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美帝国主义干涉亚洲事务的进一步的发展。”

最后，他又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提出了三项建议：第一，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台湾及干涉朝鲜的罪行；第二，促使美国海军军队撤出台湾；第三，促使美国和其它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美国代表奥斯汀对伍修权的控拆不敢作正面回答，只是否认美国侵略了台湾、侵略了中国，同时企图把安理会的讨论转移到所谓“控诉对大韩民国的侵略案”上去。

鉴于奥斯汀公然否认美国侵略了中国，伍修权再次发言，进一步驳斥了奥斯汀。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严正指出：“自从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以来，从8月27日到11月25日，侵略朝鲜的美国武装力量屡次侵犯中国领空。据初步统计已达200次，共出动飞机1000架次以上，毁坏中国财产，杀伤中国人民。我要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从6月27日以来，美国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领海，以阻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台湾行使主权，我要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花费60亿以上的美元帮助国民党集团发动空前残酷的内战，用美国武器杀伤了几百万中国人民，我要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干涉中国内政？”

至于美国代表提议转移讨论题目，企图把安理会的讨论转移到所谓“控诉对大韩民国的侵略案”上去，伍修权在发言中说：“中国早已声明不参加所谓‘控诉对大韩民国的侵略案’的讨论，因为朝鲜问题的真相是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

“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许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打败胆敢侵略的一切帝国主义者。最后，我再次要求安理会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制止美国的侵略。”伍修权结束了他慷慨激昂的

发言。

但是，安理会在美国操纵下否决了我国关于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者、美军从台湾和朝鲜撤军的提案。12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通过了决议，将诽谤我国“侵略朝鲜”的提案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为此，中国代表团愤怒地离开了会场，以示抗议。

中国代表团除了在会内同美国进行斗争外，同时在会外也采用记者招待会的形式，充分地揭露美国的侵略行径，并且向记者们散发了书面材料。

12月15日和18日，联合国大会决定不定期休会，中国代表团无法再利用联合国的讲坛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伍修权将军等只好于12月19日启程回国。

离开纽约回国前，伍修权对美国不让他在联大第一委员会有发言的机会表示愤慨，并且向新闻界散发了他的发言稿。

一场指着美帝国主义鼻子、历时三十天的斗争遂告一段落。

炮轰金门、马祖

尽管我国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但狂妄骄横的美国根本不把我国的抗议放在眼里。1951年，美国向台湾派遣了一支庞大的、由500多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1954年12月2日，美国又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声称要同台湾当局采取“共同行动”来对付中国人民解放本国领土的正义斗争。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于1954年12月8日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企图利用这个“条约”来使它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准备新的战争，这是对我国严重的战争挑衅。他宣告，国民党集团没有任何权利同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

为了反击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1月18日发动进攻，一举解放了大陈岛外围据点——一江山岛。美国为阻止我军的行动，在向台湾海峡调兵遣将的同时，呼吁所谓“停火”，并授意新西兰出面，向安理会提出了相应的所谓“停火”的提案。周恩来看穿了美国的用心，电告安理会予以拒绝。

周恩来在1955年2月9日会见转达联合国秘书长口信的瑞典大使时强调指出，真正的战争危险在于美国以武装力量霸占台湾，侵入台湾海峡，威胁中国的安全。要缓和紧张局势，就需要解决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造成的紧张局势的问题。周恩来严正警告说，“如果美国挑起战争，我们一定会奉陪到底。我们不能由于美国的战争威胁就接受美国的侵略，承认解放台湾不属于我们的内政。”面对中国的坚定立场，美国只好宣布“协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暂时收起了“停火”的伎俩。

1957年，艾森豪威尔上台继续执政。此后一段时期内，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全世界反美呼声日益高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中东地区也出现了新的形势，黎巴嫩夏蒙政府被推翻，伊拉克爆发了推翻王朝的革命。美国为了扑灭中东的反美火焰，于1958年7月—10月出兵黎巴嫩。美国的这一举动更遭到全世界的一致声讨。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为了转移世界舆论对中东局势的关注，也是为了扩大对中国的威胁，1958年7月开始积

极鼓动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怂恿国民党加强对大陆的骚扰，并从本国和地中海调派了大批军舰、飞机，加强了第七舰队在台湾地区活动。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集团派出飞机，在大陆各地甚至远至云、贵、川、康、青海等省散发传单，空投特务，轰炸福建，骚扰江浙，“反攻大陆”的叫嚣和破坏活动，甚嚣尘上。一时间，台湾海峡硝烟弥漫，情势险恶。

受台湾海峡日益紧张局势的困扰，毛泽东已失眠好几夜了。中央为此多次开会，但难以形成最后的决议，因为台湾问题不仅牵涉到中国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还牵涉到美国。8月9日清早，天刚蒙蒙亮，机要秘书送来了一份电报，上报主席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扬言说，美国海军随时准备像在黎巴嫩那样在中国大陆登陆。主席看后，不由得怒火中烧。“美、蒋的气焰也太嚣张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必须尽快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毛泽东一作出这一决定，立即把秘书叫了进来，吩咐说“通知各位首长，马上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正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炮轰金门、马祖的决议一致得到了通过，以挫败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为了严惩蒋帮的猖狂活动，打击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嚣张气焰，同时也为了间接针对这一时期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对西方的姑息政策，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对金门、马祖等岛屿进行惩罚性的炮击，至10月25日又宣布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击十分猛烈，突如其来，吓得蒋介石惊慌失措，魂飞魄散，连忙打点行头准备搬家，把他的一个经济部转移到了乡下。美国也一时慌了手脚，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以及许多美国高级官员十分惊恐，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从西海岸调兵赴台，还从地中海调了一个舰队到台湾海峡集结。据杜勒斯后来讲，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过去还从来没有在一个地点集结过这么多的兵力。美国的十二条航空母舰中，就有六条调到台湾海峡，另外还调来了其他军舰，唯恐失去金门、马祖和台湾。当时，驻台美军超过1.5万人，该年度美国对台军援数目高达3.33亿美元。

在艾森豪威尔重申美国武力阻扰我解放台湾的所谓“责任”后，9月3日，杜勒斯国务卿答谒艾森豪威尔于新港，发表了一项声明，对大陆提出严重的警告，称“中共对中华民国金马外岛发动疯狂炮战后，威胁着中华民国对该岛的运输补给，有赖美国第七舰队的武装护航”。杜勒斯进一步扬言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马等中国沿海岛屿，甚至以原子弹相威胁。“新港声明”一发表，国际间为之瞩目。

为了阻止美国的护航，我国乃于“新港声明”发表的同一天宣布：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此项规定，运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及岛屿，也包括台湾及其周围的岛群，如澎湖群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及所有属于中国而被公海与大陆分开的各岛屿及其沿海岛屿。

二、任何外国军事用途的船只与航空器，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允许，不得进入中国领海或飞赴中国领海的上空。”

其实在“新港声明，发表前，第七舰队就已开始武装护航，除让一批新闻记者、部分返防官兵成功地登上了金门外，还运送了大量物资到岛上。

9月6日周恩来针对美国的行动发表公开声明，指出：“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一定要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解放台、澎、金、

马是中国的主权，任何外国不得干涉。若美国不顾中国的再三警告，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则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周恩来在声明中还特别强调，“中国和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和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内政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美国一贯企图把两件事混淆起来，以掩盖它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在声明的最后，周恩来呼吁，“我们提议中、美两国政府坐下来谈判，限期指派大使，恢复被美国单方面中断了的大使级会谈。”

在摸不到中国底细的情况下，当天，美国政府就表示欢迎周恩来的建议，并同意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其实早在周恩来发表公开声明的8月底，中央就已经在考虑恢复中美大使会谈的事了，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是我国政府的一贯主张。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中央特地把我驻华沙大使王炳南叫回北京，让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前一阶段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情况。当他谈到“我们掌握着真理，对美国无所惧、无所求”的时候，毛泽东插话道：“我们要台湾回归祖国，怎么能说无求于美国呢？”

王炳南理直气壮地说：“台湾自古就是咱们中国的领土，是我们的地方，美国无权霸占，他本该交还给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求他。”

毛泽东连连称赞，“讲得好，有骨气。不过，在同美国人会谈时，更应使用劝说的方法，可以对他们讲，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而我们中国也不小嘛，美国何必为了一个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与六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作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毛泽东接着放缓语气说，“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中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

中央决定再次让驻华沙大使王炳南出任中美大使级会谈代表。临行前，周恩来特地给王炳南写了一封亲笔信，对会谈的要求、步骤和策略等均作了重要指示。

在国际舆论的关注下，美国政府终于被迫指派了美国驻华沙大使雅各布·比姆作为重开谈判的代表，而且不再坚持会谈地点必须在第三国举行。这是它在鉴于台湾海峡出现危机、对于我方又不摸底的情况下不得不作出的一次让步。

由于王炳南与比姆同驻华沙，会谈地点就从日内瓦转移到了华沙，但在确定会谈的具体场所时，又费了一些周折。

一到华沙，比姆大使便给王炳南来了电话，并表示，愿意开始与王大使会谈。王炳南建议9月14日让比姆到中国大使馆会见他。但比姆大使没有马上回答。后来，请示杜勒斯后，比姆建议会谈在瑞士驻华沙使馆举行。

杜勒斯真是步步设防，他害怕比姆到中国使馆来会谈，会给外界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针对这种情况，王炳南又提出，可以采取对等的办法，即轮流在两国的大使馆会谈，但美方仍然不同意。于是，王炳南便请求波兰外交部提供会场。

波兰外交部表示愿意提供会谈场所，并选定了华沙市内的梅希里维茨基宫作为中美会谈的场所。

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就在台湾海峡形势十分紧张的

情况下开始了。

会场布置得既简单又考究。四张桌子排成一个长方形，双方代表分两边相对而坐，代表团团长坐在中间，两侧分别为各自的顾问和译员。

波兰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请中美代表团入席，双方代表互相点头致意。

会谈前，王炳南已从侧面了解了比姆，知道他是一位有经验的美国职业外交家，沉着、冷静，头脑清晰。虽缺乏幽默感，不善谈笑，但具有学者风度，颇像个大学教授。在与中国代表会谈前，他已有过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谈判经历，号称有和共产党人打交道的经验。

会谈开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王炳南请比姆大使先发比姆毫不客气地提出：“美国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对金门、马祖几个岛屿的炮击。美国承认，中美长期以来对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存在着严重的争议，美国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在这个阶段放弃自己的意见，美国的目的是消除可能被对方视为战争挑衅的行动，否则，军事行动将可能扩大。”他继续用呆板的语调说：“中美的共同任务是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对于美方把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的责任有意推到中国方面的讲话，王炳南早已有所准备。因此，在比姆讲完后，王炳南平静地反驳道：“大使先生无权代表台湾当局讲话，也无权提出停火的建议。台湾及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的内政，包括金门和马祖。中国在收复金门和马祖等岛屿后，将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中美之间没有打仗，根本不存在‘停火’问题，消除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关键在于美国军队撤出这个地区。”

比姆对此只能处于尴尬的境地，无法反驳。

后来，我方又提出了双方共同声明保证不诉诸武力威胁或者武力的建议。但是，中方这一和解性方案却被美方无理拒绝。美方在对案中提出要我方放弃对金、马“使用武力与武力威胁”，而美方将设法使金、马“不被使用于对大陆或其他沿海岛屿进行攻击或其他挑衅行动”。这实际上是要在中国大陆和金、马之间画一条永久停火线，以便实现其割裂中国领土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这种方案理所当然地遭到中方的坚决拒绝。

在经过一段程式化的会谈后，9月30日，在第七十八次会谈时，比姆提出了一个由杜勒斯亲自精心起草的、也是他在中美会谈中最后的“作品”——“中美会谈声明草案”。“声明草案”开头用一种平行的格式说明中、美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还写上苏联支持中国。接着，这个草案便进一步提出，中国政府应停止对金门、马祖的军事活动。

同一天，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表示，如果中国愿意在台湾海峡地区“停火”，美国可以劝蒋军撤出金、马。其意仍然是要在台湾海峡划一条永久停火线，所不同的是这次把金、马划在这条线以西。美国要以这种“退一步”的办法，使其侵占台、澎的行为合法化，至此美国把台湾海峡两岸割裂开来以利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更加暴露无遗。这不仅是中国政府所绝对不能同意的，就连蒋介石对此也极为不满，大骂美国对不起他。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及时调整了部署，决定让金、马暂时留在台湾当局手中。10月6日，中国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国防部长《告台湾同胞书》，指出，金门战斗属“惩罚性质”。10月13日国防部发布命令，宣告对金门炮击再停两星期，“以利他们固守”，并说明“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

但是美国仍不死心，又派杜勒斯和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到台湾亲自要蒋

介石从金、马撤兵，为蒋所拒绝。这样，美国无论在中美会谈，还是美台会谈中都未能使其“两个中国”的阴谋得逞。

中美会谈一百次

中美会谈始终在互相提防和压抑的气氛下举行，你谈你的，我谈我的，千篇一律。1959年底，顽固坚持和新中国作对。始终不愿在对华政策上有所改变的杜勒斯终于离任，但接替他的赫脱国务卿也没有给会谈带来什么起色。在整个华沙会谈期间，美国反复围绕美国在中国的罪犯这一问题作文章或发难，几乎在每次会上，他们都无理提出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这批罪犯。

1960年9月6日举行的中美会谈是第一百次会谈。为了使今后的会谈有所进展，也为了让世人了解会谈所以停滞不前的真相，王炳南大使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他说，“在过去五年来的一百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方面始终本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态度来和美国进行会谈，而美国方面毫无解决争端的诚意，并且还继续扩大和加强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中美会谈在进入第二项议程后，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中国方面一直采取积极态度，作了不懈的努力，先后提出十个合情合理的方案，以谋求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改善中美关系的途径，可美国方面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美国一方面曲解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硬要把协议运用于所有在中国犯有严重罪行的美国犯人，要求无条件释放这些犯人，这是无理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又违反平民回国的协议，继续阻挠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国。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拒绝承诺对中国放弃使用武力，不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一切武装力量。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是考验有无谈判诚意的试金石。美国政府为了永久霸占台湾，把台湾蒋介石政权说成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硬说美军侵占台湾是根据同蒋介石集团的所谓‘条约义务’。这种旨在制造‘两个中国’，并把台湾变成美国殖民地的阴谋和手法，已是世人皆知了。”接着，王炳南又列举了大量事实继续揭露美国。他说，“1958年秋季，美国在台湾海峡集结了一支自称是最大的武装力量，对中国人民寻衅挑战；1960年夏季，艾森豪威尔总统还亲自到台湾去从事敌视中国人民的活动。美国的军用飞机和军舰不断侵犯我国的领空和领海。最近，美国又把武装有或者能够武装核武器的巡洋舰、潜水艇和飞机派到远东去，公开对我国进行核威胁。”

比姆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只能故作镇静。王炳南进一步说：“大使先生，你应该知道，玩火者必自焚。”

“中美之间的争端能否解决，单凭中国一方的努力是不行的，现在是你们重新认真考虑你们对中美会谈的态度的时候了，特别是认真考虑把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时候了，迟考虑不如早考虑，迟走不如早走。早考虑，早走，你们就可以早日得到解脱。”

听着王炳南慷慨激昂、痛快淋漓的发言，比姆除了表示“十分失望”外，无力进行任何反驳。

接着，王炳南又就中美互换记者再次提出一个新的方案。王炳南强调说：“中国的宗旨是，中美记者互换是为了消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逐步改善目前两国之间又冷又僵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促使两国根据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和平解决美国武装部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的问题。”

当然，这个新方案照例触及了美国政府敏感的神经，因此这个提案照例没有得到通过。

为配合王炳南在第一百次会谈上的发言，《人民日报》于9月8日特地发了一篇题为《中美会谈一百次》的社论。中国政府的正确立场赢得了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们的一致赞扬。

中美会谈十五年：无结果的结果

1960年底，美国举行大选，肯尼迪当选总统，采取了在全球推行咄咄逼人攻势的对外政策。苏联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后，与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逐渐公开化，使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日趋险恶。

与此同时，国内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苏联又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经援，中国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经济困难。

这时的中美会谈仍像一块无法推动的巨石，毫无进展。

虽然中国对肯尼迪政府不存什么奢望，但从积极的方面着想，还是希望肯尼迪不像他的前任那样死抱着没有出路的旧政策，而能够在中美关系中有建树。但几次会谈后，肯尼迪就完全暴露出他不过是新瓶装旧酒。与以往一样，美方虽也提出了交换记者的综合建议，但仍竭力阻挠被我方邀请的美国人访华，并且照旧在遣返平民问题上纠缠不休，照旧提出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不使用武力的老话题。后来看到我国正处于自然灾害，还提出以优惠的条件卖给中国粮食以及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企图以小恩小惠引诱我们在重大的台湾问题上让步。

在会谈中，我代表并不否认中国眼下正在经历严重的困难时期，但马上正告美方说：“中国地大物博，人民勤劳勇敢，我们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困难，中国人民绝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

1962年，蒋介石集团趁我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之机，又重新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大量购进新式武器，改装飞机，增加装油量，使之能来往于台湾和大陆之间，还宣布延长兵役时间，士兵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据说还从日本大量购买了血浆。大有准备挺而走险、妄图与大陆决一死战之势。一时间，福建前线重又战云密布，局势空前紧张。

1962年6月初的一天，王炳南正在北京休假，周恩来总理突然找他紧急谈话。总理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在犹豫不决，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我们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国内正在讨论怎样打台湾的问题，是拒敌于大陆之外还是诱敌深入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鉴于局势已十分严重，你是否尽快返回华沙，尽快通过会谈，找机会了解美国的态度。”

王炳南意识到这一任务的重大，丝毫不能含糊，于是马上中断休假，赶回华沙，并约见了卡伯特。卡伯特是王炳南的第三个谈判对手。1961年9月上旬，比姆奉调回国，出任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副署长，由曾任上海总领事的卡伯特出任华沙大使，接替比姆。卡伯特50多岁，与他的两位前任很不相同，尽管他已经有了三十六年的外交工作经历，到华沙之前是美国驻巴西

大使，但是他没有显露出出众的外交才能。据说他是波士顿最富的富翁。为人和善，举止随便，不在乎外交礼节，即使是在谈判桌上他也常开玩笑。

6月23日，王炳南与卡伯特见面。为了便于无拘束地交谈，王炳南采用了非正式的会谈方式，他邀请卡伯特来到他的官邸喝茶。

卡伯特依然是一副不拘礼节、毫不在乎的样子。他笑呵呵地开玩笑说，“你们中共应该感谢我们美国，你看你们胜利后检阅军队时，不是有很多美式装备吗？这些装备是蒋介石供给你们的，所以你们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他送武器给你们，连张收条也不要。”

聊了一小会儿，王炳南把话题转入了正题。在谈东南亚局势时，他说：“中国政府对东南亚局势的发展感到担心。今年以来，美国增兵越南，出兵泰国，加紧干涉者挝，东南亚局势已经发展到随时可能引起大规模国际冲突的边缘。中国政府的态度一向是克制的，尽管蒋介石残部参加了老挝内战，中国的安全正遭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中国仍然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决老挝问题，没有放弃争取在不干涉有关国家内政的基础上，使印度支那和整个东南亚局势缓和下来。但是，局势能不能缓和，关键并不掌握在中国手中。”

为了引起卡伯特的注意，王炳南加重语调说：“中国政府还要提请美国政府注意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听到这里，卡伯特的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开始认真听了。

王炳南继续用强调的口吻说：“美国政府完全清楚蒋介石集团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情况，这些都是在美国的支持、鼓励和配合下进行的。自从今年2月以来蒋介石集团就进行了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提前征集兵员入伍，延长士兵服役期限等等，准备渡海登陆。蒋介石集团在美国参与或配合下，进行了频繁的登陆实战演习和对大陆沿海地区的侦察活动，美国政府增加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的目的是支持和鼓励蒋介石进行军事冒险，不管冒险的结果如何，美国都可以收到打击和进一步控制台湾的实利。正是在美国的支持和鼓励下，蒋介石集团才跃跃欲试的。”

王炳南注意到当他反复强调美国政府在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背后所起的作用时，卡伯特显得有些紧张。于是，他进一步说：“中国人民同蒋介石打过几十年的交道，完全懂得该怎样对付他。中国政府必须指出，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对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对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

最后，王炳南用警告的口吻结束了他的谈话：“我可以断定，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

卡伯特听完了王炳南的话，停顿了一下，然后赞赏地说：“我很欣赏王大使坦率的态度，我将尽快把大使先生所谈的情况电告美国政府。”接着他又爽快地表示：“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是不会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的。”

最后，卡伯特郑重地向王炳南说：“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

当王炳南送卡伯特出门时，卡伯特又一次说：“我保证美国不会支持蒋介石的行动，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

听了卡伯特明确的表态，王炳南不禁松了一口气。他立刻向中央汇报了这一情况，因为这个重要情况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事实证明，它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此后，王炳南与卡伯特大使又进行了十几轮会谈。1964年，王炳南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改由王国权大使在华沙与美国大使继续进行这时断时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但在中美两国的实质性问题上，依然一直没有结果。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很大震动。我国政府发表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这对美苏两个大国是一个挑战，因为它们都不能也不愿意作出这样的承诺。根据中央的指示，在1964年11月举行的第123次中美会谈中，王国权大使向美方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协议声明草案。美方代表毫无思想准备，根本不敢表态。直到1965年2月的第一百二十四次会谈时，美方才作出反应，以不能没有监督为借口表示反对，暴露了美国坚持搞核垄断的用心。

1968年11月26日，我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曾就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议的会期问题发表讲话时阐明：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贯坚持两项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拆除它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但是，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就这两项原则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虽然中美大使级会谈进行了十五年，除了就中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外，在涉及中美关系的一切实质问题上毫无结果，但这是中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保持联系、进行沟通的唯一正式渠道。每一次重大国际事件发生后，中美两国都可以在大使级会谈中表明自己的观点，提出看法，使一方对对方的态度、做法有所了解，这就是中美大使级会谈维持了15年之久的意义所在。

第二章 冰川期

60年代是一个全球急剧变动的年代，社会主义阵营里中苏分裂，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烽火四起，日本和西德正从战败的废墟中爬出，而东西方两大国——中美之间的关系不仅未见丝毫改善，反而又箭拔穹张，挥戈不断。U—2飞机事件、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和越南战争使中美又回到血与火的撞击之中。“冰川已至”，两国关系温度下降，满目肃杀。

第一节 U—2 飞机遇难神州

进入 60 年代，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进程加快，美国坐立不安，便以台湾为基地，用“国军”当炮灰，派遣 U—2 高空侦察机对中国大陆的核弹和远程导弹发展过成进行全面监控。中方忍无可忍，被迫还击，于是一架又一架 U—2 飞机高空开花，遇难神州。

蒙特鲁马机场的不速之客

1959 年 8 月初，一个万籁俱静的夜晚。

美国科罗拉多州蒙特鲁马郡民用机场。

喧闹一天的机场已经伴着午夜的降临而渐渐进入梦乡。停机坪上七零八落地趴放着几架小型民用飞机。跑道两侧的指示灯在夜幕中摇曳着暗黄色的光芒。机库内早已空无一人。只有岗厅中的警卫人员在依着墙壁昏昏欲睡。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警卫猛然一怔，揉着惺松的睡眼向外张望。只见一个身着黄色太空服的大汉正在门外高喊着。警卫打开岗厅的门，朝那个人走去。

“快点儿！带上你的枪，到那边去警戒！”这位不速之客用蹩脚的英语向警卫高声命令道。这时警卫才看清他的太空服上佩有美国空军的标志。警卫朝他指的方向望去，见机场外靠近跑道的荒地中横躺着一架从未见过的黑色飞机。

警卫一边唤醒其他的同事去警卫现场，一边通知空军。

半小时后，几辆美国空军军车驶入蒙特鲁马机场，并立刻将现场封锁。那位讲蹩脚英语的人也被带走了。当晚目睹此事的机场警卫人员被告知不得将这件事张扬出去。第二天，由德克萨斯州训练中心美国空军 4080 联队大队长布拉顿上校就这次空军飞机迫降事件对外界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对事件的真相只字未提。

此事过去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事件的真相：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正在培训台湾空军驾驶 U—2 飞机，准备对中国大陆正在从事的一项核心机密行动进行高空侦察。那位迫降于蒙特鲁马机场的飞行员正是国民党空军少校华锡钧。

中国人要搞原子弹

1945 年 8 月 9 日和 13 日，当两团遮天蔽日的蘑菇云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冉冉升起后，人类战争便进入了核时代，美国也因此而占据了核俱乐部的第一把交椅。手中最先拥有核弹头的美国一开始便想庄家独坐，好在世界上耀武扬威，唯我

独尊。可好梦不长，苏联不久便打破了美国在核武器上的垄断地位。美国无奈，又将下一个限制发展核武器的目标对准中国。因为美国深知这位在 1949 年崛起于东方的中华大国一旦拥有原子弹后将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构成极大的威胁，更何况 50 年代的中美核危机已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的核讹诈不仅根本无所畏惧，而且更在核压力下坚定了发展原子武器的决心。

中美第一次核危机爆发于1950年7月底。在朝鲜战场上，朝鲜人民军已将美军和李承晚军队赶到围绕釜山的一个不到60英里长的狭窄区域内。美国想将第七舰队调进台湾海峡对北朝鲜和中国施加压力的企图也无济于事。而中央情报局得到的秘密消息是中国两栖部队和伞兵正在台湾海峡对岸大规模集结。美军驻太平洋部队司令官担心在西线遭受中朝南北两路的攻击。为了对北朝鲜和中国军队发出强烈的警告，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对中朝实施核威慑。杜鲁门下令将装有核弹却无可袭变芯的10架B—29轰炸机部署到关岛，并在此计划被批准后的几小时内将消息有意透露给《纽约时报》记者。第二天消息见报，举世哗然。但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胆，而且迅速向东北集结大军，准备入朝作战。停在关岛的B—29也没有开赴朝鲜战场，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前就飞回了老家。在返航途中，一架载有核武器的飞机还在旧金山附近坠毁。

中美第一次核危机后，美国政府仍不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利，继续对中国搞核威慑和核讹诈。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杜鲁门惊恐万状，他又故伎重演，向新闻界扬言将采取“一切必需的手段”来应付朝鲜半岛的局势，并声称，对核武器的使用“一直在积极考虑之中”，美军的战场指挥官就有权负责对核武器的使用。杜鲁门的讲话立即引来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反对。连美国的盟友英国也对杜鲁门信口雌黄甚为不满。12月1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要到华盛顿与杜鲁门商讨此事。四天后，杜鲁门被迫与盟国领导人开始了一系列的会谈。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杜鲁门只好被迫暂时放弃了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计划。然而，当美军在朝鲜半岛节节失利之后，杜鲁门又重新萌发使用核武器的念头。1951年4月6日，杜鲁门决定派遣载有完整原子弹的B—29轰炸机飞越太平洋，在远东部署。在其后的三个月内，美国政府在不“贸然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采用了三种“比较微妙和诡秘”的做法对中国进行核威慑。首先，4月末在中朝军队举行第五次战役后，杜鲁门再次批准将一批载有核弹的飞机派往远东战区，并派出一个指挥组前往东京，以协调可能进行的核攻击计划，此外还授权“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将军可对来自朝鲜的空袭进行核报复。其次，美国向香港派去一名秘密使者——伯顿·马歇尔，其使命是设法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一个“核信息”，即中国领导人不要以为杜鲁门将好战的麦克阿瑟解职是美国软弱的表示，相反美国有让中国停止发展几十年的能力，这意味着美国有使用原子弹的决心。第三，杜鲁门在国内也不断暗示美国要在亚洲使用核武器。但中朝军队的强烈攻势并没有因杜鲁门的恐吓而有丝毫减弱。杜鲁门在白宫也未遂其对中国的原子噩梦。

随着战局的发展，美国人被迫坐到谈判桌前与中朝方面开始停战谈判。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多少接受了一些杜鲁门的教训，不再向外界大肆炫耀美国动用原子弹的能力与决心，而是以较为谨慎的言辞对中国进行暗示，表明美国仍未放弃使用核武器来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1953年5月，艾森豪威尔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明确表示，他的选择是“让共产党当局理解，如果缺乏满意的进展（在停战问题上——作者注），我们打算以更大的决心，消除对核武器使用的限制，并将不再承担对朝鲜半岛有限制攻击的承诺”。其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试图透过美国驻印度使馆向北京传递新信息：如果华盛顿不能接受板门店协议的话，美国就有可能使用核武器。然而印度总理尼赫鲁断然拒绝为美国佬向中国传递“核信息”。美国只好在板门

店的谈判桌上将这一信息透露给中方。美国方面万万没有想到，中国不仅没有在美国的核威慑下有所让步，反而在前线广筑带有反原子屏的坑道工事和防空洞，大有与美国佬的原子弹一决雌雄的劲头。这样直到朝鲜战争结束，美国也没敢在朝鲜半岛炸开蘑菇云。

美国人在朝鲜半岛上的制造的核危机总算在中国人的勇气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面前破了产，但美国却仍狂妄地以为他手中的“核大棒”还可以继续恫吓中国，于是又制造了台湾海峡核危机，孰料这场危机不仅没吓倒中国，反而迫使毛泽东下定决心，“我们也要搞原子弹”！

板门店停战协议签署后，美蒋又在台湾海峡制造事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战争叫嚣。美国人又故伎重演，对中国搞核威慑。

1954年1月，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勒梅将军说：“在朝鲜没有合适的战略空投目标，然而，我可以在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东南部合适的地方投几颗原子弹。”

1955年初，美国政府秘使飞往台北，向蒋介石传递口信，说如果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发起进攻，台湾方面需要的话，美国人有决心在金门和马祖使用原子武器。蒋介石听到此话后如获至宝，立刻传话给美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唐普上将说：“只要美方提前通知，而战争又需要的话”，他将接受对大陆的原子攻击。

1955年3月16日，艾森豪威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如果远东发生战争，美国当然会使用某些小型原子武器。第二天，副总统尼克松立刻呼应，警告北京“不要进行好战的调动”，因为美国有计划使用“以属于常规武器的战术核武器”。

来自大洋彼岸的核寒流不禁使在春寒料峭之中的北京更添了几分袭人的凉意。中南海内，毛泽东主席掩卷长思：一个以和为贵的中华民族才经历了几个灿烂的春天，又要面临洋人要在自己家庭院挥刀枪弄剑他威胁，而这回的洋枪洋炮却是我们还没有的“核武器”。当时中国也曾想依靠北方老大哥的原子弹对美国进行反威慑，然而苏联人为了其全球战略，一直不敢明确表示对中国提供核保护。多少英雄抛头颅撒热血换来的锦秀江山难倒就这样又任外人肆意摧残吗？不！这位东方伟人再也静不下去了。他马上召集共和国高层领导共商对策。金门危机终于逼迫中国人决心研制自己的核武器。

1958年，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在北京郊外开始建立实验型重水反应堆。在这之后又相继建立了另外几座反应堆。其间，中苏关系开始破裂，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中国人只得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研制原子弹。

1956年春，得知中国准备研制原子弹的消息后，美国政府内一片恐慌。美国人万万没有想到会引火烧身，惹怒了这只已经苏醒过来的东方雄狮。一定要严密监控中国的核计划！艾森豪威尔给中央情报局下了死令。于是，一场以U—2飞机为主角的高空间谍战拉开了帷幕。

“蛟龙夫人”

U—2飞机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为美国情报机关专门研制的高空侦察机。该机由加利福尼亚州帕达尔的飞机制造厂生产。1956年4月，美国以全国航空咨询委员会发布新闻的方式，向外界宣布U—2试制成功。为保密起见，谎称该机将用来研究湍流气象方面的科技情况。从1957年起，中央情报

局便将 U—2 当作对其他国家进行高空间谍侦察的重要工具。U—2 飞机问世后，深得美国情报机构和军方的青睐。为此，此机得到不少“雅号”，如“蛟龙夫人”、“天使”、“神秘女郎”、“黑衣女谍”，甚至在其刚开始步入军中时，还曾被称作“究竟（THE DEUCE）”，因为很少有人知道它究竟要去执行什么任务，但最通用的绰号还是“蛟龙夫人”。这个代号源于自 1934 年起在美国流行的连载漫画《泰瑞和海盗》中一个横霸一方的女强盗的名字。漫画中的泰瑞秉公执法，对“蛟龙夫人”追杀不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漫画中的泰瑞被艺术家着上了美军军装，“蛟龙夫人”也摇身一变，成了泰瑞抗日的战友。二战结束后，泰瑞又成了美军飞行员，而“蛟龙夫人”竟成了专门对付共产党国家的地下组织头目，整日神出鬼没，来去无踪。不过漫画中的“蛟龙夫人”肯定没有想到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U—2 飞机会成为美国特务的宠物，更不会想到在 60 年代会有五架“蛟龙夫人”折戟神州。

绰号“蛟龙夫人”的 U—2 飞机的确有着非凡的技术性能。该机最大飞行速度为 800 公里/小时，最大航程 7000 公里，续航时间高达九个小时，实用升限达 22870 米。更令人羡慕的是 U—2 飞机的高空拍照能力，也就是这种“蛟龙夫人”那双如鹰般犀利的目光。U—2 飞机上装有的侦察相机在 20000 米高度拍摄的照片，可供判读的横向范围高这一百五十公里。据说，有一回，蒋介石在审阅 U—2 飞机拍回的部分大陆照片时曾不经意地问起有无其家乡的照片。国民党空军为讨老蒋的欢心，在一次赴大陆执行侦察任务时特意拍回浙江奉化溪口的照片，照片上连蒋母的墓地都看得一清二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甚至对外吹嘘，U—2 飞机在 70000 英尺高空拍摄的照片连地面小鸡的数目都照得出来。这种相机还可以多角度转动拍摄，内装有 20 公分宽的底片 2500 公尺，可连续侦照九个小时以上。这就难怪时至今日，“蛟龙夫人”仍未退出历史的舞台，在海湾战争中，美军还多次使用 U—2 飞机侦察伊拉克的军事部署。

U—2 飞机问世前，美国也曾对中国和苏联进行过高空侦察，可由于中苏两国幅员广大，一般的侦察飞机即使从中苏周边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起飞，也很难进入两国的腹深地带，而从安全和情报观点分析，这类难以触及的地区往往隐藏着更有战略价值的秘密设施或建设工程。为此，美国情报机构和空军绞尽脑汁将情报触角向中苏内地延伸。50 年代初，美国空军就在对流层的喷射气流带施放间谍气球。这种号称“大气观测用品”的气球下的吊篮内附有自动稳定装置，能使气球在高气压下顺气流从苏联东部向西部持续飘行，而另一端悬挂的自动相机则在十几昼夜的飘行中不断对地面目标进行高空拍照。当飞出苏联后，吊篮内的降落伞再自动开张，将吊篮送回地面或海上。美国空军立刻前去搜索，并将自动相机内的底片取回。可气球天性散漫，一旦升空，便随风而行，大部分根本无法按人设计的路线飞行。这项代号“白鲸”的放飞行动持续了五年，返回率只有百分之八，而寻到拍摄目标的还不及百分之一。更令美国人头疼的还是那模糊不清的照片，许多根本无法辨读。“白鲸”笨拙无奈，美国人只得求助于浑身高功的“蛟龙夫人”了。

不过，“蛟龙夫人”纵然“武艺高强”，却仍有先天不足。U—2 飞机的设计是传统与创新的结合，但却没有在这种结合中解决两者的致命漏洞。为追求高速轻捷，U—2 飞机的净重仅有 12000 磅，机体材料为铝合金，可却缺乏强劲的结构支撑，机身外表又仅有 0.02 英寸厚，加之机翼设计仍未彻底摆脱高空浮力不够的力学结构束缚，所以飞行员在高空稍有不慎，就可能亡命

九霄。而早期 U—2 飞机的高空导航更是如盲人骑瞎马一般。在超越 60000 英尺高度后，U—2 飞机的地面导航修正系统失灵。飞行员只有仰赖天文航行了。更令早期 U—2 飞行员头疼的是恶劣的操作环境。机舱狭小不说，单是那笨拙的飞行服就够折腾人的了。早期的飞行服为 MC3 型压力衣，头部是如金鱼缸般的头盔，身上是由绞盘和长管一通到地的皮紧衣裤，关节处紧乎乎，硬梆梆。加气后，飞行员入被全身紧绑，投入闷罐中一般。许多飞行员返航后，汗流浹背，体重锐减 2—3 公斤。“棺材板”式的设计使不少 U—2 飞机在训练和实战中经常因机械原因折翅坠地。所以飞行员登上 U—2 飞机后也就感到自己已飞向不可预知的危险领域。

“黑猫中队”

1958 年春末，台北。

一股强劲的热带暖湿气流过早地掠过台湾岛。岛内的气候闷热潮湿。

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北办事处主任克莱恩在装有空调的办公室内烦躁地踱来踱去。尽管室温与窗外相差近十几度，可他还觉得胸口发憋，脸上发汗。

几天前，克莱恩回美国接收情报任务。上司向他透露了一个核心机密：据可靠情报分析，中国正在甘肃、青海或新疆研制原子弹。中苏分歧不断扩大，中国人有可能加速核武器研制进程。为此，中央情报局经美国总统批准，准备利用台湾空军驾驶 U—2 飞机穿越“竹幕”，深入大陆内地侦察照相，全面搜集中共重要工业设施、军事部署的情报，全程监控中共原子弹和远程导弹的发展过程。

美国之所以要动用“蛟龙夫人”对中国大陆进行高空侦察，主要是因为美国发现其在台湾配置的各类侦察系统已无法对大陆腹地进行更有效的情报监控。自 50 年代初起，美国就在中国大陆周围建立了一个从北海道到曼谷的弧形地面电子情报站网络，对大陆的电子情报进行监听。虽然电子监听收效不小，然而，地面监测站的监视范围终究有限，对大陆内地的军事动态就无能为力了。

克莱恩领到命令后，马上飞回台湾，同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联系。不料，俞大维认为美国人关注的大陆核计划情报对台湾没多大用，更何况美国人要侦察应由美国空军去冒险，而不应让“国军”当炮灰。克莱恩知道这位“小家子气十足”的“国防部长”关注的只是大陆在沿海的军事动态，对其它战略情报毫无热心，他根本就不清楚什么叫战略核威慑，更不懂美台结盟的真正含义是全面遏止中国大陆的发展，而不是在海峡对面发几发冷炮就欣欣然了。“竖子不足与之谋”。可不谋又无法向国内的大老板交差。此时，克莱恩真有些心烦意乱了。

克莱恩在窗前站住，扭转过身，向对面的墙壁望去。突然，墙上悬挂的那把中国宝剑令他为之一震。“对啊！尚方宝剑。”克莱恩猛然醒悟。中国人喜欢以尚方宝剑压人，我何不借此东方处世之道呢？于是，克莱恩立刻驱车前往蒋家大公子蒋经国住处。

当时任台湾“国防会议”秘书长的蒋经国听克莱恩介绍情况后，对美国的合作计划很感兴趣。毕竟是“皇太子”，蒋经国的韬略远在俞大维之上。虽然，蒋经国对大陆的核计划也没什么兴趣，可他更关心大陆内地的动态，因为蒋家一直没有放弃重返大陆的企图，如果有朝一日真的回到大陆，那内

地不也是他蒋家的天下吗？小蒋初步同意美国的合作计划，但要求台湾方面也得分点儿美国的“残羹剩饭”。克莱恩当即表示台湾可以留用一些美国不需要的侦察情报。蒋经国甚是欢喜，马上奏明老蒋。蒋介石大笔一挥，这份合作计划便被台湾方面批准通过。克莱恩动用蒋家父子这把“尚方宝剑”奏效，更是乐不可支。满心的欢喜将几日的烦躁一扫而空。

这项美台合作计划经蒋介石批准后，就在绝密状态下紧张地开始作业了。台湾方面由蒋经国主持。台空军作战署长雷炎均和情报署长衣复恩奉命到桃园、新竹、嘉义和台南等基地挑选 12 名飞行员到琉球美军基地接受体能、生理、心理测试。最后选定六人赴美受训。据衣复恩后来回忆说，这项测试十分残酷。飞行员先要过的第一关是高空舱房测试。飞行员得在离心机上跑个不停，同时还得待在高温舱内。出来后马上又得进入彻骨的冰水池中，以测试其对压力的忍耐程度。过了第一关的飞行员将进入又一个星期长的“虐待式”测试。这些“虐待”的花样有美军基地医生将冷水强灌进飞行员的耳朵中以测其平衡感，还有在飞行员的身上插上一大堆怪里怪状的吸管，再加体外电击。这就难怪不少受过测试的飞行员觉得他们就像一群小白鼠一样，让美国人做实验。

经过这番折磨后，第一批赴美受训的飞行员终于产生了。他们是：杨世勋、陈怀、郗耀华、王太佑、华锡钧、许仲揆。（许仲揆受训时因操作不当被淘汰。）1959 年 5 月，这六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由美国战略空军情报官杰克逊少校率领飞往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的拉佛林空军基地接受 U—2 飞机的飞行训练。其后直到 1971 年，共有二十七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赴美受训。

赴美的国民党飞行员始终在极端保密的条件下从事着训练工作。连这些飞行员在刚开始时都不知道他们要驾驶 U—2 飞机。直到一系列基础课程结束后，他们才见到了被神秘面纱所掩盖的“蛟龙夫人”。国民党空军到达美国后立刻更换美国空军军服，并被警告不得擅自离开基地。当这些飞行员驾机训练时，附近机场的调度指挥们便被告知“英语不流利的飞行员正在使用对话频道”。王太佑回忆说，当时上课只能听讲提问，不得抄笔记，更不准将任何训练教程带出教室。尽管国民党飞行员的英语功底还算不错，可要听这么多复杂的课程却有些难度，可美国人以保密为由就是不编译 U—2 飞机的训练教材。更令国民党方面对美国人的保密原则气恼的是对中英飞行员不同的待遇。当时，英国的一批飞行员也在德州基地接受 U—2 飞机驾驶训练。美方规定两组训练队伍不要碰头不说，还特意将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安排在基地附近的一家条件不错的旅店里，而台湾空军飞行员则被安置在靠近沙漠的一处偏远社区。两个队伍的物质待遇也是英高中劣。

经过进一年的训练后，美国人认为这批国民党飞行员已可以驾机飞越台湾海峡，深入中国大陆进行间谍侦察了。于是，1960 年 7 月，美国向台湾当局提供的第一批两架 U—2 飞机秘密运抵桃园机场。台湾方面则在从美受训回来的飞行员中挑选了六名飞行时间在 2000 小时以上、具有高空侦察经验的人员组成了隶属于国民党空军总部情报署的“第三十五气

象侦察中队”。由于刚到的 U—2 飞机全身漆黑，没有任何识别标志，当时三十五中队的飞行员陈怀便设计了一只黑猫图案，黑色的猫身代表 U—2 飞机，一对金亮的猫眼则象征着高空摄影机。这只黑猫很快就成了三十五中队的队徽。飞行员们又特意定做了一批标有黑猫图案的夹克衫。所以人们就称这个中队为“黑猫中队”，对于神秘的 U—2 飞机，台湾人则称之为“黑猫

小姐”。

台湾方面称这支队伍为“神秘的混血队伍”。倒不仅因为有美国人在“黑猫中队”，而是实际上该中队是由美国人直接控制。飞机的维护、看管都由美军担任。停放 U—2 飞机的机棚，连国民党空军的联队长和大队长都进不去。

大部分美方人员是洛克希德公司雇员。他们来台前与中央情报局签有工作合同。其他的维修、调度、导航、摄影等专业人员多来自美国军方，不过这些人为保密起见，一律不穿军服，相互间也以“经理”相称。对来自不同基地的空勤人员，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求他们给亲朋好友写信时仍先写给原来的基地，再由原基地投寄回国，以免被人发现桃园有美空勤人员。当时美方地勤人员在桃园基地甚是寂寞无聊，便向台湾方面提出过为美空勤人员便利的三项要求：他们的通勤座车比照美国使馆人员用车，挂“使”牌照；比照外交人员用外交购物卡；还要参加基地外美军军官的俱乐部活动。但台空军情报署长衣复恩唯恐美方人员这样做会大招摇而泄密，便婉言回绝。可美国大兵天生莽撞好动，曾有两位美军夜不归营，台湾方面立刻向美国情报主管汇报。不久，两位美军就被遣送回美国。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美国情报机构费尽心机想将“蚊龙夫人”藏在桃园，可没过多久这份天机便被大陆方面探究清楚。海峡对岸的人民广播电台向台湾空军喊话，表示驾驶 U—2 飞机投诚者可获相当于 28 万美元的奖励。美台方面怀疑基地附近有中共间谍。但根据大陆方面 1989 年解密的文件透露，当年只要 U—2 飞机飞离地面 40000 英尺，便会被大陆的沿海防空雷达发现，甚至当“黑猫中队”飞行员在通讯网络上开始听取情况简报时，大陆的电子监听系统就开始进入全面工作状态了。不过时至今日，美国人仍不愿就此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如果中国大陆的监测系统这么有效，那美国人为 U—2 飞机入台所做的一切保密工作不也太无能了吗？

当然，保密也是要付出代价的。美台情报机构为桃园基地 U—2 飞机的空地勤人员提供了优厚的生活待遇。美方人员的津贴高达每月 2500 美元，几乎是一般空军飞行员的四倍。美国方面也想按此标准向国民党空军人员发送津贴，可蒋介石担心中央情报局对“国军”“渗透”太深，而回绝了美方的好意。但老蒋对美国的钱也不能置之不理，便以一美元的象征价格购买了美国为“黑猫中队”提供的高级轿车。国民党的飞行员收入也相当丰厚。“黑猫中队”人员的月薪是一般飞行员的三四倍。每逢过年，蒋经国还要到桃园基地给飞行员们发些红包。

穿幕飞行

经过一年多的再次训练和调试，“黑猫中队”于 1962 年 1 月 13 日开始出动 U—2 飞机对大陆实施高空侦察。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中国大陆核工厂和核试验场均分布在中国的西北部。这些地方距台湾都有上千公里的航程。U—2 飞机在这么远的距离上执行侦察任务，飞行员的体能和飞机的性能都消耗极大，如果中途发生故障，根本无法返回台湾。机毁人亡是小，关键是不能让大陆抓住任何证据，否则中央情报局不好向世人交代。特别 1960 年 5 月，一架 U—2 飞机在苏联被击落，苏联人借此大做文章，掀起轩然大波，艾森豪威尔脸面丢尽，美国

人对高空间谍活动更为谨慎了。为了增加 U—2 飞机出航的保险系数，美台双方曾考虑在大陆周边国家寻觅一处供 U—2 飞机起降的机场。他们选定了泰国和印度。但在当时情况下，这两个国家均不愿意替美台背这个坏名声。别无选择，“黑猫中队”只得从桃园基地起飞了。

每次起飞之前，美国战略空军总部要根据中国大陆发布的气象资料，研究判断侦察目标区上空的天气是否适合高空拍照。一旦天气情况良好，美方便以加密电报形式将出勤令通知“黑猫中队”。最初，在一般情况下，出勤令是在晚九时左右收到。经过一阵紧张的行前准备后，“蚊龙夫人”必须在凌晨 4 点之前起飞，才能在上午 9 时至 10 时这一最佳摄影时段赶到侦察目标上空。但这种节奏过快，地勤人员很难对飞机进行仔细的检查与维修，飞行员也是匆忙上阵，有时连飞行路线图都记不太清。后来，美国方面对时间安排做了调整，出勤令改为头一天下达了。到后期，红外线摄影技术问世，U—2 则可以不必赶早晨的拍片良机了。其实，准备时间延长对飞行员来说未必是件好事。在基地待命时，许多飞行员都有临上刑场的感觉。“黑猫中队”的队员们接受出勤令后常常是寝卧不安，食欲大减。而战情简报又常常是凌晨一、两点钟下达。飞行员一宿难眠。

战情简报分别由台美双方军官说明侦察行程的气象状况、航路指示、大陆防空部署、还有侦察目标的重点说明等。飞行员大多是机械性地听到底，等简报完成后再抽空研读由领航员绘制的二百万分之一的地图。U—2 飞机侦察成败的关键之一是领航员的后勤作业。八、九个小时的侦察路线皆经过详细推算规划，尽可能涵盖更多的目标。为方便飞行员判读，航行图还用不同颜色对目标路线分类：红色路线表示必须准确地按着飞，才不至于漏掉重大目标；蓝色的则表示较次要的目标；棕色则是有紧急情况后的避难路线。美方人员还用硬币在图上画圈圈，提醒飞行员小心所标地区的大陆电子侦察设备。

由于中国大陆当时已装备远距离多管雷达，对 U—2 飞机的追踪率相当高，所以 U—2 飞机在桃园起飞后，一般先向东朝琉球方向飞，以逃避我沿海雷达网的监控。等升到 5 万英尺高空后，才在鹅銮鼻附近调头由汕头附近飞进大陆，穿过所谓的“竹幕”，开始了不可欲知的航程。

U—2 飞机在攀升到六万七千英尺高空后，便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保持一定的速度继续爬升到七万五千英尺的巡航高度。巡航过程中座舱外的景观变化，几乎没一个 U—2 飞行员在多年后都难以忘怀。蓝色的天空一望无际，色彩亮丽，令人陶醉。夕阳如镜似花，在地平线上走完它最后一点轨迹。景色万端，飞行员却无心欣赏；日月入画，“黑猫中队”的飞行员却像在踏上西归之路。一个超级大国的霸权战略竟使的这些与核威慑无缘的国民党军人走上了人生的险程。一把蒋家父子的尚方宝剑又引发了海峡两岸多少情仇！

在半年时间里，U—2 飞机对大陆的侦察飞行高达十一架次之多。当时，大陆正全力研究从铀矿石中提炼铀 238，以取代钚作为核裂变原料。这类核原料工厂大多设在西北地区的内河和湖泊旁，因为生产过程需借助河水或湖水冷却。于是，U—2 飞机主要在青海湖、罗布泊和包头附近打转。飞机上高敏度的侦测器材可测得地面河水温度。返航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人员将测的温度与大陆发表的水文资料对比，从水温差中就能分析得出核原料的产量。

过去 U—2 飞机在苏联飞行时，主要靠沿线的铁路定方位，因为苏联的军

事部署和洲际导弹调防全靠铁路运输，而中国大陆则不然，60年代西方的情报专家一直困惑为什么中国要在荒漠中发展核武器，要知道这些地区的运输可是个大问题。在荒漠上空飞行就远不如在有铁路网定位的欧亚大平原上容易了。“黑猫中队”的高空侦察任务都是在忙乱紧张中进行的。飞行员要不停地定位，修正航向，还要提防中国大陆的雷达监控和地对空导弹的威胁。可历尽艰辛，返航后，飞机刚一落地，空照底片马上便被美国人取走，由美军C—130专机送往日本美军基地冲洗。十天后，全部照片被分为四份，其中一份美国人认为对国民党了解对岸军事部署有用的依合同交给台湾当局。看到自己出生入死换来的情报被美国人独占，台湾空军很是不满，可几次同美方交涉，美国佬都以技术问题来搪塞。一些国民党军官开始怀疑美国人故意留一手。连当初对此计划很是积极的蒋家父子也有些对美国人的做法不以为然了。空军情报署长衣复恩私下向美国柯达公司驻桃园基地的人员打听，在台湾另设一套冲洗设备有无困难，对方坦承相告在技术上没问题。美国人的谎言被揭穿了。衣复恩便向中央情报局的“经理”建议，请美方考虑在台湾加设一套冲洗设备，“以防黑猫中队队员九死一生换来的底片万一在运往日本途中发生意外，整趟的辛苦岂不白费。”衣复恩花言巧语终于使美方决定在桃园基地设立新的底片冲洗站，另外还同意帮助培训台湾的空照判读人员。对此，台湾空军喜出望外，赶紧在松山军事基地一间密室内设立“新生小组”，专门研究美方提供的高空侦察照片。实际上，由于技术的差距和情报需求不同，台湾所获得的有价值的情报相当有限。

被“木棍捅下来”的U—2飞机

中国大陆方面早已查明美蒋勾结，利用U—2飞机对我进行高空侦察的阴谋，但U—2飞机的飞行高度的确令解放军空军各类歼击机望尘莫及。60年代初，中国大陆担负防空任务的兵器中只有萨姆—2导弹才能对付“黑猫中队”驾驶的“蛟龙夫人”。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地对空导弹部队只在首都北京布防。自从1959年国民党空军的一架RB—57D侦察机被我导弹部队在北京郊区上空击毁后，国民党空军的侦察飞机再也没有闯进北京上空。要想打掉U—2飞机，打消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的嚣张气焰，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必须做新的战术调整。

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向中央军委请示，要求将保卫首都的地空导弹撤出北京，在U—2飞机经常活动的航路上机动埋伏。要知这一战术移动在当时可是十分敏感的话题。苏联援助中国的萨姆导弹库存只有62枚，而中国人在外界的压力下还不敢稍弛战争准备。首都随时有遭受台湾空军骚扰的危险。然而，共和国的领导人们更清楚U—2飞机对我国的核研制计划的压力，也更明白核武器对新兴的人民共和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世界和平和稳定意味着什么。中央军委马上同意了空军的建议。

在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主持下，解放军多次召开防空系统领导人会议。大家在仔细研究U—2飞机“穿幕之旅”的飞行路线后，发现U—2在1962年上半年十一次的飞行中，有八次经过南昌，便决定将三个地对空导弹营撤离北京，以“地质打井队”的名义在南昌布局，列网捕杀神秘的“黑猫小姐”。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四三部队第二营进驻南昌外围阵地，在两个小山谷间安置雷达，导弹发射器则架在两侧的山坡上，等候U—2落网。

1961年到1962年间，桃园基地的U—2飞机平均每月出勤三次。每次总借我沿海空军歼击机换防时进行。解放军摸清了这一规律，所以在二营到位后，就抛出了诱饵，引蛇出洞。1962年7月，一大队解放军空军轻型轰炸机从南京换防到南昌，第二天，又一大队轰炸机飞往南昌以南。上述活动均被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雷达所掌握，台湾军方以为大陆军方一定有所调动，便与美方协商，决定派U—2飞机前往侦察。

9月8日，“黑猫中队”飞行员杨世驹接到出勤令。他驾U—2飞机从桃园起飞后，先往南飞昆明，再转回南宁、桂林。正当他准备继续向前飞往南昌时，飞机油路系统忽然发生故障，只好从桂林转头飞回台湾。当时，二营的官兵也十分纳闷，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架U—2飞机眼看就要进网，却猛地调头飞向广东，而且还在天空七拐八绕地留下一串串弧形，然后一个急转弯，掠过广东市区便逃之夭夭了。他们不知道杨世驹是因为油路故障才没有继续北上，走上死亡之路。而第二天接杨世驹的班的陈怀则代他走完了这条不归路。

9月9日，凌晨6时，陈怀驾驶U—2飞机又从桃园基地起飞，自福建平潭进入大陆后经福州，沿鹰厦铁路，过顺昌，然后向南昌直飞而去。解放军的多部雷达已紧紧盯住他的飞机。地空导弹部队进入临战状态。

陈怀的U—2飞机飞过九江后，左转180度，直扑南昌。

8时32分，南昌导弹阵地，三发萨姆—2导弹离地而起，U—2飞机一头撞进由3600块弹片编织的死亡之网中。

北京复兴门外，空军指挥部的大型图板上，标示U—2飞机航迹的蓝色铅笔线停止了前进。空军司令刘亚楼高兴得跳起来。接着，击落敌机的正式报告通过电波传至北京。刘亚楼马上将这一喜讯通知中央领导。随后，他又打电话通知二营营长岳振华，命令他火速赶到飞机残骸现场，如飞行员负伤，速送医院抢救；如死亡，则用棺木收尸，好好下葬。

U—2飞机残骸坠落在南昌市东南十八公里外罗家集的一片稻田里。整个机体被弹片炸得蜂窝一般。陈怀虽跳伞成功，却被弹片击中，落地时已奄奄一息。赶到现场的解放军将陈急送医院，可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按照刘亚楼的指示，二营战士用棺木将其埋葬在一座长满小树的山坡上。

陈怀被击落时年仅32岁，是国民党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在美国受训回台后，曾多次受到蒋介石的召见。他曾向蒋表过忠心说：“若飞机在台湾海峡失事，我可以跳伞；若在大陆遭击，则与U—2共存亡。”蒋介石对此大为赞赏。陈怀丧生后，蒋介石亲临台湾空军公墓为其献花培土，还将陈怀的名字改为“陈怀生”，并修“怀生堂”以示纪念。对陈的死因，台湾方面的记述是：“陈怀于1962年9月9日在江西南昌上空，侦察蒙藏地区返航途中，因座机飞行太久，引擎受高空冷空气影响而停止，乃降至同温层暖空气带，拟重新启动时，为中共飞机追击，坠地引爆座机后自杀。”

就在陈怀的飞机被击落的前十天，美国空军一架U—2飞机从南朝鲜昆山基地起飞，在对苏联进行间谍侦察时在库页岛上空“迷航”。此事再度引发苏联的严重抗议，1960年U—2飞机事件阴云重现。中国大陆上万人聚会抗议美国的霸权行动。周恩来总理曾很自信地对与会者说：“U—2前几天入侵苏联，他们只是提出警告，而我们的空军却要把这种飞机打掉！”然而美蒋方面并没有认真思考周恩来的这种警告。

南昌之战获胜，震惊中外。新华社9月9日发布消息：“美制蒋匪帮U

—2 高空侦察机一架，于 9 日上午窜至华东地区上空，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周恩来总理闻讯后，高兴他说：“很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9 月 15 日，首都各界人士一万人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击落 U—2 飞机的胜利。

当时，大陆对如何击落 U—2 飞机守口如瓶。台湾及西方的军事专家和新闻记者一直在挖空心思地猜测解放军空军使用何种武器击落先进的 U—2 飞机，虽然 U—2 飞机早在 1960 年就被苏联国土防空军击落过，可美国一直以为克格勃在飞机上做了手脚。国外许多人对中国军队能拥有击落 U—2 飞机的能力和手段持怀疑态度。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外国记者又提出这个问题。外交部长陈毅幽默地说：“我们是用木棍捅下来的。”

击落 U—2 飞机后不就，地空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离开南昌，前往北京参加空军党代会。U—2 飞机的指北针成了献给会议的一件小礼物。

9 月 21 日，开完空军党代会的岳振华和其他代表一道，在中南海怀仁堂等候中央领导领导人的接见。当毛泽东主席走进会厅时，全场掌声雷动。

刘亚楼、岳振华疾步上前，在毛泽东面前立正敬礼。周恩来急忙向毛主席介绍说：“这就是岳振华同志。”毛主席伸过大手。“岳振华同志，打的好啊！”

欲盖弥彰

陈怀驾机遇难后，台湾当局和美国方面分别发布消息，掩盖事实真相。双方都称是洛克希德公司在获得美国政府的出口执照后，将两架 U—2 飞机出售给台湾的。言下之意是整个事件与美国政府无关。

美国国务院在飞机失事传出后对外解释说，洛克希德公司曾在 1960 年下半年间，获得美国政府许可，将两架 U—2 高空侦察机卖给台湾当局，并于 7 月订立合同，12 月将飞机运抵台湾。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时核发了飞机出口执照。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这两架飞机均用于台湾当局之事，但他又承认，“可以假定”依据通常美国与盟友的情报交换方式，台湾方面取得的任何情报将通知美国国防部。

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尼特兹在电视中答复“美国何时及为何将 U—2 侦察机交与‘中华民国，空军’的问题时称，“美国政府正在审慎研究这个问题。我相信国务院将发表声明，表明是由洛克希德公司与‘中华民国，直接交涉，出售两架已取得出口证明的 U—2 飞机给台湾。”

电视台的记者追问道：“这两架 U—2 侦察机究竟属于‘中华民国，还是美国？”

尼特兹答道：“归属‘中华民国，，因为美国空军的飞机并不在中国大陆上空飞行。”

记者问：“你能不能公开表明美国是否早已知道‘中华民国’将派 U—2 穿越中国大陆？”

尼特兹答：“对此，我不便评论。”

问：“除‘中华民国，外，美国是否将 U—2 交与其它盟邦？”

答：“这我也不便说。”

问：“中共到底使用何种武器在六万到七万英尺高空将 U—2 击落？”

答：“我们假定中共可能已有地对空导弹。”

问：“此事件是否让美国感到尴尬？因为美国政府曾公开宣称不再派 U—2 穿越中国大陆和苏联。”

答：“这当然是件不愉快的事件。”

尼特兹在电视上丑态百出，欲盖弥彰。

中国人民当然不信这一套。《人民日报》发表头版社论，指责美国加强 U—2 侦察机的侦察活动，“是美帝国主义为加深远东紧张局势和加速其在世界各地的准备工作，以从事新战争的一项具体步骤。”

新华社英文电稿义正辞严地指出，“中国空军于 9 日上午击落一架入侵华东上空的美制蒋帮飞机，这是对美国侵略者的一次严重警告。”

U—2 飞机事件也引发了美国盟国舆论界的不满和谴责。日本各大报刊均以头版头条报道此事，并称这是一个可怕的警号。《朝日新闻》说，这次事件是国际局势恶化的不祥之兆，并呼吁美台停止对中国大陆的高空侦察活动。《读卖新闻》也警告说这件事将为东方阵营国家提供“有力的借口”，在联合国抨击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面对国际社会的指责和质疑，美台方面开始是死活不认账。到最后被问得无招架之功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竟耍起了无赖，“有关 U—2 飞机的问题，我们该说的都说了。我们已一再表明那是‘中华民国政府’自己的事。”一脚将球踢给了台湾。台湾方面比美国人还会赖。台湾驻美国的“大使”是死活不张嘴，叫新闻界也奈何不得。

美蒋的无赖作派更加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中国大陆到处是群众集会，抗议美国对中国的入侵行为。中国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气愤地说：“U—2 飞机乃扩展战争瘟疫的有害毒虫，无论抹什么色彩，无论是从什么地方飞起来的，都是美帝侵略的迹象。”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说：“美帝承认：提供 U—2 飞机侵入中国大陆领空，可见过去否认煽动蒋介石派兵侵扰大陆乃谎言。”

更令人震动的是被我俘虏的原国民党空军 RF101 型侦察机飞行员吴宝智亲自出台作证，揭露美蒋联合进行 U—2 飞机侦察大陆的事实真相。

在事实面前，美国政府才不得不出来做出某种姿态，缓解国内外的压力。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暗示，美国将不同意台湾方面再采购新的 U—2 飞机赴大陆执行侦察任务。（台湾另一架 U—2 已在飞行训练中坠海爆炸。）但这只是肯尼迪为缓解压力而故意施放的“烟幕弹”而已。美国在 1962 年 12 月，又将两架 U—2 飞机提供给了台湾空军，并加紧了对中国大陆核计划的侦察工作。

神州火网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美国人已经掌握了萨姆—2 导弹导航系统的工作频率，在新提供给台湾的 U—2 飞机上安装了电子预警系统，在飞临地空导弹阵地时，该系统可捕捉到导弹的信号，向飞行员示警，并通过飞机的晃动摆脱导弹的追踪。由于大陆的核计划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建有核工厂的兰州、酒泉和包头再次成为 U—2 飞机重点侦察的目标。

1963 年 3 月 28 日，一架 U—2 飞机从南朝鲜起飞，经包头、乌鲁木齐后飞至我甘肃某基地上空。在该基地的国防科工委所属地空导弹第四营两次捕

捉住目标，却由于U—2飞机已加装预警系统，未待导弹升空，目标早已逃之夭夭。6月3日，又一架U—2飞机前往兰州侦察，故技重演，四营再次失利。

两次失去战机令中央领导人很是不安。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亲自向地空导弹部队下达指示：将四个营统一部署，组成大面积有机结合的火网。按照聂帅的指示，国防科工委地空导弹部队调整部署，进行集团式设伏，但仍无法击中目标。9月25日，又一架U—2飞机在我地空导弹的火力网中穿行而过，安然归巢。

打击U—2飞机接连失利，解放军空军觉察到敌机已拥有对付导弹的手段。通过战例分析，地空导弹部队人员发现U—2飞机每次都在地空导弹制导雷达打开天线的二十秒后开始摆动，看来如果在二十秒内发射导弹，仍有可能击落敌机。

然而，按照萨姆—2导弹作战规则，打开雷达天线一般在一百公里以外，从打开制导天线到发射导弹至少需要七八分钟。为了有效地打击U—2飞机的嚣张气焰，我地空导弹二营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反复进行研究，经过数十次开机试验，终于将打开制导雷达天线的距离减至三十八公里，发射准备时间压缩到10秒以内，创造出“近快战法”。这样，U—2飞机即使接收到导弹的制导信号，也来不及改变方向迅速逃脱。

根据U—2飞机入侵的特点，空军司令部将四个导弹营重新进行集团式部署。一营进驻弋阻、二营进驻上饶、三营驻江山、四营驻衢州，组成一百六十公里长的拦截人力网面。四个营的导弹于11月1日起正式进入战备状态。

11月1日清晨，一架U—2飞机从桃园起飞。飞行员叶常棣是位很有实战经验的王牌飞行员，曾两次当选为“克难英雄”，一次获“飞虎奖章”，并受蒋家父子多次接见。这次是他第四次驾驶U—2飞机赴大陆侦察。

在叶常棣飞向大陆的同时，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成钧正在上饶召开作战会议。会议期间，叶驾驶飞机进入大陆后沿着导弹火力网的边缘向西北方向飞去。成钧根据以往U—2飞机的飞行规律，断定敌机回航时还会经过我导弹设防区，便立即下令地空导弹部队做好打击回窜之敌的准备，同时强调，各营不需抢功一律在距离三十七公里以内打开制导雷达天线。二营营长岳振华会后马上驱车返回营部，并在车内用无线电向部队下达首长指示：“近快战法，三十七公里开天线。”二营官兵立即做好了发射准备。

完成侦察任务的叶常棣果然驾驶飞机向上饶飞来。这再一次为二营创造了立功机会。二营作战参谋陈辉亭根据敌机航速推测U—2飞机已到三十五公里处，已超过作战会议要求的三十六公里。岳振华毫不迟疑地命令：“开天线！”

天线打开后，三个跟踪显示器上都没有发现目标。指战员们正全神贯注地在屏幕上搜索。

“就是它！”高低角引导显示器右下端半个米粒大的信号露出了。操作手赶紧打手轮锁定目标，导弹进入自动跟踪状态。八秒钟内，三颗导弹全部升空：

U—2飞机内警报声响。已意识到危险临近的叶常棣急做转弯机动，躲过第一枚导弹的攻击，可第二发导弹接踵而至。随着“轰”的一声巨响，U—2飞机空中解体。叶常棣被甩出座舱，失去知觉。U—2飞机的残骸坠落在广丰县万罗山。

叶常棣毫无知觉地在空中坠落了两三分钟，才苏醒过来。他赶紧打开降

落伞，降落在一个小山丘上。落地后，他还想逃，可双腿和两臂已被弹片击伤，无法动弹。“完了，真要被共产党剥皮抽筋了。”正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解放军和民兵包围过来。叶常棣束手被擒。

11月3日下午，刘亚楼和成钧赶到医院，同正在接受治疗的叶常棣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刘：你是广东人，多大了？

叶：31岁。

刘：你放宽心。我们没有必要杀死你。

叶：在那边听说被你们捉住是要抽筋的。

刘：你在被击中前，可以看到台湾了吗？

叶：看到海了，眼看就要到家了。

刘：被打时，有什么感觉？

叶：一震就抛在空中，座舱解体了。

刘：飞机有防御武器没有？

叶：没有。凭它的高度优势，你们的飞机对它没办法，唯一怕的是飞弹。知道大陆上到处有飞弹阵地，我们的航线想办法避开。

叶常棣被击落的当天下午，国民党空军总部宣布：“我空军高空侦察飞机一架于11月1日下午在匪区上空执行例行侦察任务时失事。”矢口否认叶是被解放军击落的。五个月后，国民党空军正式宣告叶常棣“壮烈成仁”。国民党军队出版的《忠烈传》中称叶常棣“忠心可问天”。

大陆方面对生俘叶常棣一事也秘而不宣。除从其口中得知U—2的一些侦察机密外，最大的收获是在叶的飞机残骸中发现一个新的天线，并找到了名为“12号系统”的电子预警装备。显然，叶常棣在被击中后没有机会按下飞机里的装备自毁钮。航天工业部和国防科工委电子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抗干扰研究小组”将U—2飞机上的这套“12号系统”安装在伊尔—12飞机上进行操作实验。发现只要收到导弹雷达的照射讯号，在导弹阵地六十公里外，这套系统就会亮起省油灯警告飞行员，进入六十公里以内后则会亮红灯指示飞行员尽快逃离，并配有高频尖叫声示警。

大陆专家弄清楚了“12号系统”的功能，想出了以重复频率的反制方法，以假频率跟踪敌机，“12号系统”不会反应，等导弹发射时，再改用真频率引导导弹，这时“12号系统”反应已来不及了。大陆将这种重复频率电子反制系统称为“反电子预警1号”。国民党空军的“头号王牌”李南屏就栽在这套“反电子预警1号”上面。

进入1964年后，人民解放军仍在寻机打击U—2飞机。5月8日，屡建战功的地空导弹二营奉命撤出内蒙古土默特旗阵地，风尘仆仆，挥师南下，前往福建漳州设防。

就在大陆空军张网待猎的同时，美台方面也在策划新的侦察行动。六月间，台湾空军派出“头号王牌”飞行员李南屏，驾驶U—2飞机转飞菲律宾库次角空军基地待命。李南屏受领的主要侦察任务是：大陆第一次核试验进入最后现场组装阶段的有关情报和大陆军援北越的补给情况。李南屏在台湾军界赫赫有名。早在1957年，李便驾驶一架RF—84F侦察机飞越台湾海峡，对上海进行高空侦察，在被人民解放军战机击伤后，李南屏竟侥幸逃命。1963年又赴美接受驾驶U—2飞机的训练。回台后，曾十二次驾U—2飞机对大陆进行间谍侦察。蒋介石先后四次召见这位“克难英雄”、“飞虎英雄”。

7月7日，李南屏驾驶U—2飞机飞向大陆。为了配合他的行动，台湾方面先后出动一架U—2和一架RF—101侦察机，窜入大陆，借以分散解放军的防空注意力。但这些花招早已被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识破。

在漳州导弹阵地上，已升为副师长的岳振华端坐在指挥车上。这位解放军地对空导弹指挥官担任地空导弹营长后，战功卓越，半年前，被国防部授予“空军战斗英雄”称号。此时的岳振华正全神贯注地捕捉战机。

12时25分，李南屏驾驶U—2飞机进入大陆后，直奔漳州而来。

12时36分，U—2飞机飞至距导弹阵地三十二公里处。岳振华一声令下。三发萨姆—2导弹勃然腾空。

U—2飞机上的预警系统发出警报。看到仪表盘上高频重复脉波信号灯急闪不停，李南屏一边向台湾惊呼：“12号高频灯亮起！”一边操纵飞机以30度的大坡度转弯脱离，但为时已晚。解放军的“反电子预警1号”采取了反预警措施，未等李南屏逃脱，近在咫尺的导弹早已轰然爆响，李南屏的飞机在万米高空粉身碎骨。

按照台湾国民党空军的规定，驾驶U—2飞机侦察大陆十次后即可转飞其它机种。李南屏自恃技艺高超，打破常规，死不下岗”终于在不吉利的第十三次飞行中命归黄泉。

李南屏的飞机残骸坠于漳州东南七公里处的红板村，李死于座舱内。解放军空军在检查敌机残骸时，发现了两个谜：

一是这架飞机座椅下没装弹射炸药。是美国飞机厂没安装，还是飞机起飞前被人拆掉了呢？难道美蒋方面担心他们的“超级王牌”握有更多的秘密，而不希望让其坠入敌手？至今，此事仍无答案。

二是，在座舱中毙命的飞行员身上没有携带任何证件，仅在其手上发现一枚刻有“叶秋英”字样的金戒指。当时，解放军对李南屏的身份一无所知。只是在询问叶常棣后，才知道叶秋英是李南屏的妻子。大陆方面这才知道打下的竟是国民党空军的“头号王牌”。

逝去的地平线

1964年中，美国情报机构判断中国将在10月初引爆第一颗原子弹。美方猜测中国有可能在国庆节前完成这一工作。但因原子弹爆破需要一个理想的天气“窗口”，所以大陆方面将引爆时间推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在新疆罗布泊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奇怪的是这回，美国方面没有让台湾空军出动U—2飞机，而是亲自出航，搜集核尘样本。

美国对中国的核尘样本分析很是吃惊，因为他们发现中国人是用铀235作核裂变材料，而非美国人事先估计的钚。为了更准确地掌握中国大陆的核发展计划，美国人认为有必要对兰州和包头核材料厂进行更密集的高空监测，并在U—2飞机上安装红外线夜间摄影机和电子干扰“13号系统”。全自动的“13系统”只要接到大陆空军的雷达讯号，就开始传送错误的讯号，误导地空导弹的追踪雷达，编造U—2飞机的航向、高度和速度，让萨姆—2导弹误入歧途。

“13号系统”本来是装备在B—52轰炸机上的，后古巴导弹危机后，洛克希德公司将其稍加改造，装在经常飞临古巴的U—2飞机上。1964年9

月起，中央情报局开始在桃园基地的U—2飞机上安装这套设施。

1964年11月初，“黑猫中队”的王锡爵驾驶装备红外线摄影机和“13号系统”的U—2飞机向兰州飞去。可这次U—2的夜间首航出师不利。飞行三小时后，机上发生机械故障。王锡爵被迫返航。虽然这次夜间飞行有惊无险，但却暴露了U—2飞机的夜间行踪。解放军空军由此得知U—2飞机还能在夜间飞行，随即加强了夜间戒备。

11月26日凌晨，王锡爵再次出航。5时10分，U—2飞机距预定的侦察目标仅有五十公里，机上的导弹预警灯忽然亮起，王锡爵意识到自己已进入解放军的导弹防空网。驻守在兰州上中堡的导弹二营动作迅速，三发导弹直射夜空。几乎就在同时，U—2飞机上的“13号系统”也开始对制导雷达进行角度欺骗式干扰。王锡爵正要驾驶飞机转离险区，一道白光忽然射进座舱，他被刺的睁不开双眼。原来是萨姆导弹推进器喷出的火焰。由于有“13号系统”的保护，导弹没有击中U—2。惊魂未定的王锡爵急忙将飞机高度陡降3000米后再重新拉起，扳定自动驾驶仪沿原路返回。曙光初现，当桃园机场的跑道出现在眼前时，王锡爵才松了口气。机上的红外线摄影机虽未拍到地面目标，却将截杀王锡爵的萨姆—2导弹收进了镜头。

兰州失利，引起解放军空军高层的注意。成钧副司令员根据罗瑞卿总参谋长关于“要认真找出没有打好的原因，接受教训”的指示，当天就赶到兰州，同各营干部总结教训，决定在制导雷达上加装新研制的反干扰系统，以对付U—2的欺骗式干扰系统。

1965年1月8日，王锡爵再次升空，对兰州附近一处核工厂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拍照，却没遇到险情。

1月10日19时56分，“黑猫中队”的张立义驾驶U—2从山东沿海窜入大陆，向包头进发。临行前，上司曾告诉他这次航线是一条崭新的航路，决不会遇到解放军的导弹。可事实上，解放军早已在张出发前便获得情报，并做好截击准备。

U—2飞机经黄驿、大同，很快便进入内蒙古地区。张立义看了一下还有一刻钟就要到达目标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导弹正在下面等着他呢。

21时15分，三发萨姆导弹喷射的火舌划破夜空，张立义大难临头了。

在20000米的高空，张立义始终未接到“12号预警系统”

的报警。原来解放军的一反电子预警2号”装置已使U—2飞机的护身符失灵。面对显示器上出现的乱糟糟的小亮点，张立疑惑不解。因为如果遭到导弹攻击，显示器上应是一道平稳的亮线。正当他准备打开“13号系统”时，一团火光已窜到机翼下，整个机身剧烈抖动，密封的座舱内一片漆黑。张立义明白飞机已被击中，便拉开座椅的弹射装置开关。然后，他便失去了知觉。

张立义在寒冷的地面苏醒后，发现四周都是搜索他的人影，便躲藏起来。等人们散去后，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中走了八个小时。天亮时，饥寒交迫的张立义再也走不动了。忽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座土房，就鼓足劲头，爬了过去。

“我冷……让我暖和一下。”他朝房里正做饭的农妇哀求道。农妇见到一身飞行服的张立义，立刻明白了他的身份，便稳住他在家中吃饭后，跑出去报告了村里的民兵。

不一会儿，张立义就被押上毛驴车，成了民兵的俘虏。

在此后的近两年时间里，桃园基地的U—2飞机又多次潜入大陆领空，却未受任何打击。美台方面甚为得意。有人甚至认为中苏关系恶化，中国空军已失去导弹来源，无力同U—2抗衡。殊不知，在此期间，大陆已成功地对萨姆导弹进行仿制，并在此基础上，制造出“红旗—2”地空导弹。空军组建了更多的地空导弹部队，一张红色防空网早已严阵以待。1967年9月8日，一架U—2飞机又从桃园基地起飞，侵入我东南领空，准备侦察嘉兴机场。驻沪空军导弹部队接到敌情后，立刻做好迎敌准备。U—2飞机飞临嘉兴机场后不断向地面的制导雷达施放干扰电波。当U—2飞机与导弹阵地相距三十二公里时，三发“红旗—2”导弹发射升空，将这架U—2飞机击落，飞机内的国民党空军少尉飞行员黄荣北眼前一片漆黑，地平线在他脑际中消逝，他成了大陆空军击落的最后一名“黑猫中队”飞行员。进入1968年后，国民党空军停止使用U—2飞机对大陆进行纵深侦察。台湾空军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U—2飞机合作也暂告终结。

第二节 印支逐鹿

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半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逐步投入印支战争。为捍卫我南疆的和平与安宁，支持印支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共高层又一次决定与美军展开正面交锋。于是八万大军出兵友谊关。美国陷入印支战争的泥潭，国内外反战情绪急增，尼克松当选总统后被迫开始改弦易辙，中美关系的大变动已在酝酿之中。

“特种战争”

二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垂涎印支半岛上的越南。当越南人民打败法国殖民者后，1954年9月，美国政府却破坏日内瓦协议，非法将越南南方划入由美国实际操纵的东南亚国家集团“保护区”。1955年后，大批美军顾问进驻南方，逐步取代法国人在南越的统治地位，并扶植起由吴庭艳任总理的傀儡政权。开始了血腥的“诉共”“灭共”运动。17万越南人惨遭杀害，40多万人被囚禁。在美国人和伪政权的屠刀下，南越人民于1959年开始了反美爱国武装斗争。1961年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将各地的人民武装统一为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美国为防止吴庭艳政权垮台，于1961年将100名特种部队官兵投放越南南方。并由肯尼迪总统策动了对越南南方的“特种战争”。

风度翩翩的英俊总统肯尼迪除了引人注目的潇洒外表外，同美国的许多政客一样，对共产主义恨之入骨。他曾指责艾森豪威尔将中国大陆拱手送给共产党，嘲讽杜勒斯对“红色潮流”放任不管。他对甫越发动的“特种战争”是由美国出钱、出枪、出顾问，协助南越伪军进行的针对民族解放力量的“反游击战”。

1962年2月，美国在西贡成立了由哈金斯为司令的“美国驻南越军事援助司令部”，指挥对解放区进行蚕食和清剿。但美国人的“特种战争”真正含义是由美国人教唆越南人打越南人，而不愿将更多的美军投放到战场上去。

肯尼迪发动的“特种战争”在南越遇到严重挫折。据南越人民解放力量统计，在“特种战争”阶段，解放力量歼敌22万，其中美军3300人。

肯尼迪反共出师不利，也准备从越南撤军。可1963年11月，一名刺客的子弹要了他的命。收回“特种战争”的愿望也就同归九泉了。而接其任的约翰逊的扩张野心远在肯尼迪之上，他一上台就开始考虑调整对越作战方式了。

北部湾事件：

1964年6月1日，檀香山。

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驻地的会议室俯视当年日本人曾袭击过的珍珠港，一切都显得非常清晰，美丽的港湾躺在太平洋，安详恬静。

会议室里的气氛与风和日丽的珍珠港迥然不同。显得阴郁、沉重，这里的人们正为越南的处境忐忑不安。他们想从困境中开辟溪径，扭转每况愈下的局势。

参加会议的有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康、美驻西贡大使洛奇、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费尔特海军上将和即将上任的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

述有一位参与者，他正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

他叫泰勒：

泰勒在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中曾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后担任美陆军参谋长。在文森豪威尔执政时，从陆军退休。肯尼迪上台后，这位退休者又被召回，充当了白宫军事顾问。他有他的军事见解，他向肯尼迪强调，美国陆军必须准备打小规模战争，反击共产党的“民族解放战争”策略，这给肯尼迪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约翰逊上台后，对他颇为赏识，任命泰勒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这位一直在军中谋职并占有高位，曾制定和实施美军多次军事行动的泰勒，退休后被召到檀香山专门参加这个研究越南局势的会议，约翰逊不是没有其用意的。

这次会议确定了“逐步扩大”侵越战争的计划。6月20日，威斯特摩兰接替哈金斯的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司令的职务。7月初泰勒被任命为美驻西贡大使。至此，美国完成了将越南战争由“特种战争”转为局部战争的作战方针调整和必要的准备工作。

威斯特摩兰自上月任司令后雄心勃勃，想干出一番事业来，另一方面他又忧虑重重，前任美驻南越大使洛奇对他的一些军事主张并不那么热心，致使他对共产党的镇压和进攻的步骤不得不放慢。泰勒上任，他抱有极大的兴致。他了解泰勒，泰勒对他也早有好感。早在1944年，泰勒当空降师师长时，就曾通过他的副师长要威斯特摩兰到他的手下任职。威斯特摩兰早就想当一名伞兵，但未能如愿。可是他俩的交往却一直保持着。泰勒到达西贡，威斯特摩兰出面接驾，并很快驱车登门拜见。泰勒的上任使他增加了镇压和屠杀越南劳动党扑灭革命火焰的信心和力量。他称：“由泰勒将军出任驻西贡大使，这是非常合适的。他给这个职务带来了丰富的军事经验，还带来了卓越的才华和巨大的机智。”

泰勒走马上任后就咄咄逼人地说：“我要对美国政府在越南的一切行动担负并行使职责，我希望人们清楚地了解，这种全面的职责包括在南越采取的全部军事行动，并视需要可行使军事方面的指挥和控制权。”

1964年8月2日。

位于中国雷州半岛，海南岛与越南之间的北部湾宽阔海域。片片渔帆点缀其间。

越南人民军海军正巡逻在海防线上。

突然，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和“特纳·乔伊号”闯入越南领海。越南海军向美军舰发出警告。

美舰置之不理，仍如入无人之境，昂着舰头，继续向越南海面行驶。

越南巡逻舰被迫采取行动。顿时，北部湾炮声轰鸣，水柱冲天。美舰见势不妙，仓皇逃窜。

白宫情报值班官接到情报后，立刻向约翰逊汇报。约翰逊下令两艘驱逐舰重返北部湾。并从台湾海峡和香港调了大批舰艇，云集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海。

8月4日夜。北部湾雾海漫漫，能见度很低，美国军舰又一次进入越南

北方领海，炮口对准越方。

机会终于来了！美国人很高兴。两军交上了火。西半球，美国政府立即声称：美国海军遭到越南海军袭击，两艘舰艇被打沉。约翰逊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发表一系列讲话声明，并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借此，他从美国国会获得了在东南亚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权。

当晚，约翰逊就在电视上发表演说，他已命令美军轰炸越南北方，对那些对美军的敌对行动“不但要以戒备、防御来对付，而且必须给予积极的回答，在我向你们说话的时候，正作这种回答，现在正在对北越的这些敌对行动中使用的炮艇和某些辅助设备采取空中行动。”

8月5日，美国出动大批飞机疯狂轰炸、扫射越南北方。越南军民奋起还击，防空部队当即击落美机八架，击伤三架，俘虏一名美军飞行员。

是夜，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美国今天下午先后出动六十四架次飞机袭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鸿基、禄昭、福利、广溪等四个“鱼雷艇基地”和“油库”。

麦克纳马拉眼看增兵攻击越南的时机已到，即在招待会上宣布美国采取一系列加强太平洋地区兵力的步骤：一、把第一舰队的攻击航空母舰特混群调到西太平洋；二、把截击机和战斗轰炸机调到泰国；三、把战斗轰炸机调到泰国；四、从美国调遣截击机和战斗轰炸机的中队到太平洋前进基地；五、把反潜艇的特种部队调到南中国海；六、使经过挑选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进入警戒状态，准备随时出动。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北部湾事件”

毛泽东镇定自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64年8月6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中国政府郑重声明：“美国点起了侵略战争，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动权力，一切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也取得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反侵略的行动权力。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坐视它遭受侵略。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

8月8日，北京近百万工人、农民、机关于部、民兵、街道居民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8月10日，北京举行十万人的盛大集会，支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中共中央副主席、总理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陆定一、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越南驻中国大使陈子平等出席了集会。

约翰逊无视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他继续增兵越南。到1965年的6月8日，他公然宣布美军直接参战。战争再度升级。后来侵越美军增加到54.3万人。美国在越作战费用开支越来越大，到1969年财政年度达到300亿美元。伤亡人数骤增，到1968年下半年，每周平均死亡200多人，仅这一年美军死在战场上的就有14592名。

1965年2月7日，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取得波来古大捷，打死打伤美军234名，击毁击伤美机三十一架，摧毁和严重破坏美军宿舍五十二所。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火速赶到波来古机场，只见一片飞机残骸，一片破败景色，

他面带黄色，不禁叹道：“真糟糕。太糟糕了！”

随后的两天，美国飞机和舰艇，大规模地轰炸扫射越南北方的洞海市和广平省的其他地区以及昏果岛和永灵地区。

2月10日，中国首都北京举行一百五十万人集会示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军民一道愤怒声讨美国侵略罪行，坚决支援越南反美斗争。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吼声震天动地，红旗飘扬，标语牌林，十多个巨大的红色气球在广场两侧腾空而起，上面悬挂着醒目的巨幅标语。天安门城楼前，一幅长达几十米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笑吟吟地与大家握手。北京市市长彭真、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越南驻中国代办黄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阮明芳等亲切交谈，同声谴责美国约翰逊政府的强盗行为，表达中越两国人民永远并肩战斗的坚强意志。毛泽东朝东望望，朝西望望，先后与黄北、阮明芳及其他领导相见握手，显得那样的自在，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的笑容包含着对美国人的不在乎。过去他挥手打败了由美国人支持和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在朝鲜直接与美国人交锋，美国人不得不承认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与一个错误的对象，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你美国人再来，无非是再打一场朝鲜战争。

毛泽东笑得自如、自信。

胡志明秘密访华

1965年春，柳州。一列火车咔嚓咔嚓地向北行驶。胡志明这次秘密访华是请中国援越抗美，上次秘密访华是请中国援越抗法。胡志明记得，1950年1月秘密访华，后于2月初与周恩来一同访苏。当时毛泽东也在苏联访问。胡志明向斯大林讲述了越南人民正进行的反法斗争，请求苏联提供援助，特别是武器弹药。苏联未予理睬。1950年至1954年的越南抗法斗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11万6千余支，火炮420门，大批配套的弹药，以及通信和工兵器材等。黄文欢在回忆录中写道：“1950年到1954年抗法战争期间，中国是唯一向我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我国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1956年，中国刚定型生产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在中国军队还未装备的情况下，优先援助越南5万支。1960年，生产了重型舟桥，也首先援助越南。另外，从1953年至1963年，中国还为越南人民军组建六个高炮营、一个工兵团、一个舟桥团、一个坦克团和一个歼击团，补充了轻武器、汽车和通信、工程及观测器材等武器装备。抗法斗争依靠中国支援，抗美救国斗争还是要依靠中国支援。中国讲情谊，有求必应。

列车途经柳州，胡志明又想起1954年7月3日到5日在柳州度过的日日夜夜，当时正值日内瓦会议期间。那时的柳州没有这么繁华，市民的衣着没有这么华丽，但人们仍是那么的真诚和善。那次他与周恩来在这里对日内瓦会议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坦率诚挚地交换了意见。越南那时处在十字路口，可能和，可能战，争取和准备战。双方取得一致意见。事后，胡志明访问北

京，又去苏联，征求苏联老大哥的意见。日内瓦会议期间，越南、中国、苏联为一方，法国、英国、美国为一方。胡志明一直视社会主义阵营为依托，他十分珍惜阵营内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提出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时，他对中国领导人说，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你们吵起来，我们怎么办？胡志明 1969 年去世，他最后看到的仍是中苏争吵，听到的仍是乌苏里江上的枪炮声。

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与胡志明，与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互相商洽，力争主动。会议于 7 月 20 日结束，以北纬 17 度线划分了越南南北方，两年后举行大选。胡志明对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很满意，赫鲁晓夫很满意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即向越南劳动党和政府致电祝贺，但会议期间不和周恩来握手的杜勒斯却对此不满意。

春天的长沙风和日丽。

毛泽东洗漱完毕，走出房间，舒展一下身体。他晚间工作到凌晨的习惯在战争年代养成，到了和平建设国家的岁月里，仍未改变。夜深人静，思维纵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都是他在这静静的深夜里思索决断的。

今天，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要秘密来访，毛主席要在这里会见他。

胡志明要谈什么？胡志明会提出什么要求？毛泽东思索着。越南民主共和国是邻国，友好邻邦。胡志明是位真诚坦率的朋友。早在中国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多年在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道革命，一道参加抗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与胡志明的私人感情很深。

上午 10 点半，两党主席握手拥抱，亲切会见。

毛泽东早已知道了越南局势，开口便说：“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来自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说。”

毛泽东乡音很重，但胡志明听得懂。胡志明会汉语，会广东话，还会一点上海话。他向毛泽东叙说了一些越南情况，就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

胡志明从中山装口袋里掏出的是一张绘制着越南河内以北要抢修抢建十二条公路的示意图……

1965 年 4 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等领导人，受胡志明委托，率党政代表团到达北京，要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

4 月 12 日和 21 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发出指示和作出决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4 月 21 日，罗瑞卿总参谋长与武元甲会谈。

4 月 22 日，杨成武副总长在北京与武元甲举行第二次会谈，就中国援越部队进入越南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洽商。

5 月的北京，繁花似锦。周恩来总理从车上下来，就闻到一股扑鼻的花香，这是米兰的郁馨。平素，他喜爱花卉。在中南海办公间隙、国事访问中，他时常鉴赏评说。今天，他顾不上花香袭人，迈开矫健的步子向会见厅走去，浅灰色的中长毛料裤腿呼呼生风。

他走到会见厅时，一位大个子早在门口等候。这位大个子就是毛泽东曾经多次夸奖过的“天塌下来不要紧，有大个子顶着”的罗瑞卿。

站在罗瑞卿身后迎候总理的是杨成武。

罗瑞卿迎上前去。

周恩来握住罗瑞卿的手。

这是5月25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罗瑞卿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在这里接见越南交通代表团会谈的中国代表团成员。

周恩来走进会见厅，全体都站了起来。

他用浑厚的淮安普通话招呼大家坐下。

中越两国交通代表团会谈是由胡志明从口袋里摸出的那张条子引起的。

毛泽东爽朗地答应了胡志明的要求，修建河内以北的公路。毛泽东让周恩来尽快落实这件事。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话。立即与罗瑞卿、杨成武商定，继续由军队承担这项工程。

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会同李天佑副总长等已经拿出了初步方案。他将代表团的准备工作情况简单扼要地向总理作了汇报。他和罗总长、李天佑副总长经过研究，拟派大批部队出国，一些重大问题必须请中央、国务院决断。汇报后，杨成武请总理指示。

周恩来向大家分析了国际形势，继而转向要交待的实质性问题：“关于交通问题，范文同总理曾经谈过，由于美帝的封锁轰炸破坏，现在支援南方的海运减少，公路运输也减少。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继续组织海运，同时必须扩大下寮走廊，扩修支援北方的路。”

大家静静地听着，许多人作记录。周恩来呷了一口清茶，继续说：“这次胡志明主席带来一个公路图，要我们帮他修12条公路。”

他稍微停顿，若有所思地说：“这些公路肯定不能同时并举，应该按照经济建设和作战需要综合考虑，但应以作战需要为主，这是轻重的问题，还有因地形地质的不同，好修和不好修这个难易问题。为了应急，有的道路可以先修简易公路，粗通即可，但又不能太简易，以后再逐步加固。总之，是按轻重、难易、快慢、粗固八字方针来考虑安排计划。交通部等有关部门要用支前精神来办事。由总参谋部来佳帅，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积极支持，由罗总长和杨成武、李天佑副总长抓总。”

他神情严肃，话语句句敲定，不容半点迟缓和马虎。大家认真严肃地聆听着他的明确分工。

他坐在沙发上，一手弯曲地放在灰色中山装前，一手指划着：“还有水路，对越方要求，应予满足，敌人总不能都封锁住，不管是陆路、水路，损失都会有，但只要想办法，总是可以送东西过去的。总之，要改变认识，就是支前，一旦决定，就要坚决执行一定会学到许多新东西。拿我们的勇敢和智慧学会反对敌人轰炸的新本事。”

坐在一旁的杨成武摊开越南北部抢修抢建公路的示意图，提出两种兵力部署方案：“现在具体现场勘察团还没有去，但目前分析，一种方案是十二条路展开作业，派兵十万，另一种是抢修抢建主要的5—7条公路，派兵八万，视以后进展情况酌定增减兵力。”

周恩来、罗瑞卿与杨成武等围在地图上研究起来。最后决定：与越南代表团会谈后再定。我们倾向于后一方案，抓住重要的线路先突击抢修。

杨成武向周恩来提议：“总理，能否由中央、国务院出面成立支援越南的一个小组或什么机构，便于统一组织行动？”

周恩来当即决定：为了统一组织支援越南，和统一处理有关援越的涉外事宜，即由中央、国务院和军队有关部门组成“中央国务院支援越南小组”，负责经常具体组织工作。由杨成武、李天佑任正副组长。

另，由李先念、薄一波、罗瑞卿、刘晓、杨成武、李强、李天佑等七人组成领导小组，对中央负责，掌握援外越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支援任务的决定和新增项目的审批事宜。

胡志明从口袋里摸出的这张示意图，调动了中国的8万大军。

八万大军跨出友谊关

暮色笼罩大地。

中国西南边境凭祥市至友谊关的大路上，停着经过严密伪装的漫长车队和各种火炮。夜，静悄悄的，没有车灯，没有喧哗。路旁树梢上鼓噪的蝉声此起彼伏，打破了这静谧庄重的气氛。漫长的车队在等待。偶尔有一、二辆摩托车从汽车、炮车边急驶而过，仿佛是茫茫夜色中滑过的流星，很快就消失了。

车上端坐着一排排头戴盔形帽、身穿绿色帆布装、脚蹬用轮胎剪就的斜插两条胶带的“抗战鞋”的士兵，他们怀抱新式冲锋枪、高平两用机枪，一条两用薄被和一套换洗军装打成的小背包垫在身下。

这是一支庞大的越南人民军摩托化队伍？

可是所有的军人都没有军衔。

车上渐渐骚动起来，有的用刚学会的几句英文说：“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随之是一阵轻轻的笑声。

大伙七嘴八舌地互相帮助纠正发音，他们用中国汉字注音，英语说不连贯，听起来很别扭，但是这批年轻军人那威武的神态、豪壮的语气，又令人肃然起敬。

友谊关城楼下层，一位穿越南人民军服装的军人双手握拳，跑步前进，腰间扎着一根武装带，身侧的手枪套随着他的步履一颤一颤有节奏地摆动着。他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几位老将军前，立定，举手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报告首长，我援越部队二支队第一梯队整装待命。请指示。”

这位军人姓王名辉，41岁，中等身材，两眼炯炯有神注视着老将军。

他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某基地副司令员兼工程建筑第53师师长。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雄风犹存。组建援越部队二支队时被任命为支队指挥部副主任兼参谋长。此时此刻，他精神抖擞，满腔激情。他感到自豪，他感到这是军委对他的信任。马上要率领中国第一支援越部队出关，在这“报告”之时，心头的热血阵阵地上涌。

几位老将军还了庄重的军礼，向他走了过来。

一位老将军首先握住王辉的手。他看着王辉抖擞的姿容和待命的神情；轻轻地却又是一字一句他说：“王辉同志，我代表军委、三总部来欢送你们！你们去执行光荣的国际主义任务——援越抗美，希望你们为国争光！并预祝你们凯旋！”这位老将军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他说话时也显得很激动，字字句句落地有声。

刘志坚看了一眼身材魁梧的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渠，陈士渠握住王辉的手紧紧地摇了摇说：“我老了，不能随你们一道分享这个光荣，我向你们

保证，当好你们的后勤部长。只要你们为祖国争光，所需要的物资，我们一定送到。祝你们光荣而去，胜利而归！”

公路上汽车、炮车马达轰鸣，无数车灯撕开夜幕，照向前方。这只部队越过友谊关，跨进越南同登，按指定路线向各集结地开进。

时为公元 1965 年 6 月 9 日晚 8 时半。

友谊关，坐落在广西边境城市凭祥市西南 16 公里的地势险要的山谷深处。中国北有山海关，西有嘉峪关，南有友谊关。友谊关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至今已有 600 年的历史。明朝永乐年间更名为镇夷关，清初改为镇南关。1885 年关楼被法国侵略者炸毁，战后重建关楼二层。抗日战争时期又被日寇焚毁。1949 年 12 月 1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镇南关。1953 年经中央政务院批准，把镇南关改为睦南关。1957 年重建关楼三层，1965 年改为友谊关。陈毅亲笔书写“友谊关”三个刚劲有力的大字。用大理石精心雕刻，镶嵌在关楼拱式城门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关楼上迎风飘扬。关楼城墙左连左辅山，右接金鸡山，峰峦峡谷，地势险峻。关楼四周的榕树、青松、翠竹，高大茂密，郁郁葱葱。白墙绿树烘托着巍巍关楼房，使古老的雄关显得格外雄伟壮观。此刻，这一切都被夜色笼罩着，只有连绵的车灯打在关楼的城门上，人们才感到——我们要出发了！我们要告别祖国了！

出关时，与王辉同乘一台指挥车的是越南人民军东北军区黎副政委，他代表越南政府和军队先期到达南宁迎接中国援越部队。他们俩用中国话亲切地交谈着。黎副政委主动地介绍美国飞机可能空袭的情况，一路上经过的主要地点及当地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王辉也将我二支队先头部队的人员、装备配备一五一十地向黎副政委汇报，并请东北军区领导指导、帮助我们。他俩促膝交谈，亲如兄弟。

车队进入凉山。越南军民在夜里列队鼓掌欢迎中国援越部队。王辉和黎副政委下车走向人群。越南总参作战局长、越东北军区段政委激动地前来握手拥抱。来欢迎的男女老少向战士们送开水、香蕉和香菠萝。中国军队大部分是北方人，从未见过香菠萝，更不只该如何吃。车后挡板边堆了许许多多。姑娘们还是一股劲地往车上抛香菠萝。年轻的战士此时此刻洒下了感激的泪花。

车队在越南狭窄的公路上行驶。突然几道闪电劈开夜幕，随之闷雷在车顶上炸响，大地震颤。雨点僻里啪啦地敲在车篷、炮衣上，很快就紧锣密鼓。干部战士怀抱手中的武器，一个挨一个地靠在车里，随着越野车的颠簸而摇晃。大家没有睡意，出国头一夜，不知会发生什么意料不到的敌情，警惕性都很高。不准抽烟。严格控制灯光。只有黄黄的车灯在雨幕中扫描，巡视线路。

到了蒙阳，越南东北军区铁司令、毕副政委和广宁省的领导冒雨站在十字路口迎接中国军队。铁司令是王辉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故情笃厚。

越野指挥车在雨夜中穿梭。王辉手握着扶把，望着雨蒙蒙的黑夜，不觉想起上月 1 日他率先遣工作组来到河内的情景。那时刚到河内就受到一批老同学的热烈欢迎，像刚才的铁司令一样。有的老同学到越南南方去了，他们也代为介绍情况。先遣工作组在越南国防部炮兵、工程兵负责人和东北军区参谋长陪同下到吉婆、万华、八门、克桂、表仪、杜拉、姑苏、海防、鸿董、锦普等岛屿和港口要地进行现场勘察，确定我援越 2 支队的兵力部署，选择登岛码头，集结地点和开进路线。那时是白天进入越境的。越南北方城镇乡

村被美国飞机狂轰滥炸后的残垣断壁、越南军民抗美救国的英雄气概和光辉业绩，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夜沉沉，雨淋淋，灯闪闪，车隆隆。

长龙般的摩托化部队全速前进，他们在与美帝国主义妄图进攻北方的部队抢时间。

中国援越的先头部队二支队分三路向越南开进。中路从北海港登舰向吉婆岛开进。大量的火炮、工程机械昂首屹立在甲板上，舰艇全副武装，随时准备迎击美国从空中、海上的突然袭击。中国海军的海运登陆艇也像离弦之箭，在茫茫夜色的掩护下，组成战斗序列，向越南北方的锦普、鸿基等港口劈波斩浪，奋勇前进。

胡志明轻舞太极同一时刻，湖南长沙郊外。

一座不被人注目的寓所里，灯光明亮，柔和的光线透过淡蓝色的窗纱，透过明洁的玻璃，洒在室外草地上，一位老人正在夜风中打太极拳。他衣摆宽松，一抬一推，一招一式，缓慢稳健，如行云流水。他前额宽阔，眉宇和善，神情安详，一缕长须飘在胸前，颇有长者风度。

他是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胡志明自 50 年代开始就睡眠不佳，周恩来、贺龙派中国太极拳高手到河内，给他传授太极拳。从此他坚持锻炼，睡眠好了许多。

可是他政务繁忙，日理万机，操劳国家大事，又常常忘记打太极拳。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扶持傀儡政权的同时，蓄意制造“北部湾”事件，袭击越南沿海港口轰炸北方和平的城市、乡村，屠杀越南人民，令他痛心疾首，更无心于太极拳了。

他这次秘密访华，在长沙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又在董必武的陪同下，于 5 月 21 日上黄山作短期休息疗养，落榻在环境清幽的观瀑楼。

他还是穿着那身米黄色的中山装，还是那双“抗战鞋”，和董必武并肩行走在青山绿水间，他俩一边观赏一边交谈，山风徐徐，有种清新之感，不像刚才上山时那么发闷，山外青山天外天，天地这么开阔辽远，景色这么幽静迷人。

他俩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来到瀑布前，飞流直下，疑是银河落九天。瀑布落涧，发出隆隆巨响，腾起滚滚白雾。

胡志明立在瀑布前，两眼凝视，开始他觉得颇为新奇，渐渐地，他耳边好像是另一种声音在回荡，仿佛是美国飞机在轰炸越南城镇乡村，硝烟弥漫。

“董老，咱们走吧！”刚停留几分钟，胡志明神情有所焦虑地对董必武说。

回到住所，董必武特意在胡志明的房间里多坐了一会儿，宽慰一番。

住在这幽清之处，胡志明感到寂寞。第二天，他向董必武提出，搬到老百姓中去。于是就搬到人民群众较多、居住条件较差的温泉宾馆。

在黄山，他走进茶园，与茶农亲切交谈。走访黄山小学，听小朋友唱“越南小英雄”，一起照像留念。散步到温泉小卖部，在门口见到安徽省黄梅剧团的著名演员严凤英等人，他请大家进绿荫茶庄，品茶交谈，问长问短。他想听听严凤英的演唱。严凤英的《天仙配》誉满全国，她歌喉甜美，情感丰富，极富艺术的感染力。当她唱到“夫妻双双把家还”时，胡志明已热泪盈眶。

胡志明终身未娶。据说他过去曾有位女友，爱在战争岁月里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可是她被敌人无情地杀害了。烽火连天，东奔西跑，他一直顾不上成个温暖的家。他将这种深埋在心里的情感付给了越南人民，付给了抗法、抗美的伟大救国事业。

当他听到严凤英这段甜润的唱腔时，昔日那位女友的美丽容貌又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

胡志明与董必武在黄山停留了十八天。在这期间，应邀援越的中国部队一、二、三支队，两个高炮师和一个高炮加强团，正向中越边境集结。中共中央军委又作出决定：组建下属四、五、六支队的援越抗美修筑公路指挥部；先遣勘察设计代表团将于6月入越。

在黄山的十八天中，胡志明没心思打太极拳。

离开黄山时，董必武特作《别黄山四绝》诗赠胡志明。其中两首：

美帝横行侵越南，
三军十万逼凶顽。
披发纓冠将往助，
那能闲逸看青山。

胡公更是当事人，
好整以暇斗强横。
即荷子肩不愿卸，
定将纸虎付牺牲。

胡志明也作《游黄山日记诗》回赠董必武。其中一首写到：

董公赠我以长诗，
我欲作诗奉和之。
可是抗美救国事，
完全占领我心思。

就在这一天，就在中国援越先头部队浩浩荡荡出关的这一天——1965年6月9日，胡志明的太极拳又行云流水般的挥舞起来。

筑路大军

1965年6月中旬的一天，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正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秘书报告：“总理，陈士渠他们来了！”

“好！”周恩来马上从藤椅上起来，走向外间会客厅。

在会客厅等候的陈士渠见总理走过来，行了个军礼，迎上前去：“总理，您好！”

周恩来热情地握住陈士渠的手。

“这是罗洪标。”陈士渠介绍说。

周恩来说：“我认识。”将手伸了过去。

陈士渠：“军委已决定，派罗洪标到援越部队工作。”

“这很好！”周恩来很高兴。罗洪标原是军委工程兵科研设计院副院长，曾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办公室附设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他曾经来往于中南海领导办公处的施工点上；与周恩来早就认识。为了不影晌中央首长办公，施工往往按排在中央领导人休息时进行，但是周恩来日理万机，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施工人员只好见缝插针。罗洪标细致、

踏实的工作作风，总理很为赞赏。

刚坐定，周恩来就说：“今天请二位来，就是为了援助越南修建公路的事，这是毛主席在湖南长沙会见胡志明主席时商定的。毛主席说，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的可靠后方。”

周恩来语气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下面的事，就是我们如何来落实了。军委决定，修筑路的任务由工程兵负责组织执行。如果只修筑主要的几条道路，估计也要八万人。这是我国援越部队出境最多的一次，时间紧，任务重，你们要抓紧准备。美帝国主义妄图从朝鲜、越南、台湾这三方面包围封锁我们，抗美援朝这一仗打破了他们的预谋。现在它又从越南这一方面来了，派出大量部队援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援越也就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保卫我们的祖国。毛主席指示，我入越部队一定要全心全意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服务，他们打得很艰苦、很坚决。我们援越的意义很重大。这个任务要完成好，为祖国争光。”

陈士渠、罗洪标一边记着周总理的指示，一边体味着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的份量。

“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次派兵援助越南，要我们充分作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物资装备的准备工作。物资器材、机械工具都要我们自带，所以准备工作一定要充分。我们已请总参负责抓总，布置这项工作。”

“你们看怎么样？”周恩来问。

由工程兵组建的我援越部队二支队已经向越南开进，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渠估计这几万大军不够，还要派遣后续部队跟上，但他想不到来得这么快，他感到时间很紧迫，就向周恩来提出：“出国部队的事，我们同总参商量，可以由广东、沈阳、昆明等军区组建几个支队，很快可以开赴集结地域。但我们钻探勘测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缺乏，能否请交通部支援？”

“可以！”周恩来肯定地说，“我告诉交通部，可以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抽调，要多少你直接找交通部商量。”

周恩来炯炯的目光望着陈士渠、罗洪标说：“还有着装，跟二支队一样，穿越南人民军军服，由广州、昆明两军后勤部门解决。这两军区在后方组织分部、兵站、医院、接收站，负责起全部援越工作的后勤保障。”又强调说：“部队进入越南后，一定要尊重越南人民和政府，关系要相处好，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陈士渠说：“总理指示很明确，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具体问题我们找总参解决。”

周恩来：“那好。工程技术和勘探设计由交通部负责。陈士渠同志，你以后参加国务院援越领导小组工作。”

陈士渠：“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请总理转告毛主席，请他放心。”

谈完话，周恩来送他们到门口。陈士渠、罗洪标他们上车了，他还在招手。

周恩来找陈士渠、罗洪标谈话之前，已与罗瑞卿谈过，对援越修建公路作了部署。

1965年6月20日，由李天佑副总参谋长主持，在北京三坐门召开了援越修路工程会议。总参、总后、工程兵、铁道兵，沈阳、广州、昆明军区领导、总参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国务院交通部的领导参加了会议。主要是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宣读了中越两国政府签署的《中国

援助越南修建公路的协定和议定书》，商议援越修路工程的具体事宜，并报军委审批。根据越方的要求，总参议定主要援建 1、3、7、8、10、11、12 等七条主要公路干线。

随后，交通部董宁、工程部崔萍、廖习仗等三人率领的代表团赴河内协商，并对 7 条线路进行现场勘察，以便进行工程设计、兵力部署和工程材料、经费预算的筹措等。该团由交通部 30 余名经验丰富的老工程师，工程兵 20 余名工程技术人员，施工部队师团干部 10 余人，还有总参、总政、总后的几名机关干部等共 70 余人组成，于 6 月 25 日从北京出发，直抵河内。

8 月 10 日至 20 日，各勘察组先后到了河内，大家马不停蹄地整理汇总勘察资料，共同研究，提出了各条公路线的走向、路基上方、桥梁、涵洞的工程量和兵力部署的初步方案。并将勘察情况与越方交通部商定后，向总参谋部、国务院交通部汇报。

随即，中央军委命令，从工程兵和各大军区抽调 400 余名干部战士到广西柳州集中，组建精干的修路工程指挥部和直属队。罗洪标为指挥部副主任，昆明军区某军副军长王传训为副主任兼司令部参谋长，交通部西安设计院院长王庚跃为副主任兼测量设计队总队长，广州军区某军政委孙正为政委，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刘月生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贵州军区参谋长阎修文和崔萍为副参谋长，《人民工兵》杂志社社长廖习仗为政治部副主任。修路工程指挥部主任暂缺，工程任务由罗洪标抓总负责，代理主任工作。在三年的时间里，罗洪标一直主持这个工作。

修路工程指挥部下属三个支队、一个测量设计总队。四支队由广州军区组建，下辖五个团；五支队由沈阳军区组建，下辖五个团；六支队由昆明军区组建，含铁道兵 13 师四个团和昆明军区两个团；测设总队由交通部和工程兵组建，下辖二十五个测设队、四个钻探队。

3 号路是我国广西凭祥和靖西县通往越南高平、太原、河内的主要干线，地形比较隐蔽，原有道路标准低，通车能力较差，改建后，可大大提高运输能力，是我国援越运输的主要公路干线。7 号路属新建，由我国云南河口通往老街、班菲、朗达，与通往河内的公路网连接。建成后是我国从河口方向通往河内的主要公路干线。8 号路属新建，是我国文山地区通往越南孟康、班菲与 7 号路连接。10 号路上的沙巴以西为新建，沙巴以东为改建，是沿中越边境的一条横向迂回路，东起老街，经沙巴跨黄连山到封土，东与 7 号路相联，西与 11、12 号路相连。

四支队负担 1 号、3 号路修建任务。

五支队负担 7 号、11 号路修建任务。

六支队负担 8 号、10 号、12 号路修建任务。

云南省民工大队配属五支队、六支队，主要在我国边境与越南公路接壤路段施工。

各支队配有高炮分队，并根据敌情，随时可请求增配高炮部队。

八万大军遵照军委命令，于 10 月、11 月先后从各个口岸秘密越过国界线，向越南开进。

如今崔萍又一次来到高平，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高平即熟悉又陌生。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的高平还是个弱小的少年的话，那么如今的高平已经是一个有作为的青年了。青山环抱着美丽的城市，一江清水从高平城下缓缓流过，仿佛向远方而来的中国军人诉说衷肠。

他疾步登高远眺，高平的景色尽收眼底。他觉得高平的建设已初具规模，到处充满着勃勃生机和活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由于美军的入侵，由于战争，高平的一群群新建筑脚手架上空无一人，人们还来不及干完活就上前线了。街面冷落，车马稀少。商店货架上有限的货物依稀排列着，偶尔光顾的人们仅问问价格，就悄然而去。高平人民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都用于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他们为解放南方，保卫北方，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正勒紧腰带过日子。一辆辆满载物资的中国车辆，也正不分昼夜地经过高平的3号公路，向南行驶。

四支队有三个团的兵力部署在3号公路上，这一线的公路改建工程已经全面展开。锤声叮当，马达隆隆，部队冒着风雨作业。蒙蒙的雨雾像巨大的帷幕悬在天边，白茫茫的。

一列中国运送援越物资的车队被大雨阻在高平附近的山路上。前面车辆车轮在泥浆中呼呼地打转，排气管咣咣地爆出青烟，卡车在泥泞的路面上颤抖了一阵，又熄火了。修路部队只好帮助推车。推了一程又一程，不一会儿又陷入了前面的路段。

在风雨中，崔萍察看了这路面，他眼见长长的车队停在马路中，雨水敲打在卡车的帆布盖上，似乎敲打在他的心头。道路不修好，物资运不上去，越南南方人民的战斗依然艰难，中国是大后方就成了一句空话。

想到这里，崔萍立即回到指挥部里，与四支队的领导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和施工计划，决定先抢修一段路基，铺设一段路面，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拿下高平这一线的改建工程，再逐步向南推进。

3号路全长236公里，从1965年11月15日开工，一直干到1967年4月15日竣工。

竣工那天，崔萍乘坐吉普车沿着平展展宽阔的公路奔驰，以一种崭新的心境体味着周围的一切。春风从窗口呼呼地扑进车篷，他感到心旷神怡。公路两旁部队临时搭起的工棚还未拆除，虽有些凌乱，但在青山绿野的衬托下，别有一番情趣。这是我军将士奋斗的足迹。崔萍本想让车开到高平城下，观赏一下一年半来的新变化，但军务在身，他只好克制自己的感情。他在心中默默地想象着高平，想象着这座年轻的城市那富于青春活力的容貌。

中国军队援助新建、改建的七条公路，根据越方要求，大都与中国境内公路相连接。其它则是越南部队机动和输送物资的重要横贯线。

1967年春，第一期工程的3号、7号、8号、10号公路先期竣工，并移交越方。修路工程指挥部又命令各支队集中兵力于第二期工程的1号、11号、12号公路沿线。

此时，表仪至坂质的1号公路已经完成过半，但夏眉山一带的工程仍很艰巨。那里地势复杂，病疫成灾，曾被当年的法国人宣布为修路的“禁区”。“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罗洪标又一次想起毛泽东的用兵之道。他像组织决战一样，组织五、六两个支队在11号、12号公路上攻坚。八万大军已基本完成修路任务，最后的攻坚决不能麻痹，他又想起毛泽东的话：“骄兵必败”。

施工专业队采取一条龙作业法，大大提高了工效。到1968年6月底，11号、12号公路相继竣工。中国部队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全部筑路任务。经中越双方验收后，1968年6月30日举行公路移交仪式。罗洪标和越南交通部部长潘仲慧分别代表中越双方在移交书上签字。

1968年7月初，越南交通部邀请中国修路工程部队组织代表团到河内参

观访问。经中央军委批准后，各支队部、团、测设总队各派两位代表，还有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廖习仗共 56 人，由罗洪标任代表团团长，于 7 月 5 日抵达河内，受到河内人民的热烈欢迎。

代表团参观了原被美机轰炸破坏，后经中国援越部队一支队和越南军民共同修复的龙边大铁桥。又访问了越南北方最大港口城市海防，游览了海上公园。欣赏了下龙湾的奇妙景致，访问了广南省，参观了由我七支队构筑的海防工事，参观了通向越南南方的胡志明小道的入口处。

7 月 15 日。总理府通知：胡志明主席接见全体代表。大家忘却了连续 10 天参观的疲劳，情绪顿时兴奋了起来。

下午，潘仲慧部长来到代表团住处，接代表团前往主席府。潘部长和罗洪标是这几年经常相处的老朋友。潘是越南南方人，与罗洪标同岁，两人亲如兄弟，无话不谈。潘仲慧私下对罗洪标说：“我们越南抗美救国斗争发展到今天，要感谢毛主席！毛主席批准我们每个连队一台‘熊猫’收音机，还批准每个战士一顶蚊帐。每天有 240 辆汽车负责运送中国援助我们的物资。毛主席为我们想得真周到。你们修路大军整整战斗了三年，为越南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现在这么快要走了，我们真舍不得呢！”

下午 3 时许，代表团到达主席府，范文同总理在门口迎候。

范文同总理领大家在会议厅坐下。他身着灰色短袖衬衫，站着，笑容可掬地对全体代表说：“我很高兴地欢迎你们的到来！告诉大家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主席要接见、看望你们。”

范文同总理的话音刚落，大家热烈鼓掌。这时，胡志明主席从会议厅后门健步走来，向大家招手致意。代表们站起来，再一次热烈鼓掌。绝大多数代表是第一次见到胡主席，他们眼中含着激动的泪花。胡主席几次招手让大家坐下，可是这热烈的气氛持续了好几分钟，掌声在会议厅中回荡。

范文同总理将罗洪标介绍给胡主席。胡主席握住罗洪标的手：“欢迎你们！”

罗洪标把廖习仗、各支队的领导一一介绍给胡主席，胡主席与他们一一握手说：“欢迎、欢迎！”

大家的目光都聚向胡主席。他穿着一件黑色绸缎的短袖衬衫，坐在主席台的中央，和善亲切的眼神凝视着全体代表，一缕银须挂在胸前。他身边坐着范文同总理，另一边坐着罗洪标。罗洪标的边上坐着潘仲慧部长，廖习仗坐在范文同总理身边。同坐的还有中国驻越武官张秀山。

掌声落下，胡主席用流利的中国话亲切地说：“同志们好！大家辛苦了！”热烈的掌声又在会议大厅里激荡。

胡志明主席微笑着摆了摆右手说：“你们援助我们修筑的这些公路，是我和毛主席在湖南长沙见面时商定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是毛主席无私的对越援助。你们在越南 3 年修路很辛苦，还有不少同志流血牺牲了。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最及时的，大量的，最真诚的，最宝贵的，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代表越南劳动党，越南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向毛主席，表示衷心地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掌声，口号声连成一片。代表团中情绪激昂。他们中有几位在昔日的朝鲜战场上见过金日成主席，其余的因为没有聆听过兄弟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讲话，所以感到很新鲜。他们感到亲切，他们感到这三年的浴血奋战值得。

他们感到这次河内之访很有意义。这些感觉和感受都汇集在小小的手掌里，变成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胡志明的话语渐渐低沉下来了，他向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向在越南国土上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而英勇牺牲的同志们表示了哀悼。向英勇负伤的同志表示了亲切的问候。这时会议厅里静悄悄的。牺牲的战友的英勇形象仿佛在代表团成员的面前浮现，他们眼中噙着泪花，他们为牺牲的战友们感到惋惜和悲痛。胡志明深切地说：“请你们放心，中国军队牺牲的同志的遗体安葬在越南国土上，我们会很好地保护他们的墓地的！”转而他又以安慰的口吻说：“革命战争是同样要付出代价的。事实证明，中越两国的关系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牢固的。我说过，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越南人民的胜利也是你们的胜利。我给你们这支军队一个荣誉：你们是来时人人敬爱，走时人人想念的革命军队。”这时罗洪标激动不已，站起来领着大家呼口号。然后代表八万中国援越部队讲了话，他说：“我们就要离开英雄的越南国土了。但只要越南人民需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就会立即回来，把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听到这里，胡志明主席带头鼓起掌来。

中国人的防空火网

为打击美国对北越空袭的气焰，1965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609团所在的高炮六十三支队奉命入越，配属六十三支队的空军高炮23团也同时出境作战。担负克夫至友谊关铁路线的防空作战任务。

高炮六十一支队1965年7月20日接到老街至仙建的铁路线防空作战任务。

六十三支队出国后，8月23日所属628团在克夫首遇美国飞机轰炸。支队分析轰炸可能升级，可能要步步向中国边境靠近。当即命令高炮609团团团长程玉山所在团二营向河友线宋化桥附近构筑阵地。

8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高炮部队坚决做到不打则已，一打就力争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一定要以胜利的战斗，表达中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英雄气概，体现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的战斗威力。”

程玉山又发动群众，四次修改作战方案。

9月的越南，天气炎热，中午气温高达摄氏40度，而敌机中午活动又很频繁。为了指挥作战，他中午从不休息，总是汗流浹背地蹲在阵地指挥所顶着太阳和指挥所的人研究作战方案。

山下有条清清的溪泉，每天晚上，组织战斗部队分批下山洗澡。

“团长，你怎么不下去洗澡？”

“不打下飞机，我就不下山！”程玉山说。他另有一分担心，是万一下山时敌机临空，贻误战机，怎么交代？直至9月20日，美机在空中爆炸，晚上他才一溜小跑冲下山，扑通一下跳进惬意的清泉中。

10月5日，美机又一次袭击宋化桥。第一批F—4飞机从西南方向低空临近。程玉山及时抓住时机全营集火射击，将他们击落。这时，美机F—105四架又狡猾地从东北方向转入攻击。程玉山又立即命令部队转移火力，集中打第一架、第三架，又击落一架。

整个战斗集火射击八次，六次取得战果。击落美机五架，击伤一架，活

捉一名美军飞行员，宋化铁路桥安然无恙。

支队召开作战会议，推广了他们集火射击的经验，程玉山却说：“不行，打得还不理想，还有几个地方要改进！”

这样的将士敌人最害怕！

这样的将士没有不打胜仗的！

团受命在凉山至北宁沿线机动作战，数月内先后转移十三次，行程 31000 多公里，作战九次，取得了击落敌机十七架、击伤四架、俘一美飞行员的辉煌战果。

在半年的对空作战中，六十三支队共击落敌机五十四架，击伤二十二架（包括空军高炮二十三团击落二十三架、击伤八架）。六十一支队半年中先后对 77 批 222 架次美机作战四十九次，击落击伤美机各三十架。628 团 6 连在 1965 年 12 月 1 日的温江战斗中，全连沉着操作，一直压缩到 2200 米才对敌开火，一个点射，二十八发炮弹就击落美机一架。

1966 年 2 月 18 日，中国援越高炮部队六十七支队接替了六十一支队，担负起安沛——老街的防空作战、掩护交通的任务。所属 625 团部署在寨湖——铺合地区，626 团在保河——老街地区，607 团、619 团部署在安沛地区。

安沛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西北重镇。省政府所在地，是滇越铁路的一个重要的物资转运站。

1965 年 1 月，越南政府要求在安沛援建一个空军机场。5 月，承建这机场的中国援越部队三支队先遣人员抵达安沛，主力部队由中国空军组成，随后进入越南。11 月 22 日开始大规模的作业施工。

新建机场位于安沛市西北四公里处。滨临红河，群山环抱。场地原有五十多条山沟，地势起伏坎坷。三支队到达时，安沛这座省城已被美机轰炸成到处瓦砾，弹坑遍地。他们面临的定是一场浴血奋战。支队领导提出“血染红河畔，铺出通天道”的战斗口号，激励部队一边修建机场，一边与美军作战。在敌机的扰乱下抢时间、争速度。

推土机、卷扬机、装载机、平路机，一排排、一列列地隆隆作业，机场工地一派繁忙紧张的施工景象。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们顶着连绵阴雨，冒着烈日酷暑，很快削平了五十九座山包，一片开阔的机场雏形展现在群山脚下、红河之滨。

在安沛建设空军机场，对美国侵略者是个巨大的威胁。美军们在轰炸安沛市的同时，对机场工地也进行了不停的扫射和轰炸。

六十七支队将安沛的 619 团部署在市区以北至鹅冠桥的地段上。607 团和 625 团一营共同担负掩护安沛车站和机场工地的防空作战任务。

据越南报刊公布，自美国扩大侵越战争以来，对安沛多次进行轰炸。从 1964 年 8 月 5 日至 1966 年 4 月 30 日，在安沛上空已击落美机三十四架。

5 月 6 日，美军空军又出动各类飞机十一批五十架，对安沛进行了空前的袭击。六十七支队驻安沛高炮部队当即迎头痛击，击落三架，击伤一架，活捉美国空军联队参谋长罗伯逊

· 诺曼尔中校。

支队长王恩谦在指挥所里踱来踱去，他好像有一种预感，5 月将有恶战，六十七支队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他蓦然想起 83 年前的 5 月。1883 年的 5 月，有个名叫刘永福的中国人率领黑旗军在河内城西二里一座小桥附近的关帝庙前，与法国侵略军展开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大刀长矛对着法国人的洋枪

洋炮。黑旗军出动了 3000 人马，分为三路向法军发起进攻。那一天，从早晨 9 点直拼杀到下午 1 点，侵略军司令李威利也丧了命。那座小桥称纸桥，这场激战日后被称为纸桥战役。这一仗，法国人损失惨重，好久喘不过气来。黑旗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争总要付出代价。当时的越王为了酬谢刘永福，封他为三宣提督、一等义良男。越南人为了表彰黑旗军的英雄业绩，在纸桥还立碑纪念。83 年过去了。

他到两个团的高炮阵地转了一圈，对战斗部署又作了调整，使 619 团的兵力、火炮配备更加集中。又指示部队加修工事，严密伪装，检修火炮、器材，随时处于准备战斗状态。

王恩谦预感的廖战真的出现了。这是六十七支队入越以来最大的最激烈的一场战斗。

5 月 6 日后，侵越美军常有侦察飞机飞临安沛外围进行电子侦察，或突然进入防区低空侦察。5 月 30 日，连续数天阴雨刚放晴，保河、寨湖就遭美机攻击。与此同时，美机对安沛防区进行最后一次侦察。

5 月 31 日白云停在半空，喷火的太阳悬在头顶，烤得大地到处蒸腾烫人。坚守在阵地上的高炮部队指战员像置身于偌大的蒸笼中，吸进鼻孔的空气都是火辣辣的。

下午 3 时 13 分，侦察分队报告安沛西南方向 110 公里处，发现一批六架美机向安沛一侧飞来。

王恩谦觉得自己预感到的这一天到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和支队指挥部的其他几位领导扼要交换想法，立即发出命令：“各级指挥所进入一等！”

五分钟内，各团和支队直属分队全部进入一等战备状态。

就在部队紧急行动之时，前方观察哨报告：“RB—66、F—4C 六架，向安沛临近！”

王恩谦判断是敌指挥、警戒机。命令部队继续监视，注意后续目标。

3 时 24 分，西南方向相继捕捉到另一批四架 F—105 美国轰炸机的行踪。

王恩谦急切地感到一场战斗就要打响。美机很快就要进入我部防区。他立即指示部队：“注意敌机俯冲！”并果断命令：“各团（营）瞄准第一架，集火射击！”

不到两分钟，敌机临近了高炮阵地。一阵猛烈的炮击，头一架飞机就翻滚着一头栽在阵地前的山脚下，轰隆一声爆炸了。后继几批敌机疯狂地向我阵地扑来，数不清的炸弹在阵地上炸响。顿时，安沛弥漫在一片火海中。

607 团五连、619 团四连阵地遭到敌机的猛烈攻击。

轰隆一声，一颗翼尾炸弹在五连阵地上爆炸，班长黄永龙腹部中弹，鲜红的血汨汨地流淌。这时黄永龙看到排长也倒下去了，手捂着流血的伤口，他冲到排长身边，拿起指挥旗，指挥全排继续战斗。一位副班长见他脸色苍白，伤势很重，抱他下去包扎；他说：“别管我，只要我们勇敢，就没有敌人的威风。狠狠打！”坚持在岗位上。他从第一批敌机投弹负伤，一直坚持到第 18 批敌机投弹，他的气管被罪恶的弹片炸破，壮烈牺牲在炮位上。

黄永龙以顽强的意志坚持战斗了 80 多分钟。

美国飞机投下的炸弹和机枪的扫射，像雨点般地落在四连高炮阵地上。山坡上的树枝在浓烈的火焰中燃烧，炮位四周的草丛、树木燃起熊熊的火焰，烤得整个阵地通红。四连二班副班长陈永林胸外受轻伤，整个胸腔受到强烈

冲击波的暴震。他感到胸中憋闷，伴随着疼痛。作为一名炮兵战士，他知道定是肺泡、血管破裂。但是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坚持战斗。正当他又冲向炮位之际，敌人的第二次攻击又接踵而来。他腹部中弹仍支撑着身子。这时火炮出了故障，他咬着牙排除了故障。他看到火炮没弹了，又跑到二十米外搬炮弹。后在救护中，人们才发现他胸部有五处被子母弹击穿。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他在安沛土地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四连连长张家贵头部负伤，腿被炸断，光荣牺牲。指导员彭祖循弹片贯穿腰部，右肋关节炸伤。

四连二班炮位内外中弹数枚，全班七人只剩负伤的三人。最后只剩双手负伤的三炮手李昭才。他一人仍坚持战斗。他沉着地把速度、航路定好，压上弹，手打高低机，左脚蹬地转方向，右脚踏发火机，向敌机开了一串的炮。

真是炸不烂，摧不垮的钢铁战士！

时至下午4时7分，已经击退敌九批二十二架的轮番进攻。此时指挥员进一步意识到，战斗规模可能比预想的还要大。再次告诫部队：“节省弹药，打近战！”命令后勤部门，立即给部队补充弹药、抢救伤员。

619团、607团的两位政委亲自率领机关干部到四连和五连阵地，鼓励和组织连队作战。

一切为了战斗的需要！

一切为了战斗的胜利！

通讯分队冒着敌机轰炸，检查和维修破坏的线路。

战斗打到4时32分，美机还在疯狂进攻。许多连队阵地上弹药紧张，炮管、枪管超过发射极限。40℃的烈日高温下连续作战，许多人中暑倒下，伤亡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各营、连炊事班、司机班全部都跑步奔向阵地，擦拭、搬运炮弹，有的冲上炮位，顶替伤亡的战士操炮射击。

附近的越南人民也纷纷前来搬运炮弹。

枪管打红了！

炮管打红了！

619团二营高机连连续更换了49支枪管，607团五连几门高炮更换了二次炮管。红亮的炮管烫得人们手掌滋滋地冒青烟。“换！”硬是一根根卸下来，他们顾不上喘口气，抗起新炮管又刷刷地装上去。

时间就是生命！

时间就是胜利！

弹药越来越紧张。619团在击溃敌人第十五批的轰炸后，不得不规定：每炮一次只准打三发！打到第十八批敌机时又提出：“一发炮弹击落一架敌机！”

阵地上处处烟火弥漫，不少战士衣服被烧得一块块的破洞，他们根本不在乎，只要人活着，就能战斗！大伙渴得要命，喉咙像火烧一般，阵地都是高坡山岭，不要说开水，就连凉水也来不及供应，有的连队就喝洗过脸的水。

支队长王恩谦越来越觉得战斗的严峻和残酷。在国内的几次革命战争中，即使在艰难的朝鲜战场上，他也没有碰到过这样严酷的战斗，成百架美机集中在一个地区，持续这么长时间的攻击。这次美国佬们紧紧咬住安沛不放，似乎要把安沛和我军炮兵阵地彻底摧毁不可。

战斗越来越激烈，中国炮兵越战越勇，美机损失越来越大。

4时47分后,狡猾的美机又利用阳光、云块连续三批猛烈地偷袭我阵地,妄图攻我措手不及。他万万没有想到,中国高炮部队早已料到这一手。部队又是连续地回击。虽然回击的炮弹不像对付前十几批那样猛烈稠密,然而命中率确很高,一架架美机栽在阵地前。

英勇的高炮部队以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安沛,保卫了越南神圣的国土。战后,高炮六十七支队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安沛人民对中国军队无不敬佩。每当遇到中国军人,总要热情地伸出大拇指,无比激动地说:“感恩懂基中国(感谢中国同志)!”“感恩懂基中国!”

美机对修路部队的轰炸逐步升级。1965年年底,美机重点袭击连接我国的两条铁路和公路的桥梁。修路部队开进后,敌机重点袭击永绥渡口、桥梁和郎信桥,企图切断江河至宣光的交通要道,阻止我大部队开进和大量援越物资的运送。

1966年3月,美国和谈阴谋破产,恢复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进一步加强对几条路线上的施工部队的侦察和攻击。一次,美机对3号路正在抢修的302团一个连队突然袭击,造成三十余人伤亡。对12号路上的315团的一个连队进行空袭,伤亡四十余人。3号路、6号路、12号路奠边府至西庄段,也成为美机轰炸的重点。

针对这种情况,崔萍组织部队认真贯彻“疏散、隐蔽、伪装”的防护原则。在便于生活,便于施工的前提下,驻地、车辆、器材适当分散。插上树枝、披上草网。做到驻地上面不露房盖,路上行人不见墙壁,做饭“不冒烟”,点灯“不见亮”,晒物“不见物”。在驻地、工地,依据地形地貌,构筑防空工事。有的工事防护强度很大,即使敌人火箭命中,工事内的人员、器材也不会受损。

配属修路指挥部六个营的高炮部队,重点保护桥梁和主要地段的施工作业。其余数千里作业线上的工程部队全靠自身的能力来对付美军的轰炸射击。原来仅有的二十个高机连已远远不适应作战需要。部队伤亡越来越大。修路指挥提出,将部分重机连改换为高机连,各营成立高机连。658挺高射机枪,提高了点多线长的部队防空作战能力。

1966年7月31日下午,稀稀的云彩在晴空中飘荡,火球似的太阳悬挂在西天。144团的指战员挥舞铁锹,紧张地作业在7号路线上,团高机连的指战员和对空观察哨,警惕地遥望天空。

“爆音!”观察哨突然发出战斗警报,指挥员紧接着下达“就定位——”的命令。当即,全连机枪手紧急进入一等状态。几乎同时,一架RF—101敌机从阵地东南侧方向低空一掠而过。因距离较远,没有开火。

高机连的指战员分析过这种美机的活动规律,他们在过航时,一般往返约20—30分钟,返航时都在阵地东北方向800—1000米的大山顶处出现。以往几次截击未能奏效,主要是阵地距大山较近,不能发现远方敌机。所以要命中目标,只有提前准备,及时开火。

连长命令所有的枪口对准预计美机出现的东北方向,等待敌人进入包围圈。指导员号召大家:“今天是7月31日,明天是建军节,揍下‘101’向八一献礼!”

话音刚落,远方传来“嗖嗖”的风声,指挥员估计这是敌机进入前的征兆,下达命令:“实弹!”喀嚓一声,子弹全部上膛。

果然，这架美机在预定的大山顶方向露头，高度仅 300 米，距离 1000 米，全连的机枪口直瞪瞪地瞄准了这家伙。“放！”所有的枪口几乎同时哒哒地射出了第一个点射。仅用了几秒钟，这架美机托拖着浓烟，喷着熊熊火舌，从阵地上空滑过，瞬间，飞行员跳伞，飞机“轰”的一声坠落在阵地西南方，飞行员距飞机残骸约 150 米处着陆，被我俘虏。

配属修路部队防空作战的大都是独立高炮营。高炮主力部队重点部署在西、北两条铁路上。

军委炮兵司令员吴克华说：“点多线长，兵力有限，这是互交作战的特点。援越作战和抗美援朝都一样。对于高射炮兵来说，反轰炸也好，反侦察也好，通常总是存在着任务与兵力之间的矛盾。互交作战一种办法是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兵力；另一种办法是固守重点，不及其余，这都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主张是：集中主要兵力重点掩护和部分兵力机动作战相结合。”

中国援越高炮部队首批入越的六十一支队在西线，以安沛为重点，六十三支队在北线，以克夫、宋化、同摸为重点。

重点掩护的目标通常是全线的枢纽和要害，也就是敌人攻击、破坏的重点。但在北线，美国曾抛开两头炸中间，不炸大桥炸小桥，原来不是重点的宋化桥就成了重点。63 支队作了新的兵力部署，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克夫至太原的新建铁路竣工后，美军轰炸的重点又转移到刘金、太原等地。1967 年 3 月 10 日、11 日，美军对太原钢铁基地的轰炸，是他们轰炸的又一升级。

太原是越南太北省省会，坐落在求江右岸，位于河内正北方向，距河内 70 余公里。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在抗法战争时期被夷为平地，一派荒凉。60 年代初，在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下，这里开始兴建大型钢铁联合企业。1964 年，第一号高炉系统正式投入生产，越南在历史上第一次自己生产出了钢铁。太原附近有丰富的铁、煤和石灰等矿产资源。河内至太原、克夫至太原的铁路迂回贯通，3 号公路又从太原经过直达河内，为钢铁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高炮六十二支队率四个团又五个独立营于 1966 年底入越，担负保卫越南这座最大的重工业城市的防空作战任务。

1967 年 1 月 15 日，美机恢复对太原的轰炸，先后多次对发电厂、钢铁厂的外围目标进行了轰炸。六十二支队大显身手，于 1 月 29 日，2 月 3 日、4 日的初战中击落敌机五架，击伤三架。

10 日下午轰炸太原钢铁基地失利，想不到地面火力如此猛烈周密，很明显这是中国高炮部队所为。但美方始终没敢公开宣布中国军队入越。西贡政权不断叫嚷中国军队入越，无非是希望美国再增兵，再添设备，以此抗衡北方共产党的联合力量。美国有美国的用意；我不宣布中国参战，但美空中力量专找中国军队轰炸，炸穿蓝制服的中国铁道部队，炸构筑沿海工事和红河三角洲防御工事的中国工程部队，炸北部湾和在越南近海航运援越物资的中国船只，炸护航的中国海军部队，炸修筑越北和中国公路的中国工程部队，炸掩护交通的中国高炮部队。美国也担心世界舆论和外交上的麻烦。这类麻烦有时像陷阱，落入后就不能自拔。聪明的中国人也考虑到这一点，所有出国的炮兵、工程兵、通讯兵、空军、海军，统称“中国后勤部队”，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编制中国后勤部队一支队、二支队、三支队。本书中提到的中国援越部队一支队、二支队、三支队，当时就称为中国后勤部队一支

队、二支队、三支队，这也是一种计谋和策略，像美国人对中国出兵从不吭气一样。

威斯特摩兰对于 10 日的中国高炮部队的火力感到惊讶，他想不到损失这么惨重。他不想就此罢休。于是打电话召集一班参谋人员；重新拟定一个作战方案。

10 日晚，六十二支队支队长袁守范、政委张克里和几位其他支队领导蹲在指挥所隐蔽部里，在暗淡灯光下，研究对付美机的策略。他们分析判断：美机破坏太原钢铁厂的企图未成，定要大规模袭击。是袁守范即令在刘舍车站的高炮 605 团二营，调到敌机主要俯冲航线上的钢铁厂东南地区；在二机场的 620 团一营，调到发电厂以西地区。加强这两处的火力。

部队连夜动员，着眼于打大仗、打恶仗，迎接敌机再度轰炸。

11 日下午，天气晴朗，一层薄薄的云彩铺散在蓝天上，太原这座重工业城市，虽然承受了昨日敌机的轰炸，但工人们照样上班作业。钢铁厂的工人们正在清理炸弹炸毁的几个房屋的瓦砾。两座高炉依然冒着青烟。炼钢工人们以火热的激情加倍努力生产着。

中国高炮部队严阵以待，一排排炮口直指蓝天。集中的高炮群已组成了严密的火网，尤其是钢铁厂上空。美机一旦闯入，定叫它有来无回。

下午 3 点 40 分，前哨雷达观察站报告，美机多批向我防区临近。刚过两分钟，就有一批四架敌机到太原高炮部队火网边缘环飞。支队长袁守范判断这是敌人的佯攻机群，要求部队跟踪监视。这四架飞机环飞一圈后，分为两组，爬高后草草俯冲攻击了附近的苏军导弹阵地后逃窜。

所有的雷达天线在转动，荧光屏上闪着绿色的敌机亮点。一个个准确的数字，连续报向支队指挥部。

突然，荧光屏上亮点消失，就像电视中不见图像一样，只有沙沙的噪音。几乎在同一时刻，全支队雷达失灵，远方情报嘎然中断。

雷达失灵，等于失去了高炮部队的眼睛。袁守范立即断明狡猾的敌人施放了大量的反雷达干扰。在这关键的时刻，他果断命令：启用观察哨跟踪目标。

就在雷达失灵的几分钟内，六批敌机向六十二支队高炮阵地和钢铁阵地轮番俯冲攻击。高炮部队猛烈开火后，敌机向高炮阵地发射了导弹。顿时，太原大地上空，炸弹的爆炸声和空中敌机的爆炸声交织成一片，浓烟翻滚，火光四起，全城迷漫在硝烟中。

敌机一次次地向钢厂俯冲，猛烈密集的火网中，一架架美机拖着乌黑的浓烟，摇摇晃晃地坠落下来。

时隔几分钟，又有四批美军轰炸机接踵而来。炸弹像雨点般落在我高炮阵地上。有的连队一个班的掩体里，就落下两颗钢珠弹。一批批战士倒下了，当他们苏醒过来，又爬上炮位操作炮盘，向美机发射出复仇的火焰。有位战士负伤 80 多处，醒来又冲上炮位，使尽全力，独自发射出两枚炮弹后牺牲在炮位上。

英雄的高炮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那天修路指挥部参谋长崔萍，正在 3 号路上检查五支队的修路情况，他听到飞机的怪叫声，听到接连不断像放鞭炮的火炮声，就爬上一座离太原不远的小山头，他静静地观察着这场激烈的太原保卫战。他说：“那天，一群群美机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向下俯冲。有的飞机机尾朝天，竖着往下冲。一架架飞机银光闪闪，在阳光下，看得清

清楚楚。高射炮弹密密麻麻，远远看去，差不多像花生豆那么大。美国飞机就在那些密密麻麻的花生豆中俯冲、爬高，撞上一两粒，飞不了多远，就会冒着一溜长长的浓烟，栽下来，有的栽不到地面就在空中开了花，有的飞一阵，坠入附近的山地里，先是看到一阵火光，随着一缕浓烟，传来了爆炸声。这边半空中的降落伞还在飘忽。”

这场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全支队击落敌机十架，击伤两架，生俘飞行员七名。

3月10日、11日，美军出动了三十三批一百零七架飞机轰炸太原钢铁基地，中国高炮部队六十二支队，在两天的战斗中，共击落敌机十八架，击伤五架，俘飞行员十名。太原钢铁基地主要设施安然无恙。

自1965年8月1日至1968年3月，前后分五批入越轮战的中国高炮部队，连同配属援越工程支队的高炮部队，共有十六个支队，辖六十三个团及部分独立营、高机连和勤务分队，总计15万余人。

1968年3月31日，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和国际压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开始逐步降级。5月31日，越美两国政府在巴黎开始和平谈判。11月1日起，美军停止轰炸和炮击越南北方。经中、越两国政府商定，中国援越高炮部队于1969年3月中旬全部回国。

中国援越高炮部队和各工程支队在越南三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共对敌作战2153次。击落敌机1707架，击伤1603架，俘虏美军飞行员四十二名。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侵略者，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大动脉与“胡志明小道”

主持总参谋部日常工作的杨成武副总长找铁道部部长兼军委铁道兵第一政委吕正操谈话。他们分析，国内铁路建设主要是西南、京原线、北京地铁，以西南为重点。而当前，支援越南应放在首要地位……

1965年4月10日，应越南政府的请求，中国派出军事代表团和铁道工作组离京，经凭祥换乘越南车辆入境。

国务院、总参谋部要求代表团和工作组：一、摸清越南铁路情况；抢修、抢建铁路需多少兵力；我高炮部队怎样掩护重要桥梁目标及所需兵力。

当时，越南北方的铁路是以河内为中心的五条辐射状干线，即河内通往友谊关的北线，通往老街的西线，通往太原的中线，通往海防的东线和通往荣市的南线。各条都是轨距一米的米轨铁路，也就是我们常称的小铁路。这几条米轨线，路基、桥梁涵洞标准低，质量差，主要桥梁又多是铁路公路两用桥，桥面低级，受洪水威胁大，又由于大桥、大站集中，目标暴露，容易遭到轰炸，加之缺乏迂回线，铁路联不成网，所以很难保障战时运输的需要。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美机不断轰炸各铁路干线，企图阻断中国大量援越物资的南运，由于美军轰炸的升级，越南北方的铁路运输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1964年4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定了关于中国帮助越南修建铁路的铁路项目有一百个，其中主要项目：

1、改建北线和中线，将原有米轨铁路改建为米轨、准轨两用的混合轨铁路。这就是后来越南人民称的“三条腿”铁路。增建、扩建数十个站、段和隧道等保障设施。改善和加强原有铁路、桥梁涵洞及配套设施，对原来标准

过低或改善受限制的路段，除适当改善外，重新开辟迂回线。

2、新建克夫至太原（克太线）的准轨铁路（部分混合轨），形成沟通北、中两线的大迂回，使各条铁路联络成网。

3、修建铁路战备工程，包括为重点大、中桥梁和车站、隧道抢建便线、便桥、渡口及迂回线，为重点站、线、桥梁架设通信迂回线铺设水底通信电缆等。

4、为十一座大小铁路桥梁进行防洪加固。

根据这些初步意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同铁道部先行派团组入越勘察，同年7月和1972年7月，又两次派出铁路专家组到越南协助组织铁路保障工作。

从中国主要铁路建设工地上紧急抽调下来的战斗力极强的铁道兵部队，迅速组成中国援越部队一支队，下辖六个团，于1965年6月23日，兵分两路，从友谊关、河口进入越南，兵力部署主要集中在北线、中线，执行对河内以北地区铁路的抢修、抢建任务。1968年8月，中国援越部队筑路工程指挥部所属六支队的两个团编入一支队，届时，一支队将士达32700余人。

高炮609团团团长程玉山率领二营于9月20日上午1时半在宋化首次迎击美机旗开得胜后，一颗炸弹在宋化桥一号桥墩附近爆炸，桥墩被毁，其余桥面受损，另一颗炸弹在桥北端60米处铁路线右侧，致使宋化桥面及两端铁路线破坏130米。

河友线立刻中断。

正在附近改建路线的一支队6团闻讯赶来侦察，拟定抢修方案，报告支队指挥部。指挥部主任龙桂林立即批准了抢修方案并匆匆赶到宋化桥头。

这是一支队出国首次反轰炸抢救桥梁。河友线是条大动脉，能否通畅，关系重大。龙桂林要求6团24小时内拿下来，让列车顺利通过。

任务艰巨，时间紧迫。部队有的扛枕木，有的平路基，有的清墩台，有的顶桥梁，迅速展开作业。绞车、起道机、起重机隆隆作响，一派紧张、热烈的气氛。

程玉山所在的高炮部队严密注视着蔚蓝的天空。

龙桂林伫立桥头，观察着每一个连队的作业。身穿淡蓝色工作服的铁道兵指战员个个像小老虎一样。每当看到这些淡蓝色的工作服，他总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这些干部战士多么可爱！4月份，部队还在国内各条线路上施工，有的干部喜气洋洋的准备结婚，有的探亲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一听说要出国支援越南、奔向抗美最前线，他们纷纷推迟婚期，探亲的立即返队，原来想转业、复员的人，一夜间全撤回了申请。

一支队6团的指战员昼夜奋战了20多个小时，提前修复了宋化桥。

一支队抢修了宋化桥后，在河友线又接连抢修了北江大桥、安员大桥、市求第一便桥、诉罗大桥，还抢修了西线外合桥梁，中线的多福大桥。在1967年1—8月间，美机大规模轰炸同模车站、克夫车站、安员车站，一支队指战员奋力抢修，克夫车站先后遭美机轰炸四十八次，四十一一次遭受严重破坏，指战员随时抢修，保障了正常运行。

1967年8月11日下午4时，美机出动了四十五架，多批、多方向地攻击了越南首都河内的龙边大桥。

龙边大桥正桥长1681米，高约20米，共19孔，中间铁路，两侧公路，它横跨红河，南联河内市，是通往河内的咽喉，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

重要的地位。

这次轰炸，龙边大桥遭受严重破坏。一支队立即命令十团开通修建不久的轮渡码头。保障铁路运输，同时积极准备抢修正桥。

时值洪水季节，红河急浪滔滔，浪头拍击河堤，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巨响。

大桥地处河内门户，事关重大，抢救方案需中越双方会谈商定。深水特大桥的抢修，对于入越一支队也是头一次。制定一个完善、正确的方案需要经过一个反复认识的过程。在渡轮保障运输的情况下，支队指挥部与越南有关单位先后商谈研究四次，9月7日最后确定抢修方案，越方抢修第8—13孔，中方抢修破坏最严重的第14、15孔。

经过十八个昼夜的奋战，于9月30日提前开通铁路、公路。24小时内顺利通过27列火车，5小时通过400辆汽车和6万余群众。

一支队受到了中共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在抢修被美军炸断的铁路的同时，一支队将主要兵力、物力集中在抢修新的铁路线和改建旧的铁路线上。他们克服了美机轰炸，酷热多雨、洪水泛滥以及不易就地取材等重重困难，于1970年6月5日提前完成了各项工程。

据有关方面统计，一支队共新建铁路117公里，改造铁路正线362公里，抢建铁路战备正线98公里，新建铁路桥梁三十座，隧道十四条，新建和扩建各种铁路站、段二十个，架设通信线路1023多公里，铺设水底通信电缆近八公里。以上工程总共开挖土石方和采砂石958万立方米。所有工程经双方验收检查，质量全部优良。

专家们认为，中国援越部队各项援建工程圆满完成，不但使越南河内以北地区的铁路干线的正线长度由508公里增加到554公里，而且由于整个线路系统得到改善，主要路段联络成网，因而运输能力成倍提高，仅河友一线的年运输能力就由原来的146万吨提高到280万吨，有力地保障了越南抗美战争的运输需要。

平展展的河乐机场就像块洁白的绢练，舒铺在翠绿的江河三角洲上。机场傍依几座小山，山势似一堵天然屏障，威武地守卫着机场。

美机飞抵良山、柏格山上空时，编成战斗队形，对河内、红河大桥、对周围的重要据点狂轰滥炸。他们没有放过河乐机场，将这块洁白的绢练炸得斑斑点点。

越方决定在河乐机场旁边的山顶上修筑团观察所，将这工程与其它坑道工程、掘开式工事一并交给七支队。

七支队担负北至福平，南至宁平，西至永福、良山、东至海防以西的京门，上下纵横数千公里纵深的永久性防御工程。整个工程分为四个工区。金榜至宁平为第1工区，河西的侧边至良山为第2工区，安勇、嘉良、志灵至东潮、京门为第3工区，福平至永福为第4工区。312团完成二工区工程后转移到红河以北的四工区。

位于河西省的河乐机场的工程由312团承担。坑道打筑得很好，最后由一批军内专家横挑鼻子竖挑眼，也没找出什么毛病来，到坑道完工后就构筑山顶的观察所。

繁星闪烁，月华如水。天下多少家庭这时已沉浸在温情的梦乡之中。然而在河乐机场，夜空下，睁着双双警惕的眼睛。七支队的高炮部队坚守在炮位上，他们时刻守卫在机场上，时刻保护着机场旁山顶观察所施工的312团

指战员。

团长许好修站在半山腰上。他连续跟班施工作业，身体显得消瘦。这位来自华北平原，抗日战争时期就投入战场的老军人，此时年龄还不到四十。他看着自己的部队嗷嗷叫的情绪，实在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他知道这支年轻的团队有敢打硬仗、敢打恶仗的老人路的作风。

七支队位于援越部队最南端，敌机轰炸最凶。

许好修安排小分队白天修盘山小道，大部队集中在夜间突击作业。这次他从祝山调 15 连，从良山调 8 连，和原在机场的 1 连，全部投入作业。这是全团战斗力突击力最强的三个连。

今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山脚下，四部拌合机同时运转，“通通”的上料声和“哗哗”的搅拌声交相呼应。8 连、15 连负责运输，将一担担的混凝土挑上山。1 连负责捣固作业。山上山下一派竞赛的场面。

许好修想：修筑观察所最多只能展开三个连的兵力，两个连队要将近 200 立方米的混凝土肩挑上山，需要整整一个晚上，体力消耗很大。越是紧张的时刻，越要照顾好部队的的生活。

他要求各连队要保证好今晚的伙食供应。

盘山道旁，摆着一排排香喷喷的肉包子，摆着一桶桶清凉解暑的绿豆汤，摆着一桶桶散发着浓郁芳香的茉莉花茶水。

运浆的两个连队像猛虎、像蛟龙，在盘山道上飞奔。

用兵之道也许在此。他们叫着劲地赶，谁也不愿落后一步。机械的隆隆声、现场的宣传鼓动声、指导员们的号子声连成一片。辉煌繁忙的山梁外面，我高炮部队黑森林的炮口直指夜空。

从晚上 6 点直到第二天 7 点，整整苦战了十三个小时。

许好修拖着疲乏的身子拄着拐棍再一次检查完工事时，一步也不想动了。他觉得很累。他觉得过去打日本鬼子、打蒋介石部队时，不觉得这么累，在朝鲜的几次战役中，有时一夜奔百余里，也不像今天这么累。是不是那时年轻？可现在还不到四十嘛！

他迷迷糊糊地想了一会儿，觉得眼皮打颤，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清晨。和煦的阳光照耀的机场、山梁一片黄灿灿。刚打好筑好的观察所，喷上了养护水，在阳光照耀下闪耀着光芒。

晨风吹拂，像一张温暖的手轻轻抚摸着许好修消瘦的脸。眺望山下，盘山道依然如旧，但却一派宁静。他知道三个连队的人马都在坑道里安然躺着呢。

七支队所属的施工部队、高炮部队和后勤支援部队，经过四百二十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于 1968 年 2 月完成了红河三角洲的工程。当部队要回撤时，中越两国军队总参谋长又签署协议留下 221 团，奔赴内排机场修筑飞机洞库。

越南北方原有机场不能起降喷气式飞机，抗美期间，越南空军曾到中国云南省的机场训练和隐蔽。为了提高越南空军的作战机动能力，应越南政府要求，中国先后帮助修建内排、安沛两个现代化机场和飞机洞库。

内排机场位于河内西北约 20 公里处，是越南北方最大的空军基地，也是河内的国际机场。这机场，由中国空军和民航局于 1961 年至 1965 年间，派出专家组设计、指导并提供成套设备和材料建成的。但当时没有修建飞机洞

库。

七支队接受任务后，朱惠泽副支队长率机关部分技术骨干力量和 221 团赶赴现场，组织设计和施工。1968 年 9 月 16 日开工，到 1969 年 11 月 5 日竣工。越方验收认为，工程完全符合战术、技术要求和设计标准。

自 1962 年后，越南南方的革命武装力量发展很快，美军和南越傀儡政权妄图把蓬勃发展的革命武装扼杀在摇篮里，四处扫荡，围剿封锁，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的给养供应十分困难。中国援助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大批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只好通过海上，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游击队阵营。大米用三层特制塑料包装充气，在大海上漂浮不沉，随着海潮漂向海岸，早已得到通报的游击武装力量就赶到海滨，将一批批大米运回根据地。大批的武器装备通过分散的渔船运到南方各海湾，转运到根据地。

中国在海南岛还提供两个港口作为从北越运送物资到南越的中转站。

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美国侦察到这一情况后，就派船在海岸巡逻，有时派直升机在空中盘旋。通过 17 度线附近的边海河顺漂南方的米，许多被美国直升机上的机枪扫射，雪白的大米哗哗地倾入河中，米袋沉没。

这时，中国使用大量外汇开辟了一条通过柬埔寨境内的西哈努克港的秘密运输线。经南中国海驶向西哈努克港的援越物资的航轮上，高高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美军虽想扰乱阻止，但它毕竟不敢在中国海域大动干戈。中国援助越南南方的装备物资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当时的朗诺集团扣留。中国明知这一点，为了援越之急需，只好默许。物资运到柬埔寨的鸚鵡嘴地区，在转运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部队的各个根据地和游击区。

侵越美军剧增，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越南南方的游击队扩充为正规军，部队扩充急需许多重型设备，加之整团整营的运动战得以发展，消耗很大。这一切，单靠西哈努克港的转运，已无法解决。

越南劳动党、越南政府和英勇的越南军民在海上偷运、在西哈努克港转运的同时，开辟了一条通过老挝狭长地区的重山峻岭抵达越南南方各根据地和柬埔寨鸚鵡嘴的羊肠小道——胡志明小道。在这条小道上，开始只能人背肩扛，逐步扩大到能推自行车、牛车、板车和大象运输。1965 年，十多万中国援越部队抵达越南北方，使北方能抽调大批部队和青壮年有组织地开赴老挝和越南南方，拓宽胡志明小道。大批中国援越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解放牌”大卡车，奔驰在胡志明小道上。

西贡伪政权和侵越美军头目威斯特摩兰对胡志明小道这条漫长幽深的补给走廊——后来也成为大部队运动作战的重要路线——焦虑不安。威斯特摩兰曾召集他的助手们多次研究对策。1964 年春组建的研究和观察大队，对胡志明小道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这支队伍后来发展成为拥有美军 2500 人，南越雇佣兵 7000 人。其中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自特种部队，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他们集中后参加空降训练，再参加特种专业训练，执行研究和观察大队特殊的作战任务。

威斯特摩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研究和观察大队在老挝的第一次军事行动，空投了一些由五至六名南越人组成的侦察小组。侦察敌军事设施和扰乱胡志明小道的交通运输。最初在者挝的一些伞降以及潜入北越的特务几乎没有成功，绝大部分被打死或被俘，但情况很快有了好转。1965 年，‘草原野火’巡逻队（通常由九名南越人和三名美国人组成）开始在老挝狭长地带活动，基本任务是收集情报，确定可能的轰炸目标的位置，查明敌部队和

补给物资的输送情况，捕捉俘虏获取口供，在敌交通线上设置地雷和传感器。然而，许多巡逻队有时也会遇到敌人，进行战斗；有些巡逻队则担负破坏任务，如袭击警卫森严的指挥部，破坏粮库和弹药库，这些都是空中袭击难以做到的。这类任务，研究和观察大队通常都是雇用居地边境两侧的蒙太纳入去，这些巡逻队招呼直升机和战斗机来攻击，也往往遭到中越部队和掩护运输人员的还击。”美军在对付胡志明小道上也确实花费了一番心机。他们研究出了一种“星光镜”，通过放大从星星发射出来的光，使值勤巡逻人员能在夜间看清东西，发现目标。还有一种“嗅人器”——主要利用人尿的气味追踪人们的活动。

“标号 36 破坏器”是从飞机上向北越和老挝的胡志明小道投放地雷。它一落地，只要触动它或有什么东西靠近它活动就能引起爆炸。一些受音响和震动影响的地面传感器，也被安置在胡志明小道上，监听这里的活动情况。改装过的 C—130 运输机，装备有照明器材、小口径速射枪、电子器材，在胡志明小道上空接收地面的传感器所发出的信号。

美国空军在泰国那空伯依（隔湄公河与老挝相望一个城镇）的基地配备了一个通信和计算站，以便从沿胡志明小道上空飞行的飞机上收集数据，以及从地面的传感器上接收信号。

为了把胡志明小道变成烂泥，阻止北越南运物资，美国空军飞机还曾在老挝狭长地带上空制造云层，实施人工降雨。

1966 年夏，黎笋率代表团访华，主要成员有阮志清、阮文灵、武志公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他们。

会谈自下午 3 点开始至 8 点，晚饭后又谈到深夜。重点是谈越南南方情况，谈斗争策略，谈斗争的困难和需要中国解决的问题，有许多时间是谈胡志明小道情况，阮文灵、武志公都谈到了胡志明小道上的困难，美军使用化学、电子武器，使用定时炸弹、钢珠子母弹等，不要说白天，就是夜间，车辆行驶的震动也常常引爆敌人撤下的地雷。

越南同志要坚决把反对美帝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气概，和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决心，在周恩来的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对阮志清、阮文灵、武志公的印象在日后的几次接待中方援越人员时多次提及。他说：“越南南方局的领导很清醒，很有希望！”

周恩来在会谈中向越南同志重申了毛泽东的话：“凡是越南南方需要的，我们就优先供应。”

周恩来曾多次强调：“要把援助越南南方的问题，看作我国援外工作中的头等重要的事情。”他对运往越南南方战场的武器装备的包装，具体要求有关部门：“要便于运输、便于携带、便于使用、便于隐蔽。”针对越南人的身材和体力，提出：弹药包装每箱最大重量也不能超过二十五公斤，大米包装备袋五十公斤。

越南南方部队身上穿的、携带的基本上都是由中国提供的。毛泽东在夏日中，还想起蚊虫叮咬，特地嘱咐有关部门：“一定要为越南战士配备蚊帐！”“给他们制作的压缩干粮要分量轻，营养好。”

当时，中国为了满足越南救国战争急需，还专门研究生产了专打直升机的 20 毫米的高射炮、为汽车通过弹坑而铺设的轻便桥、排除磁性炸弹装置、燃烧钢珠手榴弹等。

在越南抗美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数量大、品种多、范围广的武器装

备。仅在 1970 年至 1972 年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坦克三百多辆，为前二十年援越坦克的五倍。坦克、大口径火炮，中国一时生产不出来，就从人民解放军部队装备中抽调。还向越南提供了三千公里的输油管全套设备、八万件防弹衣，这些都是在中国国内紧急动员下层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

这一批批援越物资，大多通过胡志明小道，通过穆嘉山口、运到了越南南方。

1975 年，越南人民在全世界各国朋友和人民的支持下，在南方发动了规模巨大而又凌厉的春季攻势，打垮了美国一手扶植的阮文绍——阮高其傀儡政权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南方，统一了祖国。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之欢欣鼓舞，热烈庆祝越南政府和人民取得的辉煌胜利。

胜利来之不易。

胜利是用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

当越南人民欢庆胜利的喜悦时刻，中国援越军队已经班师回国，不声不响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壮烈牺牲在越南国土上的亲密战友、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却安眠在异国他乡。

越南人民军是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欢送中国军队凯旋的。中国三十二万军队援助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在越南人民中广为流传，并深深扎根在心底。这一宏伟的战斗业绩和谱写的友谊凯歌，将永远载入中越两国关系的史册。

它与山河共存。

它与日月争辉。

尼克松仰天长叹

越南战场的形势的确出乎美国人当初的预料。他们曾以为中国正在文革的浩劫中自顾不暇，很难对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但这一次又如朝鲜战争时一样，美国人再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更低估了中国人的志气与能力。

在越南南方军民取得 1968 年新春大捷之后，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同年 3 月 31 日发表讲话，提出“部分停炸”越南北方的和谈方案。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 4 月 3 日发表声明；表示随时准备派遣自己的代表同美国代表接触”。5 月 13 日，约翰逊又发表“全面停炸”越南北方的声明，提出西贡傀儡集团可以自由参加巴黎会议，民族解放阵线代表也可以出席。尼克松上台后，1969 年 1 月 25 日，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和西贡傀儡集团四方代表举行的巴黎会议正式开始。

巴黎会议举行了三年多，由于美国的顽固态度和不断阻挠，谈判长期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结果。

在巴黎谈判中，越南北南两方的代表同美国及其西贡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击破了美国在谈判中玩弄的种种阴谋诡计。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多次提出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一系列重要建议，要求美国侵略军及其仆从军全部撤出越南南方，让越南南方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这些合理主张一概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

但是，侵略者的日子也不好过。随着时月的增加，作战部队的厌战情绪

日渐益甚，战争的主动权牢牢的掌握在正义者的一方。巨大的战争消耗困扰着美国经济。越南人民驱逐侵略者的决心更加坚定。1969年9月3日，胡志明逝世。在他留下的遗嘱中号召人民：“抗美抗战可能还要延长。我国人民可能还要牺牲更多的人力物力。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决心抗击美国强盗，直到取得彻底的胜利。”“无论碰到多大的艰苦困难，我国人民也必将取得彻底的胜利。美帝国主义也必将从我国滚出去。我们祖国必将获得统一。南北同胞必将欢聚一堂。”

1971年2月2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九次全体会议发表的公报指出：“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和全军目前的抗美救国任务是：努力实现胡主席的神圣遗嘱，坚持和大力促进抗战，加强决战和决胜的意志，奋勇前进，夺取彻底的胜利，解放南方，保卫北方，和平统一祖国。”

美国政府更大的压力来自国内人民。大批的阵亡、伤残、被俘人员给美国千万个家庭带来了难以克制的不幸，国民的反战浪潮冲击着策划侵略者的野心。1970年5月8日，由于7.5万人的示威游行队伍高举反对进攻柬埔寨和反对越战的标语涌进白宫，尼克松总统被迫亲临林肯纪念馆，向聚会的群众发表讲话，并进行了劝说。但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的仅仅是群众要求强烈的两项：进行归还俘虏谈判；努力寻找失踪人员。

尼克松总统还会见了被俘人员妻子们，倾听了她们悲切的哭诉，答应继续努力进行俘虏归还工作。真是内外交困。

在巴黎会议上，越南南方代表先后提出了“十点全面解决办法”，“八点解释”和“七点建议”等重要建议。

1969年5月8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团长陈宝剑在巴黎会议第16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帮助恢复越南和平的全面解决办法”，即“十点全面解决办法”。主要内容是（一）尊重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所确认的越南人民的各项民族权利：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二）美国政府必须从越南南方撤出美军和其他外国的全部军队以及武器和军事物资，而不得提出任何条件。拆除美国在南方的一切军事基地，放弃对越南的主权、领土和安全的一切侵犯。（三）越南人民保卫自己祖国的权利是各国人民都有的神圣不可剥夺的自卫权利。在越南南方的越南武装部队的问题应由越南各个方面自己解决。（四）越南南方人民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自己的内部事务。南方人民通过自由和民主的普选决定自己的政治制度，通过普选选举立宪国会，制定宪法，成立联合政府。（五）在恢复和平与举行普选之间的时期，任何一方都不得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北方人民。代表各阶层，各派政治倾向的政治力量，凡赞成和平、独立、中立者，将在平等、民主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商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实现一个和平、独立、民主、中立的越南南方。（六）越南南方将执行和平与中立的外交政策，按照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国家建立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七）越南的重新统一问题，将在南北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和平方法逐步实现。（八）在实现和平统一前，北方和南方保证不参加军事联盟，不允许外国设立军事基地、驻扎军队和军事人员，不承认任何国家。

尼克松则提出“五点倡议”相回应：（一）整个印度支那的所有武装部队都停止武器射击，并留在他们现在据守的阵地上，即“就地停火”，而不附带先决条件。（二）建议召开一次印度支那和平会议（国际会议）。（三）

准备通过谈判制定一项全面解决办法的一部分。准备撤出全部美军。（四）要求对方也参加寻找一项真正满足全体越南人的愿望的政治解决办法的努力。公正的政治解决办法应该反映各派政治力量的目前关系。（五）建议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双方所拘留的全部战俘。

不久，尼克松又抛出了“八点建议”，其主要内容为：（一）在达成一项协议后的六个月内，所有美军及其盟国的其他外国部队完全撤出越南。（二）从撤军的同一天开始释放战俘，军队撤完时也释放完毕。（三）在达成协议后的六个月内，在越南举行一次“总统选举”，越南一切政治力量都可以参加选举和提出候选人，现任“总统、副总统”在选举一个月前辞职，由“参议院议长作为看守政府首脑。”（四）“尊重”年初关于印支日内瓦协议和1962年关于老挝的日内瓦协议。（五）印支各国的一切武装部队必须留在自己的国境内。（六）在印支全境实现全面停火。（七）对协议的军事方面，如停火、释放战俘及撤军等，实行“国际监督”。（八）对印支各国基本民族权力、地位和持久和平实行“国际保证”。军事联盟和集团的保护。（九）各方就释放在战争中被俘的军人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政府必须承担其对越南南北双方人民所造成的损失和破坏的全部责任。（十）各方将就越南南方撤出美国和美国阵营的其他外国军队，军事人员，武器和战争工具的国际监督问题达成协议。

出席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的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团长阮氏萍，1971年7月1日在巴黎会议109次全体会议上针锋相对，提出“七点建议”。主要内容是：

（一）美国政府必须停止侵略越南的战争，停止推行战争“越南化”政策，从越南南方撤走美国和美国阵营中其他外国的全部军队，军事人员，武器和战争工具，拆除在越南南方的全部美国军事基地，而不得提出任何条件。

美国政府必须明确规定从越南南方撤出全部美军和美国阵营中的其他外国军队的期限。

如果美国政府确定了期限，规定在1971年从越南南方撤走全部美军和美国阵营中其他外国军队，各方将同时商定：甲、关于从越南南方安全撤走全部美军和美国阵营中其他外国军队的事宜；乙、关于全部释放在战争中被俘的各方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包括在越南北方被俘的美国飞行员）的事宜。

（二）美国政府必须真正尊重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决权，停止干涉越南南方的内部事务，停止支持以阮文绍为首的西贡政权。越南南方各种力量将组成一个赞成和平、独立、中立和民主的新政权。

（三）越南各方将本着民族和睦、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根据战后的局势和减轻人民负担的考虑，共同解决在越南南方的越南武装力量问题。

（四）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南北双方将通过和平手段逐步实现越南的和平统一。

（五）越南南方将奉行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所有国家建立关系。

（六）美国政府必须对其给两个地区的越南人民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承担全部责任。

（七）关于对将签署的协议的尊重和国际保证的方式，各方将谋求一致的意见。

尼克松在国内外压力之下，又相继抛出所谓解决越南问题的“八点方案”和解决印支问题的“五点倡议”。直到1972年1月25日，才提出一份在撤军问题上基本符合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倡议的“八点建议”，1973年1月，巴黎和平协议签署，美军开始全部撤离，双方释放战俘，就地停火。越南战争的帷幕开始徐徐落下。

不过，即使在巴黎谈判期间，美国人仍贼心不死，在越南战场变换手法，企图为停战谈判增添筹码。

在1969年7月，尼克松宣布美军撤出越南的同时，这位被人称为“说谎总统”的尼克松改变前任“替亚洲人打仗”的“局部战争”政策，推出以实现“当地人打当地人”为目的的“战争越南化”策略。加强对南越伪军的训练与支持，在越南南方退出大规模绥靖计划，对解放区展开血腥的扫荡和屠杀游击队员和手无寸铁的平民。1970年3月5日，美国政府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出访苏联之际，支持朗诺发动政变，成立所谓的“救亡政府”。正在出访飞机上的西哈努克亲王成了“空中国王”。与此同时，美国加紧对老挝事务的干涉，以“阻止北越向南渗透”为由，继续支持老挝的反叛武装，并逐步扩大对老挝解放区的轰炸。

对美国人的垂死挣扎，中国政府毫无怯意，而是加大了对越南人民的军事和政治支持。对因苏联等国害怕美国，不敢接收而在空中避难无门的西哈努克亲王伸出了救援之手。西哈努克调转机头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阴谋，公开支持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

1975年4月30日，越南南方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贡。柬埔寨和老挝人民武装也乘势解放了金边和老挝。

当在华盛顿的尼克松从电视中看到印度支那人民欢天喜地庆祝胜利之时，不禁又一次仰天长叹。这叹息声彻底宣告了美国在印支半岛与中国较量的破产，这叹息也彻底改变了这位曾以反华反共著称的总统的政治观点，甚至也改变了他今后的政治生命……

第三章 乍暖还寒

历史的车轮运转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初，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空化。美国被越战搞得内外交困，实力大受损害，呈现出强弩之末架势。反观苏联，经济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不断膨胀，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中国则是已在国际社会的惊涛骇浪中牢牢站稳脚跟，不可阻挡地发展壮大起来，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想惜重中国和苏联争霸，从而出现了美国要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情况。而在这一过程中却又充满了波折，充满了智和勇的较量

第一节 坚冰要被凿破

1969年1月20日，理查德·尼克松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基于总的国际背景和他本人的性格以及对中国迅速发展变化、日益强大起来的认识，尼克松感到中美之间的坚冰要尽快凿破……

局势在变化

历史的车轮运转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时，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真正出现了五洲震荡、四海翻腾的局面，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进程进一步深化。特别是雅尔塔会议之后确立的美国、苏联的两极世界格局开始发生转变。战后一直到处插手、气势咄咄逼人的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搞得内外交困，实力大受损害，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呈现出了强弩之末的架势。反观苏联，它利用美国身陷越战的机会，加紧发展自己，经济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不断膨胀，力量的对比已在向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出现苏攻美守的态势。

我们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在一段时间内实行以“反对帝修反”为特征的所谓“革命外交”，不仅不必要地刺激了许多国家，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而且为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极左思潮插手外交工作提供了可乘之机。当时在北京甚至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样的恶性外交事件，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的外交由此陷入了极大的困境。而更为现实的麻烦是，力量不断增强的苏联，越来越奉行霸权主义的政策，1968年8月公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所谓“有限主权论”。它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不仅大量陈兵于两国边境地带，挑起一连串的武装冲突事件，还和蒙古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加紧在蒙古的军事部署，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对来自苏联的威胁的严重关切。此外，印度在苏联的支持下也在用敌视的眼睛看着中国，不时搞些小动作，也不能排除在中国南部对我构成威胁。东部的日本则长期追随美国，一直敌视我国。

但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外交一时陷入困境，经济在建国后却获得了很大发展，人民也在这一过程中经受了锻炼。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惊涛骇浪中已牢牢站稳脚根，不可阻挡地发展壮大起来，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面对这些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审时度势，认为应尽快把对外关系的调整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要调整与能对地区和全球局势产生影响的美国的关系，以为中国创造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

而就美国方面而言，它在与中国的二十多年较量中，自己不但未获得什么利益，反而受到了极大损害，到这时已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从而就改变了中美关系的原有基础。此外中苏之间的冲突，此刻在进一步加剧。面对此一形势，美国政府感到，在与苏联争夺霸权的困难斗争中，中国是一个可以借用的“资本”。于是在这种互相都有调整关系的意愿的大背景下，美国和中国开始了改善关系的试探。

尼克松的心事

1968年11月，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又在紧锣密鼓中开始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战胜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有两件心事：一是搞点能产生轰动效应的惊人之举以使自己名垂史册；一是要设法连任下届总统。基于这一考虑，他瞅上了一直遭到麦卡锡法禁锢、谈之让人色变的对华关系。尼克松是位生性腼腆、怯于社交、敏锐心细、对认准的事具有执着追求的毅力的人。这样，他在上任后旋即就在对华关系上开始动作，以期去实现他的目标。

早在1967年10月，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越战之后的亚洲》的重要文章。当时他正准备竞选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文章中耐人寻味地写道：“从长远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这是一个微妙的信号。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以后认为，尼克松如果上台，美国有可能改变对华政策。1968年8月9日，即在尼克松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不久，他在对一家杂志的谈话中重申：“我们必须不要忘掉中国，我们必须经常寻找机会同它对话，就像同苏联对话一样……我们不仅要注视着变化，而且必须设法促成变化。”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积极的迹象。于是在尼克松获得大选胜利后的1968年11月25日，他亲自批准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致函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建议中美两国于1969年2月20日在华沙恢复大使级会谈。这是中国方面针对尼克松所发出的积极信息而采取的一个主动行动，它立即得到了美国方面的响应（后来由于美国给予中国驻荷兰的临时代办、叛逃的廖和叔夫妇以政治避难权，为抗议美国的行径，中方取消了这次会谈）。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正式入主白宫，出任美国总统。他在其就职演说中又流露出改善对华关系的意向，他有意识地针对中国说道：“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国家，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尼克松在就职后第十二天，针对一则说某个东欧人士对中美可能进行接触感到关切的报道又给自己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一份备忘录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2月初，尼克松在一次社交活动中，私下告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他要尝试“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曼斯菲尔德20年代曾经在美国驻中国的炮舰上服过役，他对亚洲事务有着他人所不及的极大兴趣）。他对曼斯菲尔德说：“迈克，当大门打开的时候，我要你作为美国第一个高级人士去访问中国。”尼克松又说：“我自己也想去一趟，但目前看来不大可能。”

2月18日，尼克松又指示国务卿罗杰斯，要他宣告，美国要跟中国搞一个广泛的文化科学交流计划。

此时，中国的领导人对尼克松的一系列动作虽未公开作出反应，但在内部，却在认真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加强研究美国的政策苗头，摸清美国的战略意图，探讨同美国接触的可能性。1969年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受毛泽东委托，研究形势，提出对策，认为尼克松的各种动作是出于对付苏联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建议从战

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我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

2月下旬，尼克松出访欧洲诸国，想去盟国那儿寻求结束将美国搞得焦头烂额的越战的支持和表示打开与中国关系的意愿。他此行是经过慎重斟酌的，他决心要在此行中搞出点名堂。考虑到法国与河内及北京都有着外交关系，所以他把巴黎选为访问的重点，对能尽快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也就感到尤为迫切。

3月1日，尼克松总统一飞抵法国，就和戴高乐总统在陈列着法国艺术珍宝的大特丽爱依宫举行会谈。会谈未拘形式，所以气氛也就亲切自然。他们站在当年路易十四的客厅的大窗户前，欣赏着窗外那构思精巧华美、令人怡神悦目的皇家园林，轻松但却认真地交换着对苏联、越南、中国等问题的看法。当谈到中国问题时，戴高乐轻轻舒了口气说道：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实体，拥有丰富的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会使全世界各个部分都感受到它的影响，而且他们的雄心同他们的技巧相称。把他们孤立起来使他们狂暴发怒是不明智的。西方应该努力去了解中国，同她接触，对它产生影响。”

听完戴高乐的一席话，尼克松稍微停顿了一下说道：“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对话的时候，我也可能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位置。不出十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中国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

戴高乐立即表示赞同，说道：“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尼克松十分惊讶戴高乐总统与他在中国问题上的看法竟是如此一致。这次会谈更坚定了他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

探寻接触渠道

1969年3月9日中苏两国军队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4月16日至5月2日在我国新疆的铁列克提地区，中苏两国的边防军又发生武装冲突。5月9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纪念对德作战胜利24周年的命令中，把中国、美国和西德并列为苏联的主要敌人。面对这样的形势，尼克松认为探索和中国进行接触的时机成熟了，并首先向我作出具体的和解姿态：

美国国务院于当年7月21日宣布，从7月23日起，“放宽”美六类公民（议员、记者、教员、有毕业后的学位的学者和目前在院校学习的学生、科学家和医生以及美国红十字会的代表）到中国旅行。同时，允许在国外的美国旅行者和居民购买一百美元的中国制造的货物。（中国则也心照不宣地做出了回应，于7月24日释放了两名在7月16日因所驾游艇倾覆漂到中国领海而被中国人俘获的美国人。）

为了尽早实现其东方之梦，尼克松在美国国务院作此宣布之后，就又开始了他的代号为“月辉”的环球旅行。这次旅行包括巴基斯坦等亚洲六国和罗马尼亚。尼克松此行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探寻通向北京的渠道。而他所以选择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与中国都有着友好关系，他希望这两个国家，能帮助他打开通往北京的渠道。

8月1日，尼克松来到拉合尔访问，他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进行

了密谈。会谈中尼克松向叶海亚·汗总统敞开心扉，坦诚相告：

“尽管我的政府中的其他人和许多美国人不这样看，我还是认为，如果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

叶海亚·汗听完尼克松的述说，赞许地点了点头，面露喜悦说道：“我很欣赏您的见地。”

尼克松又说：“中美两国对骂了二十多年，相互敌视，互不往来，我想结束这种状况。”

叶海亚·汗听到这话，不无疑虑地瞅了瞅尼克松。他深知中美两国的过去。于是以试探的口气说到：“中美两国积怨太深了！依我看，这不是一两次对话就能把问题解决了。当然，我作为中美两国共同的好朋友，会尽力而为的。”

听到叶海亚·汗总统这么说，尼克松连忙强调说：“美国绝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传给中国人。”此前，尼克松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访问时，他就已向这两个国家领导人表示，美国完全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他这样做，是间接要中国人放心，也是对苏联的一个警告。

叶海亚·汗连忙说：“总统阁下完全可以放心。据我所知，像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中国领导人都是有教养的、务实的、说话算数的领袖。”

叶海亚·汗总统的一席话和他所表现出来的热忱与友情使尼克松极为高兴，以致于他离开巴基斯坦时心情显得极为轻松。

8月2日和3日，尼克松又应邀到布加勒斯特进行了两天访问。他和齐奥塞斯库总统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在谈到中国问题时，尼克松直接了当地告诉齐奥塞斯库：“我想在我的任期内，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

此前，齐奥塞斯库已经知道尼克松要改善与中国关系的事，并已向中国发出了一些信息，现在尼克松亲自向他说起这件事了，所以齐奥塞斯库只是微微颌首，把微笑的目光向尼克松投过去，并未打断他的话，他要听尼克松说下去。

于是尼克松继续说道：“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计划，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被错误地孤立起来，会变成一种爆炸性的力量。美国的政策是同中国和苏联两国都建立良好的关系。”

齐奥塞斯库与中国有着多年的友谊和交往，中国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向尼克松总统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我对中国人是比较了解的。中国人坚定自信，通情达理。所以我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出现新的转机。”齐奥塞斯库停顿了一下，看看尼克松有何表示，但尼克松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于是他继续说道：“我愿意充当信使，我将向中国人转达美国人的看法，并且将把中国人的看法告诉美国。”

尼克松听完齐奥塞斯库的介绍和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不觉轻轻地嘘了一口气，接着会心地笑了起来。

8月3日，尼克松离开罗马尼亚。当他与齐奥塞斯库并排乘坐敞篷汽车驶向机场时，望着鲜花映衬下的布加勒斯特，顿觉它比来时更为美丽。他望着街道两旁挥舞着鲜花和彩带的人群，不觉心潮起伏。他面露欣喜的笑容，高举起兴奋的手臂，向欢送的人们挥动。他感到，这次“月辉”之行，竟找

到了两条通往北京的秘密渠道，这实在令他鼓舞，同时也感到紧迫。此时的他，只希望快些回到华盛顿，以便去采取下一个步骤。

缓和的新步骤

尼克松回到华盛顿后，果然又采取缓和对华关系的新步骤。

8月8日，国务卿罗杰斯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发表一篇重要演说，表示美国政府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有意恢复华沙会谈。

8月1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议，尼克松出席了会议并发表讲话，他说：“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尼克松此言一出，惊动四座。在场之人都强烈地感到了这样的信息：美国越来越迫切需要与中国建立联系了。

这时，中苏之间的关系更行紧张，苏联的传媒和军方一再发出不祥的声音。这使美国感到，它不能对苏联可能进攻中国之事装聋作哑，因为那会打破世界力量的平衡，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不仅破坏地缘政治，也将打破世界的结构平衡，从而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参加完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绕道北京，于9月11日在北京机场同中国总理周恩来举行了会谈。当尼克松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时，他极为恼火，简直有点气急败坏，他被这先前毫无迹象的事情搞得目瞪口呆。因为这事发生在他加紧实现打开通往中国的大门的愿望之时，他担心这次会晤会使他的刚有起色的寻求与北京沟通的计划夭折，使他的酝酿已久的战略构想化为泡影。他本能地向自己发问：中国人要干什么？！苏联人要干什么？！于是尼克松立即把自己的安全顾问基辛格召来，征求他对此事的看法。

基辛格来到他的办公室，刚一坐定，尼克松就阴沉着脸说道：

“这次北京机场的会晤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缓和？”

其实，基辛格自己也是从报纸上读到这条消息的，他无法事前向尼克松提供一些看法。于是他试着对尼克松分析说：

“初步看来，关于会见的联合声明是非常冷淡的。声明中没有使用描述这种会谈的标准形容词‘兄弟般的’，这意味着有严重分歧。……在我看来，这是双方严阵以待，以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斗争。”

尼克松听完基辛格的分析，显得平静了许多。他又问基辛格：

“依你看，这次会晤是哪方采取了主动？是中国？还是苏联？”

“不管是中国主动想寻求和解也好，或是苏联主动想给北京最后警告也好，有一点是清楚的：中苏关系在走向一个危机点。”基辛格似乎很有把握地说。

尼克松对基辛格的分析赞许地点了点头，心中不由得升起了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

打这之后，尼克松认为未来的形势将有可能按着自己的分析判断去发展变化。于是他进一步加快了他要打通与中国取得联系的管道的步伐。他让基辛格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立即寻找机会同中国驻波兰大使接触。美国大使斯托塞尔虽是位职业外交官，但对基辛格发来的这个指示却也感到“难以置信”，所以根本就没把它当回事。不久，基辛格又发了内容完全一样的第二份电报，要求斯托塞尔照章办事，但斯托塞尔仍然没有动作。在美国的外交

史上，还不曾有过一位大使敢于不理睬白宫打去的两份指示明确的电报。接着基辛格又发出了第三份电报，但到11月下旬华沙方面还是没有动静。于是基辛格只好又发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电报，告诉斯托塞尔，“要么你照办，要么我们就要让愿意照办的人来办了”。得此电报，斯托塞尔这才看到事情的严重性。斯托塞尔有点慌了，他立即寻找机会执行任务。到12月3日，机会终于来了。在南斯拉夫人于华沙文化宫举行的展览会上，斯托塞尔认出了也来出席此展览会的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临时代办雷阳。于是斯托塞尔便设法去接近中国使节，但他几次行动都未能成功，雷阳每次都故意转身躲开。最后，雷阳代办匆匆向主人低声道别后，就迈步走向门口，下了楼梯。斯托塞尔一见雷阳离去，立即飞身下楼追赶，并在楼梯口追上了雷阳。斯托塞尔通过雷阳的波兰语翻译向中国代办转达了他的信息。

为了让中国明白，斯托塞尔的这次主动接触不是他的个人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金在第二天午间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斯托塞尔大使同中国驻波兰的使节“交谈了几句”。而那几句话就是美国邀请中国人开始“认真会谈”。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同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于是1970年1月8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两国在华沙举行的大使级会谈将于1月20日恢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中午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介绍情况时说，会谈将在“中共大使馆”举行，但几小时后，麦克洛斯基又根据白宫的指示修正其说法，说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以前从没有哪个美国发言人用正式的名称来称呼中国，这次麦克洛斯基连讲了三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为了保证这一信号能准确无误地传到中国人耳朵里，以期能引起良好的反应。此后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和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于1月21日（应中方要求改在此日）和2月20日先后进行了两次重要会谈。这是中美大使级代表两年来的第一次正式对话，它与以前的134次大使级会谈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双方经过几个月的试探，彼此都越来越表现出愿意改善关系的微妙情况下举行的会谈。

雷阳和斯托塞尔的两次会谈使中美关系取得了三点重要进展。一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首次表示，不妨碍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双方达成任何和平解决的协议”，并且随着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增长，美国将削减在台湾的军事设施。中国政府则也相应地表现出了灵活态度，不再坚持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一概免谈的那种僵硬的做法。二是两国代表都表示希望进行更高级别的会谈。美国方面表示，它愿意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也愿意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中国则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代表或者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愿予接待。三是两国都认为本国希望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

在两国决定重开大使级会谈前后，美国还作出了一些缓和姿态。美国宣布：

从1969年11月7日起，美国中止在台湾海峡的巡逻，这就结束了朝鲜战争之后十九年来的一贯做法。

从1969年12月23日起，取消只准购买一百美元中国货的限制。美商务部宣布，美国公司在国外的子公司可以与美国进行非战略性货物的贸易。

尼克松总统本人还于2月18日在向国会提出特别报告中继续向中国发出新的信息，他称中国人民是“伟大而生气勃勃的人民”、“有天赋和有教养的人民”，还强调了“同中国人民的传统友好联系”，保证美国“尽力采取

与北京改善实际关系的步骤”。

但是中美接近的势头，由于 1970 年春美国干涉柬埔寨内政，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府，并于同年 5 月直接出兵侵柬而一度遭到挫折。中国为抗议美国政府的侵略行径，取消了原定于 5 月举行的第 137 次大使级会谈，但中方只是说此时举行会谈“不合适”，“今后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员另行商定”。于是美国认为，中国的做法“极其克制”，希望不久以后就重开会谈，但华沙会谈以后再也没有恢复。

摸着石头过河

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次中断后，尼克松对这种每次都是互相宣读经过批准的稿子的会谈，似乎也不再抱有太大的期望。他决定另辟渠道，同中国领导人对话。他要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美国方面又开始向中国发出新的信号。

1970 年 6 月 15 日，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奉命去和中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武官方文联系，告诉中方：由于华沙这个论坛大公开，也太拘谨，美国希望打开另外一条保密通讯的渠道。

1970 年 7 月 10 日，尼克松对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史密斯公开表示：他赞成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在此同时，美国政府又宣布放宽或取消对美国公司与中国做生意的几种限制。

而中国在中美两国联系中断几个月后，也向美国发出信号。毛泽东主席在 1970 年 8 月亲自批准斯诺夫妇访华，并由周恩来总理安排，于 10 月 1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斯诺夫妇，还拉着斯诺的手一同参加了我国国庆二十一周年的观礼。次日面带笑容的斯诺与毛泽东主席在一起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斯诺是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人。这一不寻常的姿态意在向美国表明，中美关系的演变已经引起毛泽东本人的高度重视。

10 月初，尼克松发出了要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更为强烈的信号。他对《时代》杂志公开表示：“如果在我死之前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0 月 25 日，尼克松在白宫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他又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国和世人传递他的信息。他请叶海亚·汗传话给中国领导人，声明美国认为中美关系十分重要，他要向同中国和好的方向走去。美国绝不会同苏联合谋反对中国，他准备派遣高级使节甚至是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对话，并且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了解美国是要同中国友好的。叶海亚·汗欣然表示同意。这就是著名的“叶海亚·汗渠道”的开端。10 月 26 日，尼克松在会见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又表示了同样的愿望，并声明，他认为台湾不是一个国际问题，而是一个国内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最好用和平方式解决。当天晚上，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尼克松又有意识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称称呼中国。一位美国总统用中国的正式名称这还是第一次，它发出了西方人士称之为“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这两条渠道很快就开始发挥作用。11 月 10 日至 15 日，叶海亚·汗总统访问中国。在他抵达北京的当天，就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单独会谈。会谈中

叶海亚·汗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说美国在迫切等待中国的答复。11月14日，周总理正式答复叶海亚·汗总统：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叶海亚·汗回国后，派专人将一份无头衔、无签字的手抄备忘录，即周恩来总理的答复口信，于12月8日送到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利手里，嘱其立即口头转达给基辛格。是日下午6点多钟，希拉利大使来到基辛格的办公室，向基辛格慢慢念了此口信，基辛格则将之一字一字记下来。周总理在口信中很有风度地告诉美方：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声明中国一直愿意并且一直在设法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谈判。为了讨论美国军队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希拉利一离开，基辛格就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穿过大厅来到尼克松的椭圆形办公室，向尼克松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他们谈了很长时间，最后一致欣然接受邀请。12月26日，基辛格把美国政府的回信交给希拉利大使。信是打字机打好后复印的，信笺上端没有印字，也没有美国政府的水印图案，也没有人签字。回信表示，美国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11月下旬，罗马尼亚副总理勒杜列斯库来华访问，也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周总理再次表示了中国的立场：尼克松说愿意跟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恢复会谈，如果他真的有解决问题的愿望和办法，我们欢迎他派特使来北京谈判。周总理还补充说，不仅是特使，尼克松自己也可以来。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的。这个信息由罗马尼亚驻美大使于1971年1月才转达给基辛格，比巴基斯坦的晚了一个多月。以后，由于美方担心罗马尼亚会向苏联透露消息，就没有再使用罗马尼亚的渠道。

中国方面这之后又再次向美方传递信息，12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再次接见斯诺，并同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主席坦率地对斯诺说：“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少一点。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如果他来，我愿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目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要同尼克松解决。”

随后不久，尼克松就获知了这些消息，他倍受鼓舞。1971年2月，他在美国国会作外交报告时说：“在今后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流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并表示“凡是我們做到的，我們一定去做。”

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使用美国护照到中国旅行的限制，不需要再在护照上盖“准许到大陆中国旅行”的字样。

至此，中美两国通过互相小心试探，不断发出信息，已使双方的联系有了一定的成果，中美关系已处在一个极为微妙的阶段，只要双方再采取一些

步骤，或者有某种其他力量再推动一下，那么两国关系就可能会出现突破。而就在这时，两年一度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的名古屋举行它的第 31 届盛会，它竟为中美两国正在酝酿的关系的突破提供了一个意外的机会。

乒乓小球创造了辉煌

1971 年的阳春 3 月，正是日本的国花——樱花的怒放时节。在日本的名古屋，遍野的樱花似乎比往年开得更为绚丽，更为迷人。一簇簇，一片片，压满了枝头，似水洗胭脂，玉映霜花，又像苍茫雪海，一片云锦。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就要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举行。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国乒乓球队已失去了参加第 29、30 届世乒赛的两次机会，与世界锦标赛绝缘将近六年了。在距离盛会开幕还有两个月、距离参赛报名的截止日期只有十天的时候，中国是不是派队参赛还未作出最后决定。最后毛泽东主席力排众议，作出决断，批示道：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中国队参赛立即引起了各方的关注。美国国务院就在 4 月 1 日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北京已派了它的乒乓球队到日本参加国际比赛，几年来它参加这类体育活动还是第一次。”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行六十余人于 3 月 21 日下午安全抵达名古屋，住进了被包租下来的藤久观光旅馆。早在启程之前，代表团就得到指示：要利用锦标赛机会，积极开展友好活动，打开外交局面。并规定代表团一天向国内汇报三次情况。

3 月 27 日晚上，发生了一件未曾料到的小事情。第 31 届乒乒赛开幕前，国际乒联于 27 日晚举行冷餐招待会。主人致词之后，大家就随意走动起来，这时几个陌生的、一时也分不清他们国籍的选手与中国运动员相遇，中国运动员习惯地报之以微笑。

这几位外国选手性格热情而奔放，其中一位兴奋地说：“啊，中国人，好久不见了。你们的球打得真好！”通过翻译了解，才知道他们是美国人。后来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情况。这种偶尔发生的司空见惯的小事，平常人和新闻界人士完全不会把它当做一回事，但是中方人员对此却是极为敏感的。中国代表团领导立即将此情况回报给了国内。在中国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之后，中美两国选手在游玩中又碰到了一起。热情爽朗的美国青年毫无拘束地高声对中国运动员说：“嗨！你们的球打得真漂亮。找个机会，也和我们打上几盘吧。”中国队员有礼貌地随即应声道：“好，好。”在辽阔的海面上，青年人之间的陌生感逐渐消失，这时美国青年笑着问：“听说你们已邀请我们的朋友（指加拿大队和英国队）去你们国家访问了，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去啊？”这一切被中国队的负责人看在眼里，于是他们决定再一次向国内报告：“美国队想访华。”但是，这时候下面的人一般都认为，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时机还未成熟。当然最后决断要由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作出。适在此时，在名古屋发生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意外事情又传到了北京。4 月 4 日，乒乓球锦标赛 5 个单项全面展开。美国男队第 3 号选手格伦·科恩为了能打好下面的比赛就到训练馆练球，不想一身嬉皮士装束、失之散漫的他，练完球走出体育馆时，竟然找不到自己来时乘坐的汽车了。正在这时，一辆带有乒乓球锦标赛标志的大轿车开了过来，科恩情急生智，连连招手，轿车在他身边嘎

然停住，科恩赶忙跳上车，长出了一口气。但当他抬头环顾时，却不禁暗自吃惊，原来同车的全是中国人。于是他独自站在车门口而没找位子坐下。

车里的中国乒乓球选手都认出了这位是美国嬉皮士乒乓球运动员，大家不免也都吃了一惊。

没有人和科恩搭话，车里静悄悄的。

大轿车开始向前飞驰，车内又响起了欢声笑语，大家谈论着异国风光和赛场内外的花絮，谁也没有再去注意那位美国青年。这时，坐在车子后边的庄则栋看到科恩孤单地站在那儿，似乎与周围欢快的气氛不怎么协调，不免升起恻隐之心。为消除尴尬局面，他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向车门口走过去。庄则栋刚迈步，就有人问他干吗去，他爽快地回答说：“去和那位美国运动员聊聊。”他跨前几步，来到科恩身边。科恩立即认出了庄则栋，说：“你是庄先生！”庄则栋点了点头。

这时，庄则栋的身后响起了一连串的轻轻呼唤：“小庄，小庄，别，别……”有一双手还在庄则栋的衣服后摆上拉了一把。但庄则栋认为，来此参加比赛的共同目标，使各国运动员走到了一起，交谈一下有什么呢？友谊不是需要互相了解才能建立和增进吗？

于是庄则栋通过翻译开始和这位美国运动员交谈，这才知道，这位美国运动员叫格伦·科恩，是位大学生，他说他早已认出了这位世界上最优秀的乒坛名将，非常高兴能和庄则栋交谈。

庄则栋对科恩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到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上车。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品吧……”

说着，庄则栋从挎包里拿出一块中国的传统的工艺品——杭州织锦送给科恩。这一意外的举动把科恩高兴坏了，他连忙到自己的挎包里去搜寻，以便能找到一件合适的礼品，但他失望地叫起来：“天那！我什么也没带，连把梳子都找不出来。可是我一定要送你一件……”

科恩从未想到过他能有机会和世界冠军交流感情，他很受感动，他看到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平、友好，他紧紧地、肩并肩地和庄则栋站在一起，一直到爱知县体育馆。

大轿车在体育馆门前停下了，一群敏感的记者立即发现这一具有轰动效应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他们把照相机全都对准了庄则栋和科恩，此情此景立即成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

中美两国运动员的友好交流很快就在大会上传为佳话。中国队的举动，更深深触动了美国队的副领队，于是他立即来到中国队的驻地要求见中国队的负责人。中国队的负责人很友好地会见了。这位副领队也不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就问：“你们中国邀请我们南边的墨西哥去访问，也邀请我们北边的加拿大，你们能不能也向我们美国发出访问中国的邀请呢？”

中国领队对这突如其来的请求毫无准备，中美两国对峙几十年，美国队突然提出要求访问中国，这可非同小可，必须立即向国内请示。

毛泽东拍板

阳历4月初的北京，仍然春寒料峭，但却已可以闻到大地散发出来的泥土的芬芳。4月7日凌晨，中南海丰泽园内毛泽东主席的办公室里仍然亮

着灯光。在他的办公桌上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呈报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报告已经放了两天多了。在这份报告上周恩来总理写上了“拟同意”的三个字。毛泽东主席已数次拿起翻阅，又数次放下。他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地抽，反复考虑斟酌这件事。

时间，已进入4月7日，这是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明天，各国代表团将纷纷离开名古屋回国。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然而决断仍未拿出。时间既能创造机会，也能带走机遇。

毛泽东主席看着西方新闻媒介对中美运动员友好交往的大量报道，不由得又陷入沉思……

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条渠道不断传来美国方面的信息。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持美国护照去中国旅行的一切限制。白宫发言人在情况说明会上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决定：我们希望对方有互惠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毛泽东感到，此时的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转折关头，美国人想来中国，总统想来。现在乒乓球队想来，这是一件迫在眉睫需要立即作出决断的事。经过一番深思后，毛泽东主席产生了新的想法，他不认为这份关于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是正确的，为什么说“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不，不，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开端，为尼克松来华以及两国政府间新的合作创造一个和平环境、良好气氛，这难道不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吗？

于是毛泽东主席毅然作出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当此一决定通过中国乒乓球队传到美国队的住地时，美国队的全体人员都有点惊呆了，坐着美国队全体人员的会议室里陷入一片寂静。他们都觉得，中国仿佛是在另一个星球上。“去中国！”寂静突然间被同时发出的喊声打破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嚷着：“有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去？”嬉皮士运动员科恩则尤其激动，他高声嚷着：“要去，一定要去，我太高兴了。”并当即蹿出屋门，去向远在美国的妈妈报告。

但是一阵激动之后，他们又立即平静起来。由于美国政府和舆论媒介长期来把中国描绘成是一个青面獠牙的魔鬼，因此运动员们对去中国后自己的生命安全问题又担心起来。于是全队又作出特别决议：未成年的人立即给父母打电话，征求意见。其他的人，如果夫人没有随行，也给家里打电话通知一声。队里40岁的博根的表现则可谓“悲壮”之极。他给妻子打电话说：万一我在那边发生什么事情，请你把我写下而未及发表的文稿收藏好，日后传给两个孩子斯科特和埃里克。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尼克松在深夜得知了中国方面对美国乒乓球队的邀请，他惊喜万分，立即指示发加急电报给美国驻日本大使，通知他，白宫的意见是：乒乓球运动员务必去北京。他还连夜召开国家安全特别会议，研究制定对华新政策。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震惊了世界，更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打开了大门。纵观乒乓球运动的历史，这个小小的、只有2.5克重的乒乓球，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如此众多的政治家的注目、思索和讨论，引起他们的欣慰、推测，或者几多的不安。

4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和随行者。在此同时，尼克松发表一项声明，宣布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华人民共

和国来美国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签证,并大幅度解除已存在 20 多年的对华贸易禁令,放宽对华货币和航运的管制。

乒乓小球的转动,带动了整个世界“大球”的转动,引起了国际形势的连锁反应,从而使中国的外交一下子充满了活力,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占据有利位置。

“亨利,让我们为今后的几代干杯!”

1971年4月27日下午3点45分,基辛格的秘书哈尔·桑德斯的话突然响了起来。电话是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利打来的。对方告诉桑德斯,他有要事需要和基辛格博士紧急会晤5分钟。桑德斯告知对方,基辛格博士将于明天去休假,现在没有时间。但希拉利大使坚持要立即会晤,说他的信息不能等待。于是基辛格在下午6点12分接见了风风火火赶来的希拉利大使。出乎基辛格预料的是,大使送来的竟是他期待已久的中国对尼克松总统的去年12月16日发出的信息的答复。这封书法漂亮、但没有签名的周恩来总理的信是4月21日发出的。信中告知美方: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的关系,美国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其一切武装力量。而要解决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之间的直接讨论,才能找到办法。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晤谈。

待了不到二十分钟的希拉利一走,基辛格家也不回了,立即去找尼克松总统。他在林肯大厅找到了尼克松,简略他说了一下情况,就把周恩来总理的信交给了他,尼克松接过信,迅速地读着。他读着读着,一阵惊喜掠过眉宇之间,他快步走向自己的椭圆形办公室,坐到办公桌后的大皮椅子上,开始仔细琢磨起这封来信。一个小时后,他把基辛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待基辛格坐定,尼克松说道:“亨利,我们的努力总算有了结果,问题是我们现在如何去执行它了。一定要挑选一位能干的人去北京完成这项使命。”

基辛格考虑了一下说道:“我看派戴维·布鲁斯当这个使节最为理想。”

尼克松立即表示同意。但还是基辛格脑子转得快,他连忙说:“布鲁斯坦任在巴黎举行的关于越南问题的和平谈判的代表团团长,选他当特使中国人会不会认为这是个阴谋?”

尼克松听基辛格这么一说立即赞同地点了一下头,并轻轻地“唔”了一声,像似自语又像是说对基辛格说:“我们可不希望在这个搭桥阶段出纸漏。”

于是他们又否定了这一提议,开始讨论其他的人选。但是说了一长串的人名,也没有一个合适的。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他们或者是对尼克松的思想了解得不够细致,或者是由于他们过于引人注目,以致影响人们对尼克松自己出访的注意。所以讨论了半天也没有个结果。第二天上午他们又在尼克松的椭圆形办公室里讨论使节入选,但还是没有结果。快近中午时,尼克松突然又把基辛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现在我已决定派你去完成这一使命,我认为你是最佳人选。你就立即开始做准备工作吧。”

基辛格听完尼克松的话,虽有点惊讶,但却有如释重负之感。他感到为设计此行忙了那么长时间,现在可以善始善终去办这件事情了。

5月9日,基辛格约见希拉利大使,将一封尼克松批准但没有签名的复信交给大使,请他立即将之转交给周恩来总理。该信告知中方,尼克松总统

正式接受邀请访问北京，并建议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与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在中国国土上举行秘密会谈，以给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作准备。

乐此不疲的希拉利大使将信接在手，信心十足地对基辛格说：“阁下放心，此信将会在最短时间内到达中国领导人手里。”说完就离基辛格而去。

5月31日，华盛顿的天空一碧如洗，风和日丽。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基辛格的心情却并不是那么好。一个刚从加拿大回来的哈佛大学时的朋友告诉他，那里新建立的中国大使馆的成员抱怨说，尼克松曾被邀请访问中国，但是他不愿意去。这一奇怪的信号令他不安。正在这时，秘书进来了。秘书告诉他，希拉利大使来电话说，他有一个激动人心的信息，由北京发出的一封很长的信正在由一名巴基斯坦信使传送过来，希拉利肯定地说，中国人接受了美方复信的主要内容。这个信息一下子使基辛格兴奋起来。他立即又把此信息告诉尼克松。然后就开始焦急地等着巴基斯坦信使的到来。

6月2日下午8点10分，希拉利大使带着周恩来总理的答复急急忙忙来到基辛格的办公室。信的内容果然如希拉利大使所说。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进行准备并作必要安排。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其中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不言而喻，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美国武装部队如何具体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全部撤走的问题。信中还就基辛格博士到达中国的具体日期提出了建议，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乘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

基辛格读着这封信，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简直难以形容。他送走希拉利大使，就急步来到白宫正厅，让人把正在宴请客人的尼克松总统叫出来，他一边把信交给尼克松，一边说道：“这是巴基斯坦信使刚刚带到的周恩来总理的口信，希拉利大使赶着送了过来，他太激动了，交信给我时手都在发抖。”

尼克松拿过信，飞快地读起来，读着读着他笑了。于是基辛格兴奋地说道：“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尼克松看完信高兴极了，他当即把基辛格领到林肯厅，拿出两个玻璃杯，斟满白兰地，然后举杯说道：“让我们举杯祝贺已经取得和尚待取得的成就。”

两人喝了一口酒，尼克松又说道：“亨利，我们现在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或我们的成功，也不是为了祝贺使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几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现在所做的事而有更好的机会过和平的生活。”说完，两人一饮而尽。

通过希拉利大使和叶海亚总统穿针引线，美国方面和中国方面终于达成一致，基辛格定于7月9日到达北京，7月11日离开。从此，基辛格开始正式准备他的秘密访问中国的震惊世界的48小时之行。

中国将以礼相待

中国准备以恰当的方式接待基辛格秘密来访的工作，在周总理亲自指挥下开始秘密、稳妥地进行，成立了由叶剑英元帅、姬鹏飞代外长和黄华大使负责的领导班子。周总理和外交部领导商定，由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

礼宾司副司长王海蓉、礼宾司国宾接待处副处长唐龙彬、翻译唐闻生四人专程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接基辛格一行来京。7月3日，周恩来总理派出中国专机，将执行领航基辛格专机任务的领队徐柏龄、领航员刘志义、随机报务员王今亮秘密送到巴基斯坦首都。三人在戒备森严的军用停机坪下了飞机，未做任何检查手续，就在查克拉拉基地司令的陪同下，乘坐中国驻巴大使的汽车直接驶往中国的大使馆。7月4日，中国领航小组同巴方飞行员在中国大使馆会面，周密地研究了试航计划。7月6日，巴航派出一架波音707专机，由巴航飞行员驾驶试飞北京，在中方人员的领航下安全飞抵北京南苑军用机场。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安排，这时中国外交部的专程迎接基辛格秘密来访的章文晋等四人，立即来到南苑机场。巴航飞机加完油后，他们四人迅速登机，随着这架返回的试飞飞机，于四个多小时后抵达伊斯兰堡的查克拉拉机场。

中国驻巴大使张彤此时已在机场等候。几人下了飞机，也未顾上和张大说上几句话就立即乘车直奔大使官邸。根据安排，他们几人本可以到外面转转看看，可临来前，中央领导的再三交代嘱托，要绝对保密，这样他们谁也没有心思出去，以免引起意外。为了完成任务，几个人一直就猫在使馆里，权且休息。一直到晚上8点，叶海亚总统邀请他们和张彤大使一起去总统府参加一次小型宴会，才有了到使馆外面活动一下的机会。

叶海亚总统的宴会到11点才结束。他们回到住地又讨论了在宴会上叶海亚总统所介绍的有关基辛格抵达巴基斯坦后的情况，并商讨了具体的接应办法。这一晚他们只休息了两个多小时。

7月9日凌晨3点半，天还没有亮，章文晋等四人就赶紧起床前往机场，他们在离预定的起飞时间前10分钟到达了机场。门口警卫看到他们的汽车牌号，就挥挥手让其通过。汽车一直开到停机坪上那架已试飞过北京的巴航波音707客机前，他们下了车，沿着前舱门前的一道舷梯，迅速走进机舱，在舱门附近坐下，紧张地注视着机场的入口处，等候着那位已闻其名，略知其人，但从未见过面的美国特使基辛格的到来。其时，时针正指着凌晨4点20分。

伊斯兰堡的巧妙遁身

1971年6月下旬，白宫在一次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由其新闻秘书齐格勒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派基辛格博士于7月2日至5日到越南南方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然后到巴黎同戴维·布鲁斯磋商。在基辛格赴巴黎途中，他将同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官员们会谈。”这一例行宣布表面看与以前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它却是基辛格的代号“波罗”行动的开始。如此安排仅仅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

基辛格于7月1日离开华盛顿，沿途装模作样进行各种活动。在西贡他活动了三天，在曼谷他停留了一天，7月6日飞抵新德里。本来在他出发时有一群记者围着他，记者们认为，基辛格同越南问题的关系是唯一可以报道的内容，但当他对记者说连越南首席谈判代表他也不会会见时，新闻界对基辛格的兴趣迅速减少。所以当他7月8日抵达炎热的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时，他已引不起什么人注意了。

于是巴基斯坦政府开始按预定的计划行事了。当晚，叶海亚总统为基辛

格举行宴会，为其接风洗尘。就在宴会正要开始、客人兴致正高之时，在主宾席上就坐的基辛格突然呈难受状，接着两手抱着腹部弯下了腰，并喃喃说道：“哎哟，不知怎么搞的，我的肚子疼开了。”

叶海亚总统立即探过身来问了问情况，接着煞有介事地站起来说道：“我原定在这个美好的时刻举行盛大宴会，为我们的尊贵的客人基辛格博士接风洗尘，不想博士因连日劳顿，身感不适，肚子疼痛，宴会只好抱歉改期了。”

其实有趣的是，基辛格7月7日晚在德里时还真的闹了肚子。当时基辛格的助手洛德拿着几份材料兴冲冲地走进基辛格房间喊道：“博士，博士。”可他没有见到基辛格。

此刻只听从盥洗室里传出了基辛格的懊丧的声音：“温斯顿，我在这儿。明天我要装拉肚子，可今天就来真格的了！真是糟糕！”

基辛格走出盥洗室，又自我解嘲地说道：“我这个凡人，如此放肆地讲话，可能上帝要惩罚我了。”

洛德也急了：“真是天报应，弄假成真了。明天你到伊斯兰堡还拉肚子，波罗计划岂不是要吹了？”

基辛格苦笑了一下说道：“如到时还不好，那就只好咬咬牙，强顶过去了。”

可是此刻基辛格的肚子疼却完全是装的，他已经不闹肚子了。

接着，叶海亚·汗总统又表情严肃地说道：“伊斯兰堡天气太热，可能会影响长途跋涉的基辛格博士的康复。我将请博士先生到凉爽的纳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休养。”随后基辛格被扶出了宴会厅。于是，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记者就说基辛格准是得了“德里痢疾”。

为了遮人耳目，巴基斯坦政府又尽量把基辛格去纳蒂亚加利一事搞得尽量引人注目。插着美巴两国国旗的一支车队，在摩托车队护送下从伊斯兰堡招摇过市地驰往山区。而车里坐着的却是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约瑟夫·法兰和巴基斯坦外交部秘书苏尔坦·穆罕默德。并还真的请了一位连基辛格的照片也从未见过的巴基斯坦大夫给真得了德里痢疾的假“基辛格”看病。这位大夫以为他是在给基辛格看病，而实际上他看的是一位真正得了“德里痢疾”的特工人员。

巴基斯坦政府为了不露破绽，又组织了巴陆军参谋长、国防部长以及二十来个其他政府官员陆续到纳蒂亚加利探望贵体欠安的客人。但苏尔坦·穆罕默德一一挡驾，请探访者喝杯咖啡，告诉他们基辛格正在休息，不能打扰。

7月9日，巴基斯坦政府正式宣布，基辛格博士由于身体状况不佳，将不得不在纳蒂亚加利多住几天。

而基辛格退出宴会厅后，就回到了他下榻的巴基斯坦总统宾馆休息。夜间2点30分，苏尔坦·穆罕默德和法兰大使悄悄地来到宾馆，一直难以成眠的基辛格也已起床。漱洗完毕，用罢早餐，时间已快4点了，他们赶紧乘上巴基斯坦军用车前往查克拉拉军用机场。这时，法兰大使突然打量了一下基辛格，连忙说：“不行。你这副模样，大家太熟悉了，行人会一眼就认出你，得变一下。”

于是基辛格戴上一顶大沿帽和一副深色宽边墨镜。苏尔坦打量了一下经过化装的基辛格，笑着说：“这么一变，确实不容易认出你是基辛格了。”

基辛格和苏尔坦钻进一辆高级轿车，车队立即急驰起来。苏尔坦看到自己的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了，就向基辛格说了几句祝福的话，但基辛格陷入了

沉思，默不作声，他也就不再说话了。

基辛格一行的车队悄悄地驶出了伊斯兰堡。此刻正是人们熟睡时分，因而路上并无多少行人。

车队驶进机场，被特许进入停机坪，直奔静候在跑道尽头的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 707 飞机，而他自己乘坐的那架飞机则停放在一个更显眼的地方，以遮掩那些有疑心人的耳目。

车子在舷梯旁一停稳，苏尔坦·穆罕默德首先从车中出来，基辛格则从车子的另一个门钻了出来，接着他的随行人员温斯顿·洛德、约翰·霍尔德里奇、迪克·迈斯泽以及两名保镖、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迪也都陆续下了车。他们快步登上舷梯，走进机舱。这时，两名保镖突然发现有四个中国人坐在舱里，顿然大惊失色。顷刻间两人有点不知所措，只是敏捷地站到基辛格的两旁，作出准备要应付万一的样子。也难怪，因为直至今刻，他们才知道自己的上司要到哪里去，但却根本不知道还会有中国人陪伴。

苏尔坦·穆罕默德赶紧笑着走过来解围。他首先紧走两步和章文晋司长握手，然后又和其他人握手。接着他就把中美双方的人员一一做了介绍。两国人员相互握手致意。这可是中美两国政府高级官员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握手。有趣的是，一边是笔挺的西服，一边是严肃的中山装和女制服，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苏尔坦·穆罕默德介绍完了双方人员，又说了一些祝愿的话，就很快和大家告别下飞机了，机上只有中美双方的人员，大家不免有几分尴尬。

4 点 30 分，飞机准时起飞。数分钟后，飞机开始平稳地飞行，大家便挪到一张小桌子旁围坐在一起，但双方都用警惕的眼光注视着对方。基辛格的两名保镖更是如临大敌，他们用手铐把自己的一只手锁在黑色文件包的提手上，其紧张状让人吃惊，其尽职状却令人钦佩。

过了一会，气氛似乎轻松了不少。这时基辛格对唐闻生说道：“很高兴能见到南希·唐小姐。”

听基辛格这么一说，中方人员都感到有些吃惊。经唐闻生解释，大家才知道这是她在美国时的名字。看来，美方在得悉中方的陪同人员的姓名后，对中方人员的情况作了了解。

接着基辛格又和唐闻生开起玩笑：“南希·唐小姐，您可以竞选美国总统，而我却无此资格，因为我生在德国。”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接着基辛格又讲他怎样装着肚子疼，叶海亚总统如何郑重其事地做戏，并把他送到总统在外地的别墅去休养，引得大家好一阵子笑。

章文晋司长问：“博士先生，你们对你此行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保密？是不是承认了与中国领导人会晤会惹出麻烦？”

基辛格连忙回答说：“我们是怕万一此行未能取得成功，将会招致难以想象的后果。”接着基辛格又对章文晋司长说：“我这次到中国进行秘密访问，目的是要宣告美中两国的关系将进入一个新时期，但最好是首先能就整个形势取得一致的看法。”

章文晋司长听完立即对基辛格说：“我国周恩来总理已准备就广泛的问题与博士先生交换意见。”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基辛格连忙接过话头说道。

这时的气氛开始慢慢轻松起来，不再像先前那样拘谨了。于是基辛格又问起北京的气候和风土人情。中方人员一一都作了回答。中美两方人员考虑

到几小时之后将要在北京开始紧张的工作，而此前大家又都未能很好休息，因而谈了不大一会儿，美方人员就去了他们的后舱，中方人员去了他们的前舱分开休息了。

初进北京

飞机在继续平稳地飞行。不知不觉之中已进入中国国境。人们透过舷窗已可俯瞰晨曦初照的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群峰。稍待，旭日东升，曙光普照，红霞万朵，苍穹尽染。银白色的雪峰巍然高耸，和玫瑰色天空交相辉映，景色更显壮丽灿烂。基辛格没有去欣赏舷窗外的辉煌，他还在仔细阅读他和尼克松一起花了好多心血准备的那本有关中国的参考材料。洛德则沉醉在他那比别的美国同伴“大约早五码先进入中国”的喜悦之中。

由成功试飞过的驾驶员熟练平稳驾驶着的专机，经过4小时45分、3862公里的飞行，按预定时间飞临北京上空，中国空军出动了两架战斗机护航。12点15分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基辛格首先走下飞机，已经迎候在飞机旁的叶剑英元帅首先走上前和基辛格握手问候，用带有浓重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说道：“欢迎你！欢迎你！”然后陪同基辛格坐进宽大的红旗轿车，直奔钓鱼台国宾馆。根据美方的保密要求，红旗车的帘布只好被拉了起来，以免行人认出车内乘客是谁。但这样一来，基辛格一行却也看不到宽阔的长安街和雄伟的天安门了，也看不到独具特色的红墙绿瓦了。

基辛格一行下榻在钓鱼台靠北头、比较僻静的5号楼。这里的一切装饰都是恰到好处。屏风古色古香，花瓶典雅古朴。楼外假山玲珑，小径曲折通幽。流水潺潺鸟语花香。这里完全是一座漂亮的、保持着清乾隆时代风格和面貌的花园式庭苑。基辛格安顿就绪，开始盥洗更衣，他这才发现，自己离开伊斯兰堡时，匆忙之中竟将换洗的衬衣忘在那里了。现在没有衬衣穿了，不免大为着急。现买，密访之身，根本不能出去。就是能出去，根本来不及，而且两眼一抹黑，何处是商场，美元能否花？最后，基辛格只好向身材高大的霍尔德里奇借了几件衬衣，但当他看到这些又宽又长的衣服竟然是台湾制造的，不免又有几分沮丧，他苦笑着说：“台湾产的，真不吉利。我就担心台湾问题会使会谈卡壳。”

站在一旁的洛德赶紧说道：“我说博士，你是否太紧张了点？”

“但愿诸事顺利。”基辛格一边穿上借来的霍尔德里奇的肥大衬衣，一边接着洛德的话说道。他扣完扣子，对着镜子照了照，发现这衣服使得他显得没有脖子，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说道：“也只好这样了。”于是他系好领带，将袖子向上挽了挽。

他们又稍事休息，就开始出席中国主人叶剑英元帅为他们举行的便宴。基辛格一行走进餐厅，看到令其眼花缭乱的餐桌上的菜肴，不觉大吃一惊。菜式之繁富，制作之精美，数量之丰盛，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这位生于德国、后来移居美国的犹太人，中学毕业时的最大愿望是他日能成为一名会计。十年寒窗苦读，使他得到了成为哈佛大学教授的回报。继而他又以自己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才华，纵横捭阖，横议朝政，很快成为白宫里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但就是经历如此丰富的他，也未见过此等丰盛精美的宴席。白宫的倍受他人钦佩的有名大厨师花好几天时间准备出的重要国宴，与眼前的这个宴席相比，也不免显得逊色。

主人请客人就座后，就不停地为客人夹菜。基辛格一行可能是真的饿了，也可能是色、香、味俱为上乘的佳肴令他们胃口大开的缘故，或许是受好客主人的殷勤诚心的感动，所以一个个都甩开腮帮子吃了起来。基辛格吃到酣畅之时，大为感慨地开玩笑说道：“大约是数千年前，有位到访的贵客没有吃饱，使主人受到指责，所以自此之后，贵国就待客从丰，以免重蹈复辙。”一席话把大家说得笑了起来。宴会结束了。由于主人已告诉基辛格，周恩来总理将在4点钟来会晤他们，所以立即分手，以进行必要的准备。

基辛格一行没有回房间，而是以到院子里散步的方式讨论问题。以后他们一直采用这方法商量问题，即使是晚上很晚，他们仍在外面散步。也可能他们怕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会窃听到他们的秘密吧？

还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

下午4点钟，周恩来总理驱车来到钓鱼台5号楼同基辛格会谈。一位政府首脑屈尊去拜访一位来访的客人，尤其是一位没有政府头衔的客人，这是一项极不寻常的礼遇。基辛格受宠若惊，倍受感动。他于是率美方全体人员在会议室的屏风前面一字排开，垂手站立，准备迎接周恩来总理。但此时的他，倍显紧张而拘束，表情僵硬而呆板，简直都有点手足无措了。他看到周恩来总理走过来时，嘴唇嚅嚅了一下，却没有讲出话，但还是没等周恩来总理走到跟前，就动作有几分僵硬地把手伸了过去。周恩来总理立即会意地微笑了，并伸出那只战争给他留下的纪念、再也不能板直的右手和基辛格相握，并友好地说道：“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来的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也说：“遗憾的是这是一次还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会震惊。”

是啊，这是一次会让世界大吃一惊的握手！它在相隔二十二年之后才得以秘密实现，这一握使中美两国由隔绝而实现联系，由对峙而走向缓和，并最终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

周恩来总理然后同基辛格的随员一一握手，基辛格则在旁边做介绍。基辛格首先介绍大个子霍尔德里奇，周恩来总理边握手边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

基辛格又介绍理查德·斯迈泽。周恩来总理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当基辛格要介绍温斯顿·洛德时，洛德自报家门：“我叫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总理握着洛德的手晃了晃说道：“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接着周恩来总理又和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说起轻松的玩笑话：“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是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

周恩来总理的一番得体的轻松言谈，使基辛格一行的紧张、拘束的神态和感觉很快就消失了。

介绍完人员后就入座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叶剑英元帅、黄华、章文晋，还有熊向晖、王海蓉、唐闻生和冀朝铸则分坐在总理的两边。参加会谈的美方人员霍尔德里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成员）、斯迈泽（主管印支事务

官员)洛德(基辛格的特别助理)则分坐在基辛格的两侧。两个特工雷迪和麦克劳德则百倍警惕地站立在窗旁,随身还带着两只沉重的装满了机密文件的箱子。

周恩来总理首先对基辛格一行表示了欢迎之意,希望他们在北京过得愉快。接着基辛格讲话,他说:“我首先要感谢周总理对我们的热情招待,要是能有机会,我希望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在美国招待周总理。”

周总理落落大方地接过基辛格的话微笑着说道:“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到过西半球,但我们是在同一时间里工作,你们在白天,我则在晚上。”周总理笑得自然而得体,话说得也极为技巧,既未顺着基辛格的思路说下去,也未去反将基辛格的军。周总理接着又说道:“按照中国的习惯,请客人先讲。”

于是基辛格翻开文件夹,拿出他的预先准备的稿子,呆板地念了起来。他用了十分钟时间念完了他和尼克松花了六个小时准备的发言稿。其中心内容是阐述尼克松总统希望开始中美对话的原因。基辛格念完稿子又继续说道:“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了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在相隔二十二年之后终于来到你们美丽而神秘的国家。”

周恩来总理听到这里忙接过话头说道:“神秘?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基辛格听完翻译,不觉轻轻一笑。他干脆就此转了一下话题,谈起了美国国家的形象,谈到为什么中国使人感到神秘,为什么美国总是显得急躁,甚至有点不懂事。而周恩来总理更是巧妙应对,侃侃道来,说得基辛格一下子活跃起来。十来分钟的题外话,很快使开头的那种拘谨气氛散去了,会谈开始显得轻松自如,似乎比较好驾驭了。

接着,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交给他两项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总统进行预备性会谈。然后他谈了七个方面的问题。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基辛格着重谈了五个问题:(1)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之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湾余留的军事力量;(2)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是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3)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4)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5)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并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随后又谈到了印支问题,越战问题,日本、苏美关系、南亚次大陆等问题。

基辛格讲了足足一个小时,看得出他已讲得有点口干舌燥。他向周恩来总理微微颌了颌首,然后端起杯子喝了两口水,继而整了整手中的讲稿,并轻轻地转换一下坐姿。

一直在仔细听基辛格讲话的周恩来总理此刻微笑了一下,并未对基辛格的发言作出评论。他看了看表,说道:“哟,该吃晚饭了。”这时的气氛已进一步缓和了,周恩来又直接对基辛格说道:“会谈嘛,何必照着本子念呢?”

基辛格一听连忙说:“总理先生,我在哈佛大学教了那么多年的书,可以说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一次不同,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要是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你了。”

周恩来总理只是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然后双方人员离开座位准备晚餐。

晚饭以后，大家稍事休息，就又分坐到谈判桌两旁，继续进行紧张的会谈。周恩来总理针对基辛格谈的七个方面的问题，坦率地讲了中国的看法：

“我认真听了基辛格博士阁下所陈述的美国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我要说我们有不同的看法，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双方的立场和世界观都不同。但这种分歧并不妨碍我们两个在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寻求阁下所说的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首先一个问题是平等，换句话说是对等，一切问题从对等出发。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将来也会友好的，而且过去是友好的，将来也会友好的。我们邀请你们乒乓球队访华就是证明。”周恩来总理说到这里向两边的助手们看了看，然后继续陈述他的看法。“关于台湾问题，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容外国干涉，我们现在仍持这个立场。同时我也讲过，美国侵略并占据着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所以我们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进行谈判，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军队必须限期撤走。如果美国军队全部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美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自然就无效了，至于我们则向来就视这个条约为非法。”

谈完台湾问题，周恩来总理就开始谈别的问题。在谈到印支问题时，周恩来总理特别指出：“美国朋友总喜欢强调体面、尊严。其实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这完全取决于美国自己。你们把你们的所有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不剩，就有了最大的荣誉和光荣。”

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都努力要使对方相信自己更有道理，但始终未能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这时已是夜间11点20分，如再谈下去，显然还会是这种情况，此刻，彼此需要作些调整，改变一下方法和角度，然后再谈。于是双方结束会谈，次日继续。

周恩来总理离开谈判桌，就径直驱车去毛泽东主席处汇报。毛泽东在台湾问题、印支问题和日本问题上具体谈了自己的意见，从而使中方的谈判人员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和把握。

次日早餐后，中方让基辛格一行放松一下，去游览故宫。根据美方的要求，中方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对外关闭了故宫的部分景点，不让游客入内。在基辛格要去参观的地方则安排了几名便衣保安人员照应，以确保一切顺利。基辛格只参观了故宫三大殿和出土文物，之后就被立即带到人民大会堂和周恩来总理继续会谈。双方人员在谈判桌旁坐定后，周恩来总理稍作寒暄立即切入正题：“你们说，你们要争取中美之间的和平，争取远东的和平，世界的和平。可现在和平根本谈不上，战争一直没有停。不去说远的，现在东方——中国、朝鲜、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更不用说中东了。客观世界的发展是大动乱。我们始终积极防御，准备大乱，准备美国、苏联、日本等国一起来瓜分中国。准备苏联占领黄河以北，美国占领黄河以南，同时向我们进攻。这是完全的坏事，但我们又可把他变成好事。这样我们反而可以教育、动员下一代。我们进行人民战争，长期抗战，胜利以后可以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基辛格听完周恩来总理的这一席话，不觉笑了笑，然后说道：“请你们放心，美国以后要同中国交往，决不会进攻中国。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和对手也不会联手去对付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朝北开，可以摆到别的地方去。”

周恩来总理对基辛格的话未予置评，而是继续着自己的思路谈下去，阐述中国对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指出了基辛格讲话中那些完全与中国不同的

观点并且反问道：“既然我们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巨大的分歧，那么总统的访问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基辛格听完周恩来总理说的话，显然有点激动：“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是北京方面提出来的，美国不能接受任何条件。以后我将不再提出这个问题，由中国领导人决定是否发出邀请。”接着他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所谈，开始发表自己的反驳意见。

基辛格刚谈几句，周恩来总理打断基辛格的话说：“如果我们不先吃，鸭子就要凉了。我们还可以边吃边谈。”然后大家离开谈判桌准备进餐。

饭桌上，主客之间没有正面交锋，只是随便地闲聊。午饭过后，双方稍事休息就又开始会谈。基辛格当即开始继续反驳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周恩来总理则只是听着。在基辛格讲到美苏会谈的时候，周恩来打断基辛格的话说道：“我们是不是现在来讨论一下尼克松总统的来访时间问题？”

基辛格听到此话，立即收住话锋，说道：“这是一个不坏的建议。”

周恩来总理说：“如果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先会晤苏联领导人，很显然那将会有一些微妙问题。”

基辛格立即说道：“访问应该按已安排好的次序进行，先北京，后莫斯科。”

周恩来总理说：“既然是这样，那么尼克松总统 1972 年夏天之前来华访问是否较为合适？”

基辛格说：“访问应该更早一点。如果总统夏天来访，离美国大选时间太近，就会有争选票之嫌。”

周恩来总理说：“那可以在 1972 年春天来访，这样就可以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基辛格说：“我同意总理先生的建议。”

于是双方同意晚上商谈基辛格博士这次秘密访华公告的措辞。

震惊世界的二百个字的艰难诞生

基辛格此次秘密访华公告的草拟，是双方在经历了一个十分艰巨的讨价还价的过程后才完成的。基辛格早在来北京途中，后来又在会谈中就说，他此次访问很难能长期保密，所以有关访问的公告须得及时公布。基于此、双方需要商议一个在措辞上彼此都同意的公告，并商定同时发布尼克松访华消息。为了准确地实施这一步骤，毛泽东主席指示公告的内容在写有关尼克松来访之事时，要说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公告也不写毛泽东要见尼克松的字样。于是周恩来总理指定黄华、章文晋参加公告的讨论和草拟。

当晚 10 点一刻，周恩来总理、叶剑英、熊向晖等人去见基辛格，向他通告三件事：黄华、章文晋将同美方一道草拟公告、确定次日离开的时间和不搞录音。他们只谈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然后黄华、章文晋开始同基辛格他们讨论公告稿。当基辛格看完公告的草稿后，立即直接了当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草稿中说尼克松要求来访，中国邀请。这种表述我们不能同意。此外，这样写让人看后觉得尼克松总统像个旅游者，不够郑重。”

中方也立即陈述自己的看法，并把事情的原委详述了一遍。尽管中方讲得合情合理，但美方仍不同意这样表述。

关于草稿中说的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基辛格说：“美中双方要讨论的问

题不应只是讨论台湾问题，还应包括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

黄华和章文晋两人反复说了作如此表述的道理和原因，但美方坚决不同意。

在何为访问的适当时间一事上，双方也各执一词。

美中你来我往，各展辩才，但都无法说服对方。其时夜已深，人已倦，再怎么争，看来也难取得一致，于是双方决定明天再继续谈。

各方经过内部磋商于次日上午9点40分继续进行讨论。黄华说：“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方同意把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的起因改成‘获悉’他要来访，我们邀请的表述，这样就避免了谁是主动，谁是被动的问题了，而是双方都主动。”

基辛格一听，立即说：“这是一个好提法。”

黄华又说：“关于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这句话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而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

基辛格连忙说：“这正是我希望的说法。”

黄华继续说道：“在来访的时间上，我们将之定为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的表述法，这样就可以有较大的灵活性……”基辛格还没等黄华说完就接过黄华的话说道：“这一份公告稿十分杰出，它充分考虑了美方的意见，和美方的要求极其接近，我甚至认为它是我们双方的共同产品。只是我还有一个要求，希望在接受邀请这个词的前面加上‘愉快地’一词，这样，我认为这个公告就更完美了。”

中方同意了基辛格的意见，将“愉快地”一词加进公告草稿。一份震惊世界的仅二百字的公告就此诞生。

就是这份仅有200个字的公告，花去了中美双方人员的那么多的时间，直到基辛格离开中国前的两个小时才最后达成。

11日上午10点12分，在基辛格的住地、钓鱼台5号楼的最后一次会谈，终于在超过预定时间后结束。双方谈判人员面带笑容走出大厅，基辛格一直把周恩来总理送上汽车。会谈结束后，叶剑英元帅与基辛格一行在宾馆共进最后一次午餐。饭桌上大家已变得轻松，两天来的紧张气氛也已不见。茅台酒成了大家的话题，基辛格不断为两天来的双方合作举杯。叶帅则风趣地对基辛格说：“这次未能以正式公开的方式欢迎你，以后再补上。下次来就不必再躲在这里了，可以到外面去走走。想吃风味菜可以直接去饭馆，可以到烤鸭店品尝烤鸭。也可以到东来顺吃涮羊肉，还可以给家人买些纪念品。”

两名特工人员此刻也把从不离身的文件箱放在了一边，端起茅台酒喝个不停。

离开宾馆前，基辛格一行又到院子里散步。此刻的他们再不像前几次那样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而是哼着欢乐的美国小调，领略一下钓鱼台的湖光山色。

离开宾馆的时间到了。基辛格和宾馆的各位服务人员告别，并主动索要了那两天的《人民日报》。在路上，基辛格对送行的叶剑英元帅等人说：“我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所取得的成果超出了原来的期望，我已圆满地完成了我的秘密使命。”

叶剑英元帅说：“希望博士先生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12点20分，根据预先的安排，基辛格一行乘坐的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

专机从南苑机场准时起飞，又秘密返回巴基斯坦。历史将从此掀开新的一页。四天之后，也就是双方商定的7月15日，中美在各自的首都发表了那震惊世界的200个字的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就像预料的那样，公告发表之后，世界为之轰动了，如同往热油锅里倒进一碗凉水。世界的风向从此开始发生变化。

第二节 这事发生在巴黎

基辛格秘密访华时，中美商定，以后双方接触不必再去劳动第三国，而是直接进行，当然，巴基斯坦的渠道也不放弃。于是两国把巴黎作为彼此继续接触的秘密联络管道，双方在这里却又展开了智和勇的比试……

事情只三个人知道

1971年7月，中国驻法国的大使馆突然变得忙碌和神秘起来。黄镇大使应召匆匆赶回国内，没几日又匆匆返回巴黎。按照惯例，大使从国内回来必把所领要事及时传达给大家，然后分头协力去完成。可这次大使从国内回来却不言不语，既不传达什么，更不布置什么，然而脸上却不时露出神秘而狡黠的微笑，让人莫测高深。胆子大点的年轻人，囿于外交纪律不敢直接向大使打听，就试图通过与大使的夫人朱霖套套近乎，以便能从她那里探点口风，但照样无任何收获，因为大使夫人自己也是啥也不知。因此使馆的人既极为亢奋，又充满着等待某种事发生的焦急。

次日上午，黄镇大使突然把身为一秘的英文干部曹桂生和法文翻译韦东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接着他关好门，端坐到自己的椅子上，然后对大概由于兴奋而眼中放着光、脸上挂着笑的两个人正色说道：“现在，有一项重要任务要你们和我一起去完成。”

二人听大使这么一说，立即收敛了脸上的笑容，露出随时听候组织调遣的严肃表情。黄镇大使看着他俩的面庞，不觉会心地一笑，继续说道：“基辛格秘密访华后，中美之间的联系要通过新的管道进行。中美双方商定，把巴黎作为两国秘密联络的管道。中央决定由我作为中方联络代表，美方的联络代表是美国驻法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

一说到沃尔特斯将军，三人不觉相视一笑，因为此人可以说他们极为熟悉。就是这个沃尔特斯将军，今年4月，他追着中国驻法使馆武官方文，说要转交一封美国总统给中国政府的信。由于方文武官毫无准备，更没有独自接受外国外交人员信件的先例，所以只答应他“一定转告”就赶紧开车返回使馆汇报情况，然后黄镇大使把情况立即报告了国内。现在轮到他们自己要亲自与这个沃尔特斯将军打交道，两人不免暗暗吃了一惊。

黄镇大使又说：“这是中央的重托，除了要不折不扣坚决执行外，我特别要求你们保密。你们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人透露！你们定要记住，有关渠道的事只向我汇报。”

大使说完这几句话，就把目光转向了年轻的韦东，似在问他能否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

韦东好像看出了大使的意思，连忙挺起身子说道：“大使你放心，我平时再马虎，这件事可不敢。”

黄镇大使又把目光投向曹桂生，然后说道：“翻译主要用法文，但如果有不清楚、没有把握的地方，就要用英、法两种语言问清楚，万万不可凭主观，想当然，以致误大事。”

两位助手不约而同地深深点了点头。

大使看到两人的表情和认真劲，再联想到他俩一贯的工作态度，心里已经踏实了，但他还是又强调了一次：“你们都知道，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和

沃尔特斯打交道要多听少说，传达中央的信息时不得任意发挥。这几点定要切记勿忘！”

“大使你尽可放心，我们一定按你的指示办。”两人差不多是同时回答了大使的话。

接着他们三人开始研究接待沃尔特斯的细节。大使办公室里的凝重气氛开始缓和了。又要方便工作，又要保守秘密，做到两者兼顾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三人讨论了半天，算是找到了比较两全的办法。最后黄镇大使加重语气又重复了一次：使馆大门保持虚掩状态，既可以遮人耳目，又可以在沃尔特斯来到时，不必久等就能入内，避免暴露目标。韦东佯装在使馆院子里散步，一发现沃尔特斯出现在使馆门前，立即开门迎入。曹桂生则在使馆办公楼的门口迎候，将客人引入客厅。整个工作都计划停当，无懈可击，单等沃尔特斯的来到。

没再吃闭门羹

就在中国使馆的有关人员研究如何接待美国代表时，受命充当美方代表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心中也正在打鼓。他深知，这么多年，中美两国一直交恶。先是美国政府帮助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打内战；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美国又发动侵朝战争，想扼杀新中国的年轻政权，并出兵占领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支持蒋介石集团不断对人民共和国进行袭扰；60年代中期至今又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威胁中国的安全。这一切的一切，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使中美两国的积怨和敌视越来越深，致使人民之间不能往来。在外交场合，不管是比较随便的外交聚会，还是比较严肃的外交仪式上，双方的外交人员总是有意互不理睬，甚至也从来不打招呼。进餐时，则是隔得远远地就座，特别是当他想到4月份自己奉白宫之命，要将一封信函交给中国使馆武官，请他将其转呈给中国领导人而吃了闭门羹后，他更有一种惴惴不安之感。这一次他又奉白宫之命，充当美方代表去和中国大使联络，而且还要对美国驻巴黎大使保密，任务能不能完成呢？会不会再吃闭门羹呢？沃尔特斯的心中一点数也没有。他不由自主地在胸前划起了十字，希望上帝保佑，一切会顺利。

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公告发表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971年7月19日，沃尔特斯和往常一样按时起身漱洗进餐，但今天的心情却完全是另一种感受，他有些激动甚至有些心跳，他对今天要做的事情没有一点把握。8点20分，他将自己平时经常开的那辆牌照号码为CD6的轿车又开出了使馆。十多分钟后，他来到乔治5号路附近的拐弯处，他把车悄悄停在旁边，然后自己钻出车门，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漫步走向中国大使馆。

临近目的地时，他又心跳起来。他极力控制住自己，仔细打量这座曾经让他吃过闭门羹、感到非常陌生的中国使馆：它坐落在花园中央，离街面有一段距离。四周高墙围绕，临街一面铁栏高竖，大铁门上则都钉上了金属板。也可能是为了防止不怀好意者的窥视吧……

沃尔特斯向四周看了看，发现竟无行人。他迅速走近大门，将虚掩的大门推得更开一点，侧身走进门里。恰在这时，一位身着中山装、眼戴深度近视镜的中国年轻人站到了他的面前。

沃尔特斯以缓慢的法语说道：“我叫沃尔特斯，是美国驻巴黎使馆的武

官。我带来敝国总统致贵国政府的一封信。”

年轻人的从镜片后面射过来的目光紧盯着沃尔斯特的脸，没有立即答话。沃尔斯特以为这次又要重演上次吃闭门羹的一幕，不觉心向下一沉。

可就在这时，已认出来者正是沃尔特斯将军的中国年轻人，却把手伸了出来和他握手，并用法语说道：“我叫韦东，是大使的助手，请您跟我来。”

沃尔特斯这才松了口气，跟着韦东向使馆的办公楼走去。他们穿过花园，来到大楼的正门口。一秘曹桂生已站在这里等候，他立即把沃尔特斯领进有着典型的中国氛围的会客室，请沃尔特斯坐到沙发上。接着他俩为沃尔特斯端上食品和茶水。

不大一会儿，黄镇大使从楼上下来，走进会客室和沃尔特斯握手，并打量了一下这位高个子、头发自然弯曲、眼窝嘴巴凹陷的美国武官。身材高大的黄镇大使，一派长者风范，这使得比其小八九岁、资历也浅得多的沃尔特斯显得很拘谨。

于是黄镇大使拉沃尔特斯并肩坐在短沙发上，然后请他喝茶，说道：“你是军人，我也曾是军人，军人对军人，我们一定能谈得来。”

沃尔特斯耸了耸肩，把手一摊说道：“你是长征出来的老将军，我在你的面前只是个小兵。”

黄镇一听笑了，摇摇头说：“我自己也只是毛主席的一个小兵。”

黄镇大使的言谈总给人一种庄重感，亲切感，它顿使沃尔特斯受到感染。于是沃尔特斯开始放松了，不再像先前那么拘谨，说话也显得自如。他向黄镇大使他们谈起他的经历，后来还得意地介绍说：“我已精通八国语言。”

黄大使立即接过沃尔特斯的话茬：“希望你不久也精通中文，这样你就精通九国语言了。”

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沃尔特斯此刻更显放松，他侧过脸，神情略显严肃地说：

“大使先生，我的行动是十分保密的，连美国驻法国大使都不知情，只有我的女秘书南希·马莱特小姐知道此事。”等翻译把话译完，他继续说道：“法国的情报机构和记者无孔不入，惯于捕风捉影，无事生非，我得处处提防着。所以今天我把我的汽车停在了远离贵国使馆的地方。我们所进行的渠道来往的口信都将绕过国务院和国防部，而是直通白宫。”

黄镇大使听出了沃尔特斯说话的弦外之音，于是正色说道：“我们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使馆里除了我们三人和极个别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员知道此事外，无人知情。”

沃尔特斯理解地点了点头，接着拿出一封信交给黄镇大使，说道：“我对中国人的保密本领深信不疑。”

黄镇大使接过信，扫了一眼，说：“我会尽快把此信转交给北京。”

沃尔特斯看到黄镇大使郑重其事的态度，忙表情严肃地说：“我来是为了执行白宫的命令，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

黄镇大使也连忙说：“我赞赏你的坦率，我们都是为各自国家利益服务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双方找到共同点。”

这时沃尔特斯从沙发上站起身，说道：“只要有事，我将随叫随到。如果我不在，也要千方百计通过南希小姐找到我。”他把南希小姐的电话号码写了下来，接着他又说：“今后见面前先电话联系一下，我的代号叫‘约翰’，每次由我亲自来大使的官邸。”

“此事关系重大，预祝我们合作成功。”黄镇大使知道他不能久待，连忙和沃尔特斯握手告别。

基辛格秘密入巴黎

沃尔特斯来中国使馆后不几天的一个夜间，黄镇大使突然被告知，说基辛格将于次日来巴黎拜访他，商谈有关事情。

基辛格到巴黎拜会中国大使，以便通过这一秘密管道商谈相关事宜，是基辛格秘密访华时与周恩来总理商定的，而且国内对此事的指示电报已到达使馆。事情如此紧迫，大使不得不赶紧把在熟睡中的两个助手叫到自己的房间，商量如何接待这位基辛格博士。商量的结果是：接待中不卑不亢，热情大方，礼宾规格要高于沃尔特斯。

为了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和在与美方人员接触时总能应付裕如，处于有利位置，两名助手这几天也是克尽职守，奔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所以半夜把他们叫来，两人都显得极其疲劳，连说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小了。大使看到他俩的情况，工作刚商量完就说：“趁天还没亮，你们先去睡一会儿。好养足精神，搞好翻译。”接着又在他俩的门上贴上“昨晚加班，请勿打扰”的纸条。他自己则在两人走后，冲杯浓茶，打开台灯，一字一句推敲国内来的电报，准备与基辛格谈话的要点。

几乎在此同时，美国驻法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也在绞尽脑汁，希望找到一万全之策，把总是新闻追踪对象的大名人基辛格悄悄带进巴黎。因为老谋深算的法国情报机关控制着每一个进入法国的关卡。只要发现基辛格到了巴黎，新闻界就会立即骚动起来，大炒捕风捉影的新闻，那么秘密渠道就有可能被曝光，从而把整个事情搞砸。最后他去求助法国总统蓬皮杜。蓬皮杜果然帮了忙，只让法国情报机关的最高层知道此事，为基辛格入境提供方便。

7月25日，根据沃尔特斯的安排，基辛格在华盛顿公开露面，然后乘坐打着飞行训练幌子的“空军一号”总统座机，飞越大西洋，从法国邻国进入了巴黎，并于当晚在纳伊区沃尔特斯居住的公寓下榻。沃尔特斯可以说也是极其尽忠职守，他瞒着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卧室让给基辛格，自己则在起居室的沙发上过夜。

7月26日晨，基辛格和他的两名助手在下榻的公寓吃了早餐，就兴冲冲地去会见中国大使。虽然此刻基辛格已悄然抵达巴黎，但沃尔特斯仍然怕暴露了目标，所以他特地从车行里租了一辆老旧私车。基辛格则是稍作化妆，眼上架起一副黑色宽边墨镜，头戴一顶普通的法国帽，并把帽沿压得低低，遮住了半个脸，然后钻进这辆不会引起谁注意的旧汽车，由沃尔特斯亲自开车，直驶中国大使馆。

“请原谅，这个想法难以接受。”

这天正是礼拜一。刚过完周末的法国人，除了上班者开着自己的汽车匆匆路过中国大使馆前的那条路外，没有人再在这条街附近走动。所以沃尔特斯驾驶的这辆旧汽车，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注意就到达了中国的大使馆。和沃尔特斯第一次来使馆时的情况一样，仍是韦东接待了他们，然后领他们穿过花园，走向会客室。这一次黄镇大使站在客厅门口迎接了基辛格，然后一道

进入散发着幽香和放着中国音乐的客厅。大家一坐定，已经变得熟悉的沃尔特斯立即把来前的情景描述了一番，引得大家哈哈大笑。黄镇大使说：“你想得周到，保密工作做得好。”

黄镇大使请基辛格和沃尔特斯喝中国茉莉花茶，吃中国的荔枝干和果脯。他俩也没有任何中国式的客气，径直品尝起来。这时黄镇大使的目光扫了一下基辛格的高鼻子和大眼镜，不觉惊愕了一下，说道：“我们好像在戴高乐将军的葬礼上见过面？”

基辛格的嘴里正嚼着荔枝干，赶紧回答：“是的，当时我就想和中国大使说几句话，但这会引起轩然大波。”

黄镇大使说：“是的，当时的时机还不成熟。”

基辛格放下手中的茶杯说：“但现在不同了，美国决定将中美关系建立新的基础上。”

黄镇大使听基辛格这么一说，感到下面有可能谈谈自己昨天夜里设想的话题和把今天的谈话引上预定的目标。于是黄大使说：“中国政府同样有着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的愿望，因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

接着黄大使让助手拿来茅台酒，斟酒举杯，提议为中美关系发展干杯。基辛格拿起酒杯，和大使碰了一下，然后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嘴唇挨着酒杯边，脑袋一扬，把一杯酒喝了下去。此刻，只见他眼镜后面眼睛里放出迷迷离离的光，咂咂嘴说：“又喝到茅台酒了，我酷爱茅台酒和中国烹调。”

黄镇大使不失时机地将谈话切入正题：“周恩来总理已同意，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基辛格博士在10月下旬先到中国访问。”

基辛格愉快地颌首，连他那双铬鞣革新皮鞋，随着基辛格高兴之余挪动腿脚要说话也发出一种悦耳的嘎吱声：“我准备先访华，并建议在巴黎主持和平谈判的布鲁斯大使陪我一起去。”

黄大使听到布鲁斯的名字很不自在，尽管他尊重和自己谈话的人，但他仍然挺了一下身子说道：“请原谅，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想法难以接受。”然后他将身子很气派地靠到沙发背上。

基辛格没有马上回话，他眼睛紧盯着黄大使，接着固执地争辩说：“布鲁斯大使得到总统的充分信任。”

黄镇大使没有对基辛格的话作出评论，而只是做了可以作各种解释的点了点头的动作。

黄镇大使没有讲话，基辛格也未再争辩，基辛格已经明白，中国现在不愿意接待布鲁斯。于是他连忙换一个话题，缓和气氛：“如果我们万一和别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会谈，美国将随时通知你们，请将这一点转告周恩来。”

黄镇大使应承着，内心生起一种满意感。

“我能会见周恩来先生吗？”

8月16日，基辛格再次来到法国的一个邻国，然后由沃尔特斯带领着，绕过法国的入境稽查员，进入法国，并很快来到巴黎。接着又由沃尔特斯驾驶一辆临时租用来的、挂着私人牌照的小汽车，直接开进中国大使官邸，车则停在院子里。

主客很快就坐到一张铺着白台布的桌子旁。桌面上已摆上一个陶瓷盘正

在冒着热气的糕饼。黄镇大使首先说话：“基辛格博士，我们又一次见面，这很好。这在目前非常迫切。”大使挪动了一下盘子，却一点也没有吃，又继续说道：“关于您要求访华的口信我已转回国内。”他又碰了一下刀叉，但仍未动糕饼。

基辛格则是一点也不客气，拿着刀叉，一边不停地切吃糕饼，一边听着黄大使说话。他见黄大使不说了，就停止咀嚼，双目紧紧盯着黄大使说：“请说下去，大使先生。”

黄镇大使没有立即说话，而是拿起餐巾，认真规范地将其向上装的衣襟里塞，从而使人必然要极为注意听他将要说出的话。

“我荣幸地转告博士，我国政府已同意您于1971年10月下半月来华进行公开访问，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准备并进行政治会谈。”

基辛格听完此话，一副又高兴又着急的样子，他迅即把衣服上的餐巾扯下放到桌子上说道：“我能会见……周恩来先生吗？”

“周总理将就有关问题亲自同博士先生会谈。”黄镇大使一板一眼地回答了基辛格的问话。

待翻译把话译完，基辛格兴奋地将身子向后一靠，满脸笑容：“我感到十分荣幸。”

黄镇大使笑了笑，说：“那么就请您一直把这种情绪带到北京去吧！”

“好的，好的……”基辛格立即应承，并又随手叉起一块糕饼塞进嘴里。基辛格此刻情绪极好。

大使本来还有一些话想说，但他严格按国内指示行事，对基辛格要多听少说，一般不作具体承诺，涉及到台湾、远东等重要问题也只在必要时作原则表态。所以接下来只说了一些与传递信息无关的话，就结束了这次与基辛格的会晤。

中国不同意9月23日这个日子

8月下旬的一天，按照约定，沃尔特斯今天将再次来使馆商谈基辛格访华的预报问题。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的黄镇大使见到了约定的时间，却并未见沃尔特斯的踪影，不免有几分着急。于是他就从二楼的窗户望着使馆的大门口。十五分钟过去了，沃尔特斯才出现在使馆的院子里。韦东领着沃尔特斯迅速走进楼内。黄镇大使则顺着走廊来到客厅。沃尔特斯一见黄大使，立即上前握手：“很抱歉，大使先生，我迟到了。您知道，我的行动必须秘密。”

“没关系。”黄镇大使很宽厚地说了一句。

沃尔特斯见黄镇大使并未见怪，忙又说：“大使先生，您精神很好，瞧您满面红光！”

“您的脸色也一样，武官先生……”黄镇大使笑了笑说。“可能是窗帘映照的吧？”他向红色的幔幔扫了一眼。

两人走进客厅，沃尔特斯向房间环视了一下，目光停在了紫红色的窗帘上，流露出某种好奇的神情。

两人没有更多的开场白，很快切入正题。黄镇大使首先说话：“按照我国的作法，一般是在基辛格到达中国时发布消息，不另发预报。为照顾美方需要，中方同意在10月5日各自发表内容相同的预报。”

就基辛格访华发预报的事，是上一次沃尔特斯来使馆商量时提出来的。

当时他提出了9月22、23和10月5日三个供选择的发预报的日期，并明确提出倾向于前者。黄镇大使立即请示国内。现在国内已来了指示：美国将在联合国大会开幕时提出“两个中国”的提案，我们坚决不能同意在9月22日或9月23日公布基辛格访华的预报消息，只同意美方提出的另一时间，10月5日。

听完黄大使的话，沃尔特斯顿生困惑，他不解地问道：“大使先生，既然中方同意发预报，为何不提前至9月23日？”

黄镇大使欠了欠身子，用平缓而庄重的语气说道：“请武官先生注意9月23日这个日子。9月23日前后，美国将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提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的、旨在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在这个时候发表基辛格访华的消息意味着什么，武官先生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沃尔特斯听完翻译，皱了皱眉头，用很低的声音说：“也许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为了准确起见，黄镇大使又叫沃尔特斯用英语说了一遍，法文和英文说的完全一样，于是黄镇大使摇了摇头，说道：“中方不能同意在这个时候发布基辛格访华的预报。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没有改变。”

沃尔特斯看到黄镇大使语气坚定，没有商量余地，就不再说什么了。

访华不应为枝节 问题分散精力

黄镇大使又适时地转换话题，讨论基辛格访华时要讨论的问题。他递给沃尔特斯一份说明中方主张的书面材料。

沃尔特斯也递给黄镇大使一份书面材料，那上面写着美方主张基辛格拟同周恩来总理会谈的内容：一、尼克松访华的时间、路线、会谈形式等问题；二、除台湾问题外，还要谈远东和国际问题；三、双方高级人员互访，包括文化、科技交流等问题。

黄镇大使翻看了一下沃尔特斯给的这份材料，然后说道：“很遗憾，我不知道贵国为何把第三方面的问题提出来？”大使说完双眼紧盯着沃尔特斯。“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双方发表的公告只说‘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沃尔特斯见黄镇大使这样说，连忙说：“在我看来，在两国关系没有正式建立之前，这是一条扩大联系的渠道。”沃尔特斯望着黄镇大使，想从大使的表情中琢磨出这个问题成立的可能性。

黄镇大使一听沃尔特斯的辩解之言，立即用威严的目光扫了沃尔特斯一眼，说道：“基辛格博士访华不应为枝节问题分散精力，台湾问题不解决，高级人员互访以及其他种种交流等问题都无从谈起。”两位翻译的出色工作，使大使的讲话能像直接用法语和英语讲话一样自如。黄镇大使又压低了声音说：“事情总是有主有次。”这声音虽低，却极其具有力量，很能震慑对方。

沃尔特斯不再分辩，但却用带点警觉的口气说道：“我可以向基辛格博士转达你们的意思，现在并不需要我们在此决定什么，重要的是传递信息。”

“是这样，”黄镇大使变换一下坐姿，又用一种比较轻松的语气说道，“现在到了我们解决次要问题并可以自己作主的时候了。”黄大使用手指指桌上摆放的茅台酒和小吃，请沃尔特斯自便。

沃尔特斯因要开车，不敢喝茅台酒，只拿起了一块杏脯放进嘴里咀嚼。

黄镇大使又说：“武官先生是否陪同基辛格博士一起访华？”

“我很希望博士带我一起去中国访问，可是他决定不这样做。”沃尔特斯很懊丧地说。

黄镇大使连忙说：“我已向中国政府谈过你的情况，你为打开这关闭了达二十五年之久的中美关系大门出过力。”

“在美国，军人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不能竞选公职。还有一条法律，在最近十年内曾在军界供职的人不能当国防部长。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公平的。”沃尔特斯在黄大使的面前发起了牢骚。

9月22日，沃尔特斯应约再次悄悄地来到中国大使馆，会见了黄镇大使，进一步交换了有关基辛格的飞机和上海虹桥机场指挥塔进行通讯联络所用的频率的问题。

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之后，尼克松访华之前，巴黎的这条秘密联络渠道变得更为忙碌了，沃尔特斯差不多天天都来拜访大使馆。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的相关事宜，二是把一些一般是正式外交途径才予以解决的问题传达给对方国家的首脑，以期求得解决。所以这条秘密渠道也起到了某种外交途径的作用。

在尼克松访华前夕，沃尔特斯又来到中国使馆，他把出席与中国人进行各种会谈的美方人员名单、飞行计划表和随同尼克松总统访问的办事组人员名单、一份新闻发布会的讲稿和一面总统汽车专用的小旗，交给黄镇大使，黄大使则交给沃尔特斯一张尼克松访问杭州时的住房安排表。黄镇大使收下东西后，严肃地对沃尔特斯警告说：“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台湾有人企图击落飞往中国大陆的总统座机，而战机上则涂上了我们空军飞机的标志，很难断定这个消息是否准确，但提供给你们注意。”

听完黄镇大使的话，沃尔特斯连连点头，忙说：“非常感谢大使先生的及时通报。我们已采取防范措施。”

黄镇大使又说：“我国负责尼克松总统座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内上空的安全。”

在沃尔特斯任美方联络代表期间，他与黄镇大使共秘密会晤四十五次，为基辛格和尼克松的成功访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在这一系列的会晤中，也充满了双方智慧和勇气的较量，黄镇大使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为我们国家争得了最大的利益，也使沃尔特斯不得不发出由衷的赞佩。尼克松访华后，巴黎的秘密渠道改为公开渠道，由美国驻法国大使沃森和黄镇大使进行联系。沃尔特斯则调任美国中央情报局任副局长，黄镇大使为他饯行，两人成了各为自己国家效力的朋友。巴黎这条公开渠道一直工作到1973年2月中美双方决定互设联络处为止。双方又联系了五十三次。

